

三联
耳关

生活

®

2015.9.14
2015年第37期
www.lifeweek.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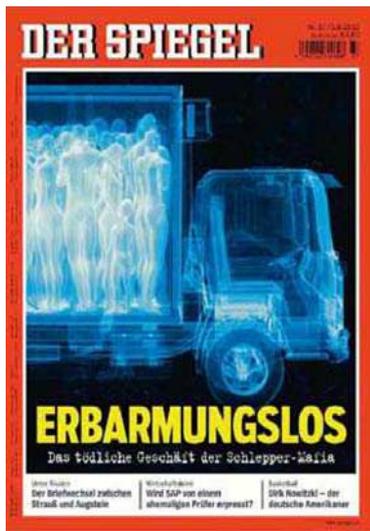
周刊

圣城拉萨
世俗、宗教与自然

8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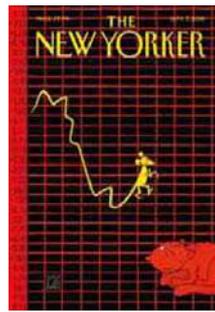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G
生活周刊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2元



《明镜》2015.9.7

致命的边境

过去两年，欧洲经历了“二战”之后最大的难民潮。这些难民的到来也历经了很多阻挠。无数的栅栏、关卡、军舰和士兵是难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每个星期都会有许多经由黑社会渠道到来的难民死在途中。目前德国是难民最向往的目的地，预计今年到来的难民将超过15万。8月底，一辆前往奥地利的货车内有71名偷渡者死亡。难民正在成为欧洲急需面对的问题之一，一边是人道主义，一边是现实利益，默克尔已经努力了，但她目前并没有什么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纽约客》2015.9.7

沧海一粟

股市不是经济。这是一个简单的金融真理，但是在股票大跌的时候我们很难记住这一点，所以许多人担心股价暴跌会影响整体的美国经济。这种担心几乎肯定是没有根据的。暴跌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股市动荡。其实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还不到GDP的1%。所以中国经济的低迷会挤压苹果、必胜客和爱荷华的农场主，但大部分美国公司几乎觉察不到。股市的变化必须是严重、长期的才会对经济产生真正的影响。



《经济学人》2015.9.5

危险的特朗普

特朗普宣布他将竞选总统时，他被当作一个笑话。一个投机钻营的人，在电视真人秀方面有着丰富的经历但是未担任过选举产生的职位。这样的人想当总统？但是几周来他在关于共和党候选人的“民调”中一直领先。这是因为他说了任何政客都不会说的话，人们就以为他不是政客。他的支持者认为他的粗鲁证明他很本真。共和党人应该小心地听特朗普的言论，把票投给其他人。



《金融时报周末杂志》2015.9.6

在多任务时代如何生存

当我们谈论多任务时我们指的至少有四种情况。一是真正的多任务如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真正的多任务是可能的，但至少其中一种任务要熟练到无需思考。其次是任务转换，我们的注意力在多件事之间穿梭。我们说的多任务大部分指的都是它。第三种就是网瘾，比如读文章时不由自主地要去上网。最后一种多任务是有许多事务要去处理，但不等于要同时去处理。生活就是如此。



《纽约时报杂志》2015.9.6

危险的穿越

7月27日两艘小船载着来自北非的733人穿越地中海，其中有59个不到5岁的孩子。他们只带了一些饼干和瓶装水，没有一个人穿救生衣。他们在午夜时分从利比亚出发，目的地是300英里外的西西里岛。大部分移民不知道旅程要持续多久，有些被走私客告知6~8个小时后就能抵达意大利，但实际上要花至少6天时间，到那时船上的人早已脱水而死或被冻死了。幸亏无国界医生组织派出的船只于上午10点找到并疏散了这些难民。

P36

世俗、宗教与自然 圣城拉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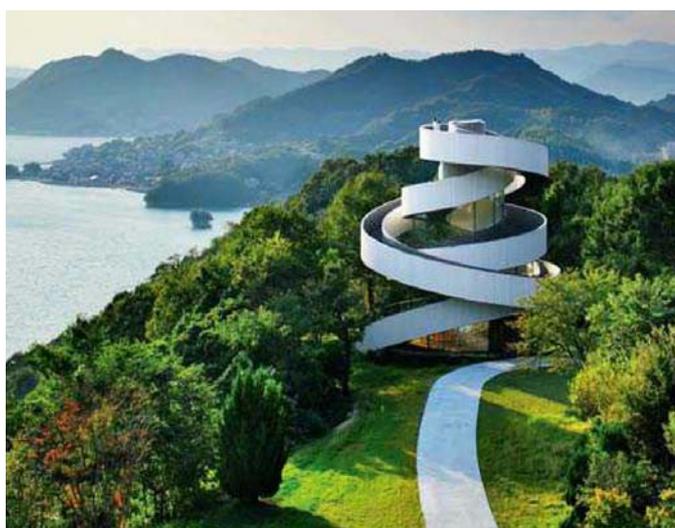
- 40 藏文明剖面：世俗、宗教与自然
- 48 拉萨老城，传统与现代之间
- 60 在拉萨，索穷和朋友们
- 66 央嘎：让藏医学离世界再近一些
- 72 木雅·曲吉建才：从活佛到高级建筑师
- 76 格勒：藏族博士的藏族社会观
- 80 阿旺罗布：登山改变人生
- 82 跨越 50 年，雪域高原的飞行传奇
- 88 新西藏：天上地球村



P120



P124



P130

2015年第37期 总第853期 2015年9月14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社会

- 92 人物：金立群：执掌亚投行
- 96 调查：大数据时代，学习之变

经济

- 90 市场分析：阻击资本外流
- 102 收藏：叶承耀与黄花梨家具
- 106 商业：航空市场向“低成本”转向？

文化

- 112 文化：故宫“石渠宝笈特展”：《清明上河图》全卷打开
- 116 话题：在斯德哥尔摩遇到地球上 50% 的麻烦
- 120 音乐：那只叫米奇的 92 岁老鼠能领导一家娱乐帝国吗？
- 124 运动：何川：自由地攀岩
- 130 设计：恋爱中的建筑
- 142 思想：哈耶克理论的得失
- 144 书评：所有植物都是平等的
- 146 书与人：他把托尔金的世界变成了你的视野

专栏

- 20 邢海洋：煤制油里一叶知秋
- 136 苗千：爱因斯坦错了吗？
- 138 袁越：沙拉真的有益健康吗？
- 140 张斌：游子联队
- 141 宋晓军：“高、大、上”的猜想如何兑现？

- 2 环球要刊速览
- 10 读者来信
- 14 天下
- 22 理财与消费
- 24 好消息·坏消息
- 25 声音
- 26 生活圆桌
- 30 好东西
- 150 漫画
- 152 个人问题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舒可文 Shu Kewen 苗炜 Miao Wei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阎琦 Yan Qi 吴琪 Wu Qi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曾焱 Zeng Yan 王恺 Wang Kai 陈晓 Chen Xiao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王星 Wang Xing

朱步冲 Zhu Buchong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魏一平 Wei Yiping

蒲实 Pu Shi 庄山 Zhuang Shan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翔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杨璐 Yang Lu 何潇 He Xiao

徐菁菁 Xu Jingjing 黑麦 Hei Mai 陆晶靖 Lu Jingjing 程磊 Cheng Lei

记者 Reporter

李东然 Li Dongran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阿润 A Ru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邢宇 Xing Yu

龚融 Gong Rong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尤帆 You Fan

艾江涛 Ai Jiangt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设计总监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徐睿浚 Xu Ruihan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发行事业部 Circulation

荣誉总监 Honorary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大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Southern China

雍江 Yong Jiang

北京区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Beijing China

周旭 Zhou Xu

发行拓展经理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品牌经理 Brand Manager

肖丽媛 Xiao Liyuan

客户经理 Sales Accoun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渠道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Marketing Channel

于硕 Yu Shuo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付新林 Fu Xinlin

李卫红 Li Weihong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潘姮 Pan Heng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产品部 Products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张莉 Zhang Li 袁媛 Yuan Yuan 连子君 Lian Zijun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罗启宏 Amy Luo 陈陌陌 Chen Moyang 孟佳 Meng Jia

内容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王晶 Wang Jing 薛芃 Xue Peng 祝童 Zhu To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技术部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www.lifeweek.com.c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韩雅丽 Han Yal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广州办事处地址：

广州市海联路6-8号银珠商务中心405室

邮编：510230

电话/传真：(020) 34283562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2.00 \$6.00 港币 16.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 南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 (025) 83327129
-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347099
-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 长春：中外书刊音像经销有限公司 (0431) 82708592
-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 南昌：沧海书店 (0791) 8592810
-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 郑州：大河书报刊销售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017749
-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奔驰
- 3 · 如依家
- 5 · 上海大众
- 7 · 力度形象
- 11 · 空客
- 13 · 一汽大众
- 21 · 童言面具
- 34~35 · 跑族 2p
- 71 · 比音勒芬
- 100~101 · 正谷
- 119 · 豪利时
- 135 · 周刊 20 年
- 139 · 三联-回味套装
- 151 · 书店广告
- 封三 · 中网
- 封底 · 藏博会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SL 到 10655111，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No.852

世界：秩序重建

因为“9·3”阅兵，重温“二战”史。放眼世界反法西斯各战场，倍感中国的抗战毫不逊色，其波澜壮阔的规模、寸土寸血的惨烈、历久顽强的坚持，都无愧于一个伟大民族的担当，理应被世界铭记。遗憾的是，昔日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今日却无法站在一起共同纪念伟大的胜利；而曾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各政治集团，至今仍无法共同纪念胜利日。有按照所谓共同价值观结成的联盟意欲改变战后秩序，但中国可以说“不”的时代到了。

青岛 樊东林

长江的鱼

我家住在江边，楼下的江滩上自发地形成了一个渔码头，每天凌晨天还没有亮，就有点着蓝莹莹灯光的渔船聚集，我在阳台上看得好奇，于是在一天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下楼看鱼。

我到的时候，已有七八条渔船在那儿，几十个渔民、渔贩，还有几个捡便宜鱼的市民在忙碌着。渔船有两种，一种是十几米长、两三尺宽的铁船，一种是三五米长、一米多宽的木船。让我意外的是，各条船上的鱼虾并不多，大船有三五十斤，小船也就一二十斤，甚至只有几斤，而且鱼都不大，超过尺把长的都很少。外地朋友到我们这个城市，都喜欢尝尝“江鲜”，以为长江里的鱼都是野生鱼，餐馆也喜欢打着“野生鱼”的招牌招徕顾客。其实每年春天的时候，都会在报上看到渔政部门往江里投放几亿尾鱼苗的报道，这还只是我市一个“点”的投放量，相信其他的沿江城市也会这样做；而且长江的水质并不

好，以我个人的感受，并不觉得长江里的鱼比湖里、塘里的鱼好吃。鱼苗投放后，会有几个月的禁渔期。可就是这样，长江里的鱼为何还是这样小呢？

在我给一条小船上的女渔民拍照的时候，一个老头问她：“你这一趟，200块钱能不能搞到？”她说：“没有呢，从夜里两点忙活到现在（6点钟），我和老公两个人，也没搞到。”老头叹了一口气，算是对她表示同情，但他下面说出来的话却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你怎么这么老实呢？你这么老实怎么行，你要电啊，要电鱼才行。”女渔民说：“我不敢呢，我是外地的，本地的都电，他们电了抓住了也没事。”说着她看了看旁边的几条大船。

他们的谈话让我感慨很深，虽说是出于同情，但老头居然鼓动渔民用那种不分大小、断子绝孙式的捕鱼方式，只能说是愚蠢。电鱼这种方式并没被有效禁止，那个外地的女渔民之所以不敢电，是因为她害怕电鱼的成本高于正常捕鱼的成本，而

本地渔民则不怕，因为即使被抓，他们也能摆平，这也可以看出监管的漏洞甚至是腐败在里面。这样的事，因为是从无意中听来，均无戒备，我认为很真实。

我家就住江边，我天天看江，越看越不满意，比如说水没以前干净了，水流没以前急了，水量也没以前大了……但我真没想过江里的鱼的生存问题。一条野性的大江里，生长的全是人工孵种的鱼，而且鱼也不多、不大，那也不是正常的生物链啊，也不能让人感到那种蓬勃的生机，这事让人怎么想都不是滋味。

安庆 余毛毛

家乡的传统之殇

我的家乡是鄂西一个土家山村，前几天，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眼看不到、耳听不够，深切感受到了家乡的巨大变化。道路变宽了，楼房变高了，村民收入增长了，老年人每年都有养老金了，大病医疗也可部分报销了；特别是在部分其他农村较为普遍的早婚、早育、多

育等现象，在我的家乡都不存在了。这些变化都让我心生欣慰。

然而还有一种变化，却让我颇有些神伤。我的家乡以种植萝卜、辣椒、西红柿等蔬菜为主，蔬菜种植过程中特别是售卖期间，由于季节性、市场变化快、采摘时间紧，一些种植大户多以临时雇工的形式请周边乡邻帮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帮工形式逐渐演化开来并被无限扩大。从此，无论是农忙还是农闲，也无论是劳力充足的家庭还是确需帮助的孤寡老人，出钱雇人成为惯例，且不讲帮人者无钱免谈，就连请人者若是无钱都不好意思开口。回想20多年前，乡亲邻里采取轮帮互助“打转工”的形式，甚至可以新建一栋房子，我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化？曾经有人说，城里的高墙隔断了邻里，我觉得，如今的乡下也被利益阻隔了乡情。

跳丧舞是土家族的传统文化。曾几何时，一旦有人亡故，周边乡邻不请自来，或帮忙擦桌摆凳、煮饭做菜、迎来送往，或通宵达旦载歌

载舞，陪亡者走完最后一程。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跳丧舞作为民俗文化被搬上了舞台，现实中却在悄然消失。这次回乡，正好碰上一位老人过世，厨师是镇上专门的班子、乐队是镇上专门的班子、打鼓跳丧的也是镇上专门的班子，这些人都是花钱雇的，平日与亡者及其孝子孝孙都素不相识，不到晚23点，真正的乡亲已然走光。传统已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秀”和一门生财之道，但其真正的土壤却在以极快的速度消亡。

老家在农村，目前仍然实行土葬。源于“谁都有父母，谁都有离世那一天”这种最朴素的情感，抬运棺木下葬这件事，一直是乡亲们的自觉行为。这次也不例外，到了老人下葬的时候，周边乡邻又来了。可是，多数都是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鲜见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我向一位老者说出了我的疑惑，老人答复：看吧，不出20年，又会出现一套新的班子。这就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家乡？！

湖南怀化 一读者

又到开学季

眼下，正是中小学开学之际，我周围的人们大多喜忧参半。欢喜的是孩子们跨入新的一年级，忧的是我们这些在津务工外来人员子女上学的问题。

我们租住的这一带是外来工混居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孩子上学的问题，去年

有两个适龄儿童因某些证明欠缺被迫返回原籍。一家是来自四川收废品的夫妇，一家是从河南来打工的大家庭。他们两家的小孩儿都是在打工地出生成长，上幼儿园、学前班，及至该上一年级时，双方家长跑前跑后费尽心机，终因手续不全无奈放弃。

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在津就读需要五个方面的证明：一、居住证；二、原籍户籍证明（户口本）；三、务工证明（父母任意一方有缴纳社保一年的证明）；四、住（租）房证明；五、原籍或天津市儿童预防接种证。这五种证明缺一不可，少哪条都不行。四川那对收废品的夫妇，哪有缴纳社保的证明？托人找关系无果后，只能是女方带着小孩儿回到原籍上小学去了，男方一个人留在这里继续打拼。河南那一大家庭，三代同堂共居一院，大孙女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因年轻的父亲参加工作不久，社保缴纳不足仨月也不符合入学条件，无奈奶奶与儿媳、孙女儿也返回了原籍。只留下爷爷与年轻的父亲俩人在一起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再看看今年我们这儿另一家小孩儿上学的情况。小孩儿的父母在当地有一至亲，在某一行政部门担任要职。小孩儿的父母还未提起上小学的事，这一至亲早就通过关系办好了入学手续，而且读的还是重点实验小学。不仅如此，他家的大女儿小升初时，因居住地不同

按片儿划分，被分在了离家较远的学校，这位至亲听闻此事后，亲自赶到学校几句话就轻松搞定了这件事，孩子转到了离家最近的中学。两种家庭两种命运，这就是社会的现实。

想想自家即将升小学的二女儿，不禁让我有些犯难：由于我打工的保安公司没给我们交纳任何社保，我的孩子在本地就读势必受到影响。为此事我特意上网查阅了《天津市小学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意见》，其说明中指

出：应持居住证、务工证明、住（租）房证明、原籍或天津市儿童预防接种证，向暂住地所属区教育局提出申请，经审核后，就近安排在公办学校就读。仔细看完这条信息内容，我得赶紧想办法解决社保证明这一大难题了，否则的话，自己女儿的求学之路就要重蹈那两家小孩儿的覆辙。可是个体普通劳动者在城里就不能有一个立足地，给孩子一个普通的学习机会吗？

天津 农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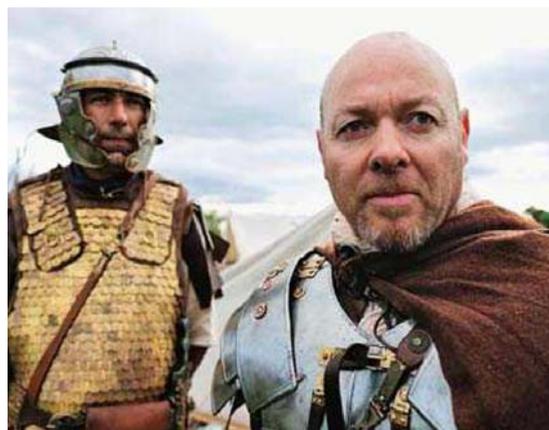


方大曾 1935年摄于绥远

重要更正：本刊第35期《方大曾：被遗忘的战地记者》一文，第100页图片说明“在绥远前线的方大曾”有误，实为方大曾在绥远前线拍摄的抗战军官。特予更正并致歉意。感谢其家人提供方大曾生前照片，在此特别刊出，以供缅怀。

本期截稿时间：9月7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英国 | 重现罗马士兵

9月4日，在英国诺森伯兰郡博多斯沃德罗马堡垒的哈德良长城，意大利的历史爱好者重现罗马士兵的生活和战事。

巴勒斯坦 | 抗议犹太人定居点

9月4日，在约旦河西岸拉马拉市附近的一个村庄，巴勒斯坦人抗议犹太人建造定居点时，一位巴勒斯坦妇女向一名以色列边境警察发出质问。





希腊 | 叙利亚移民

9月2日，希腊伊多梅尼村，一位叙利亚移民抱着她的女儿，等待穿越边境，进入马其顿。2015年初以来，使用“巴尔干路线”的移民暴涨，他们经土耳其抵达希腊，穿过马其顿和塞尔维亚之后，从匈牙利进入欧洲。





印尼 | 任抹时尚嘉年华

8月30日，在第14届任抹时尚嘉年华上，模特在展示花道服装。



英国 | “反恐”美女

考文垂市两届选美冠军克斯蒂·洛根-汤森德美貌与智慧兼具，她有两个国家的“安全”学位。在以一关于“9·11”恐袭事件的本科毕业论文赢得奖学金之后，克斯蒂开始攻读考文垂大学开设的“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硕士学位。

英国 | 乡村游园会

(左页上图) 9月3日，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特技表演队抵达德比郡查茨沃斯庄园，他们将在查茨沃斯乡村游园会上表演特技和马术。

美国 | 火人节

(左页下图) 9月1日，内华达州黑岩沙漠，在火人节的“镜子嘉年华”艺术和音乐节上，一位参与者在跟装置艺术“复眼”互动。

煤制油里一叶知秋

文 / 邢海洋

8月官方PMI落至荣枯线下的49.7，其中高耗能行业PMI为48.1%，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为今年以来的低点。宏观调控从“保8”到“保7”，从发改委一个月审批近万亿元大项目到大型企业利润一路滑落，寻找经济节节退守的症结，从煤制油这个在当下前景颇为清晰的新兴产业，或能获得一叶知秋之效果。

5月5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明确提出要“统筹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暂停6年后，中国决定重启煤化工投资项目。上一次暂停审批新建或扩建传统煤化工项目是在2009年，因为产能过剩，当时仅各地报到发改委的煤制油项目的总规模就超过4000万吨。而早在2006年，发改委连发两道禁令，“不批准年产规模在300万吨以下的煤制油项目”以及“在国家煤炭液化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前，暂停煤炭液化项目核准”。当国际油价一路高歌猛进，资源禀赋多煤少油的中国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煤炭液化的路径，但彼时世界上除南非外再也没有运营的大型煤炭液化项目，发改委的审慎是一种颇为科学的态度。一个煤制油项

目，投资动辄几百亿上千亿元，因为体量大，发改委的监控相对有效，多年来，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示范项目相继建设投产。

西方国家没有煤制油化工业，技术并非瓶颈，而是因为不经济。以现有的油和煤价格，油价只有在70美元/桶，煤制油企业才盈利。煤制油从项目启动到开工建设，至少需要5年准备时间，从建成到投产，耗时更可能长达8年。而油价频繁变动，时高时低，人们往往反应滞后，使决策者举棋不定。其实谋事还不全在人，市场的力量更强大，德国曾经是煤化工的大国，但“二战”后低迷的燃油价格却使得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全线破产。另外，煤化工还面临着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三高”诟病，其发展前景一直充满争议。“三高”背后，则是只有规模效应才能将能耗和水耗降低的规模门槛，一次投资如同一次大赌注的博彩，要么大赚，要么血本无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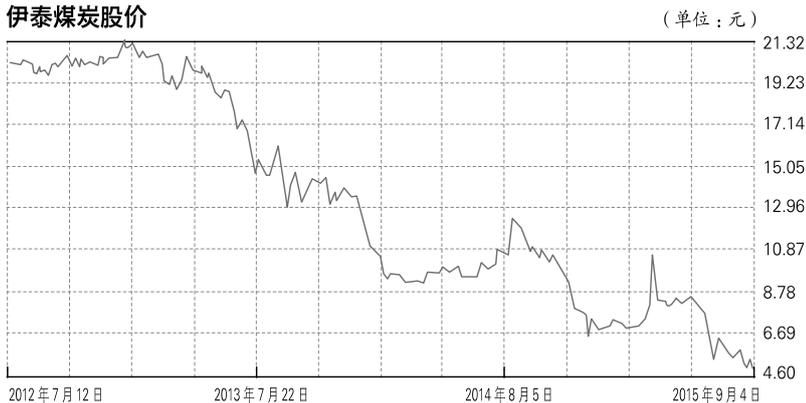
如果说修筑铁路公路体现了保增长决策相对稳健的一面，对煤制油项目的审批，恐怕就更为激进了。煤制油路条的转机发生在2012年底，发改委对煤制油项目严控已经开始松绑，三大

煤制油项目——神华集团宁夏400万吨、潞安集团540万吨、伊泰集团200万吨或报送，或者获得了路条。此前，全国只有神华鄂尔多斯108万吨、潞安21万吨和伊泰16万吨三个煤制油示范项目投产，累积产能140余万吨。在2012到2013年，发改委发放的“路条”，使全国煤制油的产能一下子放大了一个数量级。复盘当时发改委大发“路条”的心态，除了示范项目都已经获利，恐怕就是保增长的需要。而2012到2013年，煤价开始暴跌，但油价尚未受到波及，更给煤制油以利润扩大的远景。幸好煤制油的暴利窗口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否则被套进去的产能很难计数。

项目立项时，无论企业还是审批方都在重述的事实是，中国煤炭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同样的项目，总投资成本远低于海外。但以5年乃至8年，一个煤制油项目的建设周期看，连这些确定性因素也会发生逆转，何况原油这样瞬息万变的大宗商品。中国工业的问题，就小的层面而言，如温州的小作坊，来了订单就能生产，无需技术壁垒，仅以低成本和市场规模就足以横扫世界。大型国企面临的也是类似的低水平重复的投资依赖。煤制油技术经历上半年的摸索，在当今科技背景下并无技术障碍，偏偏大型国企愿意大举投资。若以当下石油产业的希望页岩油来对比，不难发现，真正促进行业进步的是民营企业的创新追求，而非大企业的财大气粗式的产业链扩张。若再深究下去，中国石业迟迟不向民营企业开发，煤炭业于是拥挤了太多的竞争对手和资本。

一次集中发放“路条”，集中释放了增长动力，殊不知却可能为未来埋下隐患。✎

伊泰煤炭股价



BB MASK 童颜面具



微商招募中

咨询热线 400-160-5000



全球 近红外线 美容面具 创始者



NASA技术, 韩国制造, 每天17分钟, 有益近红外线直达皮下4.5mm真皮组织, 促进胶原蛋白修复再生, 焕发光彩美肌, 2周感受变化, 8周达到理想状态。



欢迎扫描二维码,
进入官方微信订购
敬请关注官网:
www.bbmaskchina.com了解更多资讯





栏目插图 | 范薇

赌城风光不再

澳门二季度 GDP 收缩 26.4%，连续第四个季度经济负增长，跌幅较今年首季进一步扩大 1.9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澳门经济实质下跌 25.4%。澳门经济收缩主要受服务出口下跌影响，博彩服务出口跌幅较去年同期扩大至 40.5%。博彩为澳门带来的营收从 2004 年的 50 亿美元猛增至 2013 年逾 450 亿美元的峰值，达到拉斯维加斯的 7 倍。内地持续的反腐终结了博彩业的繁荣。如今的澳门，严格的签证政策和赌场监控，使腐败官员和国企领导到澳门已经有所忌惮。

第二波救市

据彭博社报道，证监会 8 月 29 日召开会议，要求加大股票自营增持力度，从之前的 21 家券商扩大到 50 家券商，以 20% 净资本再筹集约 1000 亿元人民币给证金公司。很快，国泰君安、国海证券、长江证券、太平洋证券发布公告，以 20% 的比例出资投资权益类证券，并相应提高自营业务规模。与第一次 21 家券商大规模维稳行动不同，这一波券商联合维稳救市是由证金公司设立专户进行统一运作，50 家券商按比例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第一波救市，据推测共动用 1.3 万亿元。

外储下滑之于债市

新兴市场外汇储备仅在 10 年里就暴增近 7 万亿美元，于 2014 年中登顶 8.05 万亿美元，随后趋势逆转。新兴市场购买发达国家债券，压低其收益率。收益率下降至少部分促成了金融危机后股市飙升、连创纪录。如今全球央行相继抛售外汇储备，逆转这种债券购买趋势，债市超级循环恐逆转。花旗援引的一份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外储每下降 5000 亿美元，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就面临着 108 个基点左右的上行压力。随之而来，全球资产市场或将出现重大转变。

股权质押告急

Wind 资讯统计显示，截至 8 月 31 日，今年发生股权质押的公司中，超过 813 家发生股权质押公司的最新股价低于其质押日价格，其中超过 158 家跌幅超过 50%，面临“破位平仓”的风险。据中金公司数据，目前股权质押业务存量约为 2.7 万亿元，占 A 股总市值的 6%；若以质押时股价测算，2015 年净增的质押市值为 1.66 万亿元，目前已缩水为 1.4 万亿元。股权质押、场内去杠杆等因素已然成为压在 A 股头上的大山。



狙击做空人民币

央行发文，要求从2015年10月15日起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20%的外汇风险准备金。民生证券指出，这份文件的用意主要有两个：增加做空人民币成本，汲取股市“6·27”经验，在未形成趋势性做空之前及早增强审慎管理；降低维持汇率的成本，及早降低远期杠杆倍数，增强央行相对控制力，减少未来维持汇率的成本。此前，根据外汇市场波动率，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缴纳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分别为5%、10%。很多预期人民币远期贬值的企业，以数倍于真实贸易额做套期保值交易以获利。



美联储褐皮书

9月2日，美联储发布了经济形势报告褐皮书（Beige Book）。褐皮书显示，美国大部分地区零售活动扩张，部分地区就业市场收紧稍微推高薪资水平。就业市场紧张造成的薪资增长在纽约、克利夫兰、圣路易斯和旧金山地区尤为明显。制造业活动总体更为积极，房地产市场总体正面。不过，总体而言薪资增长继续停滞。根据亚特兰大联储的最新预测，三季度GDP预计为1.3%，依然低迷。褐皮书使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将于本月加息25个基点。但交易员有着不同的看法。

仍比港股贵一倍

9月1日，恒生A/H股溢价指数大涨近6%，创8周最大涨幅，至140.9，意味着A股比H股贵出41%。同时在两地上市的股票中，A股较H股溢价最高的是浙江世宝，溢价达6倍，其他高溢价股票还包括洛阳玻璃、广汽集团、石化油服等。恒生A/H股溢价指数中大盘股的权重较大，若仅从平均价格而言，截至8月底，两地上市股票的A/H股平均溢价幅度为115%，比7月份的4年高点下降了不到3个百分点。A股限制做空又可能促使投资者在香港做空，进一步加大H股的压力。



向亚太扩散

8月11日人民币贬值以来亚太地区第一份贸易数据出炉：韩国8月份出口同比下滑14.7%，创2009年8月以来最大跌幅。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正在向整个亚太地区扩散。出口占韩国经济总产值的一半左右，对中国出口占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8月对中国的出口额下降8.8%。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显示，以对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为标准，G20中对中国风险暴露最大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其二季度GDP同比增长2.0%，创2011年3月份来新低；日本第二季度则出现萎缩。



葡萄酒的道德问题

美国加州的纳帕谷是新世界葡萄酒的地标，距其 100 多公里的洛迪产区却相对寂寂无名。消费者通常愿意多花点钱购买前一个产地的葡萄酒。然而，以美国农业部为首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选择后一个产区的葡萄酒不仅可以省钱，也对环境更加友好。发表于《国际生命周期评价学报》上的文章指出，生产等量纳帕谷葡萄酒消耗的水、能源和由此产生的碳排放均是生产洛迪葡萄酒的两倍。纳帕谷手工采摘的传统使得收获期各种设备的运转时间显著延长，此外，为了控制果实糖分和提升风味，在纳帕谷也有更多的葡萄在疏果的过程中被弃置。有机葡萄酒是能源消耗和碳足迹最大的一种葡萄酒。

好消息



鸟的联盟

生活在美洲的黑颈北蜂鸟虽然个头不大，却深谙“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之道。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进展》杂志上的论文指出，仅重 3 克的这种鸟类为了防御体重达其 40 倍的灰胸灌丛鸦对后代的侵犯，会选择在更凶猛的苍鹰和库珀鹰的巢穴附近定居，借此震慑天敌。



地气之益

一提起“粪便”、“灰尘”、“细菌”和“肺炎”，足以令父母拉响警报。但欧盟研究小组针对小鼠进行的试验显示，在婴幼儿期接触农场中混杂动物粪便和微生物的尘土而患肺炎的一组未来患哮喘的风险可显著降低。流行病调查数据也表明，在奶牛场中长大的孩子患呼吸道疾病的概率是最低的。

坏消息



盐湖之厄

伊朗的乌尔米耶湖曾是地球上第六大咸水湖，但在天灾人祸交侵之下，这里正在加速变成一片盐碱沙漠。伊朗环境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的调查显示，全球变暖和持续干旱令湖水迅速蒸发，而疯狂的筑坝和地下水开采切断了水源补给，仅 10 年间，湖面面积就萎缩到全盛时的不到十分之一。



睡不好？感冒来找

孩子突然变得食欲特别旺盛，且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小组针对 164 名健康成年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分组对照试验后发现，在接触感冒病毒后，之前平均每晚睡眠时间超过 7 小时的一组中仅有 17.2% 的人会真的患上感冒，而那些平均睡眠时间不足 5 小时的人患病率则高达 45.2%。



(插图 山羊胡)

2200
名
数字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法国是欧洲人口最有活力的国家，无论年景好坏，法国每天都有 2200 多名婴儿出生，去年法国共有 81.8565 万名婴儿出生，这将巩固法国欧洲领导者的地位。欧洲妇女平均生育率远远低于人口更新所必需的水平，即一位母亲生育 1.6 个孩子。

3
亿美元

韩国贸易协会和化妆品行业 7 日称，今年 1 月至 7 月中国进口韩国化妆品规模达 3.7083 亿美元，同比剧增 250.6%，韩国化妆品在华市场份额达 22.1%，同比提高 12.3 个百分点，韩国仅次于法国成为中国第二大化妆品进口来源国。

120
万英镑

英国时装公司 Hugo Boss 两年前曾发生逾百公斤镜子砸死 4 岁儿童的事件，现在该公司被判罚 120 万英镑。2013 年 6 月，4 岁男孩奥斯汀·哈里森随父亲来到英国比斯特购物村的 Hugo Boss 店。当其父正在试衣时，在一旁玩耍的奥斯汀被一面倒下的镜子砸中头部，于 4 天后不治身亡。牛津地方法院认定，这面 120 公斤重的金属框镜子“被疏忽地立在那里，没有任何固定装置”。



潜在的爱，我自己也曾多次感觉到，而且非常丰富。这是无法否认的。不幸的是，人们虽说有这么多潜在的爱，却仍然如此凶狠。这种爱不出来，就是这样。它被关在里面，就留在里面，对他们毫无用处。他们被里面的爱弄得筋疲力尽。

——塞利纳，《长夜行》

宝钗的空和宝玉有所不同，她空而无我，她知道生活毫无意义，所以不会执留，也不会为失败而伤心，但是她又知道这就是全部的意义。她知道空无，却不会像宝玉一样移情于空无，因为她生性平和，空到了无情可移。她永远不会出家，死，或成为神秘主义者，那都是自怜自艾之人的道路。她会生活下去，成为生活本身……她无求无喜，却一切有度，不是无可奈何的折中，确是一种天然的“合适”。这“合适”的法则举世无例，所以也

不拘泥。

——《顾城哲思录》

别跟年轻人吵了，你不可能赢的。因为等到有一天，他知道你赢了，那表示他也不年轻了。所以，你不可能吵赢真正的年轻人。

——黄舒骏

这部小说的含义是，在一个愿意使邪恶显得很平常的世界，也会使善显得很平常。

——英国《旁观者》杂志评乔纳森·弗兰岑的新小说《纯洁》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古董、游艇、豪车或集邮等有形资产可能会让人沾沾自喜，但英国国家统计局发现，这些与个人幸福感毫不相关，这或许可以——也或许不可以——证明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在法拉利车里哭泣要好于在公园长椅上哭。

——据《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论文中表示，金钱能够买来幸福，但与幸福的关系最为密切的财富是金融财富净值，它们可能是股票证券、银行存款或放在床垫下的钱

舌尖上的公众号

文 / 尚小右

图 / 谢驭飞



我和三个朋友组了个微信群，纯聊美食。成员都对吃不肯将就，老是发愁何以果腹，所以这群相当中二地取名为“腹愁者联盟”。某次聚餐时，四人一致认为我们与其成天在群里谈吃，不如合办一个走心的美食公众号。

头几次更新是A做的，有关她喜欢的中日零食。推送走软妹子路线，文字少于表情，表情少于照片。作为修图圣手，A能把散装艾窝窝美化得如贵价和果子。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饭前拍照，饭后修图”早已成为她的本能。除了美照，A还添加不少酱汁缓浇、布丁微颤的GIF特写，撩拨得不少用户涌入，齐齐求购买链接。不过涨“粉”最猛的，还是内含她在席间甜美自拍的推送。更令人暖心的是，A从不坑害朋友，后期时不单单自己加滤镜、去瑕疵，也总记得用贴纸遮住我等误入的狰狞吃相。

与A不同，B是个爱用数据说话的理工男，专注科学研究、客观测评。他推荐某家烧鸟店，要先光顾三次确定菜品质量稳定；真正落笔推荐时，又要先写近两千字解释美拉德反应。最近B要排名全市的流沙包，在某高人气茶餐厅问服务员：“流沙包里的咸蛋黄是你们自己腌的吗？”他的严肃令服务员不知所措，以为是总店上级微服私访，搞什么神秘考核。四人之中，B写推送最为倾尽心力。如果我们真是“复仇者联盟”，B无疑是勇于献身事业的绿巨人。

至于厨娘C，早在公众号创立前，便是一家美食网站的知名达人。不少订阅户从网站追随而来，就等她的菜谱推送。C则不负期望，永远心系厨房，在外吃到佳肴回来总要复制，成功后则想着升级为快手版、高阶版。哪怕某天看片痛哭流涕，也要挣扎着在公众号发条预告：“这电影实在太虐……不过话说回来，那反派校长的水族箱里全养水母，我反倒想起好久没吃凉拌海蜇皮了。等着我，明天做。”最后不忘加三个哭泣表情。因为厨艺精湛又颇具影响力，常有商家赞助厨具与食材。她大多做活动赠给“粉丝”，涨“粉”拉力不输A的自拍。

如今公众号已上正轨，A、B、C轮流推送，与他们异地相隔的我负责删改与排版。然而，后台数据令人日渐尴尬，无论是转发数、阅读量、打开率，A和C都远远超过B。尤其开放打赏和评论功能后，人气悬殊明显得要冲破屏幕。更何况A早响应“粉丝”呼声，开了零食代购网店；C也摩拳擦掌准备在线售卖手工蛋黄酥。至于B，我不知道他还能否耐着性子写追溯贝果历史的万字长文，虽然本地没有一家烘焙店售卖贝果。后来，我收到B全市流沙包排名的推送预览，与他平时的极客风格截然不同。标题迎面就是：那么问题来了，流沙包水平哪家强？以及我发现文末多出一行字，虽然之前老早就出现在A和C的推送上：“商业合作请与本账号联系。”

在周日的晚上 谈一项工作

文 / 王峰

图 / 谢驭飞



对老男人来说，在周日的晚上谈论一项工作，是多么残忍而美丽的事。十来个人从城市的各个方向，穿过慵懒的人群，奔向一个地点。有些事得当面拍板。下面的人已经联系好几个轮回了，再多几个回合，做不了主的还是做不了主。该是领导出场的时候了。是谁说，这个世界的沟通方式将交由微信语聊、交由微博艾特？这东西玩玩情调还可以，真正解决问题的还得靠眼见为实。

甲方那个穿得很潮的小伙子，面对一个问题胶着不下。他终于、几近质询地说：“这个问题我们微博里聊过，也微信了，最后我还特意打了电话跟你确认了一下，应该由你们全权负责。”大家有点愕然，这会儿，齐刷刷的眼睛齐刷刷地看过去，只会将场景变得更滑稽。所以，有人将目光投向别处——即便那是一张已经看了无数遍的卡片。乙方再次显现这个地位一贯的弱势和尴尬，一脸茫然。

最后总是掌握钱的领导能解决问题。甲方那个什么总，这个时候，从深陷的沙发里欠了欠身子，他的脸一下子光亮起来，说：“这个也没多少钱，就我们盯一下吧。”甲方小年轻脸微微红了一下，点点头，然后在纸上做个符号。会后那个什么总会不会翻脸一通电话将他劈死？

而现在，他说话时，那种气度、那种分量，让他手上那黑黝黝的手机变得非常有质感。那是一只神奇的手机，通过它会将指令传达，那个管钱的会唯唯应答。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一切问

题其实都只是钱的问题。他侧过脸对乙方说，我们就是要好看、要有效果。

将一场工作碰头会安排在周日的晚上。这多么巧妙又深谙人心。经过一个双休日的体整，和家人两天的亲密厮磨，再硬的棱角都磨软了。而周一上班的号角还有待一个漫漫长夜。更何况，碰头会的地点就放在非常有情调有气氛的书店。音乐是直指人心的，搅得你心里快要拧出水来。书店里那些往来的年轻人，他们有着紧致的皮肤，大把的闲暇时光，还有一些轻轻交谈着的老外，都让你不由回想起青春和美好生活。

时间指向晚上 19 点半。那就这样？那就这样。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大家再次看着那个什么总，他也再次端着浅浅笑意，我就不陪大家吃饭了，他摇摇手上的手机，儿子还在家等我吃饭。“你们吃着，发票留着。下次等活动圆满结束，我请大家吃大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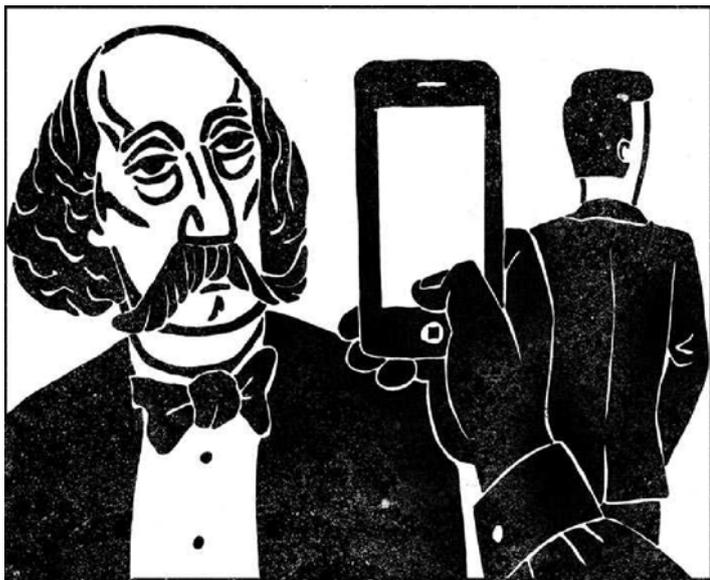
大家依次出门，有人长吁一口气，谈资转向微博热门话题或问候对方近况，并交换彼此看法。这就是很多道别的场景。果然，快到门口，有人提高了声音：“我就不去吃饭了。”“我也不去了。嗯，还有点事要处理。”“要减肥，这个点吃饭太危险了。”剩下的四五个人，我们在路口转了个方向，有人提议，去吃塔可吧。

大快朵颐之下，我们谈诗歌，谈现实，谈人生。没有彼此的熟人可供八卦。因为我们在网上交流无数，但在线下，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福楼拜家的星期天

文 / 哲人二

图 / 谢驭飞



19世纪70年代初的法国鲁昂，“五人聚餐会”这个小范围文艺团体，要是搁在现在可能要添新成员。如果还是按照莫泊桑设计的出场顺序，2015年，福楼拜家的某个星期天，先进门的依然是屠格涅夫，最后进来的一定是女士。这已经无关乎礼仪问题了，因为女人天生就有迟到的权利。在如今零花钱都要伸手讨要的“女尊男卑”式的家庭结构中，想来没多少男人的心中尚存有敢对女性质疑的底气。

身为此间主人，作为文艺小团体的领头人，对世故人情肯定了然于胸。出生于医生家庭，其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就明显带有“医生那种细致观察剖析的特征”。福楼拜一生未婚，但并不代表他没有爱情史。事实上，少年时的福楼拜好像碰触到了上帝的金手指，似乎一下子早熟起来，15岁那年爱上了一个美丽少妇。和大多数的初恋一样逃不过无疾而终的结局，况且还是在这个年纪。只是，这场畸形恋爱对他影响深远，认为是“整个生命中一次伟大的爱”。当然，初恋被岁月发酵成一杯醇厚馥郁的美酒，福楼拜在后来写了一本小说来纪念，女主阿尔努夫人成为福楼拜所有作品中唯一一个纯洁女性。初恋虽伤人，可见福楼拜并没后悔当时在人群中多看了那一眼。

严格地讲，福楼拜算是一个“啃老族”。他

一生就写了六部小说，时间跨度长达24年。即便两百多年前的法国稿费丰厚，想来维持基本生活也会捉襟见肘，而且他又没第二职业收入来源。如果不是福楼拜他老爹生前为他在鲁昂塞纳河畔买了房子并留下一笔不菲的遗产，估计就难有后来的文学成就。后人伍尔夫说过，“女人若想从事写作，第一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其次要有私房钱”，这话也一样适用于男人。作家要吃饭也要交友，不然今天的男女屠格涅夫们往何处去。放开想象，文艺大师们会不会在席间也会开某一个人的玩笑，比如集体捉弄福楼拜这个有着鲜明故事的人？

此等人的一举一动都是极具新闻价值，况且是文坛大佬们的聚会，难免会有媒体约稿。钱债可欠文债不能拖，反正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在此次聚会上，年轻且顶着福楼拜学生的身份，莫泊桑能做的也就是端茶送水。当然，其间也会拿出手机偷偷拍照留念，因为并不是每个文学青年都能够拥有这等机会。按照常规剧情走下去，一脸青春痘的莫泊桑会把照片上传到个人虚拟社区：大白脸的屠格涅夫、蓄着某导演式大胡子的都德、富态的左拉，还有手夹香烟的女士。大佬们会点个赞，而唯一的那位女士则可能会贴句评论：“小莫又调皮了。”

雍和宫

文 / 陈贝贝
图 / 谢驭飞



四年前，刚入冬，一场大雪安静了城市。因此兴起发飞信叫小和尚同我去雍和宫烧香。小和尚是我在心里给他起的译名，因为他是禅学社的骨干，笃信佛教、学梵语，身材瘦削、头发剃得短短的竖立在头皮上，有时泛着青光。

小和尚在飞信那头似乎总是随叫随到。我飞信说 20 分钟后在两个宿舍楼之间的十字路口见，他就回了个“噢”。我在脸上抹了一把强生擦脸油，套上红色羽绒服和灰不溜秋的旅游鞋。本来就是朴素节省到不修边幅惯了，跟小和尚见面更是没有压力。相反精心打扮了倒要不自在，好像不懂色空的道理似的。小和尚的同学说起过他立志最终要出家，如果我以好颜现其前，好像要耽误他修行得道。

小和尚祖母信佛，他又被保送到四年招生一次、一届只有六人的梵语专业，在我看来这就是有佛缘。而且小和尚每天坚持打坐 20 分钟到一小时，吃全素，永远悄声细语，不急不恼。小和尚的世界观很固执，所有事情最终要落脚到圣教与修行上来，然而对藏传佛教、汉地佛教并没有什么分别心。与小和尚从初识时便觉熟稔，仿佛多年的老朋友，但他只是默默地远远地看着你。当我说起时常忘记时间而晚睡，使失眠愈演愈烈，他便开始每晚 23 点准时发微信提醒我睡觉。一开始我很感动，非常听话地去睡觉，久了把这每

日一则的提醒也当作了耳旁风。后来我叫他不必这样，但他还是固执地坚持了一段时间，直到我有了男友。后来，我对禅学社的主要活动——学习深奥枯燥的中观经——感到厌烦，便与小和尚鲜少有交集了。毕业搬离宿舍那天，一宿舍的家当装满了爸爸的车。车开到校门口，忽然想起小和尚说过要送我禅社给毕业生的礼物，马上叫爸爸掉头回去。微信发过去，小和尚很快从宿舍楼走下来，给了我一袋经文、纸笔和一小罐从印度带回来的恒河沙。

一年以后，我在巴黎校园中白桌白椅、阳光普照的图书馆内贯注精神拼凑一篇期末论文，忽然之间产生出离之感，顿时回到那个雪后的北京冬天、唤来小和尚同去雍和宫的下午，写下上面的文字。

雍和宫的故事还有个蛇尾，前阵子小和尚微信上说起之前自己拘泥于佛教禅学，把路走窄了，唯恐再行延宕要没了回转余地。今年夏天我回国，听说他竟交起了女友。前不久，我发现雍和宫旁边的那个素食餐馆静莲斋在租金日涨的压力下悄然关张，周边的设计师精品店、昂贵的素食餐厅、咖啡馆和酒吧越来越多，与许多大师算命的铺子对峙起来。☑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戴尔 XPS 13 超轻笔记本电脑

将 13.3 英寸显示器安装在一台 11 英寸大小的笔记本电脑上，仅重 1.18 公斤，这也使得 XPS 13 成为世界上最小的笔记本电脑。XPS 13 使用了独特的近乎无边的显示器，其上方及两侧边框的宽度仅有 5.2 毫米，UltraSharp Quad HD+ 分辨率达到了难以置信的 570 万像素，一次充电可以连续运行 15 小时以上，搭载了第五代 Intel 处理器，最高可以选装酷睿 i7 以及 Intel HD 5500 显卡。



ED Hardy 秋冬季成衣系列

一反往日的五彩斑斓，以简明肃穆的黑白两色为主，配以人造皮草元素与提花工艺，渐变色涂层印花是本季一个全新的创意理念，颜色鲜艳的迷彩图案配以无缝橡胶束头，使得传统的滑雪服与夹克系列变得活泼生动。



Piaget 伯爵婚礼系列

Limelight Possession 系列两只活动式戒圈彼此独立又密不可分，Passion 单钻指环由铂金打造，而钻石底座仿若悬浮空中。密镶碎钻的戒托镶饰两个涡形纹饰，寓意情侣之间心有灵犀。

登喜路 2015 秋冬系列剪羊毛外套

两个主要款式之一是深棕色短大衣，它采用的是冰岛优质剪羊毛，其他细节包括经典而结实、富有质感的意大利手工编织皮制“足球扣”和大而温暖的口袋。另一款充满现代感，形状呈茧形，长度刚好到膝盖上方，有四个军装式口袋，一个双层的鞍皮扣带用于固定领口部位以保暖，鞍皮扣带上面赛车绿色的珐琅按扣受 1957 年捷豹汽车的绿色和 1893 年压花 D 型环启发而设计，外层为蓝灰色，富有麂皮丝绒触感。



Gucci Flora 花都魅惑系列首饰

在 Gucci 经典的花卉图案启发下，此款项链饰有紫红色珐琅蝴蝶和花卉吊饰，嵌饰红宝石，一同推出的还有开放式戒指，饰有粉红色蝴蝶、花朵或以红宝石点缀，作品都饰有迷人的粉红或深红色蝴蝶，它们采用珐琅技术制作并手工上色。



圣路易斯 Twist 1586 系列酒杯

在被爱马仕收购后，今年圣路易斯特地推出了这个以工坊成立年份为名字的酒具系列，全套除一只醒酒器、一只水杯外，用来品酒的杯子有三式：一只郁金香收口、倾斜旋转条纹的香槟和白葡萄酒杯，一只年轻红葡萄酒杯，一只成熟红葡萄酒杯。都采用手工技艺吹制。成熟葡萄酒杯的厚水晶、收口的设计对老酒香气的留存保护非常明显。



Victorinox 大马士革刀全球限量版

优质大马士革钢主刀，特在刀刃上锻造出经典流水花纹，配以天然橡木刀柄，此款专业配备主刀、小刀、拔木塞钻、开罐刀等标准 14 项经典附件，全球限量发行 7000 套。





桌面整理台

L'atelier d'exercices 的桌面整理台强调自然的风格，从一块坚实的榉木块上切割出 5 个插槽和用于插笔的圆洞。把邀请函、戏票、名片、明信片等插入整理台，桌面因此变得井然有序。



不对称耳环

纽约设计师莫妮克·波安的首饰系列以独特的材料和前卫风格为特征，这款玫瑰金不对称耳环同样如此。6.5 克拉的黑钻石片切割出复杂的图案，不规则的镶嵌强调出动态的感觉。



回收铝材

康斯坦丁·葛契奇设计的 Parrish 椅子，以被喷涂成红色的再生铝为支架，与木面座椅结合。椅子是模块化系列的一部分，强调了回收材料的概念。

水滴形咖啡桌

Kendo 品牌的 Cami 咖啡桌以实心胡桃木或橡木为桌腿，水滴形的桌面结合实木和上漆面板两种材质。这样不同寻常的组合，为咖啡桌提供了一种有趣新鲜的外观。



诗歌餐盘

Mineheart 的“诗歌”系列餐具，镶着金边的白色细骨瓷餐盘中间是蓝色的文本。其中 10 英寸餐盘上用昔日情书的书写体，写着一首爱情诗：“我爱你看我的样子，你用餐刀的方式。我爱你吃东西的样子，你赋予我生活的意义。”

复古地毯

德国设计师吉安·凯丝设计的 Sari 真丝地毯，结合传统打结工艺与现代的图案设计。高品质的丝织物被切割成细条，根据色彩来分类并用作打结编织的材料，呈现出东方地毯的复古外观。



苏丝黄的台灯

西班牙 Yonoh 设计工作室受电影《苏丝黄的世界》启发，制作出这款具有远东故事氛围的 LZF 台灯。台灯在瓦伦西亚手工制作，共有 11 种不同的天然木皮饰面可选。





大昭寺门前，虔诚的信徒在行叩拜礼

圣城拉萨

—— 世俗、宗教与自然



(金海摄)

傍晚时分的布达拉宫

文 / 吴琪

不一样的地理与文化对于个人来说，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启示与引领。空气稀薄、大气干洁的藏地，那些陷入河谷的村落，与山间属于藏传佛教不同流派的大小庙宇，构成了旅游者心目中的圣地西藏。

藏传佛教的存在，成为西藏文化让许多人感到神秘的重要原因。全民信教的藏族，造就了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寺院、佛塔、经幡等，那些“六字真言”和嘛呢堆，雄伟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小昭寺，都成为藏传佛教的外部标志。藏族积累的文字典籍浩如烟海，数量之巨仅次于汉文典籍，壁画、塑像、唐卡等佛教艺术，散发着雪域高原上独有的魅力。

每一个走入西藏的外来者，都不可避免地携带着自身的文化基因，进入

到一个个让他们感到惊奇的文化场景里。拉萨是藏人眼里的朝圣中心，也是世俗眼中西藏最现代化的城市，它就像一个无言的主人，千百年来静默地看着人群的往来与社群的变迁，一点点渗出历史带给它的打磨痕迹。

藏族作家阿来在《大地的阶梯》里写道，他曾在四川藏区山间的冷清小寺里，遇到一个年轻的喇嘛。当喇嘛送他从山顶小寺一点点走下山时，夕阳照亮了一川河水，也照耀着列列远山，直到视线最远处。年轻喇嘛轻声说道：“我看那些山，一层一层的，就像一个一个的梯级。我觉得有一天，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去到天上。”在藏族人心目中，青藏高原的腹地拉萨，就是顺着大地与历史的脉络，处在大山阶梯的顶端的藏文化中心地带，是终其一生也

要努力到达的地方。

拉萨的历史，在地理学上尚属年轻，在文化历史上已然十分悠久。大约在2000多年前，拉萨河谷还保有森林与沼泽的生态，大昭寺就是在以土填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大昭寺维修的时候，气象学家惊喜地发现，该寺更换下来的梁柱为建寺时的原木，并从其年轮中辨识出公元7世纪中叶以前数百年间拉萨地区气候的干湿冷暖。

按照传统藏学家的研究，也就是在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藏区，在此之前流传于藏地的宗教为苯教。藏学家柳陞祺认为，苯教作为一种原始宗教，本没有多少深湛的教理而言，所以本波（苯教的另一种称呼）教士一旦遇见佛教的威胁，就深切地感到自身的缺点。

为与佛教竞争，他们一方面利用人民的保守性和排外性，另一方面借鉴佛教义理甚至仪式，制作大量经典。佛教初到藏区，对于信奉苯教的民众来说，认为佛教里都是外国人，比如释迦牟尼、文殊菩萨。苯教原本信仰里，河有河神、山有山神、水有水神。莲花生大师用他的智慧使藏区百姓接受了佛教，他将苯教里崇拜的神吸收到佛教里来，增加了一个神的系列，叫作“护法神”。这个护法神系列没有定额，随时可以增加。莲花生大师将苯教的神灵搬到佛教里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就形成了佛教的万神殿。

用藏学家王尧的话来说：“藏传佛教就把原来当地的崇拜和信仰统统吸收进来，最后皆大欢喜，当地人也觉得信仰、崇拜的神都是熟悉的，这样就减少了人们心理上的反感。这是莲花生大师重要的贡献。”德国宗教学者H. 霍夫曼总结说：“在藏区，似乎是佛教占领了舞台，可上演的是苯教节目。”

不过在年轻一代的藏学家沈卫荣看来，上述曾经非常主流的观点，今天已经遭遇到国际主流学界的质疑。直至今日，人们也无法确切地说清楚苯教真正的来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乐于相信苯教或许就是佛教的一个分支。但是“将佛、苯对立作为吐蕃时期西藏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更像是后世西藏史家有意建构出来的一种历史叙事，其真实的历史则依然是模糊不清的”。苯教史家建构出来的苯教的远古来历，更像是神话传说，没有确切、可信的历史资料依据。从现存的苯教文献来看，它们的绝大部分都与佛教文献相对应，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反倒是昭然若揭。但是藏文明在历史河流中的灵活性与包容性，一直清晰可见。

在对于西藏的讲述中，从某个角度来说，它们有着两重空间。一重是被上百年来以西方探险者、传教士、学者、旅行者为主讲述的、逐渐被神秘化的“香格里拉”和纯精神化的西藏；另一重是藏人自身在变迁的生活中如

何把信仰、人际关系、经济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智慧。但是后者并不像前者那样获得外界的更多关注。

西方早期的探险者，往往凭借个人的讲述而给西方世界塑造出充满传奇色彩的西藏。比如因《一个巴黎女人的拉萨历险记》而名扬西方的大卫·妮尔夫人，她的多种游记出版后，一直遭遇到种种质疑，甚至照片的真实性也被怀疑。沈卫荣分析说，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真正能够涉足西藏高原的西方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不但留给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而且也使得涉足西藏的西方旅行家们对西藏的描述有意无意地会刻意去满足西方受众对西藏的热望和期待，以至于会不顾事实而添加很多符合西方人的西藏想象的内容。

具体到大卫·妮尔的种种有关西藏的游记和著述，其中显然夹杂进了很多当时欧美十分流行的“通灵学”中的一些内容。作为“通灵学”的信徒和积极倡导者，大卫·妮尔非常热衷于将她在西藏的所见所闻与作为东西方性灵之学的杂烩——“通灵学”的内容联结起来，将它们杂糅在一起，以至于引起了后人对其所记述之内容的真实性的深刻质疑。“我想大卫·妮尔曾经到过西藏当是不争的事实，但她笔下的西藏一定与她见过的那个真实的西藏有很大距离，其中充满了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它们为后世出现的一个神话化的西藏形象起了很大的作用。”沈卫荣说。

今天的西藏，很多地方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早已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发展得更快。但是藏族人民对佛教普遍而深刻的信仰，又让藏族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西藏仍然保留着相当的独特性。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西藏热”，使得人们非常关注西藏的物质外观和精神内涵，希望西藏在现代化当中不失其璀璨的文明。如何撇开我们头脑中被过度精神化和神秘化的西藏，认识一个与现代文明不断融合，同时在融合过程中亦存在曲折与矛盾的西藏，或许是我们今天需要面

对的新课题。

当今天我们走进藏文明的中心拉萨时，它依然像一个流动的跨越时间界限的博物馆。古老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仍然是朝圣者的圣殿；甜茶馆里游客与当地入一样酣畅地享受着藏面与甜茶；一些藏族人熟练地用汉语和英语做着游客的生意，家里最为整洁的地方仍旧是家户神殿。在离拉萨市中心很近的村庄里，人们随时准备接受喇嘛、活佛、占卜者、民间或社会精英、降神者的指导。在藏民们看来，这些人是指导他们在仪式、生活和生产当中走上正确道路的导师。人们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历史与现代性非常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这就好比这里的人们并不排斥天气预报，但春播、秋收这样的关键农时必须遵守藏族的历史书。人们根据自己所认同的理解，把耕种和收获、农闲和农忙、干旱和雨水、灾难和平安、丧葬和婚娶都放入到他们的生活结构里，他们的日程、月程和年程都根据这些关系来安排。

藏文明的灵活性和包容性随处可见。藏民们在解释历史文本的时候，非常强调“一个喇嘛一个佛法”，意即各个喇嘛念的经有所不同，因而强调各个地方的独特性。这种基于对地域和不同教派的包容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和容许了变通和独特的发展。学者陈波感慨地说：“佛教能进入西藏，正是由于藏地在空间上还存在大量的‘宗教性闲置’的地方需要被填充。或者说，佛教是在既有的空间中，开辟出了新的祭祀空间；在不妨碍固有朝圣空间的同时，开创了自己的朝圣领域，引出了另类的朝圣功能。”

我们这次走进拉萨，观察拉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讲述生活在其间的藏医、活佛建筑师、藏族作家、登山队员等人的故事，就是希望能够接近更为真实的西藏，体会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们如何用他们的生活智慧，在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传统习性与现代风尚之间保持着奇妙的平衡。■



藏文明剖面：世俗、宗教与自然

没有一种文明能够在封闭静止中获得生命，藏文明在发展中不断吸收着其他文明的养分。今天它所遭遇的现代化，也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碰撞的一瞬而已……

文 / 吴琪



(陈浩摄)

色拉寺的僧人们每天有一次辩经活动。这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辩论，辩论者往往借助于各种手势来增强辩论的力度，他们或击掌催促对方尽快回答问题，或拉动佛珠表示借助佛的力量来战胜对方

巴村人的神圣空间

巴村是拉萨北部山麓边的一个藏族村落，一条季节河与一条灌溉渠穿村而过。从巴村出发步行去拉萨市中心，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每天清晨起床后，仍有一部分巴村人穿着传统服装去拉萨转经，她们通常走一遍布达拉宫下面的转经道，再步行回来开始一天的劳作。

由于村子里不少人在拉萨上学或上班，一些从拉萨退休下来的人也会在巴村买房居住，这个相当富裕的村子既在西藏最繁华都市的边缘，又由于村落形式的存在，保存着藏族人生活的传统。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的学者陈波曾在这里居住了13个月，“整整一个藏历年的时间”，通过田野调查对西藏50年间的这个文明化村落进行研究。陈波发现，西藏的文明形态是跟村落与城市、藏传佛教与前佛教信仰的共处和互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从世俗生活来看，由于靠近拉萨，做生意的机会多，巴村是对其他地区藏族人有吸引力的财富中心；从宗教生活来看，这里作为拉萨的一部分，又是藏人心目的朝圣中心。

拉萨对藏人有着特殊意义，它是一个藏人宇宙观的模型。这个模型，体现在以布达拉宫为顶点，以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下面的“雪”（西藏地方政府机构区）为中心，向下和向外层层扩展。这个顶点和宇宙的“天”连接在一起，大昭寺则和佛教的信仰连在一起。西藏20世纪50年代以前城市的典型模式，是以山上的宗教政府城堡为中心，围绕着它，在山下形成居民区。

拉萨河谷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地区是藏文明1300多年的中心。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拉萨的城市意义跟其他城市并不相同：它的城堡和城墙在红山，但是居民区几乎没有在这里发展。

城堡和城墙几乎完全是象征意义上的。拉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东边是以大昭寺为中心的信仰聚落地区和市场、居民区；西边是布达拉宫和下面的“雪社区”。这两者之间，以及被后人当作拉萨最具古城特色的“帕廓”（中转经路，大昭寺周围），都没有任何所谓的城墙，完全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穿越其中。

对于西藏文明来说，这种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城市建筑中，更是体现在精神信仰里。

比如藏人一出生，就有两种神灵跟随，一种是生神（skyeI-Iha），一种是地方神（yul-Iha）。生神是伴随一生不变的神灵，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这个神灵都跟随着他，不因所处地方的不同而改变。地方神则随着居处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一个人一生中只有一个生神，但却可能有无数个地方神。对于一辈子留在出生地的人来说，他只需要一个祭祀空间就行；而对于那些外出或迁徙的人而言，在某个具体时段，他就需要祭祀两个神灵：一个是生神，一个是当地的地方神。于是，一个地方的迁徙人口越多，这个地方人们的祭祀空间就越多。甚至一个家庭里不同的人，祭祀空间和神灵也可能是不同的。

巴村的人，如果是在异地出生后迁徙过来的，他们会每年回家乡祭祀自己的生神，或者去拉萨祭祀。对于迁徙而来的人来说，出生地依然飘扬着他们一年年亲手悬挂的经幡旗，出生的地方永远是他们经常回顾的记忆圣地，直到今天不变。研究者陈波告诉我，与汉人过年时回到家乡与在世的亲人相聚不同，藏人在藏历年回访出生地，是以他们的特殊方式与神灵进行交流。

西藏历书是观察藏人传统生活的另一个载体，它在今天的藏人生活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藏文的天文历算是通过对宇宙中星体的运转以及解



(金海摄)

8月31日，大昭寺的朝霞

读季节变化的各种现象，分判一年中的时日，通过各种星体的位置来了解自然规律、指导藏人的生产和生活。西藏著名的历算学家贡嘎仁增曾说：“以前船夫从船桨头搅起的水涡上寒气的大小判断天气的冷暖，牧民‘冬宰’时能从血液在手上凝结的情形判断气温的变化。如此他们从生活历练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气象知识……人们平时观察的现象有水欧至、燕子归、马熊产仔、食古雕筑巢、雪猪眠毕、桃树花开、草子初结、草山转色、树胶溢出等，这些成为藏历中最具民族特色的地方。”

藏族作家索穷在《西藏记忆》中写道，传说拉萨八廓一带有这样的习俗：每当新年的历书出来后，门孜康（拉萨藏医院）的一位喇嘛就把《春牛芒神图》画在一张大纸上，挂到八廓街上的人行道上，对着图画，用唱腔

给街头的行人讲解来年的天气形势和农事方面的情况，听的人总是里外三层挤得满满的，这曾是拉萨老百姓（特别是农牧民）了解历书内容的主要机会。

学者陈波看到的巴村，在今天已经完全成了拉萨城市圈的一部分。2002年他长住巴村的时候，这里仍然有一些农田，但是当地人基本已不种田，而是将田地租给外来的四川人。待到近几年，农田在巴村完全消失，但是藏书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仍然十分重要。对于人们来说，离开了历书，一切都将混乱。

巴村的村民如果准备建新房，会到拉萨的藏医院天文历算所，将自己的生肖、生辰提供给“谷秀啦”（僧人），请他们为建房卜算一个吉日，并提供建房开工时仪式方面的指导。村民将藏医院历算所给予的指导看得非常重

要，并在开工仪式时严格遵守。比如一位叫及仓卓嘎的女主人，发现历算所的测算要求里，需要她们在开工仪式上用洗脸水遍洒四方。她认为自己没有完全洒到四方，就会因此感到紧张。

陈波发现，1959年前，普通西藏人没有多少经济能力和空闲去从事仪式活动，仪式活动大量集中在以寺院为代表的“大传统”内部。1980年以后，原来大传统的仪式扩散到民间，成为普通民众追随的主要对象。

而巴村人在具体的宗教行为中，已经自然而然地将不同来源的信仰融合在一起。比如陈波曾在巴村参加过一个降神仪式，这个降神者从日喀则地区迁来，他的降神活动与宁玛派比较接近，但是又受到格鲁派一定的影响，而巴村人则欣然接受。“可是如果细细追究起来，降神并不是佛教的行



(于笑攝)

拉萨哲蚌寺

为，它更接近于这里的原始信仰。”在巴村人的家户神殿里，既供奉着佛教的神像，也有诸如“央”的非佛教供奉器物的存在。巴村大约30%~40%的人会装藏一种叫“央”的柜子，“央”经过喇嘛念经后，人们将各种物品装进柜子里，据说柜子里装藏的是全世界的粮食。“央”显然不属于佛教信仰，它是藏族人的一种原始信仰，但却与佛教神像共存。佛教的轮回说和苯教固有的灵魂不灭观念相结合。佛教进入西藏后，通过僧侣的修正、加持，这些本土的神灵纷纷重新获得了合法性、权威乃至神圣性，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一代代传承下来。

巴村人的现代生活

与巴村相对应的城市，自1990年以后，迅猛地推进着“城市化”的进程。

巴村从来不拒绝现代性的成就，但现代的器具又无不服从于他们生活的丰富和信仰世界的构建。在他们居住的空间里，有大众媒体在铺延，也有现代的家用电器。村民家中的神殿里也使用凡俗的器具，但是它们和世俗生活空间的器具又有区别。神圣和世俗空间的划分，一方面是在物理空间上区别出来，另一方面通过嵌刻在村民的情感体验中来完成。不同信仰的神灵居住在他们意识中不同的空间里，互相并无干扰。

陈波在《生活在香巴拉——对西藏五十年间一个文明化村落的实地研究》中写道，他通过考察发现，1959年以来巴村社会的剧烈变迁和1980年以来的“休养生息”的政令，为文明扩散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物质条件。它带来的是一种大小传统关系的结构性转换：当原来大传统中的精英阶层

更多选择外来文化并几乎达到汉化时，作为小传统的巴村却将原来属于大传统的核心内容加以发展。现代化并没有使西藏的传统出现明显的断裂，民间深厚的文化传统在物质条件发展之后，生命力依然彪悍。

不过西藏社会的改变，使得人们的现实选择确实正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过去西藏家庭的重要追求，是将家里的男孩送进寺庙。经院教育制度的产生与历史上藏族人的现实生存需求相关。一些为了摆脱家庭贫困状态，希望到寺庙里寻求发展以摆脱贫民状态的人，要进一步升到社会更高一级的地位，唯一的办法只有“进庙”。较为富裕的差巴家庭就在几兄弟中选取一个聪明的、能读书的人进寺庙，给寺庙修间房子，在寺里保持他家庭的一个房间，每次家里派一个人来，都住在这间房里。由于寺庙里只供茶，在

寺庙学习的人就要两三个月回一趟家取粮食，同时参加家庭的农业劳动，藏族的寺庙、出家人和社会有密切的关系。

藏学家王尧分析说：“因为这些僧人了解寺庙的情况，回到农村一趟，又从农村带来新信息回寺庙，经济上没有隔断家庭的支持，以及家庭对他的期望。这和汉地完全不同，汉地出家人无家，家是火宅，不能回去。这和藏区对宗教的态度不一样，藏族社会的寺庙和若干家庭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家庭带来社会信息到寺庙，也将从寺庙里学习的知识带回农村，这是僧人的作用。”经院教育给穷苦的贫民提供了一个晋升到上层社会的机会。假若是贵族子弟或转世活佛，就用不着辛苦地竞争，他们本身就是贵族，到寺庙里仍然是贵族。

现在的藏区教育通常有两个途径：有相当一部分人按现代的教育体系来读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研究生、出国留学等，这条路成为西藏流行的教育制度。另外一些人会出家，到寺庙里学习藏文，进入经院教育体系，考格西学位，成为佛教学者或寺庙主持人。寺庙不再像过去那样，承担着藏族社会的教育、医院、信仰等多种主要功能，寺院的功能逐渐单纯化，而寺庙之外的现代化社会，向人们提供了医院、教育等多种公共服务。

云南省社科院的研究员郭净提到，这些年藏区出现的很多藏文和专业培训学校，很受百姓欢迎，它们属于“另类教育”的一部分，这种学校通常由高僧主办，将寺院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开办藏文、佛学、美术、汉语、英语，手工甚至影视课程，非常注重教育的整体性。比如青海藏区的吉美坚赞学校，就办得非常特色。

现代性理念的进入，改变着藏族人对一些事物的看法。王尧提到，现在藏区有不少藏族学者成为某些学科的领军人物，比如某位藏族青年学畜牧兽医，后来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

成为专家。“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藏区的传统教育中有个缺点——轻视劳动者。劳动者本人也认为自己是贱民，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观念。”在印度人的四个等级中，其中最后一个等级就是“贱民”，是不可接触的人，最悲哀的是这些贱民也认为自己是不可触碰的，走到街上，他们拿着棒子敲打，“不要被我碰到，我是不可接触的啊！”这种观念对藏族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传统社会里，打猎的人、屠宰的人、打铁师、天葬师等几种人最受轻视。

在拉萨范围内的巴村，年轻人在今天的选择非常丰富，有的外出读书，有的则在家做生意。随着这些年“西藏热”带动了旅游业的兴旺，巴村人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头脑。他们一部分人跑长途货运，一部分人则跑客运。2002年陈波住在巴村时，内地游客刚刚多了起来。巴村跑客运的人，之前多是拉着外国人去西藏其他地区玩，由于语言沟通不顺，巴村人只能充当司机的角色。内地游客来了之后，巴村人觉得语言障碍小了，除了当司机还能做导游，交流很畅快。现在巴村人的经济收入已经完全脱离了土地，村子里有少部分人因为怀念过去的生活方式，在家里养着两三头牛，每天挤奶去拉萨卖，也供给自家人喝。

从表面上看，巴村年轻人穿戴很时髦，跟外部世界的年轻人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了。转经筒有了电动的，打奶机有了电动的，点佛灯也有了电灯来代替。但是他们依然在藏历年随着父母去出生地祭拜，依然在内心保护着家户神殿的圣洁性，依然遵从着宗教里不应该逾越的规范。

陈波发现，村落不仅是人们生存的外部形态，村落的公共领域如活水一般，消弭了巴村人心灵之间的隔阂，情感上的瓜葛、信仰上的分歧，为巴村的内部整合、巴村村落身份的新建构立下了功劳。

在巴村的甜茶馆里，陈波一次偶



然的加入，发现一个僧人、一个商人和一个从拉萨退休的老人聊着佛教的派别以及藏族经典《甘珠尔》，一个从没说话的老阿妈一直旁听着。“在这间藏区再普通不过的茶馆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通过交流，构建一部映射在村落的历史。这是文字书写的历史上没有的。通过创作和分享这样一部公共的历史，人们找到村落的认同点。



2012年8月17日，哲蚌寺在雪顿节期间举行晒佛仪式，游客信众争睹佛颜

而这种交融历史传说与宗教故事的聊天，它甚至让我认为蒲松龄时代的聊斋活动也不过如此。”

而藏人的生活里还有着十分有特色的“吉毒”，它是村民人际关系的重要内核。“吉毒”藏语意为“乐苦”，即“共同乐苦会”，多为民间互助的群众团体，有“乐时同吃山头草，苦便同饮洼地水”之意。巴村的老年人会

念叨说，儿女不孝顺也不怕，只要在村子里有几户“吉毒”，老了就会有人料理丧事。

巴村人的这种文化理想是和藏区其他村落共享的。在青海的文都乡，夏天时，若干村的人家把所有牛羊集中起来在山上统一放牧。每家出一个人，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7天，轮流到山上放牧。在山上期间，组内的

若干人把所带的吃食拿出来共同吃。一旦牛羊有损失，也由组内的人共同负担。7天期满，牛羊点清以后交给下一个组。文都人把这种同甘共苦的制度称为“吉毒”。

在古老传统的内核之外，巴村又包裹着现代特色，我们该怎样理解现代化作用于西藏人带来的改变呢？陈波向我分析说：“如果我们从藏族人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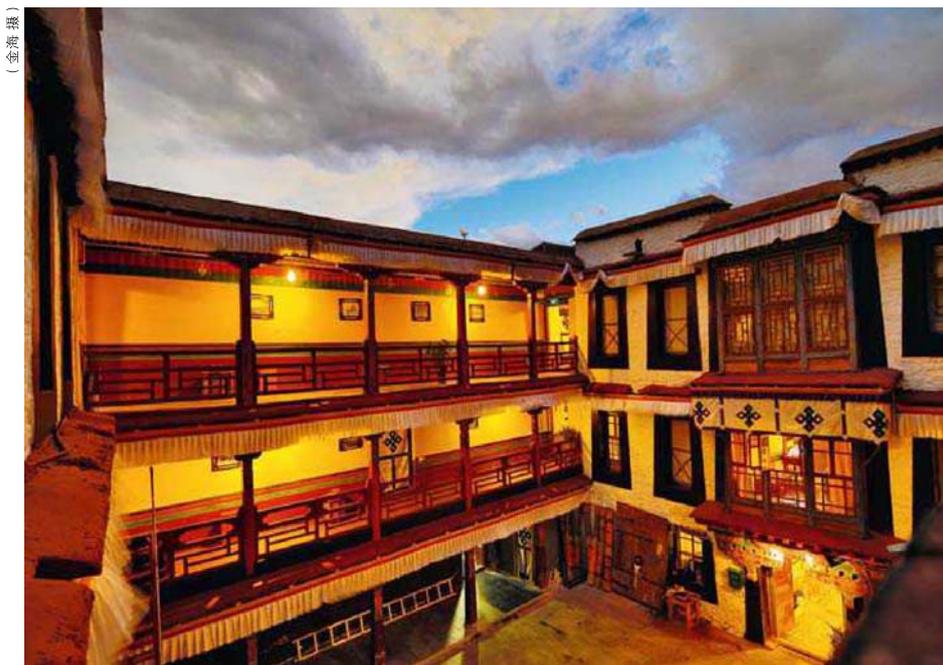
身来出发看待外部世界，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接纳，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时，开始建立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些在青藏高原以往的历史中是没有的。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带来了外部文明，那个时候人们创造出藏文、引进佛教，吐蕃王朝派贵族子弟去长安学习儒家经典。今天当飞机、火车进入藏族视野里，他们将之翻译为藏文里的‘铁鸟’‘火轮’，创造出非常生动的新词语。从历史角度来看，今天西藏的现代化，也只是藏族接触外来文明的一瞬而已，藏文明在如何交融其他文明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这种在历史中形成的文化基因，已经成为藏人群体性的性格，体现在个人的生活方式中，则是对现代文明的开放心态。

藏人的三重空间

云南社科院研究员郭净则在长年的实地研究中，为我们了解藏文明提供了另外的角度。今年60岁的郭净热爱民族史研究，也热爱影像拍摄。他跟着藏族人家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去卡瓦格博转山，他研究西藏藏传佛教寺庙里的仪式，也和环保人士、学者、喇嘛和农牧民一起，发起“乡村影像”的行动，以帮助当地农牧民发出自己的声音。

郭净说，这些年的工作让他一直在思考：新的现代化理念和工具，到底是怎么参与到藏区的社会变革中的？他了解最多的两样进入藏区的新事物，分别是环保和影像拍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环保理念从西方传入中国，郭净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参与到云南藏区的环保活动中。这使他有了一个机会，观察环保这种外来理念怎么在藏区变成一个整体性文化观念，而这种观念又是怎么被藏族改造的。在深入了解藏文明的自然观之后，郭净发现，外部输入的环保理念，



邦达仓是拉萨老城区目前建筑结构保存较完整的一个森厦（贵族官邸），如今已改造成古建酒店

自身有很大的缺陷。起源于西方的环保运动，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相分离的理念上的。可是世界上很多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比如任何藏族眼里看到的自然，都是已经打上了文化烙印，一座所谓纯自然的山，其实也是一座神圣的山。

郭净说，原本一些环保非政府组织进到藏区，与藏族只谈保护某种动物或植物，可是在当地农牧民眼里，这些都是神山的一部分。外来者如果不去了解神山，不了解与神山相联系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不了解藏民对神山的情感与认知，很难理解“环保”在藏区的真正意义。

郭净从藏族知识分子那里，了解到他们对于三重空间的认知。一重空间是世俗空间，人们为了生存，可以在这个空间里耕种土地、修建房屋，对环境做适度改变；一重是神圣空间，其中的万物均被赋予神圣的价值，不可侵犯；再一重则是普通人无法洞悉，仅为觉悟者感知的秘密空间。云南藏区的村子，特定时期会请活佛看风水，划定村子里的“封山线”。封山线以某棵树或某个石头为界，有些村子也会

埋个“宝瓶”，或立嘛呢堆作为标志。封山线以外的地区便是世俗空间，村民可以为生活的需要加以运用；封山线以内的区域，每棵树每块石头都被神圣化了，不能随意触碰。村民对此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则意识，并以村规民约加以规范。封山线以内的动物不能打、树木不可以砍伐。这种约束如今虽有所弱化，但依然有效。

藏人眼里的神圣空间是被神灵占据的，人不可侵占。按照他们的说法，本来整个世界都是为神灵所有，人为了生存而找神灵借了一块土地，可是人不断扩展这个范围，占用的空间越来越多，对神灵的侵犯也越来越大。郭净说：“圣经里其实也有类似的表达，人在有了智慧之后，破坏了伊甸园的神圣性，才被驱逐出来。”

在郭净眼里，藏族的生命观与现代环保思想相通，但又有本质的区别，这些观念总是通过日常生活和仪式来传承的。比如云南德钦的藏族，喜欢聚在一起“跳弦子”，他们一边拉着一一种叫作“弦子”的当地乐器，一起跳舞唱歌。大家在跳弦子过程中唱的藏文歌词，表达的正是藏族人对自然的



(金海摄)

拉萨北部山麓边的藏族村落——巴村

敬重、对道德的遵从。在藏人一代代的创作过程中，他们用生动方式传承着德育。从十年前开始，德钦的卡瓦格博文化社每年组织各村搞弦子比赛，这种活动完全与旅游无关，而是当地人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弦子与仪式性很强的锅庄相比，更为欢快随意，世俗性和娱乐性都很强。这种灵活的方式吸引了当地很多年轻人参与，郭净说：“大家唱诵的神山祈祷文，是用藏文写的，弦子的歌词也是藏文。这比藏文班的课还有效，年轻人不学好藏文，没法编弦子的歌词。”

2000年，郭净和云南做纪录片的朋友章忠云（藏族）、曾庆新（藏族）、和渊（纳西族）与苏雄娟等人一道，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起了“乡村影像教育”的活动；2007年，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的吕宾与云南大学合作，组成了“乡村之眼”团队，他们与当地民间组织合作，将乡村影像的培训发展到云南、青海和四川藏区。来自大学的李昕、陈学礼老师教当地村民如何拍纪录片，然后鼓励他们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当地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

让这些外来的“老师”吃惊的是，

藏族人学习影像拍摄非常快，而且拍出的片子视角很独特。他们发现，大学里学了几年的学生会过多关注技术，而不是把影像当作一种表达手段，可是藏族人很快就会跳过技术这一关，在表达内容和拍摄手法上，对科班的影像教育提出挑战。“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藏族人本来就懂得环境的艺术，我一个学建筑人类学的朋友到了藏区后就很震撼，觉得藏族人可以运用经幡、嘛呢堆、石刻，把自然环境变成一个神圣空间，所以她说“藏族精英是伟大的环境设计师”。另外，藏族人长年浸淫在对自然的尊敬、观察和互动中，藏文明的价值观又从未断裂，这使得最为普通的藏族村民，一旦拿起DV，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找到自己表达的内容。”

郭净说，藏民们拍摄片子，不少让他印象深刻。比如一位叫李卫红的妇女，她一家是生活在澜沧江干热河谷地区的藏族，历史上这里的人们利用雪山水源构建供水体系，构筑起干热河谷绿洲农业生态系统的传统农业。2000年以后，葡萄种植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在卡瓦格博地区迅速发展。

李卫红拍了一部名为《葡萄》的片子，讲述一家人种植葡萄的过程。“在我们的环保理念中，反对使用化肥和杀虫剂的理由，是认为这样破坏了环境，最终对人有害。但是李卫红要说的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杀死了其他生物，即使它们对人有伤害，这也是不道德的。”郭净说，在藏族人的眼里，生死观并不仅仅限于人类，他们认为所有生命都有生死轮回，不同的生命形式是相互转换和平等的，因此他们所说的环保，并不是有生命的人去保护无生命的自然，而是和谐的生命系统保护人的生存。

还有一位叫扎西桑俄的藏族人，拍了一部叫作《大自然的谢恩》的纪录片，讲述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藏区发生的大饥荒。“内地人谈到大饥荒，大多谈的是人们受到的伤害。但是这个拍摄者访问经历过饥荒时的一个个牧民，人们谈得最多的是，那几年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突然长得特别茂盛，一些野生动物也跑到人生活的区域，它们成为人类的食物，拯救了大家。所以这部片子讲的是感恩大自然，感恩非人类的生命。”郭净说，这样的视野超越了一个“小时代”中人人急于索取的消费文化观念，在今天具有国际化的意义。“有时候我们会抱怨自己的时代没有伟大的思想家，我觉得不是没有，而是伟大的思想家或许并不生活在我们熟悉的主流文化里。”

通过环保和影像拍摄，藏文明开始以新的姿态面对外部世界。郭净说，文化的活力来自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外部的刺激和冲撞，为古老传统的觉醒与再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现代环保观念的进入，使藏族人找到了一种重新整合传统的现代语言，成为他们与当地干部、外来开发者和旅游者沟通的介质。而影像作为一种跨越语言文字障碍的工具，能帮助他们更有效地与其他文化沟通，促进相互的理解与合作。■



拉萨老城，传统与现代之间

如何在传统风俗与现代生活中寻求平衡，是拉萨城市建设一道永恒的题目。对于老城这片历史悠久的区域，虽然传统和现代的对立有时发生，但交融得好，有时也可以是一道风景或者一种创造。老城的魅力就在于此。

记者 / 丘濂 实习记者 / 陶玉荣



拉萨八廓街随处可见手持转经筒的藏民

（图）

老城，拉萨的原点

服装设计师扎西是来自四川甘孜的藏族。他记得小的时候，那边家里都习惯挂上两幅照片，一张是布达拉宫，一张是大昭寺里释迦牟尼12岁的等身像。扎西还有个有点“讨厌”的叔叔，每次见到他，都把他一次又一次地举向空中。“看到拉萨了么？看到拉萨了么？”叔叔这样反复逗他，把他都有点弄痛了。不过，那也形成了扎西对拉萨最初的印象：“一个神圣的、每个藏族人在有生之年都要去朝拜的地方。”

索朗曾经就住在布达拉宫脚下。那是一片叫作“雪城”的区域，藏语中的“雪”是指高建筑下的矮房子，如今进入布达拉宫的城墙内，那些改成博物馆的房子，便是“雪城”的一部分。历代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居住和办公，“雪城”里有着为庞大官僚系统提供生活服务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在过去，每到藏历新年来到时，索朗的祖父就要为宫殿来做颜色艳丽的酥油花。索朗和家人后来迁出了“雪城”，住在布达拉宫后面一片叫作“雪新村”的住宅小区。“90年代，布达拉宫旁边有很多小巴车，售票员斜靠在门口，都嚷嚷着‘去拉萨，去拉萨！’你们外地人听了一定会疑惑，都到布达拉宫跟前了，难道还不是拉萨么？”

没错，在老拉萨人心中，布达拉宫不算是拉萨。传统意义上的拉萨只是围绕大昭寺和小昭寺形成的1.33平方公里的区域。633年，松赞干布将吐蕃政权的都城由山南雅隆迁至拉萨河谷，那成为拉萨历史的开端。布达拉宫是松赞干布首先修建的工程。635年，为了迎接尼泊尔赤尊公主进藏，松赞干布在玛布日（红山）修建红宫。布达拉宫在吐蕃王朝后期受到严重的毁坏，只有松赞干布用来修行的法王洞（曲杰竹谱）和供奉着由树木天然形成观音像的观音殿（帕玛拉康）才是7世纪时候的建筑。今日布达拉宫的样

貌来自五世达赖喇嘛的重建。他曾进京觐见顺治皇帝，被清王朝正式册封。从此布达拉宫的性质才有所转变——不仅只是政治中心，也是西藏最大的活佛所在地。

另外的工程则是小昭寺和大昭寺的修建。世上有三尊释迦牟尼亲自参与塑建、开光和加持的佛像，即8岁、12岁和25岁的等身像。当年赤尊公主带来的是8岁等身像，之后文成公主带来的是12岁等身像。传说赤尊公主为佛像建造寺庙的时候，寺庙屡建屡塌，文成公主到来后按照汉地流行的五行学说观察地形，发现整个藏地的地形像一个仰面朝天的罗刹女，有一湖泊正好是女魔心血聚集之地，应该填土以堵塞其血脉，并建寺庙以镇之，这便有了供奉8岁等身像的大昭寺。而湖泊之畔的沙砾滩是龙宫的所在地，也需要建造寺庙来镇龙魔，就有了供奉12岁等身像的小昭寺。戏剧性的是，有一个说法解释，到了芒松芒赞时期，唐朝听说了松赞干布去世的消息后，想取回文成公主带去的12岁佛祖等身像。僧侣们将佛像移至大昭寺的一间暗室。直到710年，金成公主嫁到吐蕃，谈起她姑母带来的佛像，大家才将佛像迎出，从此两尊佛像的位置调换。我们今天看到小昭寺里反而供奉的是尼泊尔公主带来的8岁释迦牟尼等身像，但寺庙位置却是朝向东方长安文成公主的故乡。

“你可以把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小昭寺想象成三个不断生长变化的细胞。”西藏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院长王世东这样向我形容。“慢慢地，大昭寺和小昭寺因为距离相隔不远，而逐渐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中心，大昭寺的地位更加突出；而与此相对的，布达拉宫成为另外一个中心。很长时间以来，拉萨城就是这样‘双核’的格局。”西藏摄影家协会主席旺久多吉为我展示了他的父亲、同样也是摄影师的德木活佛在1942年拍摄的一张图片：在高耸的布达拉宫和围绕大昭

寺形成的房屋群落之间，是大片的荒地和沼泽。在解放之前，这两个“中心”加起来一共才3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也不过3万人左右。

为什么人们习惯将大、小昭寺的片区才称作拉萨呢？王世东说，这是因为布达拉宫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行政中心，和普通人的宗教与世俗生活关系不大，而环绕大、小昭寺却逐渐出现了平民和贵族的宅邸、店铺和市场、手工业者的作坊、旅店和餐馆等等，曾经清政府设置的督办西藏事务的驻藏大臣衙门也是在这个区域。藏传佛教徒有围绕圣物来进行转经的习惯，因此大昭寺外面一圈转经道“八廓”也就最为繁华，布满了满足寺院宗教仪式和朝圣者生活需要的各种商店。以前有一句谚语在藏族的牧区很流行，它大意是，当你在大庭广众中看到一件似曾相识的东西，千万不要急着说那是自己的，因为这种相似的东西在八廓街上到处都是。

这片传统意义上的拉萨城和内地的历史古城在格局上有很大区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青是联合国“拉萨老城保护与发展”项目聘请的专家。她说，拉萨是一座信仰之城，老城自然生长出来的空间格局充分体现了宗教的概念，是一种“坛城”的意象。“坛城”是佛教宇宙观的模型和象征。佛教典籍讲，世界的中心在须弥山，围绕须弥山的是四大洲和八小洲，最外围也有日月星辰环绕。“坛城”也是佛教修行者的道场，修行者为了防止魔鬼进入，会在地上画一个圆圈，或者建一个土坛，在上面画上诸神的画像，邀请他们聚集加持。在经典的“坛城”题材的绘画里，通常是外圆内方的结构，由水、火、莲花等图案层层烘托，中间是主尊。拉萨老城的面貌就和这种佛教的宇宙观相互映照。“坛城都呈现一种向心性的分布。拉萨老城的中心是大昭寺，大昭寺的中心又是12岁等身佛。大昭寺内有转经道，称作‘囊

廓’，大昭寺外的转经道是‘八廓’，再往外，还有包含了大、小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外圈转经道‘林廓’。它们形成了三个同心圆，环抱着若干曲折折、宽窄不一的道路，构成了密集通达的街巷网络。”

拉萨老城是拉萨发展的原点。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轮的城市建设是要填补拉萨老城和布达拉宫之前的大片空白，沟通“双核”。“我们勘察设计院的历史是60年，比自治区成立的历史还长10年，那10年我们就在这个中间地带来做设计工作。劳动人民文化宫、新华书店、百货大楼等25个现代建筑就出在这个区域。”王世东说。之后的城市发展思路则可概括为“东延、西扩、南跨”，拉萨位于一个狭长的河谷地带，随着城市扩张，向东西两面延伸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南跨”则是指跨越拉萨河来建设，现在河的南面是经济开发区“柳梧新区”，有西藏第一座立交桥“柳梧大桥”将它和北面的主城区相连。各区域的功能逐渐清晰：柳梧新区成为一个“商住两用”的新区；东面是新的行政中心，党委、政府、人大都陆续迁往东面；西面则分布了民族轻工业。“保护老城，开发新城”也已经成为共识，老城之内就是发展文化和旅游业。

对于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来说，老城是一张可以显示拉萨身份的名片。他们需要考虑如何让老城的文脉得以延续，新城和老城如何在气质上相呼应。“否则新城越来越大，老城湮没在水泥丛林中，整个拉萨便失去特性。”王世东说。一个让他反思的设计是“林廓”转经道上的交通体系。“林廓”是最外圈的转经道，也是老城和新城的接合处。等到冬天的农闲时节或者是萨噶达瓦节来临的时候，“林廓”上就会出现大量磕长头的朝圣者和转经的人群。“他们都是走在转经道的内侧。这就意味着马路两侧的车行道和人行道不能做成完全对称的。遗憾的是当初设计时并没有这样去考虑。”如何在



服装设计师扎西

(金旻旻 摄)



(金海摄)

如今西藏的交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拥有私家车成为家庭经济条件好的评判标准之一

传统风俗与现代生活中寻求平衡，是拉萨城市建设一道永恒的题目。

老城演进史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老城曾经体会得更加深刻。

在外来者的笔下，拉萨老城在荒凉的谷地中闪烁着诱人的光芒。1936年，跟随英国使团来到拉萨的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惊异于这里商业发达的程度。“藏族人天生就是生意人，拉萨大街似乎总是熙熙攘攘。”他在《圣城拉萨》一书中写道，“羊毛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牦牛尾、兽皮、盐和珊瑚砂运往印度，而麝香、鹿茸和各种中药材则运往内地。金条和银币从印度被带回来，常常会看到成队的驮畜满载着沉甸甸的箱子。”他想介绍一位朋友买几块石貂的皮。在城中一处叫作

邦达仓的富商的院子里，他看到了大量的皮毛存货，包括雪豹皮、山猫皮、狐狸皮、水獭皮、土拨鼠皮以及其他根本叫不出名的皮毛，羊毛则是“成吨堆放，高达屋顶”。

20年后，从北京去到《西藏日报》工作的摄影记者陈宗烈也有相似地发现：“那里有印度商人、尼泊尔商人、日本商人，还有高鼻子蓝眼睛的欧洲商人。吃的东西就见到奶粉、饼干和印度来的高级点心；化妆品有巴黎的香水、美国的口红。还能买到最高级的莱卡相机。”陈宗烈告诉我，街上的店铺通常都不挂招牌，但是老板们经常会用留声机来放音乐。“我们根据音乐风格不同，来判断它是哪一国家商人的店铺。”

然而物质极端丰富的另外一面，则是肮脏与贫穷。让查普曼同样感到震惊的是拉萨城里乞丐和野狗的数量：

“门道旁边常有成群结队的乞丐倚墙而坐，他们吐着舌头，竖起大拇指，哭诉着乞讨……”陈宗烈说，按照旧藏地方政府的统计，解放前后拉萨城里3万多人中，就有4000多名乞丐。

一方面具有国际化都市的面貌，另一方面又很落后，刚解放时的拉萨城就呈现出这样奇特的面貌。“拉萨的国际化程度是由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西藏离南亚和西亚都比距离中国内地要近，所以它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当地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业在当时都是要靠手工劳作。农副产品的产量都无法满足当地的需要，工业又没有，所以它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制品都要从内地和周边国家输入，作为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的拉萨长期以来便商贸发达。”李青这样解释，“市场上能见到十分难得的奢侈品，它们和普通人无关。那时

西藏是个等级鲜明的社会，财富分配很不均衡。”

让老城里的基础设施达到现代化的标准是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早年间老城的街巷全部为土路，缺乏排水设施，又没有电力供应。西藏大学艺术系教师噶德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城，5岁之前全家就与别人一起合住在曾用作尼泊尔驻藏领事馆的廓尔喀大院中。他曾经用一幅暗红色的、有些阴翳的油画表达他对童年老城的记忆。“经常停电，晚上23点后才来电。直到1997年羊湖电站建起来才完全改变。”藏族作家张羽芊对老城的记忆首先是味道，“因为都是旱厕，粪使用草木灰覆盖，由专门的人挑去近郊的农田。”

从和平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老城的基础设施只进行了局部的改建，1979年开始相继有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对市政设施的改造，2005年后这种维修变化连年都有。老城房屋的改造和保护则着曲折的经历。解放之前，老城内原有的民居包括贵族的宅邸、地方政府的公房、商人或富裕居民的私房、普通民居几类。随着旧制度结束和新社会建立，大量普通人得以分配、入住这些房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旧房改造好后可以和现代的生活方式相适应，但在当时两者却是不相容的。那时候政府考虑就是怎样迅速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也能让老城容纳下更多的居民。”一位参与过老城改造的工作人员诚恳地对我讲。于是就出现了将传统院落改建成联排公共住宅的情况，还有的做法是将几个院落合并成一个院落或者拆二层建四层、增加附属建筑物，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00年左右。

居民达瓦次仁就是在这个时期携全家搬离老城的。因为他住的地方被改成联排住宅后，左邻右里都是陌生人，不再习惯，便搬走了。离开老城后，达瓦次仁依旧关心着老城的命运，“那是个想起来便会觉得温暖的地方”。



西藏大学艺术系教师噶德

达瓦次仁是西藏大学工学院的教授，也是联合国“拉萨老城保护与发展”项目的参与者，他为大量老建筑测绘并收集文字资料。他告诉我，其实老城里看到的一些具有藏式风格的建筑都是把老房子推倒后重新盖的，“那些原汁原味的藏式民居凝结了先人的智慧，没有了非常可惜”。如果有些西藏民居的常识，很容易就能辨认出复建的建筑。老房子墙厚、窗小、门低矮。墙厚和窗小都是为了室内能够冬暖夏

凉，门矮则是为了进门低头对佛祖表示尊重。重新盖的都少了这些特色，并且外墙的石头全部都是规矩的正方形，而不像过去就地取材那样什么形状都有。另外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高度，以前贵族家的主楼才是四层建筑，平民就算是富商，也只是两层到三层。而老城里不少建筑的高度都有所变化。

所幸的是在2001年进入“十一五”后，对老城的改造政策得到了调整。56个具历史价值的院落进行了挂牌保

护。“政府一开始的思路是能将院落中的居民迁出，修缮过后能够交给有责任心的开发商进行商业利用。毕竟作为民居使用，而且有那么多户居民，并不利于保护工作实施。”那位工作人员回忆。

邦达仓大院、尧西平康大院和颇章莎巴大院就是这样来实践的。邦达仓有53户居民，尧西平康有58户，颇章莎巴有13户。“最早居民也不愿意搬，都觉得老城生活方便。但是等到第二年外面的小区建好后，我带着居民去看房，他们看到条件的确很优惠，很快就搬过去了。”他说。大部分老城居民的房子都是公房，每月来交租金。到了新小区，老百姓可以继续租房，租金基本没变化，面积能达到原来两倍，或者以低于市场价很多的价格来购买。

但是这种实践并没有推行开来。一是政府资金有限，二是他们也担心如此一来会使老城成为一个仅仅是游客光顾的空城。56个院落绝大多数还是居民在居住和使用。拉让宁巴大院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活佛住过的寝宫称作“拉让”，宁巴的意思是“旧”。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此居住过，之后五世达赖喇嘛将这里作为临时寝宫。尽管面对熙来攘往的八廓南街，一走进这座三层围合结构的院落，便马上感到宁静。院子在2013年还按照“最小干预，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过修缮，整座建筑能看出岁月的痕迹，但并不显破败。它的每一层的廊道里都摆满了各家养的盆栽鲜花，在烈日下争奇斗艳，给小院增添了盎然生机。

拉让宁巴大院里一共有26户人家。其中一户的色玛拉大姐告诉我，她从上世纪70年代就租住在这里了。“这是活佛住过的房子，我们每天都会把它打扫得格外干净。”色玛拉一家人一共分到了三个柱子的住宅面积——藏族人以柱子为单位来丈量房屋，一根柱子的住宅面积大约16平方米，她

精心用布帘子隔成不同的空间。就算空间小，她也喜欢住在这里，因为大昭寺的金顶就在眼前。

不变的传承

老城改造的过程中，一些风物永久地消失了。李青就很怀念八廓街上那一圈摆摊的小贩。“那时候商店前面还有一排铁架子搭的沿街摊位，卖的东西琳琅满目，路人讨价还价的情景生动活泼，那是生活和旅行体验的一部分，八廓街也显得很有韵味。”但考虑到八廓街上本来就很拥挤，一旦出现火灾之类的安全险情，消防车很难进入，从前年起这些摊位都整体迁入一个室内的商场“八廓商城”。

尽管如此，在拉萨没有什么地方比老城更顽固地保留下传统。老城不仅是旅游地，它依然是藏族人的朝圣地和生活地。大昭寺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来四方的朝圣者。人们围绕它转经、磕头、居住，因此传承下来古老的风俗。那位参与老城改造的工作人员告诉我，56个院落之外，老城里最主要的居住者依然是藏族，“不一定是拉萨本地人，也可能是从藏区其他地方来的。56个院落是属于国家财产的文物，其他房子则可以买卖，拥有产权”。藏区主要分为三大区域：卫藏地区、康巴地区和安多地区。“尤其是康巴人，那里牧区为主，名寺少，他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一定要来大昭寺朝拜，有钱了也要在这里买房，这边集中了藏区最有名望的人。藏语里有个词语叫作‘青典’，大概就是那种活佛给你摸顶后的宗教意义上的荣耀感。他们说住在大昭寺边就是有‘青典’的。”

“泡甜茶馆”是老城里一项有些年头的活动。关于甜茶是如何传入西藏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英国人进入西藏时，将喝茶的习惯留在了西藏。也有人说是受到印度和尼泊尔的影响，因为那两个国家是甜茶的故乡。在过去，喝甜茶有着各种局限：旧时代只

有贵族家庭天天喝得起甜茶，而且喝茶的时间和分量都很讲究，在午后喝上两三杯，佐之以印度出产的高级饼干；等到旧制度推翻了，甜茶馆到处开花，却不欢迎女性光临。

70年代出生的当地朋友丹增告诉我，在他小时候，甜茶馆被认为是不规矩的女性和一些社会闲杂人等才会光顾的地方。“我们男生逃课就会跑去甜茶馆，那里不但能喝甜茶，还能玩到一种叫作‘格尔让’的类似台球的游戏。”现在甜茶馆里则男女老少统统都有，不变的是甜茶和藏面，两种甜茶馆的基本食物。藏面是用碱面制成的，初吃起来觉得夹生，习惯后会喜欢上那股嚼劲儿。藏面的汤是实打实地用牦牛肉熬制的肉汤。一碗藏面营养丰富又价格低廉，就着一碟腌酸萝卜，再喝一杯甜茶下肚，出一身汗，顿觉酣畅淋漓。

人们早晨起来围绕八廓街转经，转完后就来到甜茶馆歇歇脚顺使用过早饭，接着年轻人去上班，留下老人还有一些不着急的小生意人在甜茶馆里继续“吹牛”。最地道的甜茶馆要属离大昭寺广场200多米的“光明港琼”。那里一个开敞的大间里摆着长桌和长凳，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混坐在一起，有一种粗犷的气氛。最有意思的是论杯买茶的方式——摸出钞票放在桌上，服务员拿着暖壶倒完茶后会自行挑走每杯七毛的零钱。光明港琼制作甜茶坚持只用红茶、奶粉和白糖三种原料，不像有的茶馆会用红糖或糖精。这里是三教九流的汇聚地，可以听到有关各种国家大事、小道消息的议论。

丹增的妻子次珍很少和丈夫一起去泡甜茶馆，她更喜欢和自己的女伴们一起去。她的两个好朋友是她的初中同学，汪红和达珍。她们各自的孩子都已经上了小学，不用太过操心，一起约在甜茶馆聊天是周末难得的放松。如果不是她们带着，游客很难找到这家叫“酷故”的甜茶馆。“酷故”汉语意思是“隐蔽的地方”，它藏在一

条很深的巷子里，门口没有牌子，只有熟客知道。选在这里是因为它都是一个一个单间，每个单间也就能容纳两三张桌子。“可能是以前大家说女孩子去甜茶馆不好，心里还是有这样的障碍，走进那种大开间的甜茶馆便恍惚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次珍笑着说。与另一桌粗声粗气谈着生意的男人们不同，她们的话题都是属于女性的——次珍分享她养花的经验，汪红讲了讲在暑假里她带孩子们去上海做的“图书馆之旅”，达珍给她们推荐自己新看中的一家藏装店。

老城里聚集着数量众多的手工艺人，他们大都从事佛教用品的制作。唐卡画师土丹从小长在大昭寺边，他经常路过那些唐卡店铺，“看到那些画师们专注地作画，心里会感动”。于是他高中毕业后也来到一间唐卡工作室学艺，他说：“家里人都很支持。信佛的人相信画唐卡跟修行是异曲同工的。修行是心要静在一个地方，这个画唐卡也能达到。”

这家唐卡工作室隶属于古艺建筑美术公司，它的前身是位于布达拉宫脚下的“雪堆白”——那是一个为布达拉宫服务的手工艺者机构，代表藏区手工艺的最高水平。土丹师父的师父，最早就是一位宫廷画师。按照传统，画室还在坚持自己制作矿物颜料。旁边的颜料生产作坊里堆满了蓝绿色的铜矿石，女工在那里将原料捣碎、筛检、研磨，再在水里析出颜色。土丹说，颜色单一的矿石经过手工，可以出来五六种不同的颜料。“颜色深的颜料质量要比颜色浅的颜料大，在沉淀一段时间后，工人们要依次把盆里含有矿石成分的水倒入下一个盆中，以便沉淀出不同色彩，往往一盆水在一天内要倒上百次。”

也是因为使用了自己的矿物颜料，土丹和同事们绘制的唐卡色彩层次要更丰富。“旅游用品商店的唐卡多是用广告色画的，时间久了会褪色。矿物颜料画的就不同，每年过藏历新年我



2014年3月1日，藏历新年期间，拉萨小昭寺集市挤满前来采购的藏民和游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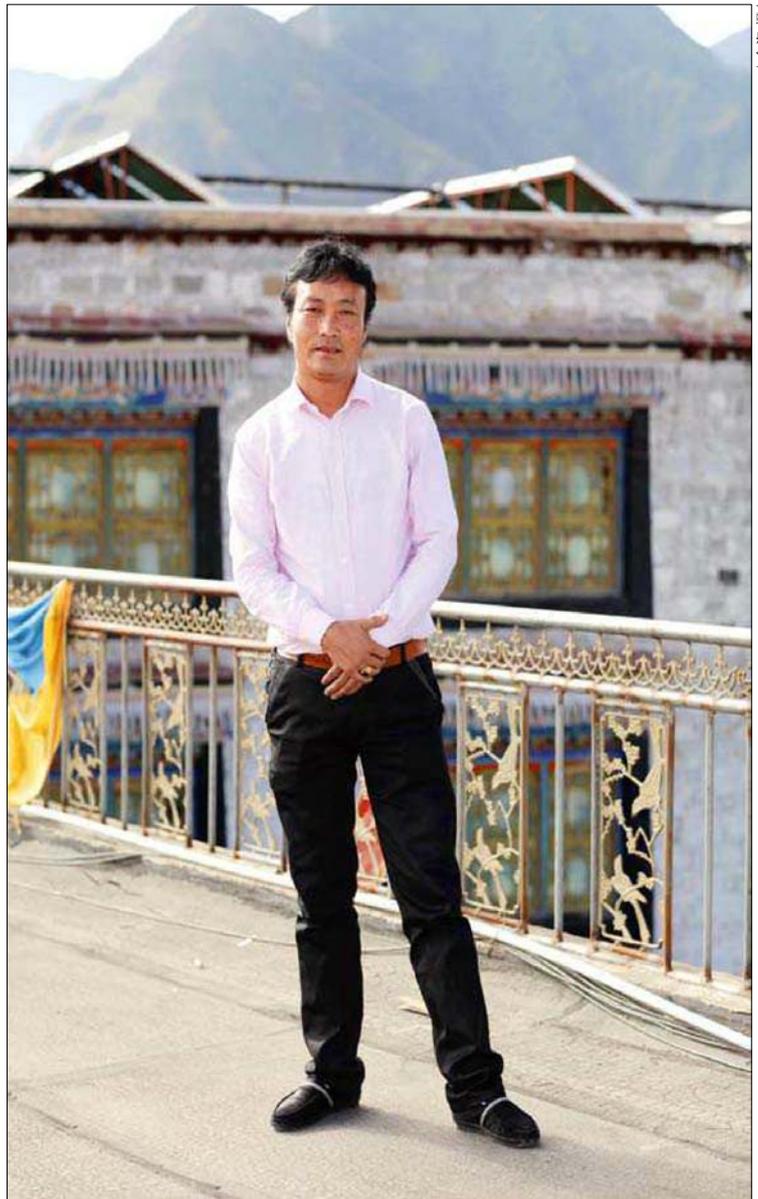
们用糌粑团粘走唐卡上的浮尘，它就又和新的一样。”矿物颜料上色很困难。土丹演示了一下，那些深色的颜料颗粒大，就像把沙土抹在画布上一样，初学者根本涂不上去，要慢慢适应。一幅佛像众多的唐卡绘制时间可以达到三年。“衣服的纹饰有的要描金粉，再用削尖的玛瑙石把金色的线条来做抛光。”唐卡绘制好后，他们都会请大昭寺里的喇嘛念经加持，并在背面盖上喇嘛的金汁或朱砂手印。

历史悠久的“老字号”也都保留在老城。尼泊尔商人开的“夏帽嘎布”

就是这样一家。70多年前，现在老板吐拉哈达的祖父从尼泊尔骑马翻越喜马拉雅山，来到西藏做生意。当地人记不住他祖父的名字，见到他总戴着尼泊尔风格的白帽子，便称呼他为“夏帽嘎布”，即藏语“白帽子”的意思。最早他祖父从印度噶伦堡和尼泊尔进口货物，经营的是糖果、布料、香皂这种日常用品。到了吐哈拉这一代，拉萨的各种小商品已经应有尽有，于是他改做尼泊尔佛像经营，正赶上那时大批寺庙重建。三代人积累起来的信誉让这家小店总是顾客盈门。虽然尼泊尔



(陈浩 摄)



(金海 摄)

唐卡画师土丹

佛像有的要比拉萨本地制作的佛像贵，但精美的做工还是很受朝圣者的青睐。

由于康巴人会围绕大昭寺居住和经商，在老城里还可以看到他们特有的“康巴站市”和“袖筒生意”。康巴人聚集的冲赛康市场具有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一个五岔路口，往南走是八廓街，朝北延伸贯通的街道是小昭寺路，向西向北方向以及东北方向都有通行老城区各个商业街巷和大昭寺的小道。高大的康巴人就一群一群站在这里做珠宝和古董买卖。那些待价而沽的绿松石、红珊瑚、蜜

蜡、玛瑙一串串缠绕在他们的脖子或者手臂上。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易方式，都通过袖筒来完成——他们会把手伸进对方的长袖子里，靠捏手指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来达成价格。

大昭寺：一个直面现代化的样本

煨桑的浓烟从广场上升腾起来，散发出松柏燃烧后猛烈的芳香。在大昭寺前磕长头祈福还愿的男女，在烟雾中若隐若现。这样的场景仿佛和英国人查普曼在80年前所见没有区别。

查普曼曾用好奇而尊敬的眼光打量着那些虔诚的佛教徒：“他们面对大昭寺而站，双手着地，然后脸贴着地将伸出的双手缩回，再收回胳膊，然后站起身来，双手并拢，准备磕下一个长头。他们全神贯注进行这种肌肉奉献，以至于对我们的到来也毫无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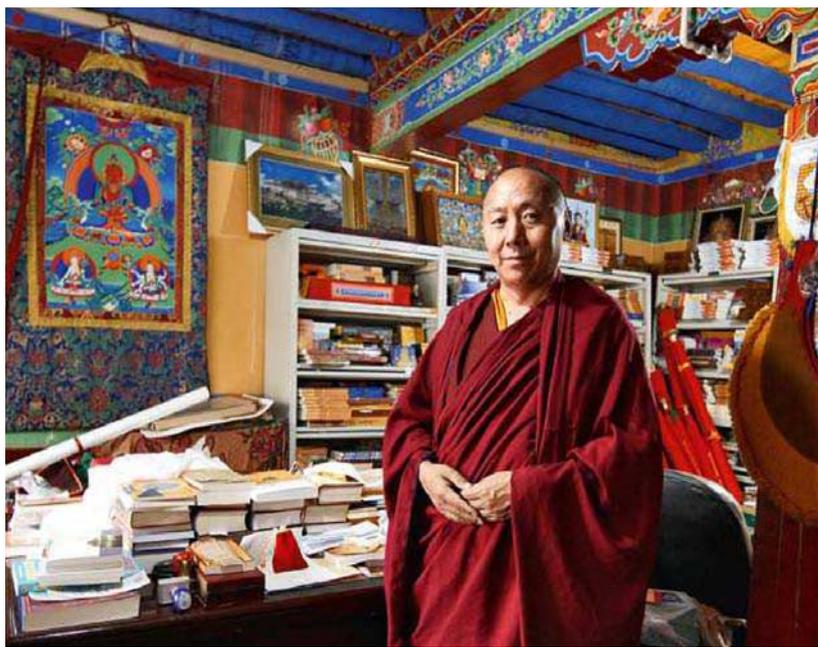
不变的场景只局限在大昭寺前20米的空间。作为老城中心的大昭寺，其实从来都是现代化进程中首先考虑的对象。拉萨的第一盏电气灯，就是由英国人竖立在大昭寺前的。直到他们走之前，全城也仅此一盏。整个老

城最大的格局变化也发生在大昭寺门口——上世纪80年代这里拆除了破旧的民房，修建起一个崭新的大昭寺广场。就在今年4月，大昭寺里还引进安装了西藏首个文物保护气象监测系统。这个先进的系统可以提供准确的火警预警，防患于未然，还可以搜集温度、光照和湿度的数据，为壁画保护提供参考。

身穿绛红色僧袍的尼玛次仁一旦开口讲话，绝佳的口才让周遭的环境再喧闹也会安静下来。其他导游也会示意游客先听他的讲解，他们都喊他作“老师”。尼玛次仁在寺院管理委员会担任来宾的接待工作，因为经常在重要宾客到来时担任讲解员，他大概是大昭寺最出名的一位喇嘛。

与尼玛次仁见面之前，我们事先在微信上沟通过。我发现他每天都要更新几回朋友圈，多是关于佛法开示的转发。“智能手机很少安装藏语软件，苹果手机是其中一款，这和乔布斯是佛教徒有关。否则两个藏族族人用藏文交流，发信息只能用汉文，那样对保存文化其实很可惜。藏区的很多家庭即使贫困，家长们省吃俭用也要为孩子买这种手机，他们希望孩子能用母语更多地认识世界。”他继而说到藏语对于佛经翻译的准确性。当年松赞干布在决定用佛教治理藏区时，同时引进大量佛学典籍。很多梵语词汇，在藏文中找不到对应，便直接将梵文写进藏文佛经。于是那些佛学经典，除了梵文外，只有藏语表达得最准确、最圆满。这也是为什么藏传佛教发展得比印度、尼泊尔和内地都晚，却后来者居上的原因。

稍微查阅下尼玛次仁的资料，就知道他是个十分“与时俱进”的喇嘛。他出生于拉萨市属的农村，早年间在哲蚌寺剃度出家。1989年，他到北京进入十世班禅创办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学习。除了汉语外，他还精通英语。业余时间尼玛次仁爱好摄影。1994年，大昭寺开始对寺内文物进行



大昭寺喇嘛尼玛次仁

登记造册。他利用这个机会拍了大量照片，后来出版了《大昭寺》的画册。除了难得一见的文物之外，画册里也记录了大昭寺的日常生活，比如有僧侣们在夜间补习英语的样子，还有在节假日打牌娱乐、温泉中沐浴游泳的场景，打破了人们对寺庙刻板生活的想象，看上去生动有趣。

尼玛次仁说，这些年大昭寺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它不仅是藏族的朝圣地，也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这在青藏铁路通车后更为明显。尼玛次仁是一个西藏现代化坚定的拥护者。他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入藏，不仅带来了佛教经典，还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都说明西藏只有不断开放、不断融入外来文化并使之和谐发展，才能持续进步。

面对暑期旅游高峰，每天数以万计的游客，大昭寺显得无能为力。听到有的游客过来说里面实在太挤了，根本没看到等身佛在哪里，尼玛次仁就觉得很可惜。传统藏式寺庙的屋顶和地面都是本地特有的阿嘎土夯实而成的。有的游客很激动，在大昭寺的天台上又跳又蹦拍照片，尼玛次仁下

面的办公室都会簌簌落灰。“我就会上去和他们讲，这是土木建筑，不比钢筋水泥，你需要像对待老人一样对待它。”现在大昭寺天台上立了块“禁止跳跃”的牌子，可是游客兴奋起来还是照跳不误。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尼玛次仁反复和我强调。他去西郊哲蚌寺的路上，看到牛和马要在马路上吃力地行走，心里会难过。那里以前都是湿地，没有楼房，没有路，牛羊随便吃草，晚上自己会走回家。郊区的农民还会自己挤奶、打酥油，坚持很古朴的方式。“当年老百姓从家里拿来供奉的酥油，点起来没有烟，味道像在草原上一样。现在那些土地开发了，老百姓不怎么养牛羊，都去外面买酥油。那种酥油却有很多烟雾，不知道掺杂了什么。”

新城无法顾及，尼玛次仁和所在的大昭寺是老城风貌坚决的维护者。他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幅老城全景图对我说，在过去，大昭寺周边的建筑都是要低于大昭寺高度的，所以大昭寺和小昭寺的金顶可以相望，从大昭寺也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布达拉宫。政府在旧城改造中一度加高了建筑高度，意识到问题后又逐渐降层恢复。“检查



拉萨木如宁巴寺内，一名信徒为寺庙里的油灯添加自带的酥油

过后，有的违章建筑又会偷偷冒出来。一些房屋的业主保持了楼层，却将层高暗中提高了。”尼玛次仁经常参加有关旧城改造和保护的会议，对关键问题绝对直抒胸臆，毫不掩饰。还有个让他苦恼的问题是，老城在几次改造后路面地基被垫高了。“本来是大昭寺地基高，现在反了过来，一下大雨大家就会紧张。”

某种程度上说，游客的到来改变了大昭寺的功能。“大昭寺是西藏第一间佛寺，佛教就是从这里开始传播的，

这个地位不会变。但它日渐成为一个做佛事活动、诵经祈福的地方，相当于是个场地。从弘扬佛法的角度讲，拉萨的哲蚌寺和色拉寺才是学术中心。”尼玛次仁说，大昭寺的喇嘛都要参与日常工作，“这个任务就很重了，藏传佛教的根在这里，不能有丝毫差池”。所以尼玛次仁觉得大昭寺能够出很好的管理人才，但很难有高僧大德。

不过这让尼玛次仁每天都会见到许多对佛教不了解却又饱含兴趣的人，这促使他用浅显生动的现代语言

去解释那些深奥的理论。“他们会问许多为什么。为什么要转经？为什么不远万里从藏区来朝拜释迦牟尼？为什么要把积攒一生的钱财全部贡献给佛祖？”尼玛次仁讲道，这些并不是佛的意图，而都可以算作是一种“方便法门”，也就是让修行者觉得便利的一个途径。“就像要给一个小孩子讲道理，不能一上来就讲，要先给他们糖果，让他们感兴趣。信徒也会从祈求健康、平安、发财，到慢慢渴望了解佛法的真实面目。无论对于佛教徒，还是其他人，大昭寺都是一个具有亲近感和吸引力的起点。”

交融与和谐：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即使是尼玛次仁这样一位具有现代思维的喇嘛，要帮助大昭寺这座1300多年历史的寺庙适应现代化的影响还需要时间摸索。但对于老城的另外一些人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传统和现代对接的密码。

服装设计师扎西就是这样一个。2010年扎西在北京闯荡一圈后，来到了拉萨。出生于四川甘孜，之前来过几次拉萨，但扎西喜欢说“回拉萨”，因为小时候“天天在画里看拉萨，太熟悉了”。扎西原来的职业是商业策划，一个与朋友合作的机会让他接触到了服装设计。开始只是玩，可是设计出来周围的人都喜欢，还一下子卖出了几件，他便来了劲头。2011年他创立了“恰喻”品牌，汉语的意思是“心仪的藏装”。老城里的藏装店很多，但藏装都是传统样式的，最多在布料的花色上有所变化。扎西的定位很明确，要做“有藏族元素的时装”。“对于年轻人来讲，藏装渐渐成为逢年过节隆重的服饰，我希望在时装里融入藏族元素，平时大家也会把它穿在身上。”

在扎西的脑海里，传统与现代从未冲突过。“以前藏族老裁缝教徒弟的时候，会这样形容藏族服装‘大气’的特点：‘藏族人心心里都有跑马的

地方。’这种气韵在时装里也不能丢。”总有人怀疑地问扎西在西藏能否发展时尚产业。“你看八廓街上那些从牧区来的康巴男人。他们头上系着红丝线，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特别引人注目。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就说，他们太美了。你细看他们，脸是风尘仆仆的，衣服上有油污，身上也散发着酥油的味道。可是没有人介意这些，他们自己也不介意。这种自信就是美，就是时尚。传统里本身包含了这些。”

工作室里放着一排扎西新设计出的衣服。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在服装背后来加纹饰。“你可能会觉得这种装饰很傻，但这正是我觉得传统藏装中打动我的地方。藏装的背部很少是空的，一般都会有刺绣做点缀。”扎西说，“后来我读到一句话：每一次离别都是再见的开始。一下子理解老祖宗这种设计的熨帖和礼貌，不仅要在你面前好看，还要给你留下一个美好的背影。”

“恰噶”在老城里搬了两次家。最后扎西把地址选在了八廓街边伸进去的巷子里。店铺下面是成衣售卖，上面是扎西的设计工作室。他喜欢透过落地窗户，观察八廓街上的行人。“这里有来自藏区各个地方的藏族，尤其是冬天藏历新年前，八廓街上简直是上演一场藏装的盛宴。不仅如此，这还有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文艺范儿的、户外范儿的，应有尽有。我简直捡了个大便宜，每天看一下，脑子里就会蹦出无数灵感。”扎西当设计师后第一季秋冬服装的主题就叫“拉萨的小巷”。那批服装具有时装的廓形和剪裁、厚重的氍毹与明艳的色块搭配，却让人联想起日光之下朝圣的信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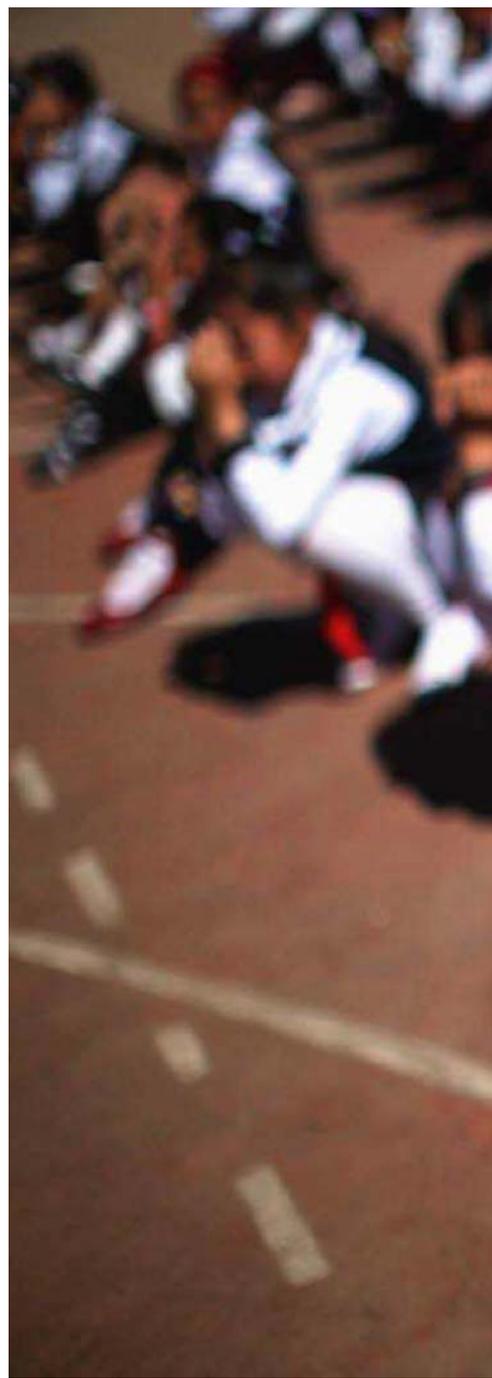
从“恰噶”出来拐上八廓街，走不了几步就是西藏大学艺术系教师噶德和其他艺术家在2003年联合创办的根敦群培当代艺术画廊。老城的圈子很小，尤其是具有相似追求的人，都彼此认识。扎西和噶德就是常能在一起交流的朋友。

噶德告诉我，根敦群培建立之前，

西藏都没有一个正规的画廊。“艺术家卖画是在工艺品商店卖，和首饰、衣服夹杂着放在一起。”即使是现在，能称得上“当代艺术画廊”也恐怕只有这一家，“其他画廊都是卖迎合游客口味的西藏风情画，雪山、草地、牦牛那种”。根敦群培是20世纪西藏一位著名僧侣的名字。他是学术大师、艺术大师和思想启蒙家，是西藏人文主义先驱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出生在藏族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期，根敦群培具有着一种进步、创新和反叛的精神。噶德定下了“根敦群培”的名字，希望能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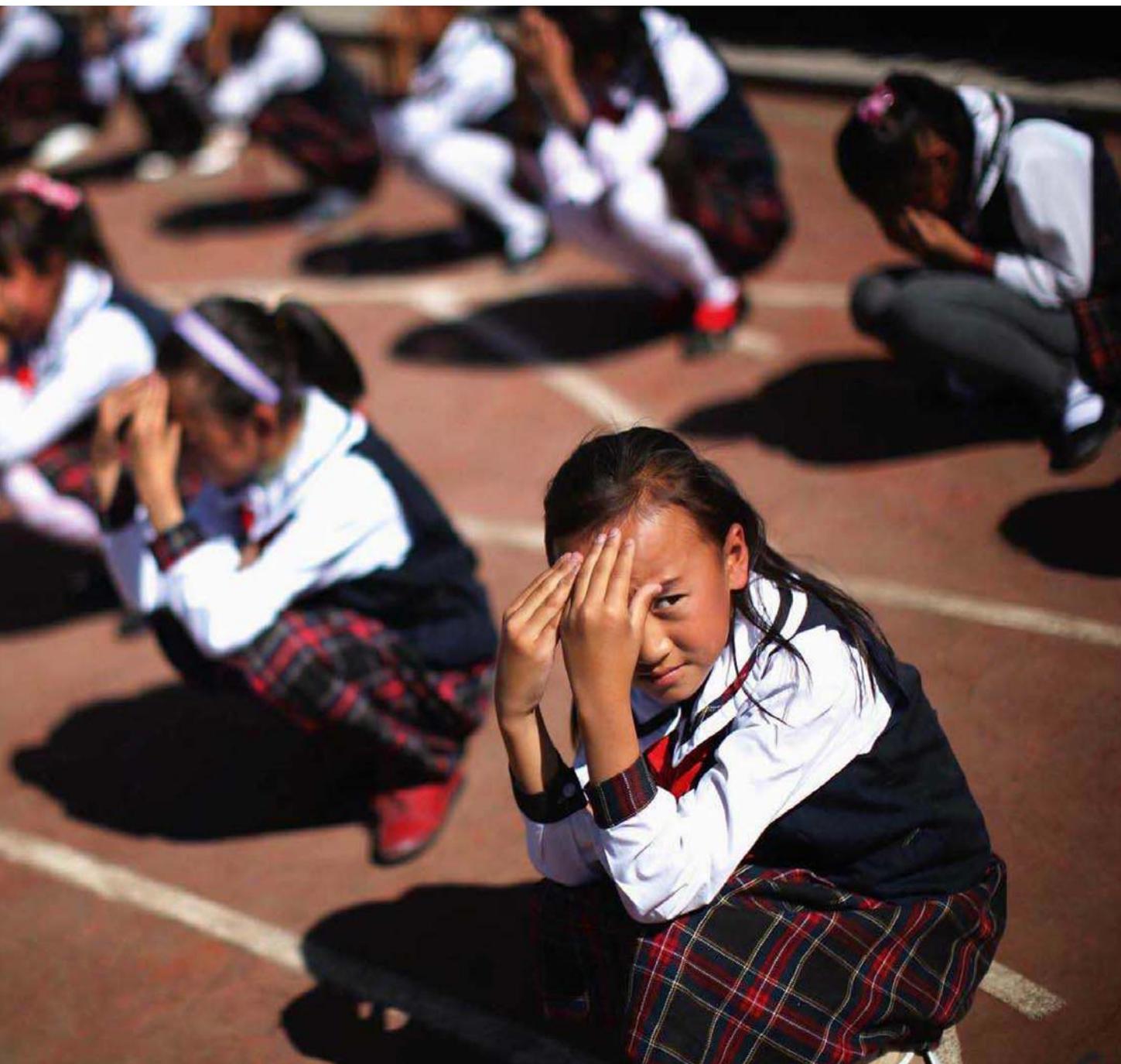
噶德是根敦群培画廊的领军人物。他是个早慧少年，很小的年纪就画得非常出彩，并且立志当一位艺术家。考西藏大学的时候，他主动选择了国画下面的工笔画作为专业。为什么是工笔画？噶德说还有一个特色专业是唐卡制作。“唐卡要求度量衡，有一套规矩在里面，它要求忘掉自己，和他当时急于表现自己的个性不相符。”事后回想起来，其实这个下意识的选择也表明了他渴望探索的方向：“工笔画的技法和唐卡绘制最相似，西藏最主流的勉唐派唐卡就是受到工笔画里青绿山水的影响。但工笔画又脱离了宗教仪式形态的束缚，这就能帮我从传统绘画进入一个现代绘画的语境当中。”

西藏大学毕业后，噶德开始了顺风顺水的创作。90年代，他的《沐浴节》获得中国第二届工笔画大展优秀奖，《放风筝的季节》获得第八届全国美术展览铜奖。凭着这些获奖画作，他已经在美协系统小有名气。但是噶德感到，那些表现传统题材的作品来源于想象而不是他的经历：噶德是“半藏半汉”的身份，童年他上的是汉族学校，多数时间也是和父母单位的汉族小朋友一起玩耍。尽管他也跟随母亲经常去寺庙转经拜佛，但他觉得自己没有浸淫在纯粹传统文化中，也无法承担起如此解读传统文化的任务，所以他



开始关注自己当下生活的感触。

于是在2000年之后噶德便有了《新经书》和《新偶像》系列作品。在这组作品中，古老的经卷上抄写的不是佛法智慧，而是诸如网络段子、手机短信、周星驰的电影台词这样的流行华语。《新偶像》中，他用麦当劳叔叔、米老鼠等形象置换了唐卡中的佛像。虽然“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在表



拉萨实验小学的学生在操场上做眼保健操

达力度上稍显单薄，但噶德说关键它们表达的是真实的感受——这种做法放在过去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但在今天的拉萨，满街的品牌商店、明星广告充斥眼球，面对噶德的戏谑，人们只是会心一笑。

“西藏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在作品中记录和反思这种变化。”噶德说，“但这种变化又需要拿母语来讲

述，而不可能按照内地艺术家或者外国人的思维说故事。”噶德回忆自己“母语系统”的建立是在刚毕业的那段时期，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日喀则的夏鲁寺、白居寺还有古格王朝遗址临摹壁画。他喜欢老壁画经过风霜洗礼后那种颜色有些暗淡的状态，“在那些残缺、剥落和水渍中，蕴藏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对时间带来的厚重质感

的追求，也在他的当代绘画作品中体现。到了后来，当他的作品由架上绘画转变成装置、行为或者影像艺术时，他的“母语”又变成了印经幡的木板、拉萨河水或者佛珠。他借用这些有符号意义的材质进行创造。《冰佛》当中，他将以拉萨河水冻铸成的佛像，又置于河中消融，借以阐释佛教的无常观和轮回观，是一次对母语的绝妙使用。☑



在拉萨，索穷和朋友们

就西藏的每个人而言，对拉萨这座城市的理解，大概与对自身的理解是不可分的——在这里，人们会遇见一切。

记者 / 周翔



拉萨市内的一家茶馆。到茶馆喝茶聊天是藏民喜好的生活常态

藏族小伙子用汉语说：“他，哪里来？他……”

美国人仍用藏语说：“糌粑没有吗？”

汉族商贩严肃地用英语重复着：“中国。美国。”

这是索穷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在《西藏文学》上的一篇小小说的结尾。隔了快30年，当年《西藏文学》的编辑央珍和索穷以及几个朋友一起坐在一间传统藏餐馆的房间里，央珍还记忆犹新地提起这篇“特别有意思”的小说。阳光透过窗格照着索穷有点花白的头发，他脸上有种羞赧的神情。通过小说和这些朋友结识的年代，转眼已过去这么久，而在这时间的慢慢酝酿中，当年写作时不甚明了的意味，倒一点点咂摸了出来。故事很简单，一个藏族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汉族人在西藏一个小县城里相遇，都拿自己不擅长的语言去沟通，又得不到说话对象的理睬，形成一个循环的怪圈。“就是写他们互相拧巴着，都要跳出自己的文化，但是又跳不出去的那种感觉。”这像多年前的一个隐喻，虽然那时候索穷并不那么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我就觉得是要发生的一种事情，要有新的事物进来，要有新的改变发生——好与坏，并不知道。”

被他们的谈话勾起了兴趣，我向索穷要他的小小说想读一读。他为难地搔搔头说：“我这里都找不到了。”他不保存自己多年前的作品，而且，他也很多年没有写虚构的作品了。但在80年代，在阿里措勤县唯一的学校里，用教课之外大把的时间，不断地写一篇又一篇的小小说，将它们寄往拉萨的报刊杂志，却是索穷最大的快乐、最好的“抒发自我的方式”。

80年代：相遇

措勤县是阿里的东大门，是阿里地区离拉萨最近的县城，但邮车也要

半个月才来一次，带来一个月以前的书信、报纸和杂志，那是当时获取外界信息唯一的通道。1965年出生在阿里噶尔县门士乡的索穷算是当地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在乡里上了几年小学后，他考到位于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读了三年预科之后又读了两年初中，最后的第六年进入边境地区小学教师培训班，毕业后分到措勤县完全小学，成了县里不多的“有文化的人”。1984年，从民族学院毕业分配回乡时，索穷第一次路过拉萨，他意识到内心强烈的渴望，一定要到这里生活。“拉萨太好了，是藏族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我是西藏人，我就要来这里。”

在广袤的高原上，“文化的绿洲和生态的绿洲往往是重合的”。阿里地区除了普兰、扎达、日土这几个县城，其他地方在索穷的眼中都缺少文化和历史。措勤县以牧民为主，历来居无定所，除了帐篷，“连一间房子也没有”，只有门东寺这一处古物，“文革”时期成为粮食仓库，才得以保留下来。七八十年代四川的建筑队在这里修了校舍和住房，只有一条街的县城就固定了下来，住在县上的人口只有百来人，其他仍然在牧区过着迁徙的生活。索穷就在小县城里施展着自己的想象力，幻想着、勾勒着会发生在生活里的变化、冲突、异于自身的一切可能。攒钱，每个暑假搭上三天邮车去一趟拉萨，是最快乐的事情。“没有一定的目的，就是觉得要去有人、有文化的地方。在八廓街附近找个招待所，逛书店、画廊，看寺庙和古建，跟陌生人聊天。”

不过索穷当时看到的景象，在老拉萨人央珍的眼中已经变化了模样。60年代生活在拉萨的央珍和姐姐玉珍对这个城市的判断是“洋气”，因为地缘的关系，西藏与印度联系密切，而印度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而备受其影响。西藏贵族中多年来的传统就是前往印度甚至英国留学，因而西方的

生活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西藏尤其是贵族阶层的生活。60年代这种影响的延续性仍在，央珍记得那时的拉萨往往比内地物质更丰富：“英国的巧克力、呢料，印度的泡泡糖，都可以买到，看电影、跳舞，也都是平常所见的情景。在西藏待了几十年的廖东凡1961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来拉萨，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当时内地因为自然灾害物质很匮乏，没想到来了拉萨看见八廓街上商铺特别繁荣，他就推着自行车东张西望地看，一路上还有许多身着艳丽服装的藏族妇女在卖香，装在印度进口的铁箱里。”

那时拉萨的城区只有从西面布达拉宫到东面大昭寺一带，在今天的北京东路和与之平行的宇拓路上住满了城市居民，八廓街上满是商铺，但是不同于今日，“店铺里面是放着印度的音乐，有淡淡的香气，商人静静地坐在店铺里，没有靠吆喝招徕生意的”。藏族所需的一切物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要买内地商场里的东西，则去宇拓路。幼年的玉珍和央珍姐妹俩有时候还会被父亲带去甜茶馆。今天走进任何一家甜茶馆，大都是人声鼎沸，除了藏民在里面打牌、下棋、聊天，还有很多游客。但60年代的甜茶馆在央珍姐妹的记忆里“安静极了，大都是一家人在喝茶，或者男人们在低声地谈论新闻”。而且极少有女性会去甜茶馆，这些都是拉萨人的老规矩。在央珍眼中，过去的拉萨社会，所有的特质可以总结为“优雅”：“重视礼节，歌舞的动作幅度不会很大，说话嗓门不会很高，穿衣服也不会特别艳丽，房子的颜色绝对不会大红大绿……”

这些记忆因为“文革”的开始而中断。当1981年央珍成为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西藏学生时，这座城市又慢慢开始从“文革”的单调中醒来。跟内地一样，拉萨的文化艺术活动也掀起了热潮。有不少大学生怀着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来到西藏工作，从事



藏族作家索穷

文学艺术创作，马原、裴庄欣、于小冬以及更早到来的马丽华、韩书力等外来者与当地的知识分子一起，构成了规模不大但异常活跃的文化圈子。如今的布达拉宫广场一带，当时全是居民聚居区，不少拉萨市民把房子租给外地的艺术家，这一片因而成了颇有名气的画廊。南边的拉萨河则是青年们聚会聊天的天然场所，仙足岛和太阳岛一带都是茂密的树林，外来的青年也学着闲适的拉萨人一样到那里去“过林卡”（郊游）。

1981年，初中刚毕业的阿旺扎巴以画画的特长考取了西藏师范学院（1985年改为西藏大学）艺术系，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从小就被家里的宗教氛围熏陶长大的阿旺扎巴，一到拉

萨立刻去了大昭寺朝圣。但进入学校不久，按照他的说法，却“很快转换了信仰”。那时正是陈丹青《西藏组画》声名大噪的时候，学校里所有的美术杂志、丛刊都是相关的介绍。在昌都长大的阿旺扎巴所受的启蒙教育来自在当地教书的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生夏和中，他教给阿旺扎巴最基础的素描，但这一次油画产生的震撼效果确实是前所未有的。“那种色彩、人物和生活的方式，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画西藏的。”阿旺扎巴从此立志要画好油画，“画画成了我的信仰。”因为当时是被当作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所上的课程包括了各个门类的绘画，但是阿旺扎巴却并不喜欢画唐卡。“我总觉得它拘泥于过去陈旧的模式，我在

学校学中国美术史、世界美术史，那些艺术家都是在不断超越当时的艺术巅峰，才造就出伟大的作品。唐卡好像复古一样，不是跟当下相对应的艺术形式。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时代的烙印，你是这个时代的，你的艺术就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气氛。”

作为粗犷的康巴汉子，阿旺扎巴内心深处总觉得和拉萨的优雅、从容有一点“隔”，在那个逐渐升温的年代里进入藏地文化的中心，他喜欢拉萨的氛围，但画笔下的冲动总是指向遥远的昌都。1985年毕业，阿旺扎巴拒绝了去天津进修然后留校的机会，告别了学校里的李津、于小冬等师友，回到了昌都。同样在1985年，上学期间四年没有回过拉萨的央珍又回到故乡，在文联下属的《西藏文学》当编辑。当时的这座城市，正经历着她记忆中最有活力的时期。民族的与外来的事物，统统像地下的潜流重新接上了过去的余脉，或者打开了新的空间。“以前机关单位里极少有人穿藏装，现在有人穿了。老建筑上抹的灰泥都去掉了，民族的色彩回来了。”

80年代末，央珍和索穷在拉萨看到了阿旺扎巴的成名作《等待》，他们也因此认识了阿旺扎巴——拉萨的文化圈子，历来是“特别小的”。这幅后来更名为《无题》的画，在1988年中国美协西藏分会在北京举办的西藏当代画展中得了一等奖。它是一幅康巴人的群像，红褐为主的色调，并不完全写实，人物和空间的组合有一种抽离感，康巴地区的强悍气质就更加凸显；天空上诡异地挂着一个时钟，上面的指针指向完成这幅画作的时间。人们都问阿旺扎巴，等待什么呢？“我就说等待未来啊，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才画了这张画。”

90年代：分歧

小说和绘画成为80年代对西藏

赋予想象的主要方式，不管是外地人还是当地人。马原和扎西达娃以西藏为题材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风靡全国，这种新的叙述方式与西藏的传统相遇，较之内地而言，更能为天马行空的瑰丽幻想提供适合的表现题材。当然，外来者的审视意味和想象性会更加强烈。在宗教范围浓厚的传统藏族那里，往往不是线性的时空观念在支配他们，前天、昨天和今天并不一定遵循着单一的逻辑，循环往复和重叠错乱恰恰为叙述的多重维度提供了空间，放进写作者自己的想象。但并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如此。

央珍不这样写。“我没有他们那样奔放的想象力。”她说，“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作家对西藏有一定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但是我从小生在拉萨，在十分熟悉的环境中，无从产生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种熟悉让她的写作更多指向对过去的追忆，她要通过虚构的方式呈现真实的过去。1994年，央珍出版了小说《无性别的神》，这是第一部藏族女性所写的长篇小说。小说的叙述时段主要集中在1940到1951

年，小说中关于当时贵族的家庭生活、礼仪规矩、饮食习惯、文化风俗的素材，大都来自她听到的祖辈的描述，以及她自己在60年代拉萨生活的直观记忆和感受。“拉萨的生活在‘文革’之前是有延续性的，虽然贵族、商人、平民之间的阶层差异消失了，但是人与人的相处模式、生活方式很多还保留着。”央珍的写作里因此充满了真实的追忆性质，不同于魔幻现实主义，她的写作更侧重于通过客观的真实性来让人们了解这片土地和生活的细节。

这种写作上的定位，要依靠她较之其他人更丰厚的拉萨记忆，这是不能通过想象力替代的东西——既是对自身记忆的发掘，也是重新梳理、诠释、理解它们的结果。“我小时候淘气，下雨天麻雀飞来，我们去逮，家里老人就会立刻阻止。”她后来意识到，这是藏族根深蒂固的佛教传统的一种表现，“见了动物不能杀生”。她小时候上汉语班，教育里没有传统的内容，她说“书里会告诉我们哪些是不好的，我们也没有地方去了解”。而到文联工作以后，她一面当编辑，一面跟着民间艺



藏族画家阿旺扎巴

(金海摄)

术研究会到处下乡。“重新了解民族文化，也更有自觉要把自己身上缺失传统的那一部分补回来。”那是她记忆中最好的时光，她说，“那是我最喜欢的拉萨，丰富，充实，满是希望。大家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感情而去了解和保护民族文化，不像90年代以后到现在有很多商业的考虑。”

同样感觉到90年代带来的变化的，还有1992年终于下定决心辞职来到拉萨的索穷。离开措勤之后，他进入拉萨的《西藏文化报》，辗转“在很多媒体干过”，直到2007年加入《西藏人文地理》。索穷本来打算到拉萨继续写小说，然而他自己也没想到，来到拉萨以后他开始了纪实性的写作，从文化调查类的小散文开始，到系统地研究八廓街、研究西藏近代史上的教育。当年上私塾的老先生、曾经的留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些大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成为他口述历史的对象。“以前在措勤，只能通过虚构和想象来支撑写作，但是到了拉萨，遇到的一切都变成了我的素材。”

索穷之所以对西藏的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因为他觉得教育是改变人生最根本的途径——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央珍，或是历史上的西藏人，都是因为所受教育的不同，而改变着自己，以及自己与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关系。“你会发现几类人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比如早期留学印度、英国的留学生，他们所接受的是西方那种自由、民主的观念，回到西藏以后一腔热情要改变这里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留学生们大多有过在西藏接受私塾教育的经历，但相比起他们，只接受私塾教育的老先生则更加保守，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有非常丰厚扎实的学养，但又相当谨慎。而后来去内地上学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现在西藏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更紧密地联结着西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不过索穷更感兴趣的还是普通藏族人的“言传身教”，那些形形色色人们的经历，是他们更本质的教育。喜欢跟陌生人聊天是他最大的特点，也是有助于他成为一个“记者型作家”的原因。“我特别喜欢跟拉萨街头的人说话，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那些朝佛过来的，那些沉浸在声色犬马里的……随便什么人都可能是一个传奇。有时候人家也来劲儿了，觉得找到了很好的听众，就掰扯上大半天。”索穷最喜欢去的还有拉萨街头随处可见的小酒馆，在街角、在路口、在树荫下，随处可见，拉着布帘，远远地在外就能听到里面轰然的笑声。“一般都是圈人在这儿玩骰子，又唱又跳。玩骰子的人口才都很好，嘴里念念有词，从一开始唱到数字十二，每个数字都能唱出一大堆故事，像诗歌一样。曾经有人还编了本书就叫《西藏骰子说词》。”这是民间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比试口才中的灵光乍现、突发奇想，都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结果，充满了俗世的谐趣和智慧。

索穷用对他们的记录和观察，代替了小说写作。如今回头看来，央珍夸他做了一项抢救性的工程。“我们生活在拉萨，倒想不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反而索穷怀着对拉萨的热情和想象记录下了缺失的这一段历史。否则，今天的拉萨已经不同了，过去也就找不到了。”1994年，央珍的工作从拉萨调到了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此后每年只有尽可能找时间回到那里。而距离的遥远，更让她觉得这个城市充满了越来越快的变化，她对于拉萨的追忆，充满了老拉萨人“追忆似水年华”的味道。在八廓街的中心区域，她觉得甚至很难再找到一个传统的拉萨人了。而当初来到西藏的大学生和艺术家也大多纷纷离开，曾经热闹的文化圈子逐渐风消云散。

“80年代的一阵风吹完了。”索穷说。不仅是知识分子圈，民间松散、

惬意的文化氛围也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而逐渐消失。街头的酒馆茶肆在逐渐消失，他并没有一丝要离开的念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就要在这里生活。”他仍然觉得拉萨是一个“传奇”，只有在这里故事才能有更精彩的继续。“西藏最好的与最坏的肯定都在这里。”

阿旺扎巴也重新回到了拉萨。1990年他调进了西藏美术家协会，从此有了条件专心从事创作。但他没有停止内心的“不安”，他安慰自己这里是一个窗口，也会提供给他更好的审视昌都的角度。“其实离开一个地方，再从很远的地方来看这里，会真的不一样，那是非常深刻的。身临其境的时候说不定很多东西你看不到，容易钻牛角尖拔不出来。所以我想，来拉萨也许是幸运的。”不过90年代中期以后，他变得有些苦闷起来，曾经的油画技法对他而言不再能够满足表现力的需求，而走出门外，他总是听到人们问他，你的画卖得怎么样？

焦虑和张力开始在离开故乡的他身上变得明显起来。属于传统的唐卡、国画在这个时期重新进入他的视野，他意识到这是躲不开的传统。“我开始想把现代绘画介绍给他们，当个中间人。”阿旺扎巴说，“传统是你的灵魂，但要不断地提炼，像两块石头碰在一起产生的火花。这支撑着我从油画转向尝试新的画法。”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他在自己的小空间里开始做一件更基础性的工作，借鉴西藏传统绘画材料，调配新的颜料、新的油，他说：“我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话。”

2015年：重逢

这一次他们的相聚是在阿旺扎巴的家里，休假回来的央珍想去他家里看画，同时也会许久不见的老友。9月初的拉萨白天阳光依然灼热得像夏季，家家户户的窗台上和院子里都种满了花。央珍说，这也是拉萨人的传统。



藏族作家央珍

以前的拉萨人，不管多穷，连家里的桶和盆也要拿去种花。

2004年以后，阿旺扎巴重新开始大量作画，他已经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绘画语言。10年的试验，他把西藏传统绘画中的植物颜料和矿物质颜料加入油画所用的颜料中，研究伦勃朗调制油时所用亚麻仁油和核桃油的比例，并加入西藏过去织地毯染色所用的桐油，“研制”了一套自己所用的特殊材料。他也重新吸收了80年代曾经排斥的唐卡的风格，吸收那种“以线当面”来描摹的技法。“油画的色彩、国画的线条、唐卡里的技法，融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我今天的画。”阿旺扎巴说，“也许有点狂妄了，我给它们起名叫作‘康巴艺术’，我还是画这个地方的人，画这群人怎么生活，我怎么感受他们。别人怎么解读，那是他们的事。”

比起80年代的画作，阿旺扎巴新世纪以来的画虽然仍有油画的质感和技法，但是风格和画面上有了传统壁画的神韵，想象和画面组合也更加奇

崛，唐卡里的宗教人物和佛经故事有的变成了画中的元素。而他所画的一组康巴人的肖像，国画的画风更加明显，色彩的呈现又是油画式的。

央珍仍然记得当年看到《等待》时的震撼，“一下子就能感觉到拉萨以外的藏族的气息”。而如今眼前的画作，在一贯的强悍、爆发式的状态里，又多了些内在的从容。过去的圈子消失了之后，阿旺扎巴每天的生活就变成了独自作画，“画画的时候不抽烟了，和人聊天高兴起来才抽烟喝酒”。他的画里有了更多清醒的审视和有意识的创造，他习惯了热闹之后独自一人的状态。“八九十年代大家的群体意识很浓，搞艺术的全都从早到晚在一起谈天，现在都是各干各的。但我觉得对于艺术的认识，大家都在提高。其实一高了，人就独立了，个性化了。这是一个过程，并没有绝对的好坏。”

虽然他们记忆中的拉萨在变化——古老建筑的消失，城市的扩张和改变，曾经的朋友各自散去，但是

拉萨还是存在一个“解释不清楚的无形的气场”。阿旺扎巴内心和拉萨之间存在的疏离感，那种既近且远的张力终于处在一个刚刚好的关系之中，如今他找到了最舒服的作画状态，一个能够在熟悉的地方“跳进跳出”、随时变幻审视距离远近的位置。“不想画的时候就可以跑到八廓街转一圈，那种氛围一下子就会带给我画画的冲动。”今天的八廓街上反而是康巴人居多，他们轮廓分明的五官、脸上深深的皱纹，都和阿旺扎巴的画里一样。

从阿旺扎巴家告别，索穷又准备去八廓街。不同于阿旺扎巴来这里找绘画的灵感，索穷像是在这里找故事的续集。过去的拉萨景致消失之后，央珍不太常去那里了，相反，索穷却越来越多地泡在八廓街一带，在他看来这里仍然是“所有可能性的所在”。传统的冲赛康市场盖起了新楼，但楼前的一片空地仍然每天进行着传统的冲赛康“站市生意”，来自西藏甚至全国各地的商人带着他们淘到的古董、珠宝，进行着一场场关于文化、商业、经验上的较量。

索穷在那里一待就是半天或一整天，很多时候他并不说话，只在人们交谈的时候静静地听着，或者细细地看他们手中的古物。他常常会站在市场上年纪最大的阿觉爷爷身边，让他教自己如何通过观察一件青铜挂饰的孔道来分辨它的年代，买水獭皮如何观察它的绒毛，什么样的玛瑙石和绿松石才最好。他常常会记混了昨天和前天遇到的人事，在时空之间跳跃。他教我如何不讲逻辑地交谈：“这里跟人们说话的好处就在亮堂堂。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要一万块钱，你可以还价一块钱，他不会生气。”在传统的藏族人那里，大概一切语言和事物都可以直达它的核心，并不需要中间的层层递进。我看着他想，似乎拉萨把索穷变得更像某一种西藏人了；但同样是在这里，索穷和他的朋友们是多么既相似，又不同。■



(陈国结摄)

一位藏医在给藏民把脉。藏医的诊治方法与中医有许多相似之处

央嘎：让藏医学离世界再近一些

神秘的藏医，如何用现代科学破解并发扬光大，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央嘎，任重道远。

记者 / 程磊

哈佛时间

准时 10 点，央嘎骑上老旧的自行车，飞奔于哈佛大学的校园，去往有课的那间教室。这位当时已近不惑之年的藏族汉子是 Harvard Time 极致的享用者。上课迟到不超过 10 分钟，教授不可以因此生气而被称为 Harvard Time，是哈佛的诸多优良传统之一。央嘎是哈佛不多见的，几乎所有上午的课都要迟到 10 分钟的人。在哈佛读

博士的 7 年中，Harvard Time 从未间断。

出国之前，央嘎是西藏藏医学院的副教授。在哈佛，他的专业方向是藏族文化史。这类人文学科博士，七八年读完是正常的时间。但任何专业要想拿到学位，都非常困难，和央嘎在 2003 年同一天入学的一位德国女同学，到现在博士仍未毕业，还在写论文。央嘎的毕业论文并没有离开藏医，研究的是《四部医典》的起源问题。

央嘎承认，藏族、藏医的特殊身份，让他进入哈佛读博士，确实有了一些便利条件。但 GRE、托福的进入门槛少不了，进去以后要想毕业，所有人面对的标准是一视同仁的。

无需闹钟，每天准时 5 点起床，简单梳洗，给熟睡的两个女儿的额头各一个亲吻，告别妻子，跨上自行车，央嘎的一天开始了。

25 分钟后到达查尔斯河畔的 Boat House，是央嘎打工的地方，职务的名



(王旭华摄)

藏医药研究者央嘎

称叫船坞管理员。“其实，就是看门的，职责就是阻止没有资格的人进入。”每天早6点到10点的4个小时是他的工作时间。“除了有收入，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影响看书学习。”

央嘎并不知道他工作的地方是哈佛为奥运会培养皮划艇竞赛种子选手而成立的专业皮划艇训练基地的一部分，他只知道 Boat House 是存放皮划艇的地方。不关心学习、学术以外的事情，记者采访的央嘎的同事、同学都对此印象深刻。

查尔斯河是波士顿地区的灵魂，它弯弯曲曲，途经哈佛和麻省理工所在的剑桥市，穿过波士顿，最终汇流到大西洋。每年秋天，来自全美各地的专业皮划艇运动员聚集在查尔斯河上，参加为期两天的赛事。在此期间，

沿河的两岸会摆上各种食物，连绵有好几百米，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对于这两天，央嘎是有印象的。

免费的餐食对央嘎来说很重要。他在 Boat House 打工每天的收入差不多40美元，是一家四口的饭钱；奖学金每个月是1800美元，用来支付每个月1400美元的房租，剩下的400美元用来维持家庭除吃饭以外的日常开销。所以，在学校享受到的免费早中餐，是央嘎维持家庭收支平衡的关键。

冬天查尔斯河结冰时，Boat House 的工作就暂停了。未雨绸缪是央嘎熟悉的生活逻辑。他出生在西藏那曲地区比如县，超过4500米的海拔，是著名的牧区。出生的时候没有房子，每年都要“搬家”两次。冬天要搬到海拔低的地方躲避寒冷，夏天搬到海

拔高一点的地方为寒冬的来临做好准备。他还是要另谋他法赚一些钱，譬如偶尔当一次藏医，给人看病。

很多藏医，在藏区是医生，到了其他地方，过去的许多经验都用不上了。在美国有位女患者因为精神压力很大，找到央嘎看病。央嘎给了药，吃了一个月，好了。再来的时候带着她妈妈来看心血管方面的病，央嘎也给了一个药，吃了两天，出现过敏。央嘎说，这次给的药是极普通、常见的药，以前从未出现过敏。他也无法解释原因，只得建议停了。央嘎从此不敢在美国给人看病了。

后来央嘎知道，在西藏很多用起来并没有副作用的药，到了其他地方，同样的病，类似的体质，有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副作用。这可能与体质、

海拔、气候等原因有关。央嘎也看到，在中国沿海地区，藏医藏药还比较受欢迎，那边的藏医已经通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出了适合当地的用药方法，比如很多用药要比在藏区更猛。

金钱和时间，被央嘎称为是国外求学生涯中最大的敌人。他对于打工贴补家用和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的描述，和许多攻读哈佛的励志书的描述大体差不多：早5点到下午18点，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图书馆。傍晚骑车不到半小时到家，妻子已做好饭菜等着。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一个小时，是央嘎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晚饭后的学习持续到深夜12点，一天结束。

最困难的时期发生在美国的第七年，奖学金花光，家里也没有条件给予帮助，一堆要付的账单差点让学业就此停止。好在有导师推荐，到密歇根大学当一年讲师。全家辗转搬到了密歇根大学附近，讲几门课，讲课的收入勉强维持住了剩下一年的开支，一边教书一边写论文，博士才得以毕业。

在美国生活的7年中，每天回家妻子准备的晚餐依稀有些藏族味道；为数不多的两三次藏族学生的聚会中妻子做的“班喜”，也就是藏族的饺子，是藏族味道的；藏历新年那天，晚餐时会摆一些简单的藏饰，和比平日稍微丰盛些的食物，给1.5万公里外刚刚进入藏历新年的家人打电话，算是过年了。除此之外，哈佛期间的的生活，几乎在外表上没有藏族的影子。

与此同时，藏族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在美国的每一天都在受到冲击和改变：酥油茶变成了果汁、咖啡和牛奶麦片；黄油面包和三明治取代了糌粑和青稞面；拉根绳子晾衣服被烘干机取代；女儿们上公立的幼儿园和小学没有任何费用且孩子每天都很开心是令人惊喜的；大女儿爱听的饶舌和乡村音乐听起来有点吵，妻子有时放的藏族音乐会被关闭；复活节通



患者们排着队等候藏医诊治

常是全家和导师一起过，火鸡吃起来没有看起来感觉好；圣诞节是孩子喜欢的节日，她们对张灯结彩的圣诞树很是喜欢，不过是在别家院子里看到。

这些细节如涓涓溪流会聚成河，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这个传统的藏族家庭。生活习惯吗？“不太习惯。”生活艰辛吗？“真的很苦。”“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去同情和怜悯。苦是自己的事情，没人逼你去美国，这是价值观发生的最大变化。”央嘎说，“以前在西藏，我不会这么想。我会焦虑——怎么没人帮我呢？”

“一些藏族人对政府有明显依赖，比如生病了，觉得驻村干部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觉得政府、亲戚，都应该帮助，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藏区的发展，中央应该帮助，不帮怎么行。现在我认为，病了就是自己的事，自己想办法，藏区没有发展应该藏区人自己努力，任何一个民族都要靠自己。”

央嘎认为，以前藏区和他有类似想法的人很少，这种依赖多少源自于世俗的信仰。“很多人都觉得，安排人未来和人生的是命运、是神，好像自己没有主动权，只能接受、认命，甚

至觉得人生的希望都在下一世，这是藏传佛教悲观的地方。藏族人的命运好像需要有人来决定，这是个悲哀。”

央嘎的同事、西藏藏医学院副教授魏冬评价他的变化：“如果说美国的生活经历给他带来了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更理智了。”

按传统，藏民看病之前常常算卦。央嘎也不能理解了：“找谁看病、什么时候看病、哪一天适合手术、该不该住院、去人民医院还是去藏医院，很多藏族人都要算一卦，找喇嘛算或者自己看藏族的历算，现在依然在藏区很流行，普通百姓、千万富翁都这么干。还有人找到我算卦，我也很奇怪。”当然，央嘎承认，宗教和习惯是分不开的。

从拉萨到西方

1987年9月的那曲，白天气温15摄氏度左右，到了晚上，气温降到零下也不稀奇。穿着羊皮袄，央嘎第一次由故乡那曲来到了大城市拉萨。从车站出来，坐上小推车，人和行李全在上面，汗流浹背，到了学校，脱了羊皮袄，都发臭了。这让央嘎印象深

刻，拉萨这个城市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成为个人意义上的第一故乡。

关于刚到拉萨时定格在央嘎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印记有很多。“最大的困难是听不懂拉萨话，我说的牧区话和拉萨话好比北京话和河北张北话。我一说话，大家都在笑，我觉得没面子，后来要么就不说话，要么就讲汉语了。专业课用的是藏语，也是拉萨藏语，课都跟不上，花了一个多月才适应。”

“在拉萨的第二天，想出来看看拉萨什么样，又担心迷路，就沿着学校门口的那条大路一直往西走，不敢拐弯，走到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就不敢再往前走了。按现在的地图，就是江苏路一路往东，直线距离超过5公里，算是逛街了。”

对自己很多个“第一次”，央嘎都记忆犹新。1991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想读研究生，但苦于没有别的学校招收藏医专业的研究生。直到1996年，藏医学院有了研究生招生资格，央嘎才抓住机会在1999年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当年西藏本地培养的第一批藏族硕士生有10人，4人在藏医学院，西藏大学有6人。那是史上最隆重的毕业典礼，自治区领导全来了。他第一次站在拉萨人民会堂，与十几位省级干部握手。

像第一次在拉萨逛街不敢拐弯害怕一样，央嘎有很多的“不敢”。有没有想大学毕业去内地城市工作？对于这个问题，央嘎的回答是：不敢。“第一次去成都吓死了，太大了，不敢出门。”在央嘎看来，自治区内的藏族和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对生活在大城市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前者觉得内地城市太大了，“觉得不是我待的地方，很难有归属感”。

央嘎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基本都去了阿里、昌都等相对艰苦的地区，当时只有一个同学毕业以后，工作不要了，学英语出国了，一直在美国。央嘎当时感觉美国都不在地球上，敢这

么去做的，也不是地球人。

大学毕业工作两年以后，央嘎开始对英语感兴趣，接触到很多外国游客和学者。英语世界打开了央嘎未知的那扇窗，慢慢克服了对未知的恐惧。那时他还没结婚，没负担，工作上只有教学任务。所以他很想去外国学习，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1999年读了研究生以后，央嘎也成了家。当时已经是副教授，觉得事业也到顶了，刚过而立之年，该踏实过日子，基本断了去国外的念头，以至于在第一次出国的机会摆在眼前时，他想都没想就放弃了。

2000年有个国际藏医药学术会在拉萨，已经可以用英文交流的央嘎认识了外国的藏学家珍妮·加措，他们交换了邮件。并没有给央嘎留下太多印象的珍妮，2001年发来邮件，告诉央嘎自己在哈佛找到了工作，是藏学研究的教授，问他想不想来念她的博士，央嘎没多考虑就拒绝了。他觉得太不现实，自己有了孩子，无论经济还是家庭负担，出国的代价太大。

2002年，珍妮又发来邮件问，想不想来哈佛做Visiting Scholar（访问学者）。“访问学者”在当时还是个新名字，央嘎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解释就是来教一门课，听听别人的讲课，一共半年时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他欣然接受。

让央嘎没有料到的是，半年的访问学者，自己深深被哈佛的学术氛围所吸引。于是有了想继续读博士的愿望。过程比想象中顺利，GRE和托福都考过。之后，向当时藏医学院的院长措如·次朗申请去美国读博士，也没有任何阻力。紧接着向哈佛提出申请，2003年5月份收到通知，全额奖学金。珍妮·加措这位犹太裔美国教授，成为央嘎的博士生导师。

央嘎说，在美国，最想念的就是拉萨，其次才是家乡。在他的认知里，拉萨是第一故乡，因为从比如县城到

那曲地区再到美国，每个地方待的时间都比不过在拉萨生活的时间长，拉萨也是他开启自己事业、承载理想的地方，因而更有归属感。

不受“欢迎”的人

哈佛的经历改变了央嘎的许多观念，这使他始料未及。同样意外的，是哈佛学到的研究方法和国际视野并没有给他带来便利，“很多人很反感你带来的科学与国际化，甚至觉得你在破坏藏医，挑战传统”。

“哈佛的博士学位，在某种程度上，是家族的荣耀，是藏人的荣耀，但这个光环带来了更多不便，甚至是前所未有的负担。”央嘎说。

达瓦这样描述他观察到的：“央嘎回来以后，学术研究上有了明显的飞跃，尤其是在藏医历史人物的研究思路上，和传统的研究方法很不一样。在藏医研究的一些问题的结论上，经常出现和传统藏学研究不一样的结论，招致一些同行的反感。”

在西藏藏医学院图书馆，挂着闻名已久的全套80幅表现藏医学内容的唐卡。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一幅反映藏医药胚胎学的唐卡。它形象地展示了人体受孕、妊娠反应和胎儿发育过程中“鱼期、龟期、猪期”的顺序，与脊椎动物、鱼纲、爬行纲、哺乳纲和人类的进化顺序一致。传统藏医会骄傲地介绍，这些源自藏医的观点比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还要早1000多年。

对此，央嘎说：“这幅唐卡所展示的胚胎学，理论上和进化论是相似的，确实比进化论要早。但如果根源深究下去，还真不是藏医药历史上的原创，这幅唐卡演绎的内容，是源于印度的理论。我们平时不会说，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尊心，我说出来，有人就不高兴了。”

拿藏医到底有多少年历史来说，

主流研究的结论是1300年历史。但也有人认为历史还应该更长，因为他们发现，尚处于原始部落的藏族人民，就懂得用树叶解毒、用草根止泻、用温泉水舒骨等，生活在寺院、庙宇中的僧人，开始收集这些治疗的方法，思考治疗的道理，僧侣们逐渐积累了一些治疗经验，并向前来拜神的人们布施。

“这种界定方式是不科学的。”那个时候，连本民族的文字都没有形成，僧人记载这些事迹的符号、记号显然不能视为藏医的体系。如果以形成学术体系来看，藏医药可能只有1000多年历史，远不如中医的历史源远流长。

藏医的术语在英文世界里已经基本形成，在汉语里反而有一些无法找到对应的。另外，做藏学研究首先要懂藏文，这是门槛。国外的学者愿意投入五六年时间去学习语言。而国内研究的人数虽多，懂藏文的却不多。国外学界对藏医药的研究做得更深入。“我个人认为，国内藏医药在文献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方法还没有掌握。而这个观点，也是这个圈子里不喜欢听到的声音。”央嘎说。

对于藏药产业化的持续性，央嘎也持怀疑态度。藏药理论对药材采集有严格的规定，比如不同药材的花、茎、叶、根、果都要根据时令和季节，在药材有效成分含量最高时采集，以前的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但产业化以后就不这样了，不该采的时候采了，甚至有的企业，该加花的时候加了根，治疗效果肯定就不同了。“藏药产业化很难。有些药生长于海拔很高的地方，怎么可能产业化？我们也不能为了产业化而破坏环境。”

离世界更近一些

据央嘎介绍，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等疾病，是藏医所擅长的领域，对胃溃疡、萎缩性胃炎的治疗很有把握。

尤其是萎缩性胃炎，现代医学基本没有太多好的办法根治，但用藏药的成药就可以根治。尤其是结合了现代医疗的诊断手段之后，就更精准了。比如胃溃疡，以前是搭脉，经常不准。现在用胃镜，很容易就做出精确判断，再配合藏药，治疗效果很明显，而在这些领域，效果就是比西医好。

达瓦也认为，藏医在很多领域的治疗方法已经很成熟，比如藏区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肺病、痛风会用到放血治疗，治疗效果比西医明显要好。但海外基本对此不认可，也不在国外的医疗体系里。不认可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与国际接轨的证据、数据。

央嘎觉得这就是藏医发展或者说藏医国际化的最大障碍。“藏医面临很好的机遇，内地市场很大，市场也能接受，如何用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如何走向更宽广的舞台，如何变成生产力，需要数据、需要证明，更需要实事求是。”

国外对藏医药的认知还很神秘，央嘎说，在哈佛学习期间，有这样一类人找到自己。“来了后，伸手让我搭脉，哪里不舒服也不讲，只说：‘你摸摸，我到底有什么毛病。’有点试探、考验的意思。”

在央嘎看来，外部世界对藏医药基本缺乏认知。“经常要对人先解释藏区在哪里，必须得提喜马拉雅对方才清楚。西藏、藏族、藏医，都要一一解释。”

若对方是学医的，一些药物成分与效果的解释，更加困难。比如在藏医心目中，所有名贵藏药都离不开的药引子佐塔，是一种用水银洗炼八珍与八铁而制成的特殊药剂，即以珊瑚、玛瑙等八种矿物入药和黄金、白银、铜等八种金属入药。简单来说，就是将这些与水银混合在一起烧成黑色的粉末。

一些特定的藏药添加佐塔之后，对泌尿、生殖、消化等疾病有明显治

疗效果，不添加佐塔则无效果。这是在藏医药1000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的经验。尤其是添加水银这个环节，由于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原因一直未做科学研究，海外质疑声居多。当然也更增加了藏医的神秘感。

在央嘎看来，藏医用药根据人的身体情况、根据季节甚至根据海拔的酌情的特点，也许会比西医更具有说服力。这是未来藏医走向世界的突破点。

“老祖宗留下的古老藏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也迫切需要理论创新。如果一味沿袭传统，藏医学就会变成无人问津的古董。”央嘎通过希望自己和其他研究藏医学的人共同努力，让藏医学在新时期有所突破和创新，让藏医学离世界的距离再近一些。

见到央嘎时，他正在告假休养，因为不久前消化道出血住院。5年来，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少，休养这段时间，虽然身体不舒服，但内心是快乐的。他终于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学术做一个总结。

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藏医药，央嘎一直为此而努力。不久前，他申请到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研究藏药浴的治疗效果。

未来主要的精力，央嘎会放在一本学术著作上。央嘎在哈佛时的博士论文是“四部医典的起源”。藏医比起藏传佛教，算不上热门，藏医药的临床研究现在是比较被关注的领域，参与的人也很多，但藏医药历史还不够清晰。导师珍妮一直在催他尽快把内容完善之后，形成书稿，她已经找好出版商，出一本英文书。

央嘎承认，做这些研究，出书基本都是倒贴，可能就出几百本。但在国际藏医药领域，能用英文出书的中国人很少，藏族的就更少。“一个藏族的中国学者，如果能在国际上出一本像样的书，也算是对藏医药发展的贡献。”



Biemfolk
比音勒芬



中国国家高尔夫球队指定品牌

公司官网: www.biemlf.com 全国服务热线: 400-113-2228



关注比音勒芬官方微信



(陈宗烈摄)

西藏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山南地区的桑耶寺

木雅·曲吉建才：从活佛到高级建筑师

最能体现曲吉建才身份特点的是，当他带着学生去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考察建筑，不用额外的手续，僧侣们都会给予热情接待，“因为他既是活佛，又是建筑师”。

记者 / 丘濂

木雅活佛

木雅·曲吉建才8年前到了退休的年龄。由于他在古建领域深厚的造诣，西藏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返聘他继续担任古建顾问。他的老家在四川甘孜州的康定县，要往返拉萨和康定两地，成都是中转站，我们便约在这

里见面。曲吉建才在一家茶馆出现的时候，是休闲的短衣短裤打扮，很符合这座城市安逸闲适的气质。

曲吉建才在设计院的学生群英见过他的另外一面。那是曲吉建才回家乡参加一年一度藏传佛教传召法会的录影：他穿着隆重的僧袍，老百姓们从很远的地方过来迎接。有摩托车为

他开道，他的车上堆满了哈达，“场面隆重震撼”。

曲吉建才的另一个身份是木雅地区的活佛。藏族人一般都有名无姓，前面缀以姓氏，便知道他或是贵族或是高僧的显赫身世。他是古瓦寺、岭古寺、扎卡托寺、九龙久思寺和孜庆曲林尼姑寺等几所寺庙的寺主活佛，这也意

味着他统领这几间寺庙的日常事务。虽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拉萨，但他一直会拿出时间关心寺庙的发展。“那些寺庙建筑是我从80年代开始，回去带着群众一起陆陆续续修缮的，没靠一点外面资金的支持。”曲吉建才说。

除了发挥他建筑师的特长之外，每次去家乡，他也要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问题。“曾经那里要修水库，会淹掉很大一片风景区，我向上呼吁才保住。”曲吉建才还在甘孜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动员喇嘛、尼姑们去关心环境和动物，监督有没有偷猎现象，另外也涉及记录山歌、舞蹈、习俗等方面。曲吉建才在家乡的威望很高，他告诉我：“老一辈会告诉年轻人我的故事。”

曲吉建才被认定为活佛的过程听起来十分传奇。他告诉我，他出生在1947年夏天，长到5岁时得了一场病，总是不能痊愈。村里一位在修行的老人算卦，让他一定要去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庙朝拜，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于是奶奶就骑着马，背着帐篷，带他前往七八十公里以外的古瓦寺。他在路上就开始显现出灵异的现象，比如路过一片牧场，便捡起一块石头，说“这是我的马圈”，后来证明那果然是他前世的一片财产。到达寺庙后，僧侣安排房间住宿，曲吉建才却偏偏指着山上的一片房子说他想住那里。那是前世活佛居住过的地方，那位活佛已经去世10年，按照规定还不能有人居住。奶奶拗不过曲吉建才，扎了帐篷住在活佛住过的院子里。

第一次来到这间寺庙，曲吉建才对里面供奉的格鲁派祖师却都能叫得出名字。看到种种这番情况，当时寺庙的喇嘛们觉得曲吉建才很

有可能是转世灵童，便搞了一场活佛的确认仪式。喇嘛们在桌子上摆放了前世用过的经书、小佛像、念珠、钥匙包等七八样东西，又放上一套看上去完全一样的僧人物品，让曲吉建才来辨认。曲吉建才说他毫不费力地就把前世用过的东西留下，其他推开。主持仪式的喇嘛正要宣布结果，一位喇嘛又出了一道难题。他对曲吉建才说，这个钥匙包里面有100来把钥匙，现在管家不在，他们也不知道哪一把是前世活佛房间的，希望曲吉建才能给挑出来。曲吉建才选了一把，众人跟过去，果然一下子就打开了那扇房门。据说，曲吉建才从活佛房间出来时，路过管家的房间，突然跑进去，拿着一个牛角鼻烟壶做了一个抚摸的动作。正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个喇嘛说那个鼻烟壶其实是前世送给管家的礼物。

当时寺庙里还有另外一个认定的活佛，但一直没有显露出什么特别的才能。僧侣们决定再来一场辨认物品的测试。按照习俗，两个人如果又同时都答对，还一个分辨的办法是把他

们带到寺庙最高的金顶，两个孩子同时都推下去，没摔死的那个就是灵童。结果另外一位活佛主动退出了测试。就这样曲吉建才成为寺庙活佛，在当年9月进行了坐床仪式。第二年他进入寺庙学习，那时他不过5岁。

从5岁到10岁曲吉建才都在古瓦寺学习，每天的功课是藏文的文法、修辞、书法、经文和宗教仪轨。他的经师对他要求十分严格，每当他背诵经文时，他便拿着棍子站在后面，背不出来棍子马上就要落下来。1956年，寺庙普遍开始了民主改革运动，中央代表团来到寺庙，年仅9岁的曲吉建才还做了接待。那时他和桌子一样高，为了让他讲话时露出头来，喇嘛们在他脚下垫上了厚厚的毛毯。

1957年，曲吉建才主动提出想去藏传佛教的学术中心、拉萨哲蚌寺进修。那时川藏公路因为局部动乱不通，他辗转宝鸡和兰州，从青藏线到达拉萨。在哲蚌寺，他住在一个叫作“木雅康参”的院落里，那是相当于一个同乡会的住处，里面还住了许多来自同一地区寺庙的僧侣。曲吉建才的活佛地位较高，在旧时代相当于四品官的噶伦级别，所以他在这里也得到了特殊的照顾。比如一般的喇嘛都是住在一个4平方米的小屋，他的屋子能有十几平方米。“木雅康参”里历史上出了不少高僧大德，这成为他努力学习的动力。多年后他回到这间院子，看到小小的辩经台和背后的度母像，还能想起他当年与师父们辩论的场景。

1959年，曲吉建才又进入了色拉寺小学。他开始接触简单的汉语，“上课”、“下课”、“打铃”、“放学”之类的词语，由



木雅·曲吉建才

（张维金）

军管会的干部为他们上课。饥饿是那段时光最深刻的记忆。早饭和午饭是二两糌粑加酥油茶，晚上是糌粑糊糊，里面加上一点放了很久的骨头渣子。1963年底，他参加了自治区青少年活佛学习班，每月有30块钱的工资，日子渐渐没那么艰苦。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一切又都被打乱了。

曲吉建才在活佛学习班的同学，随着“文革”后落实政策，很多都到了佛教协会工作。在曲吉建才印得满满当当的名片上，第一个头衔是古建总建筑师，第二个是自治区政协常委，第三个是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的副秘书长。“文革”期间下乡劳作的经历，意外提供给他一种新的职业选择，他也因此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如今在设计院，大家都称呼他为“曲吉建才老师”，或者藏语“更啦”，也是老师的意思。“但是媒体经常报道，很多人也知道他另一重身份。藏族人对‘活佛’都很尊敬，日常见面会双手合十，微微点头，叫一声‘仁波切’；如果是在寺庙，还会鞠躬行礼。”群英这样说。

高级建筑师曲吉建才

曲吉建才是他本来的名字。“曲吉”表示对宗教的虔诚，可以翻译为“乐于佛业”；“建才”所对应的藏语，和宗教法器有关，他翻译的时候特地挑选了这两个汉字，表示“对建设的有用之才”。这对他建筑师的身份非常贴切。

“文革”期间，曲吉建才在山南农场度过了7年的岁月。那里的农业建设队搞了不少副业，喂猪、磨豆腐、捕鱼，还有修房子。曲吉建才当时就对修房子挺感兴趣。“不仅仅是体力活儿，木工、砌墙都要有技术才行。”他说。时间久了，大家干活的时候都喜欢和曲吉建才搭档。虽然那些房子都是很简单的一、二层平房，但他对建筑结构建立了基本的认识。业余时间，曲吉

建才一直坚持学习汉语，就是抱着《新华字典》看报纸。他出色的汉藏双语，为他之后参加工作也带来不少机会。

1974年“文革”快要结束，曲吉建才回到拉萨。他被分到了城关区建筑公司，在那里因为能读得懂图纸，很快由普通的技术工人变为了工程管理的施工员。1975年，他参加了设计院办的培训班。授课老师不会藏语，下面坐的学生听不懂汉语，曲吉建才于是承担起翻译的工作，那也是他进步最快的时期。翻译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他需要很快消化老师所讲的内容，然后再转成藏语。课程结束后，设计院想要留下几名优秀学员，其中就有曲吉建才，尽管他年龄已经超了。那时曲吉建才有机会调回佛协，但他已经决定从事建筑事业。

如果不是80年代的那次西藏古建筑普查之旅，曲吉建才的专业领域也许会在现代建筑上。那次为调查“文革”之后古建筑物保存状态的旅行，让他看到了祖先精湛的建筑技艺，同时也目睹了它们破败的现状。像是雄伟的江孜宗山城堡，与悬崖峭壁完美地融为一体，又是当年西藏人民抵挡英军入侵的地方，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但当时山下已经在打防空洞，山体遭到破坏，会随时危及建筑。还有壮观的古格王朝遗址，从山麓到山顶高300余米，房屋洞窟、佛塔和洞窟密布群山，可是那里的文物根本无人看管，谁去都可以随便拿走。面对那些十年浩劫中遭到破坏的建筑，曲吉建才心里想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将它们全部修缮？

1987年国家拨款修复藏传佛教在西藏的第一座寺庙桑耶寺，那成为曲吉建才建筑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工程。桑耶寺的五重金顶完全都没有了，曲吉建才翻遍了所有资料，才找到两张老照片：一张1946年的照片是个外部全景，一张1947年的照片照了金顶的一个角。而桑耶寺最难的是五重金

顶的内部：整个金顶以双排柱子为支架，中央空间是个15米见方的方形平面，这一空间没有一根柱子，称作“内无柱”；双排柱子的柱廊间隔，没有用实墙，而采用木架石板隔断，称作“外无墙”。这种出神入化的结构实际上是藏式传统柱网结构和汉式营造斗拱结构合为一体的产物。

在这个时候，曲吉建才原来在寺庙中的生活经验就发挥出来了。为了搞清楚那些内部建筑细节，他找到寺庙里的喇嘛——来做询问。“比如他们说，这个好像和他们吹喇叭时候的高度差不多，我在寺院也用过那些法器，一下就能明白他们的意思。”曲吉建才说。他把内部结构的平面图和里面图画好，想和喇嘛做最后的确认。可是喇嘛们说看不懂。曲吉建才于是按照1:10的比例，重新做了大殿的模型。看到模型，年老的喇嘛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说：“我们有生之年就是想看到阳光再次照到金顶上。”由能工巧匠按照模型来复原，桑耶寺不久就重放光彩。如今看上去，飞檐和五层重叠的金顶冲天而上，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除了宗教建筑外，曲吉建才对西藏民居也很有研究，他称自己是个“复古派”。“拉萨在城市改造过程中，一度有一种错误的指导思想：现代材料就是发展和进步的表现，如果继续使用传统材料就不会进步和发展。”他说，“其实现代建筑材料会有种种质量问题，比如在八九十年代时，老城改造资金有限，但当时新建的民居一定要钢筋混凝土的结构，所以那时水泥砂浆标号就降得很低。这种砂浆干固后没有任何强度，手轻轻一捏就会碎。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用石木材料？”城市的况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偏远的山村。“特别是钢筋水泥在农村很难保证质量，除了钢筋会有次品和假冒品外，水泥的品种和强度也有差别。就是合格的水泥运过去，不

及时施工，也可能会过期和失效。如果坚持传统材料就能避免这些状况。”

曲吉建才认为即使是西藏现代民居的建造，也可以从传统中吸取不少优点。“我们西藏的房间布局基本是方形的，进深不会特别深，因为这里传统没有电暖或者中央空调，要靠阳光来取暖；而要是不懂这一点的设计师，会做成‘车库’形的房间，有太阳和没太阳的地方，温度要差几度。”他说，传统西藏建筑也很重视南边朝向，“比如我们南边就不会放楼梯和厕所。因为南边的阳光太珍贵了。”西藏有不少藏式元素的现代建筑，但这种点缀都没有抓到藏式建筑的精髓，“里面完全是适应内地自然环境来做的设计”。

但是曲吉建才也绝非固执不变的“守旧派”。他参与了两次布达拉宫的保护维修工程，一次是从1989到1995

年，一次是从2001到2006年。第二次维修之前，布达拉宫上山的大台阶已经有过几次垮塌。这都是因为近几年来拉萨天气有改变，雨量增大，过多的雨水导致里面土质地垄疏松。曲吉建才大胆地把土质地垄换成了框架结构，相当于现代建筑下面那种条形基础。“气候变了，施工方法也要相应做出改变。何况在外表上依然保持传统风貌。”从2006年至今，布达拉宫的大台阶都保持完好状态。

群英最佩服曲吉建才老师的就是他广博的知识。她是昌都人，本来在南京理工大学学的是现代民用建筑结构。有一次，她在阿坝州看到了很多神奇的碉楼，50多米高的墙体，全部都是垒砌起来的，没用任何水泥。于是她对古建产生了好奇心，追随曲吉建才学习。“像是那种古建筑的开间，

说一个面积，老师马上知道里面要用几套梁柱。”曲吉建才说，现在学院里出来的年轻人，的确很难有他当年在寺庙生活或者在农场的劳作经验，所以即使从著名高校毕业，在理论上有很高造诣，但离真正做项目还有差距。有的人对藏式建筑感兴趣，但是藏语不懂，宗教又不懂。曲吉建才好几年前就开始为藏式古建的人才储备担忧了。更何况这里面还有经济因素——现代建筑是可以拿设计费的，但古建维修在费用方面就少了很多。在设计院的古建所里，工作人员就是两个“80后”、两个“90后”，其他“60后”、“70后”已经纷纷转到现代建筑。某种程度上说，曲吉建才既为自己活佛建筑师的身份骄傲，又觉得有些悲伤，因为很难再有人像他一样了。✎

（实习记者刘畅对本文也有贡献）

最美的滇与藏

踏寻旅人心目中的心灵圣地
深入绝美与隐秘之境
呈现与众不同的行走记忆

生活周刊
最美的滇与藏

内含周刊:
《最美的滇藏线》
《去墨脱》
《腾冲》
《西双版纳》

可在以下电商购买本产品

亚马逊 amazon.cn JD.com 当当网 dangdang.com



格勒：藏族博士的藏族社会观

退休之前，格勒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著名学者。他在这个机构整整工作了20余年。然而很少人知道，这位藏族人类学博士，曾经的志向是要做最高等级的“格西”，从而成为寺院的“堪布”。

记者 程磊



四川甘孜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理想国”

格勒写日记的习惯已坚持了40多年，他把自己此前的岁月装满了四个小木箱。这四个小木箱，浓缩了西藏50多年来的变化，记录了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第一位藏族博士，从卑微的农奴成为国际知名藏学家的人生轨迹。

1964年，14岁时的格勒在日记里记下了许多属于那个年代的梦想与事迹。学校发衣服，把衣服让给了衣服更破的人；学校每个月发3块钱，用这钱给困难户买东西偷偷送过去——可是，要找出比他还穷的人还真不容易。上世纪70年代在成都郊区劳动，碰上洪水暴发，他第一个跳下去。“我以为身体能挡住洪水，结果傻乎乎地被冲走了。”格勒说。

与身体挡不住洪水一样，在格勒看来，藏族文化、藏区的发展同样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同样无法阻挡。而这也是退休后格勒正在研究的课题——《中国藏区文化保护与现代化研究》。

他为北京当年没有采取梁思成的建议将古城保护起来择地另设中心而遗憾。他认为拉萨的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在现代化的冲击中，西藏的问题更复杂。如果西藏像大家所想象，选择内地城市现代化模式，那就不是西藏了。”

西藏的未来是什么样？在格勒看来，西藏是中国唯一具备“理想国”土壤的地区。壮美的自然景观、丰厚的文化资源、虔诚的信仰构成了西藏的独特基础。他理想中的西藏由很多小村镇组成，没有堵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生活和旅居在这里的人们，认同本地的习俗和文化，人人平等，开放而具有国际性。

这个理想以另一种形式已经在自治区以外的藏区实现，这让格勒看到了希望：“外界对色达的五明佛学院有很多偏见。但对于这种自然生长的信仰，我觉得非常成功。”

五明佛学院常年会聚了数万名信

徒，藏文化与现代知识彼此融合。研习内容，除了传统的藏传佛教的内容，还设有藏文文法、藏族史、英语、翻译、历算、工巧、医学、戏剧、诗学等课，并各分出初、中、高级班，以适应不同程度的学生。

僧尼们响应“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号召，毕业后回到偏僻的山村、牧区，主动办起寺院僧尼教育扫盲学校，培养民间知识分子。他们自觉成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五明佛学院是成功的。这个以佛学院的大经堂为中心，不计其数、密密麻麻搭满了四面山坡的红色小木屋组成的区域，没有偷盗、没有吸毒、没有暴力，给西藏的未来带来无限希望。”格勒说。

作为农奴的学者

博士生导师，农奴童年，这两个身份恍若隔世。

对西藏而言，传统与现代的分界是1959年的民主改革。作为自治区以外的藏区，甘孜地区1956年就拉开了这场变革的帷幕。格勒的童年，有一半时间是在旧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度过。这个社会的特征就是它把整个藏族社会和藏族人民划分成十几种等级，最高为贵族。

90%的藏族人口都是农奴，农奴又分成三种等级，“朗生”是最底层的农奴，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丝毫人身自由。格勒就出生在这种家庭。

格勒和他的两个姐姐以及妈妈，只能睡在贵族家厨房和客厅之间的过道上，几件衣服和两个坐垫是他们的唯一“财产”。姐姐后来还被“主人”当作“财产”送给其他贵族。

格勒这样描述对当时生存处境的理解：“生命是没有保障的，能吃饱就不错了。像我母亲、姐姐，她们从父辈下来就相信宗教，认为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他们相信前世和来世，认为人是不断地转世，认为自己现在命不

好，就是因为前世造了孽，这种信仰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她也意识不到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当然也不可能挣扎或者是奋斗，她和所有的农奴一样，只是被驯服的工具，一无所有，一生都归贵族所有。”

虽身为农奴，但作为家中的男人，格勒依旧被寄予厚望的。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男人的出路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参与械斗，家族和家族间为了贵族的利益，发动血腥的战争。格勒的家乡旧时被称为“西康”，那里的男子以英俊魁伟的体貌和英武之气著称，是声名赫赫的“康巴汉子”。因作战英勇，便能在本村或本族之间获得一些没有实际用途的尊敬。其实这都算不上是什么出路，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获得尊敬，年纪轻轻就因械斗而死——这也是格勒从未见过自己父亲的原因。

另一条更现实的出路，便是去寺院当僧人，通过二三十年学经，成为喇嘛。这几乎是所有农奴家庭对儿子的最高期望。

“妈妈最大的愿望是让我读书。对于读书好处的理解很简单，她觉得你多认识一个字，以后就在地狱里少受苦，运气好还能当喇嘛。”所以，母亲梅朵拉措把当时才4岁的格勒送到了白理寺，交了粮食报了名。但因为年纪尚小，喇嘛让他等到7岁再去。

梅朵拉措仍没放弃，她说服主人，让格勒跟着给贵族家经堂工作的喇嘛学习，格勒给喇嘛当杂役干活、伺候他以换取学习机会。贵族家门上有个洞，太阳照到洞里，就到了上课时间。季节在变，太阳也不常有，上课是否迟到由喇嘛说了算，如果迟到就是一顿揍。上课的课具是一块木板，将灶灰撒上去，用树枝在上面写刚学的字母，给喇嘛看，觉得可以，擦掉，继续写。

就这样读了近一年，收获是学到了30个藏文基本字母，以及各种顺手抄起的树枝、烛台等物体抽打身体留下的印记。



藏族博士格勒

这期间，解放军来了，住在贵族家楼下。格勒并不知道这是进藏部队。但通过他们，他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第一次吃到馒头，他惊讶于“以前都是吃豌豆糌粑，第一次吃馒头，觉得天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啃馒头时听到的有关电灯、汽车、电话的描述以及产生的向往，全部定格到具象的馒头这个物体上。以至于格勒回想过往重要的时间节点，脑子里浮现的总是不那么白的馒头。

直到1956年，格勒的家乡开始了民主改革。格勒生平第一次可以睡在床上，第一次盖上了被子。同年，新政府在当地县城办了一所小学——绒坝岔小学。对读书这件事有着坚定不移信念的梅朵拉措听说这个消息，拉着格勒，第一个到这所小学报了名。

在县城的课堂，黑板和教室被分成两半，一半用来教县城的孩子，一

半教乡下的，只有一个老师教。一边在用“人民”造句，一边在学人民的“人”。一方面是师资依然不够，另一方面这样让底子差的学习汉语更快。

让格勒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离开家来到县城，此后除了探亲，便没有太多机会回到那个有着农奴印记的家。从西南民族大学到中国社科院再到中山大学读博士生，跟着去北京工作、去成都当“博导”，是格勒此后的人生轨迹。

“妈妈不是觉悟高，她就是个文盲，只是看到有地方读书，就把我送了过去。”格勒说，到了学校，老师问：小孩多大年纪？她说不知道；哪一年生的？她说，那一年下雪。老师说：年年都下雪啊！

“就这样的一个人，偏执地认为读书能改变命运。”格勒说，“只不过差别在于，母亲认为能改变的是下辈子的命运，而我因为读书，后来知道了，

命运从现在就可以改变。”

复杂的成长经历，使格勒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西藏社会的现实与困境。

按照格勒后来的调查，宗教和寺庙既是西藏农奴社会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 2676 座，僧众超过 11 万人，其中大小活佛等上层僧侣约 500 人，掌握经济实权的僧侣共 4000 余人。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僧人人数一度超过 1.6 万人，共占有庄园 321 个、土地 15 万亩、牧场 450 个、牲畜 11 万头、农牧奴 6 万多人。

“西藏传统农业社会的形态保持了 1000 多年，政治上的最高利益是宗教。而法律、经济、文化、艺术都为宗教服务——画唐卡是为了信仰，学习是为了当喇嘛，也是为了信仰。”格勒说，“很长时期以来，西藏社会的价值标准都以宗教为核心。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也是要看是否利于宗教和信仰。”

“神秘”想象

1986 年，格勒博士毕业后，到了北京参加筹备建立中国第一个藏学研究中心。直到 2011 年，他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位置上退下来，25 年来主持了多项调查和研究。这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校的博士生导师，讲授民族学和人类学。

尽管已经退休，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一项名为《藏区文化保护与现代化战略研究》的项目还在收尾阶段，还要录制“珠峰讲堂”的节目。

在他看来，藏文化的挖掘还远远不够。仓央嘉措的诗歌成为流行情歌。但很多人并不了解，最早把仓央嘉措的情歌翻译成汉文和英文的是于道泉先生。仓央嘉措被翻译过来的诗歌，其实只是沧海一粟。

按格勒的理解，仓央嘉措的诗受到关注，一方面在于他六世达赖的身份，另一方面则源于电影的推动。其实藏文文献很多以诗歌的形式记载，

翻译为汉语和英文的只是极小一部分。在萨迦寺，几层楼高的书架上那些布满灰尘的书匣许久未曾打开过。里面是手写的经典，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较早被挖掘的藏文典籍，已发挥出重要价值。如 1000 多年历史的《四部医典》，让藏医成为藏区的支柱产业。“还有美术、绘画、雕刻、建筑、哲学等藏文化艺术都在沉睡中，需要被唤醒。”

“正是因为挖掘不够，西藏一直在许多人眼中显得很神秘。”格勒说。

1988 年，他第一次去美国讲学。课毕有人提问：听说喇嘛可以在天上飞，你见过吗？格勒的回答说：“飞天壁画中有喇嘛会飞我见过，改革开放以后和我一起坐飞机去北京的活佛，算是我见过的飞的，能自己离地直接飞的没见过。”

在格勒看来，西方人视野中的西藏，与现实、物质的西藏，没什么关系。那是一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拥有西方文明中已经失去、令人渴望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在他们眼中，西藏是一个充满智慧、慈悲的地方，没有暴力，没有尔虞我诈。

格勒也注意到国内也有类似情形：在中国当代社会时尚变迁中，西藏与当代人生活方式之间，呈现出复杂而有趣的关系，西藏成为中国人精神的终极向往。很多人戴着旅行团的小红帽、寂寞和人生的挫折感前来；他们希望让来自物欲时代的自己，完成一个心灵救赎式的短期培训班。

“其实，他们需要的不是西藏，而是信仰。”格勒说。

现代化

在很多个场合，格勒都向人们讲述过自己如何从佛教信徒成为现在的无神论者。“我是信科学的。”在他看来，一个学者，必须要跳出信仰，用现代知识，去思考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才是有价值的。

“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是以经济

为中心，这个是对的。但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未来你要追求什么？”格勒认为，西藏建区 50 周年后的今天，西藏来到了一个现代化的十字路口。

“西藏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需要怎样的现代化？”在格勒看来，只有把那 1000 多年历史的古籍经典全部挖掘出来，让西藏不再神秘，西藏才有可能在现代的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一个健康的人类社会，必须是物质和精神相对平衡，传统在得到继承与发展的同时，物质生活有相应匹配的速度。”这个结论从格勒对藏文化历史的研究中可以找到佐证。

在格勒看来，强大的吐蕃王朝对今天的西藏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青藏高原各部在吐蕃王朝的统一下凝聚成强大势力，逐渐走出封闭的内陆高原，使得古代藏族社会生机勃勃。吐蕃的崛起源于对外开放，开放产生交流，交流能促进民族发展。吐蕃没有文字，就创造文字；苯教的信仰原始，不能够构成意识形态支撑统治，统治者就派学生去印度学习，引入佛教。

但频繁战争和内部矛盾，使吐蕃走向衰落。随后佛教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教合一与农奴制让这片土地日益封闭。“只有精神得到发展显然不行，但完全摒弃精神，丢掉传统同样不行。”格勒这样认为。具体应该怎么做，格勒讲了一个他看到的变化。第一次去丽江古城，当地年轻人都不学东巴经，他们觉得这是死了的文字。隔了几年再去，很多年轻人穿着纳西族服装，开始向游客介绍东巴经。“这个过程是个自我觉醒的过程，要靠旅游赚钱，就要有地方特色，要向游客介绍自己的传统文化。”格勒了解到，以前政府办有关文化遗产的培训班，没人去，后来老百姓自己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自己掏钱办班。“这就算产业化了，知道传统文化怎么用了。有了钱，反过来进行保护。这个过程，既传承了文化，也有创新的可能。”

阿旺罗布：登山改变人生

西藏山多，登山之于藏族小伙子，只是日常，但也是改变命运的一种路径。

记者 / 周翔

1998年冬天，刚刚成立的西藏登山学校的招生老师坐着车，走了好几天的路，从拉萨来到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的时候，初中毕业生阿旺罗布对于登山还一无所知。“放羊的时候也要去爬小山坡，但跟登山当然是不一样的。”聂拉木县处在喜马拉雅山与拉轨岗日山之间，当地的孩子从小在珠峰脚边长大，习惯了高海拔地区的艰苦生活，学校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在聂拉木县和毗邻的定日县招收了学校第一期的大部分学员。

阿旺罗布家有八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五。这个家庭，既耕种土地，也放牧牛羊，除了延续祖祖辈辈相传的农牧生活以外，“能想到的也就是当教师和医生”。阿旺罗布的一个哥哥便选择了学医，留在了日喀则工作。其他的兄弟姐妹，还有父母，都不在拉萨，“拉萨就我一个”。当地的教学水平，限于边地的条件，也并不理想。“三年级开始教拼音，小学毕业之后基本不识汉字，大致能用汉语简单沟通，但基础比较差。”如果要读高中的话，就要去日喀则。因为初中毕业时成绩不理想，阿旺罗布正在考虑接下来的人生道路。进入登山学校，就能够去遥远的拉萨学习、生活，对这个雪山下长大的孩子而言，这是当时对他最直接、最单纯的吸引。

作为藏文化的中心，大城市拉萨带来的首先是一种接近于震撼的体验。“刚来的时候感觉城市很大，好多地方不敢去，怕迷路。”阿旺罗布说，在藏民家庭里代代相沿的佛教信仰，也在他心里引起了情感的激荡。“看到布达



阿旺罗布

(金海摄)

拉宫和大昭寺时，心里真正感觉到了“一个神圣的地方，跟家那边不一样。”倒是学校刚开始完全不符合他的预期。登山学校开办初期，条件艰苦，学生全部住校，“在体校里面租了六间平房作宿舍，一个简易活动房就是教室，还有一个帐篷就是厨房”。这样的条件他们住了好几年，中间还在体育局的院子里住过，做饭常常是学生们自己轮流做，碰上做饭难吃的同学，大家一整天都只好愁眉苦脸地“将就将就”。但是，学校将这第一批25个学生看得很重，期望很高。阿旺罗布一直记得登山学校校长、曾经被誉为“登山英雄”的尼玛次仁跟他们说：“现在你们看不出西藏登山的潜力，但是10年后你们会明白西藏登山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你们是第一批学生，我希望将来你们培养更多的人。”对于一手创办登山学校的尼玛次仁而言，他的设想是在西藏登山队从完成国家任务到普及登山运动的转型过程中，通过专业培养训练，让新一批的登山队员走上与他们此前不同的职业化道路。因此，在学校的教学设计里，这些来自高寒地区的藏族孩子，不仅要接受严格的登山训练，还要接受语言、文化方面的学习，以便与来自国内国际的登山队伍合作，代表西藏登山的专业水准。

阿旺罗布和同学们的文化课要学汉语、藏语、英语和西藏历史，老师大多由西藏大学的老师兼任，专业课则包括体能和技能训练，学校专门从法国请来高山向导用英语授课。最令学生们期待的，自然是实际登山，这也是登山教学中最重要的环节——他们所学的一切，都必须在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中得以检验和证实。“我们1999年3月入学，11月份就爬启孜峰，当时去的时候非常兴奋。”背着登山装备和生活用品来到营地，一步步向上攀登，学生们这次在山上——一共待了半个月，可惜最后准备登顶的时候，连下了三天三夜的雪，最后只得下撤。

这次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遗憾的经历，让阿旺罗布记住了“下雪三天不动”这句登山界的老话，也教给了他最初的经验——要学会观察、判断雪崩区和积雪区，选择最优的扎营地点和攀登路线，还有，懂得等待和放弃。

在学校里，由于登山经验还不足，学生一般不担任向导，主要是负责运输、协作，工作比一般登山队员还要繁重。“老师们会要求我们记日记，然后大家读出来交流，互相支持鼓励。”但是登山的机会多，成长得也快。从2000年开始，阿旺罗布便有机会和国家登山队，还有国内国外的登山队伍一起去爬山。先是7000多米的章子峰，然后是8000米以上的卓奥友峰和希夏邦马峰。刚开始的时候还缺乏经验，从其他队伍的老队员们那里，他渐渐学会如何事先了解山峰的情况，做出预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呼吸和步伐的节奏，登山的技巧一点点地磨炼出来。

从培养专业登山者的角度来说，登山学校显然是成功的。正赶上了西藏登山大发展的十几年，这期间，学校陆续培养了100多人，“西藏登山队的主力都是这个学校毕业出来的”。在登山队编制以外的学员，大部分毕业后到商业运营的圣山探险公司工作。阿旺罗布2003年毕业后，也在探险公司里工作了5年。有任务时就去登山，其他时候还是待在学校里学习，特别是冬天会去做高山技能培训。这段时期，登山的机会不少，每年的周期也相对固定——3月到6月底在珠峰，8月在拉萨周围，9月到10月，再攀登两座8000米左右的山峰。除了攀登国内的高峰，阿旺罗布和同事们也与别的队伍一起攀过国外的高峰。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出国是去南极，为王石的队伍担任摄影，从智利最南端的大本营出发，阿旺罗布第一次见到了2000多米厚的永不融化的冰原。另一次则是去瑞士，在那里他看到了登山运动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在当地登山

作为爱好很普遍，是常见的家庭活动，是他们生活里的一部分。有许多人带着孩子去，他们并不会觉得很危险，和我们这边的想法认识不一样。”

从2002到2009年，每年一次，阿旺罗布已经8次登上了珠峰。“第一次感觉轻松，特别兴奋，之后兴奋感有减少，但我有了冲击登顶纪录的念头，而且很享受在峰顶看下面的风景。”其实就算是已经攀登过的山峰，在他看来，下一次面对它还是要把它作为全新的对象，因为雪山永远在随着自然四季的变化而变化，永远有神秘莫测的魅力，必须用全部的身心面对它、感受它——阿旺罗布不用“征服”这个词语。他记得最危险的一次，是2008年攀登希夏邦马峰，登顶的过程本来比较顺利，下撤的时候，由于疲劳和疏忽，队伍在一个陡坡处引发了雪崩。幸而雪崩并未变大，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这次意外一直留在阿旺罗布心里。“登山牵涉许多人的性命，一定要团队分工，要很细。”他说。

2008年以后，由于表现优秀，阿旺罗布从探险公司调入西藏登山队，成了“有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这时登山队基本没有了国家的登山任务，开始转型为半商业化、半公益性运行，“更多地地在培训上下工夫”，与完全商业化的探险公司之间也形成了某种分工——登山队承接的社会登山培训，一般在6000米左右，时间不超过10天，至于攀登8000米以上的高峰，则“基本上探险公司算是唯一一家”。在登山队，工作和训练的任务相对都要轻松一些，不过，阿旺罗布对登山的热情并未削减。“我个人是越登越有兴趣，不断往高处，是对自己身体的挑战。”每一次登山都会积攒经验，也会学到新的东西，而除了专业能力之外，最重要的也许是：“登山的经历会让人变得更平静一些。经历过死亡和困难，生活中的事相比起来小多了。”

（感谢实习记者王天艺对本文的帮助）

跨越 50 年，雪域高原的飞行传奇

翻开一张世界地形图，从平原到丘陵再到高原，由绿至黄的颜色渐变体现着地形海拔的逐渐攀升，中国西南部的这片区域则被染成了深黄色。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难飞的高原机场都集中在这里。自 1965 年开航拉萨起，国航陆续完成了全部高原机场的试飞和首航，并建立了连接雪域高原、内地和世界的一条又一条航线。面对异常复杂的飞行环境，国航创造了高原安全飞行 50 周年的辉煌纪录，这在航空业里称得上是一个传奇。

记者 / 丘濂

飞往雪域高原

乘坐国航 CA4128 航班从北京起飞，3 个多小时的飞行时间，翻翻书，合眼休息一下，很快就度过了。再定睛向窗外看，群山巍峨，天空湛蓝，日光倾泻满地，已经到达拉萨。机舱广播在耳边响起，乘务员柔声细语地提醒大家下机后不要大幅度运动。贡嘎机场，是 3600 米的海拔。

现代交通工具的迅捷，模糊了人们对旅途辛劳的记忆。民航正式通航拉萨不过只有 50 年的历史。不用说唐朝的文成公主进藏——从长安出发，历经风霜磨难，整整走了 3 年才到达拉萨——就是在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进京与中央谈判，亦路途辗转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直到 1954 年，川藏公路通车，但从成都到达拉萨仍需要十几天的颠簸，而且一旦碰到雪崩、冰冻、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交通便会中断，行路的艰难仍超出人们的想象。

地面交通情况如此恶劣，打破高原封闭的自然环境对改善当地生活水平又如此重要，1955 年中央下定决心，一定要在青藏高原上开通一条民用航

线来。当时中国民航业刚刚起步，飞机数量极少，内地很多大城市尚且没有民航航班。飞机性能也比较差，飞机最大飞行高度不到 1 万米，而青藏高原境内海拔 8000 米以上的山峰多达 11 座，海拔 7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 50 余座。这片鸟都飞不过去的雪域高原，一直以来更是飞机无法到达的“处女地”，被称为“空中禁区”。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民航系统开始了探索。1956 年，飞行专家潘国定进行了成都到拉萨的可行性实验飞行，并取得了成功。那一次飞行可谓险象环生：一度飞机在云层中由于静电干扰失去了与地面的联系，又因为汽化器结冰，螺旋桨转速出现急剧下降。所以尽管“空中禁区”已经突破，要实现民航通航目标还有很长路要走。1959 年，民航局决定改用刚刚引进的伊尔 18 型飞机试航拉萨，任务就落到了中国民航第一飞行大队（国航飞行大队前身）的身上。

1960 年 6 月 15 日，飞行大队的张瑞嵩机组执行了北京到拉萨航线首次通航任务。据张瑞嵩回忆，当飞机平稳降落在当时拉萨的民用机场当雄机场，立即被欢呼的热浪包围，藏族



同胞手捧哈达，载歌载舞迎接他这个“毛主席派来的飞行员”。那个欢庆的场面如今还能从一张张黑白老照片中找到痕迹，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他们在背后流下的汗水：他们是在没有可行性资料、没有高原飞行经验的情况下，依次选择北京、昆明、格尔木三个海拔高度逐渐升高的机场来



中国航西南分公司空客 A319 利用 RNP 程序（精密导航技术）执飞拉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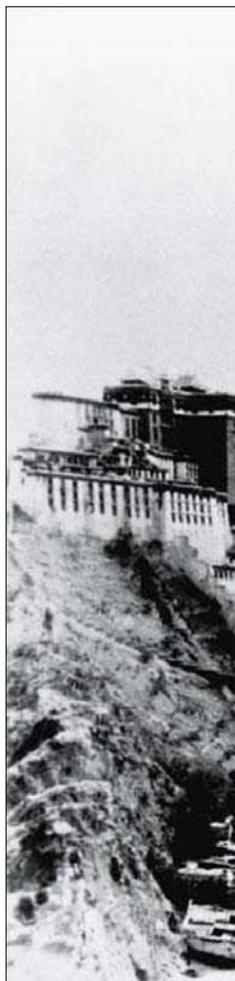
做飞行探索的，重点在飞机起飞后的 4300 米高度上，进行“假”起飞、“假”降落。最后张瑞嵩和同事又进行了 5 次实地试飞以确保试航万无一失。

1965 年 3 月 1 日，经过精心筹备，中国民航第一飞行大队的孙权贵和毕春芳机组驾驶着伊尔 18 型飞机再次降落在当雄机场。他们实现了成都到拉

萨航线的首航。

于是今天乘坐飞机去往拉萨才是这样稀松平常的事情。从最初的伊尔 18，到后来的 B707、B757、A340，再到现在的 A319 和 A330，随着国航对机型的不断更新，旅客也获得了越来越舒适的空中体验。不仅是拉萨，在西藏、四川、青海境内一共建成有 11 个高高

原机场（海拔在 2438 米以上为高高原机场），它们全部都是由国航完成试飞和首航。近 20 条往返“世界屋脊”的国际、国内和区内航线，构筑起了以拉萨为中心密集辐射周边大、中城市的航线网络。1965 年通航至今，国航仅在成都—拉萨航线上就安全起降飞机 8.48 万架，运送中外旅客 1099 万人，



1960年6月15日，张瑞霖、孙权贵机组驾驶伊尔18型飞机降落在4250米的当雄机场，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运输货物邮件24万吨。面对异常复杂的飞行环境，国航创造了高原安全飞行50周年的辉煌纪录，这在航空业里称得上是一个传奇。

特殊的高原飞行

一架进行高原飞行的飞机乍看上去和普通航线的飞机好像没有区别，其实从飞机配置和机上人员的资质来看，都与普通航线不一样。

细心的乘客能从起飞前的安全广播中注意到紧急情况下供氧时间的延长。一般航线客机的客舱用的都是化学氧气发生器，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氧气面罩就会自动弹出，旅客戴上氧气面罩，拉动绳子，两种化学物质通过发生反应产生氧气。这种氧气

维持时间大约是15分钟，足够让机组在紧急情况下从1.2万米降到4000米。但在高原飞行，地面障碍物平均海拔4000米，特别是拉萨，那里的山大都是在5000米到6000米以上，飞机不能贴着山头飞，最少要有600米以上的安全裕度，所以这条航线的最低安全高度是7470米。也就是说，一旦遇到座舱失压，飞机的高度不可以降到7000米以下，而这个高度常人是不能承受的，遇到突发情况飞机没办法紧急下降，就必须提供足够的氧气。成都到拉萨正常飞行约为一个半小时，飞行的时间中点是45~50分钟，必须提供足够满载旅客情况下维持50分钟的供氧量，保障从航路上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安全返回成都，或者继续飞到拉萨着陆。这就需要对执飞高原的

飞机进行氧气系统的改装，通过高压氧气瓶向管道中输送氧气。

除了氧气系统外，还有发动机的选择。高原起飞着陆，因为海拔高、气压低、氧气密度小，飞机发动机的推力会损失，而且气温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损失越大，这样在发动机的配置上，就需要有更大推力的发动机。如果平原飞行，需要1万马力的推力，那么在高原就至少要1.2万马力，就相当于“大马拉小车”。国航副总工程师、西南分公司党委书记钟德超介绍，在此基础上，还要保证执行高原飞行飞机的发动机能处于最佳状态。“机械设备都有一个运行曲线。投入使用后，一头一尾的故障率偏高。所以国航就用‘掐头去尾’的原则，高原飞行要选在飞行小时数在1500小时到



一架客机飞过布达拉宫上空

9000 小时之间的发动机，之后就要阶梯式地换发动机。相当于我们只是用它性能最优越的青壮年阶段。”

飞机在起飞前要满足“最低放行清单”(Minimum Equipment List)。它的上面标明飞机的各个零件设备要达到的最低要求。“这是根据飞机制造商的建议列出来的项目，各个航空公司再做补充。”钟德超说。平原放行和高原放行要满足的标准有所不同。“比如飞机的轮子都装有风扇，刹车的时候来降温。如果是平原飞行，8 个风扇里面坏掉 3 个是可以放行的，但是高原飞行是一个都不能坏。”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都集中在中国，而对于开航最早、飞行经验最为丰富的国航，对高原航线飞机的放行标准无疑是最高的。“国外的航空公司，在这一点上

也超不过我们。”

在雪山林立的高原找到一块适合修机场的平地非常不易，所以很多高原机场都修在群山环抱的河谷当中。地形的阻挡常常造成无线电导航信号不稳定。在高山之间找到机场、对准跑道，并在规定的时间下降到合适的高度，是个不小的挑战。更不用说高原变化多端的天气，四季的天气常在几小时内呈现，上一分钟还是东南风，下一分钟就是东北风。为了降低返航率，国航在 2006 年率先为高原航线飞机引进了 RNP (Required Navigation Performance) 精密导航技术。它使得驾驶飞机不再依赖于无线电信号，而是靠卫星传递的信号完成对准跑道。这样一来，不仅在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可以完成安全起降，一些受地形限

制只能单向起降的机场，也可以实现双向起降，风向对飞机起降的影响也大大降低。

特殊的高原环境，特殊的飞行任务，必然要有特殊技能的人才。一名民航飞行员的成长和晋升，通常可以划分为学员、副驾驶、机长和教员。对于执行高原飞行任务的飞行员来说，成为一个机长仅仅是技术资质的第一步，之后还将经过一般平原特殊机场、一般高原非特殊机场、一般高原特殊机场的训练和飞行，取得不同层级的资格确认，然后才能进入高高原机场。高高原机场又分运用传统程序和运用 RNP 技术很多档次，每个飞行员要取得这些资质，必须一个机场接一个机场地进行起飞单发（即在另外一个发动机失效的情况下）应急返场程序、单发飘降程序、飞机超障供氧程序、RNP 程序等理论学习，再经过模拟机训练，方可进入带飞、检查，最后放机长。之后每半年还要进行 1 次单发培训，过程相当复杂，质量控制也非常严格。一个普通飞行员想拿下高高原机长资质，至少需要 10 年。国航目前有近 5000 名飞行员，但具有高高原资质的机长只有 259 人。在飞行员资源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国航在藏区航线飞行中却始终实行双机长配组。

相比平原航线，飞高原航线的机长在执行飞行任务前都要求经过更严格的体检。高原航线对人的身体消耗极大。比如成都飞九寨沟的往返，一共是 35 分钟的飞行时间，人需要在平原和高原模式之间不停来做切换。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机长在降落高高原机场前都要求佩戴氧气面罩。

一条高原航线的诞生

进入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国民航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国航也进一步加大了藏区航线的开拓力度。继拉萨航线之后，1995 年，国航开辟了成都一

昌都（邦达机场海拔4334米）航线，刷新了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民用机场的通航纪录；1999年，国航又开辟昌都—拉萨航线；2006年，国航成功试飞世界上航路极为复杂的林芝米林机场（海拔2949米），并开通了成都—林芝航线；2008年，国航依靠RNP精密导航技术成功实现了拉萨夜航，结束了拉萨机场43年无夜航的历史；2010年，国航成都—拉萨—阿里航线开通；同年，日喀则（海拔3782米）首航成功，西藏第五个民用航空通航点顺利通航；2011年，国航北京—拉萨直达航线开航；2013年，国航航班顺利降落在稻城亚丁机场（海拔4411米），这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2014年，国航航班平稳降落在阿坝红原机场（海拔3535米），从此由成都前往“黄河源头”只需1小时；2015年，北京到林芝之间又实现了直航。

每一条航线开辟的背后，都有一个充满艰辛的故事。国航西南分公司飞行经理李应参与了大多数航线的试飞，他是这些故事最好的讲述者。

每次试飞之前都要去目的地先做考察。2010年，李应等一行十几人的团队奔赴阿里。从拉萨去阿里要走两天两夜。“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每个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发应。好几个人嘴唇都发紫，也不想喝水。因为喝水就要上厕所，上厕所就得活动，然后就更加缺氧。”李应回忆说。可是这点苦和生活在那里的人相比又算什么呢？李应在途中路过了一个兵站，他回忆，战士们“见到我们特别热情，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们。可是他们吃的很有限，蔬菜是自己种的，土质差也不好长活”。当车队行驶到距阿里还有400多公里时，在飞扬的尘土中，他们看到阿里党政军民近百人，已经手捧着哈达站在那里等候。那一刻李应的眼眶湿润了。迎出400公里！这是多么高的礼遇？又是藏区人民多么大的渴望？李应心里暗下决心，无论



危急情况下，民航是唯一的选择。图为2008年的一次飞行中为担架儿童提供保障

多困难，一定要把阿里的航线飞出来。

至今阿里航线仍然是李应心目中一条难飞的航线。它的难度来自可飞行的时段很短。阿里白天的温度变化速度快，一小时升高5摄氏度。随着温度上升，飞机性能出现衰减，就要减载旅客或者货物，上升一度要减少5~7人。最厉害的一次，能装128个人的A319飞机只坐了39个人。“所以我们早晨5点多就从成都飞了，经过拉萨时是8点多，就为了抢到达阿里那个最合适飞行的‘窗口’。”

除了实地考察之外，试飞前还要在模拟机上做大量的飞行实验。模拟机上有国航专门投入成本去做的高原视景，飞行员操纵它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林芝机场是李应认为复杂的另外一个机场。“机场的河谷很狭窄，周围环绕的山又高。不像是平原那样往哪个方向飞都可以，你必须全神贯注控制飞机不能让它飞偏。”而那种视觉上的冲击是很大的。“虽然安全裕度从仪表反馈来看完全都够，但看上去就好像机翼的一边要插到山里去了。”因为有山的缘故，李应和同事就要提前在模拟机上看怎样绕开山来下降，同时它的转弯角度和下降速度也不至于让

乘客产生压耳朵的不适感。“就好像架桥一样，我们在模拟机上练习阶梯式地下降。”就这个转弯和下降，李应的团队就在模拟机上折腾了20多个小时。

真正的试飞，是一种要把事情做到极限的飞行，一定要所有危险的情况都要模拟到。比如离地面只有不到100米的“贴地”飞行，还有模拟一台发动机失效时候的“单发”飞行。在高原，由于氧气稀薄油料燃烧效率很低，飞机发动机性能衰减很厉害，两台发动机推力尚嫌不足，减少到一台性能衰减得会更厉害。缺少推力，飞机爬升能力特别低，飞机的反应速度也会降低，而李应要做的就是飞机最差的状态下，飞出安全路径和程序。一次危险的经历是从邦达机场起飞后的“单发”飞行。邦达的风向风速变化特别快，起飞时可能才几米的风速，刚一离地一下就变成了十几米，飞机侧偏特别快，单发操作起来就像一个人在往一边推，另一个人往反方向拉，飞机都是拧巴的。飞完下来，汗水已经把衣服全部浸透了。

夜航拉萨是另外一次让李应记忆深刻的飞行体验。当时不仅是拉萨，整个西藏都没有夜航，从国家整体战

略考虑，拉萨必须有全天候运行的能力。“从空中看拉萨这个城市，白天很壮观，晚上就很寂寞，因为周围都是山，没有灯光。”李应说。黑暗会让人产生一种叫作“黑洞效应”的错觉，“飞行员看不到地面，总是会觉得离地很高，想一个劲儿地往下降。尽管有各种仪表参数来提示，但这种心理感受还是会对降落过程造成干扰。飞行员自己还是要做判断，拉多少杆、大概什么角度飞进机场”。经过数月在压力下的训练，李应终于对落地前的操纵手法了然于心。“真正飞行时就好像飞在一片夜晚的汪洋大海上。只有拉萨机场的停机坪有一点亮光，我仿佛是在对准海上的一条船在降落。”

试飞工作中的风险和挑战，对于李应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再大的挑战他都能够从容应对，但他也知道，对于常人来讲，这些风险是一道不容易过去的坎。所以他很少对家人和朋友谈起试飞的过程，每次接到试飞任务，他都不敢告诉年迈的父母，只有在试飞成功后，才会给身为国航乘务员的妻子发上一条再简单不过的短信——“平安落地了。”

高原上的坚守

国航高原航线的成功运行，离不开飞行员的安全驾驶，更离不开西藏分公司地面服务人员有力的保障。国航西藏分公司2004年在拉萨挂牌成立，其中大部分员工都来自内地。长期生活在西藏本身就是一种考验。分公司的党委副书记王春江说，来西藏工作首先要过身体这道关。初到西藏，头疼、恶心都是正常现象，但过了许久，还被失眠困扰。“你去我们员工宿舍，会发现很多人都有‘白加黑’的感冒药，而且都是白片留着，黑片吃了，因为它有助眠的作用。”有句话是：“在西藏，睡觉都是一种奉献。”这成为国航员工对抗艰苦条件的幽默。

高原环境复杂多变，虽然RNP技术的引进大大降低了返航率，但秉承“安全第一”的国航还是要求飞行员遇到危险天气时不能冒险降落，要选择备降或者返航。这都会造成旅客大量滞留机场需要安置的情况。“一些机场会出现旅客过分激动的场景，那多半是代理人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国航在拉萨机场也是有代理人的，遇到不正常航班我们完全可以交给代理人来处置。但国航的地面保障人员一定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和旅客解释，把问题就解决在萌芽状态。让旅客等待很久，没有决断，然后再取消航班，这是最大的忌讳。我们的经验就是遇到状况，果断处置。”西藏分公司生产保障中心吴江涛说。返航和减载是旅客最不容易理解的两点。“他会说‘别人都能降，你们为什么降不了’，或者看到飞机上很多空位，觉得我们故意不卖票。这都需要大量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

藏区的民航运输有“三多”的特点——孩子多，急病患者多，担架旅客多。在高原，许多危急情况下，搭乘飞机是这里唯一的选择。从企业经营来讲，运送这些旅客是件“费力又亏本”的事，但一次又一次紧急事件的处置，让他们形成了“有急事找国航”的印象，国航一定会不讲代价、创造条件来解决问题。

今年初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刚出生不久的女婴儿丹增患有极为罕见的先天食道锁闭。恶劣的高原气候和落后的医疗设施，使得整个西藏的医院都不具备为女婴实施手术的条件。民航总局有规定，出生不足14天的婴儿和出生不足90天的早产婴儿由于身体状况欠佳，航空公司不予承运。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心急如焚的家人开了一张婴儿提早出生的证明，这让国航的工作人员更无法确认孩子的真实信息。最后经过向上汇报，国航还是决定开辟绿色通道，执行一次特殊的飞行任务。婴儿有随行医护人员陪

护，公司又安排机组、乘务组全程关注，最终婴儿顺利抵达成都，成功进行了手术。

最好的坚守来自于对藏区的热爱。国航针对援藏干部制定了特殊的政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爱上藏区并坚守藏区。同时也加大了藏区本土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越来越多的藏族员工成了活跃在高原航线上的中坚力量。

黄兰成的藏语名字叫才巴多吉，意思是聪明和吉祥。他出生在甘南藏区一个偏僻乡村，曾是方圆几百里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国航招收的第一批藏族飞行员。但因为从小没有接触过英语，基础太过薄弱，已经飞到了高教机的他，最终没能如愿飞到最后。停飞后，黄兰成来到了国航西藏分公司。学飞行的经历却让他到现场保障岗位有了更好的施展，既熟悉流程又懂得技术，令他成为与机组沟通、与地面协调的最好人选。同时，遇见一些不懂汉语的藏民，黄兰成更可以用藏语和他们沟通。

国航在昌都机场的运输保障，黄兰成是第一个被派去的。那是一个连藏民都会产生高原反应的地方，但他连年主动申请并参与保障：“内地上的不适应，时间久了会落下毛病。我是高原长大的，总会比同事们要好些。”保障通常都在11月底，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环境中，廊桥里都结上了冰。多变的气候经常下雪，睡觉时候还是晴天，半夜就已大雪封门，每当这时，黄兰成就得马上爬起来，叫醒当地机场的工作人员连夜扫雪除冰。除冰除雪的进度怎样，机场现场的状况怎样，什么时候可以完成……黄兰成操心着方方面面。只要有他在那里，运行保障就能令人放心。虽然内心深处有着不能翱翔蓝天的遗憾，但黄兰成总是说自己是幸运的：“我是带着梦想来的，因为这里是离天最近的地方，我愿意留在这里。”

（实习记者陶玉荣对本文也有贡献）

新西藏：天上地球村

世界最后一方净土，需要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记者 程磊

藏博会

去西藏，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外，旅行者总得先准备一两本书进行知识储备，自助游系列先来一本；想多了解点历史文化完成一次深度游，也许你还会找本类似于《西藏七百年》的书。或者你对此行有更多的精神期待，你享受在星空漫天的纳木错湖畔的露营灯下，读着《西藏生死书》寻找生命的真义。

但较之西藏的古与今、景与人、峰与湖、神与俗、灵与肉，为这趟旅程你准备得再充分，也只是西藏之一粟。

相比之下，去年开始并每年都在国庆长假前夕举办的藏博会，则是一个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去全方位感受西藏的最佳渠道。藏博会的展览展示活动持续至“黄金周”结束，展示的内容像是将西藏所有令人向往的美好事物列出了“大纲”，分成文化和旅游两部分，以图片、影像、表演的形式集中在毗邻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的一片区域上进行。

“书中的西藏是别人的感受，也许你来之前已经根据大量信息为自己的行程做出决策，但去一次藏博会，新的决定将是根据来源于比书刊更进一步的直观感受而来。”去年参观过藏博会的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博导”格勒这样告诉记者，要知道，很多走马观花的所谓攻略并不能给旅者指引，若要寻访书中盛名的藏文化，需要大量时间和长途奔波。

藏博会的特殊之处在于，那些久负盛名的藏文化符号，几乎全部被囊括于此。文化板块展览展示会聚了40多个国家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4年9月25日，首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开幕，歌手索朗旺姆在文艺演出中演唱歌曲

（普布扎西摄/新华社供图）

项目、100多件珍贵文物，唐卡、书法、雕刻、织染绣品、歌舞、藏香制作、藏医藏药等，还有30多名国家级和西藏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演示。

自治区政府希望将藏博会办成和世博会一样丰富的盛会，这当然就少不了美食。在旅游板块的展览中，除了大量热门冷门的西藏各地绝美风景和风土人情、藏饰的展示，风干肉、奶渣糕、人参果糕、炸牛肉、辣牛肚、灌肠、灌肺、酥油茶和各种藏式点心，让藏博会成为舌尖上的西藏。

一些少有听闻的美食，例如昌都的红酒、日喀则的朋必，在藏博会上让更多人知晓。将“果冻”样的豌豆凉粉放在碗中，淋上新鲜研磨的辣椒汁，朋必是日喀则地区独有的特色小吃。藏族朋友为了让你记住它，喜欢开玩笑地说：“朋必”就是朋友来了，必须要吃的美味。

第二届的藏博会将如期在即将到

来的今年国庆长假前夕开幕，在吉日旅馆那面著名的留言板上，有人这样写道：国庆长假来西藏的人是幸福的，无须做任何功课，藏博会就能让你领略到你所关心的一切，几乎没有遗漏。

现代化

对于游客来说，藏博会是感受藏文化并做出下一步行程决策的绝佳去处；对于西藏来说，则是全面升级旅游产业的开始。去年初，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全力打造西藏旅游升级版，促进旅游与文化、生态融合发展。

将旅游业作为地方支柱产业的地区很多，但像西藏可以选择的余地几乎没有。“这片地域太神奇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都是那么独特，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可能阻碍了在那里通过工业化实现现

代化的过程。”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靳薇，研究民族问题理论及政策。她表示，西藏的生态环境是极其脆弱的，抗外界干扰与系统再生能力还很欠缺，一旦生态系统遭到毁坏，恢复可能要花很多年，珍贵物种可能会因此消失。“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是要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但在西藏，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不管世界是不是如同弗里德曼说的那样已经“平”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西藏肯定是不可能孤悬于喜马拉雅山脚下与世隔绝的。

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现代化研究”，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提倡多样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西藏今后的方向，是做更大的努力消除文化资本的“障碍”，实现与内地同一的“现代化”，还是重新认识这一独特资本，实现西藏特点的现代化？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中国区域旅游开发研究会会长吴必虎教授认为，旅游型城市化是西藏与现代接轨的途径，从地理学来讲，大量的财富和需求集中在东部，最美的风景和对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集中于西部，这就可以造成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自主型区域流动。

“旅游城市化在20世纪后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出现，基于后现代主义消费观和城市观的一种城市形态，是一种建立在享乐的销售和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吴必虎认为，“不要把旅游业看成是带来财富的产业，每个人要有精神上的升华和提升，旅游城市化是以旅游休闲的发展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区集聚和扩散，带来的好处是提高城市化质量。”

现在约占地方财政收入20%的旅游产业，虽已是西藏支柱产业，但还远远不够。去年西藏全年接待游客1553万人，全年旅游总收入204亿元，人均消费约1200元，这对于一个以逗

留时间较长为特点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来说，可提升的空间巨大。

空间从哪里来？升级，实现西藏特点的现代化。

人间圣地

“藏区不走城市化是不可能的，但走什么样的城市化就值得讨论了。”一辈子都在研究藏文化与人类学的格勒特别提出了人类学的一个观点：小即是美。他理想状态的西藏应该是：由很多小镇、小村组成，这里没有堵车，这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生活和旅居在这里的人们，认同本地的习俗和文化，无论肤色、无论种族，人人平等。同时这里又不是闭塞的，任何小饭店、电视、报纸和杂志，都可以在和纽约、巴黎一样，具有天下在此的国际性，如同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

在格勒看来，西藏是中国唯一具备完成这一可能的土壤基础的地区。自然、人文和虔诚的人们构成西藏最独特的基础。西藏地区缺氧，但从缺少信仰。飘扬的经幡、转动的经筒、静默的玛尼堆、庄严的寺庙，无一不在敬畏地诉说着虔诚。不分老少，不分昼夜，是一种深至骨髓的信仰。有信仰的人，活在希望之中，平和而坚定，乐观而从容。

西藏之内，雪山巍峨，离天很近，离喧嚣很远；西藏之外，有关那片土地的各种印迹在悄悄蔓延，一点点传承。宗教、饮食、音乐、影像，人们神往的是西藏的魂魄，在这个声色犬马的年代，那股自然、原始的力量直抵人心。

不管这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地球村”能否成为现实，新西藏未来的每一步都将放在显微镜下细细端详。西藏已明确将旅游业作为特色支柱产业，并把“促进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积极探索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发展的方式和方法，建立两者之间的利益联结和共享机制”，作为近年来

西藏未来发展的思路。

很多城市都提出利用本身的自然资源成为旅游城市，很多也以“世界级”为目标，西藏的优越性在哪里？如同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所说：“中国大多数资源禀赋较高的旅游资源已经开发，西藏成为极少数尚未深度开发的旅游资源富集区，有充分空间和美好前景。而西藏的无限神秘性对海内外旅游者有天然吸引力，这是西藏旅游最强劲的竞争力，也是中国旅游业为世界珍藏的最后经典。”

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马丽华谈到，西藏作为一方净土，从土壤到大气都保持着自然原本的状态。自然造化的文化积淀，以自然、气候、地域、地貌、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形成了西藏独特的民俗传统文化，成为吸引现代人回归和崇尚自然的精神之旅，这是西藏文化的多样性和唯一性。

“只有在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实现真正平衡的同时，凸显文化的深刻内涵，西藏未来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指出，“多样的环境、多元的文化、多彩的民俗，是天上西藏的魅力之源。推动西藏旅游文化大发展，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旅游个性化、体验式、多样性需求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更加需要体现文化特色、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将生态、文化与现代旅游融合，在多样化中传承传统文化，这种西藏自古就有的文化的包容性，也是西藏迷人的特质之一。

在八廓街上的玛吉阿米，一群十几分钟前彼此刚认识的年轻人正在建微信群，北京的“番茄小宝宝”是来看星星的，河南的“狼牙棒”是来看星星的，烟台的“石心夫人”是来晒太阳的，青海的“平措”是来圣城朝佛的……

一晚过后，他们将踏上各自的旅程。但他们通过微信随时发布各自的坐标，分享旅途的经历，探讨各自的信仰、对生活的憧憬和对生命的热爱。谁说这不是“地球村”的雏形？

阻击资本外流

在经济增速放缓和人民币贬值预期之下，防止资本外流成为中国经济的新挑战。

主笔 / 谢九

8月31日，央行向国内银行下发《关于加强远期售汇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称从2015年10月15日起，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缴存外汇风险准备金，准备金率暂定为20%，利率暂定为零，冻结期一年。此举意味着央行开始为阻止资本外流而出招。

远期售汇是指银行与客户签订远期售汇合同，约定将来办理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等，无论将来汇率如何变动，企业可提前锁定汇率，以此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远期售汇成为很多投资者规避人民币风险的重要市场，而大量资金进入远期售汇市场，反过来又加速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引发更多的资金外流。

在央行新规之前，办理远期售汇业务的银行需要缴纳5%的准备金，而央行将准备金大幅上调至20%，而且利率为零，意味着银行的成本将大幅上升，银行的远期售汇主要为代客交易，这就意味着银行最终会将成本转移到具体办理远期售汇业务的投资者身上，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远期售汇的套利空间，进而减缓资本外流压力。按照外汇管理局最新的数据，7月份的银行远期售汇签约1951亿元人民币，按照20%的风险准备金率计算，对应390亿元人民币，按照一年12个月平均计算，银行需要向央行缴存4680亿元人民币的无息准备金。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资

本外流压力在最近几年始终挥之不去，从2014年一季度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连续4个季度出现下降，最新公布的7月份外汇储备3.65万亿美元，距离去年6月份3.99万亿美元的峰值，已经缩水3400亿美元，一年时间缩水将近一成。今年8月份，央行意外下调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人民币贬值预期骤然上升，更加剧了资本外流的压力，虽然8月份的外汇储备数据尚未公布，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出现加速缩水的趋势。

外汇储备之所以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快速缩水，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和居民结汇意愿下降，购汇意愿上升，在美元升息，人民币贬值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居民更倾向持有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另外，从央行的角度来看，8月份虽然宣布下调人民币中间价，但本意并非要启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更多是为了一次性纠正人民币汇率偏差，以及增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但是，人民币走势显示，市场上人民币贬值的力度远远超过预期，这使得央行不得不入场干预，维护人民币汇率不至于贬值过快，这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

虽然中国央行拥有高达3.6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在一些外资机构的眼中，这并不意味着央行可以在外汇市场高枕无忧。巴克莱银行认为，在刚刚过去的8月，中国外汇储备下降了1220亿美元，而在7月降幅仅为500亿美元，如果按照目前外汇储

备下降的速度，巴克莱预计中国央行将在今年下半年流失14%的外汇储备。荷兰合作银行集团(Rabobank Group)的观点更加悲观，按照该机构的推算，要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短缺，中国央行必须有至少2.7万亿美元在手，其中1万亿美元用于支付6个月的进口贸易，还有1.7万亿美元用来还外债，而8月最后几周，中国外储可能已经减少了2000亿美元，荷兰合作银行认为，以现在的外储消耗速度，到今年12月初，中国央行将不得不停止支持人民币汇率，任由人民币贬值。

除了要考虑外汇储备的消耗速度，央行在稳定汇率的同时，还不得不面临股市的冲击。由于A股市场自8月份以来开始第二轮大跌，已经跌破了国家队入场救市的点位，因此现在的救市面临着两难，如果按照证监会日前的表态，证金公司一般不入市操作，市场信心可能会更加脆弱，但是如果以证金公司为代表的国家队继续大规模救市，实际效果可能会像第一轮救市一样并不会尽如人意，与此同时还可能会在其他领域付出代价，比如给人民币带来贬值压力。央行在今年8月份突然下调人民币中间价，起因之一就和7月份的救市存在关联，短时间超发的大量货币影响了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给人民币汇率带来贬值压力。今年7月份，国内广义货币M2比6月份跳升了1.5个百分点，7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了1.61万亿元，多出来的流动性，并非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和银行体系为救市提

供资金扶持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股市继续上演大规模救市，还会给人民币贬值继续施压，央行从而会陷入股市和汇市两线作战的困境。

除了企业和投资者在外汇市场增持美元，有迹象表明，一些相对富裕的个人也开始考虑将手中的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资产，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的资本外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的资本账户开放速度有可能会因此放缓。

今年5月初，国务院批复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其中提及“择机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所谓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业界俗称QDII2，也就是允许高净值人群（比如个人金融资产100万元以上）可以直接进行境外投资，包括股票、不动产和实业投资等等。在国务院正式批复之后，今年5月底，就一度有传言称QDII2很快就会在国内6个城市进行试点，包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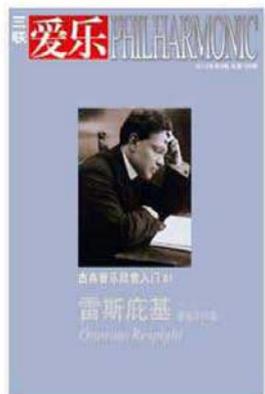
深圳和温州等，不过时至今日，并未得到官方消息证实。由于今年国内股市和汇市的剧烈波动，如果资本账户的管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放开一道口子，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国内的富裕阶层可以更为便捷地将人民币资产转移至境外，换成美国股票或者房地产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度可能会被重新考虑。作为2015年的改革重点，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原本应该在今年择机推出，不过现在距离年末已经不足4个月，是否能够如期推出可能还尚存疑问。

今年8月份，住建部、商务部、央行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境内设立的分支、代表机构（经批准从事经营房地产的企业除外）和在境内工作、学习的境外个人可以购买符合实际需要的自用、自住商品房。对于实施住房限购政策的城市，境外个人购房应当符合当地政策规定。”我国楼

市的“限外令”最早始于2006年7月，当时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对于境外个人在华购买符合实际需要的自住商品房的，规定其在中国境内学习时间必须超过一年。2010年，国家外汇局出台规定，境外人士在中国境内只能购买一套房产。此次六部委取消10年之久的楼市限外令，一方面固然也是为了扶持楼市，另外，也不排除是为了放宽外资在境内的投资渠道，减轻资本外流压力。

9月4日，美国8月份的非农数据出炉，作为美联储是否在9月份加息的重要依据，美国8月份的非农数据显得疑云重重，一方面新增就业人数明显低于预期，减弱了9月份加息的概率，但失业率却创下7年新低，为美联储加息又提供了依据。但无论如何，即使美联储在9月份没有选择加息，在年内加息也依然是大概率事件。随着美元升息逐渐逼近，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还会继续上升。■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5年第九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81

- 聚集精华，传统与现代的糅合——雷斯庇基的管弦乐作品
- 詹颖春、田彬华、贾梦梦、张泽亮对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格里高利协奏曲》和《琉特琴古风舞曲与咏叹调》的精彩解读

逝者 纪念捷克钢琴家伊万·莫拉维茨

专访 德国钢琴家巴克豪斯早期访谈

话题 谈谈“弦乐三重奏”的前世今生

早期音乐 高卢圣咏（上）

作曲家档案 卡尔·玛丽亚·韦伯

演奏家档案 记俄罗斯钢琴家彼得罗夫

作品 听埃尔加两首交响曲有感

听片购片与收藏 科晋在 Decca 最后的五首莫扎特协奏曲录音

专题 加拿大男高音乔·维克斯（上）

《爱乐》2015年订阅须知

2015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5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金立群：执掌亚投行

面对初创期的亚投行，跟长跑一样，跑得快固然可喜，更可贵的是要跑得稳。

主笔 / 魏一平 记者 / 龚融

行长

8月25日，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第六次谈判代表会议上，亚投行各意向创始成员国以共识方式推选金立群为亚投行候任行长。自去年亚投行开始筹建以来，有关金立群将出任行长的消息就一直未断，这次会议，也算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今年66岁的老将金立群正式开始执掌亚投行。

亚投行实行三级领导机制，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一般由各国财长组成，平时的主要决策由执行董事会执行，但具体运作则由行长等高管团队来管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担任国际多边金融组织的领导人，亚投行在未来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将是摆在金立群面前的头号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徐秀军告诉本刊记者，亚投行的定位属于开发性银行，但在运行上将更加商业化，重点是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传统金融机构分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两种，前者以政策扶贫等为目的，效率低、规模小，后者则更讲求投资回报，又难以兼顾公平和正义。为了弥补这中间的鸿沟，出现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银行。

以目前的三大多边金融机构为例，诞生背景不同，决定了其日后各自的运作重点和传统。世界银行以扶贫性的开发项目为主，主要由美国人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危机救助为重点，



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

当某个国家出现汇率波动过大，货币贬值过快等情况时，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贷款帮助度过金融危机，其领导人一般来自欧洲，但实际运行中也受美国的影响；亚洲开发银行则一直由日本人担任行长。三大金融组

织，欧美日各占一头，中国虽然在其中多次增资和提高投票表决权，但仍然处于被动地位。

中国需要一个新型的多边金融机构。其实，在发起设立亚投行之前，中国另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低调动作是

发起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早在2012年，财政部就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让他们组织研究人员进行金砖国家多边银行的可行性分析。今年7月22日，金砖银行在上海宣布正式开业，这也是首家总部落户上海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前期参与金砖银行可行性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徐秀军告诉本刊记者，一家多边金融机构的重要变量一般有三个：一是股权，二是行长人选，三是总部所在地。金砖银行是金砖五国共同发起的机构，五个国家商定平均分配股权，剩余两个变量，行长与总部，中国选择了总部。于是，金砖银行落户上海，首任行长由印度人卡马特担任。

而参与亚投行前期筹建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则认为，行长位置更为关键。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在最初起草亚投行筹备方案时，他们就明确提出建议，如果行长和总部两者只能选其一，那还是要争取行长人选。“总部是静态的，只能发挥一些带动作用，而人是活的，银行需要人来管理和运行，行长才是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最后不仅行长入选，亚投行还将总部设在了北京，可谓双赢。

据王军介绍，设立亚投行的念头最早萌芽于2012年12月，当时，博鳌论坛在印度孟买召开“亚洲金融合作论坛”，王军陪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理事长曾培炎去参加。一路上，大家都被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所震撼，曾培炎在论坛上呼吁各国要重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回程的飞机上，曾培炎和一同赴会的周文重、郑新立等专家就迫不及待地讨论起来，提出我们可否在亚洲建一个银行，主要帮助亚洲国家改善落后的基础设施。当时，大家甚至给未来的银行起了很多名字，“亚洲投资银行”、“亚洲实业银行”等等。回到北京，在从机场驱车回家的

路上，曾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新立口述，由王军整理成一份关于设立亚洲实业银行的内参报告给了中央。

为了在来年3月的博鳌论坛上进一步呼吁，这一年春节前后，在外交部亚洲司支持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出面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专门讨论设立亚洲新银行的可能性。王军记得，他为此专程去拜访还在担任中投公司监事长的金立群，就在金立群的办公室里，“他当时很激动地告诉我，他早就给中央建议过，在亚洲设立一



“金立群当时很激动地告诉我，他早就给中央建议过，在亚洲设立一个新银行，用以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建设。”

个新银行，用以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建设”。当时，大家围绕着搞银行还是搞基金、单边组织还是多边组织进行了多次碰撞，最终一致选择要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3年4月，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及多部门的谏言下，亚投行得到中央高层的批示，相关部委也陆续介入，事情终于上了快车道。

当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亚投行开始进入国家战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金融抓手。另一方面，亚洲基础设施这一短板需要由专门的金融机构来助力。据统计，2020年前，亚洲国家每年需要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费用多达上万亿美元，这是现有金融组织无法提供的，缺口很大。

从零开始建立一个全球多边金融组织，其挑战可想而知。“能承担这一重任的中国人并不多，从一开始，金立群就是我们建议的人选。”王军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创建期间所要面临的

复杂局面，要求亚投行的首任掌门人必须具备丰富的国际金融组织工作经验才能应对。“同龄人中，金立群是为数不多的国际金融人才和金融外交家，流利的外语和全球化视野，是无可替代的优势。”

英语

所有接受采访的人提起金立群，第一印象都是“英语好”。也正是凭借流利的英语，金立群成为中国少有的国际化金融人才。50年前，他由老家

江苏常熟独自一人来到离家乡七八十公里外的临县江阴，向南菁这所苏州地区重点中学报到，为的就是学英语。虽然在菁园的求学因“文革”中断，但金立群后来说：“我在国内和国外名校深造期间，得到过很多名教授的指点，但是，这些都不能取代当年南菁中学老师对我的指导和教诲，因为我在南菁中学受到扎实的教育，是我日后受益于国际上大师级学者的基础。”

提到金立群，我采访过的所有老师和同学最一致的评价就是英文特别突出。金立群这一过人才能的形成，与他的家庭培养和亲人的影响分不开。金立群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教师家庭，从小就对英文十分着迷。早在初中阶段，金立群在英语方面的过人天赋就已显露出来。从初中就开始阅读英文系列名著《西风丛书》的金立群，已经有了超过一般学生的英文水平。刚进入高中，金立群就以一篇“超过当年高三学生理解力的”英语作文震惊了全校。金立群的高中同学黄雄在采访中回忆，当时金立群时常会收到他阿姨寄过来的《英语周报》等杂志，

和一些英文小说，都是平常的学生不太会关注的。

在金立群看来，南菁高级中学不仅是省里18所重点中学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南菁中学有两位英语二级教师。廖慕禹老师和何吉人老师的大名，令他十分向往。他说：“那时真巴不得暑期早点结束，早早到南菁中学去上学。等待奔赴南菁的焦虑，竟然比等待录取通知书还难熬。”

冲着南菁中学两位二级英语教师而来的金立群，时刻没有忘记向这两位教师虚心请教，而这两位教师对他的成长也的确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个年代，尽管没有文理分科，但多数人还是把80%的精力用在了数理化的学习上。对于这些刚从俄语学习转到英语学习的学生们来说，“笔头英语”过得去就很知足了。“你们这些人还不如高一的金立群！”这是何吉人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尽管在英语方面有超出常人的优秀，金立群其他学科的成绩也并没有落下。他在回忆中写道：“我在文科上花的力气固然很多，但是绝对不忽视数学、物理、化学之类的课程。”在这里打下的数学基础，令其日后在经济方面的学习甚至是前往波士顿大学进行经济方面的研究都游刃有余。那时，他深刻地体会到了扎实的基础教育的重要性。

金立群除了拥有过人天赋外，还表现出了超常的勤奋。课余时间，图书馆是金立群时常出入的地方。1965年是“文革”来临的前夕，虽然气氛紧张，但进入高中学习的金立群和他们的同学却坚持着自己一颗单纯读书的心。在每日学习之余，他爱下象棋，也爱长跑。他的同班同学黄雄回忆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长王军

虽然他每次都不能拿到名次，总是掉在队尾，但一定是坚持跑完的那一个。虽然节省路费是金立群假期不回家的理由，但在学校则更能安心学习，恐怕是他内心的真实动机。他在回忆中写道：“1965年国庆来临之前，很多同学急于想回家，日益按捺不住，激动和兴奋的情绪显然占了理智的上风。这也难怪，毕竟都是初次离开父母，思家心切。为了省一笔路费，我是早就做好了不回家的打算的，所以处之泰然。”

仅仅度过一年平静充实的高一生活后，“文革”断送了金立群的大学梦。为外部环境所迫，金立群不得不离开学校，被下放到常熟开始插队，一待就是10年。这期间，他“种地、修水利、造桥、搞乡镇企业、教书”，由于上大学的资格不完全取决于学习成绩的好坏，有两次机会，都因各种原因，与

其失之交臂。第一次是1973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对他表示出了兴趣，但他被卡在了政治审查那一关。1974年，看似一切顺利，马上他将有工农兵大学生身份时，张铁生的一张白卷，使他再次与大学校园错过。金立群的大学梦，在那个特殊年代，始终难圆。

中学时代打下的坚实知识基础和十年知青生涯中形成的系统知识积累，成为他最终叩开北外研究生大门的内因。1978年，当没有读过大学的金立群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文学的研究生并师从名师王佐良、许国璋时，熟知他的同学、老师都不感到意外。因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句话在金立群的身上得到了应验。

研究生学习期间，得到王佐良、许国璋等大师的指点，金立群的知识变得更为系统和扎实。他的同班同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润清回忆，班上十来个人中，金立群是年纪最小的男生，他脑子转得很快，嘴皮子很灵，学习努力，爱发言，与其他同学一起讨论问题时，很自信。临近毕业的时候，许国璋力荐这位得意门生进入急需外语人才的财政部，他说：“我们中国有100个英国文学专家差不多也够了，但是缺少财经专家。我相信你是能做好的。”本有些犹豫的金立群，最终选择了财政部。

世行岁月

翻看金立群的履历，世界银行是一条绕不过去的主线，其国际化背景贯穿始终。从一踏进财政部大院开始，

他就被派去美国参加有关世界银行工作的培训，回国后又一直在外事财务司工作，负责与世界银行的援华项目打交道。1989年金立群开始担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的副司长。

上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有过一段蜜月期。长期在世界银行任职并担任过世行中国局局长的杜大伟 (David Dollar)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1980年秋天，世行第一次派遣团队来到中国，他们发现了当时中国计划经济中的一些严重缺陷。第二年，一份名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报告被提交到了世行的董事会。当年6月，世行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被批准开展。这份报告史无前例地在中国政府的官员中广泛传播，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一项突破性举措。报告涵盖了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也包括中国为何在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处于落后状态。

1984年，在重庆开往武汉的船上，由世界银行召集的会议中，中国的一些高层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向7位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取经，学习现代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之后的1985年，第二份报告上交至世行董事会，主要内容是中国在2000年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3倍的可行性分析。自1985年后，针对中国经济状况，世行每年会发出一份报告，分析当年的经济发展以及来年的趋势。

同时，世界银行也开始向中国提供实实在在的项目援助。第一个提交到世行董事会的中国项目是与高等教育有关，名为“大学发展”，为26所大学提供设备和材料升级所需要的资金以及资助一群学者前往国外学习。第二个项目名叫“中国北方平原农业”，一年之后获得通过。旨在为土地流失的地区提供资金，以改进灌溉和管道设施，提高农业生产。第三个项目是1982年的“三大港口”，上海黄埔港、

天津和广州港口。这三个项目按照计划执行并达成了初定目标。

杜大伟向本刊记者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工作重点是更传统的基础设施，如公路、电站。在农村地区也有一些成功的项目，其中包括一些最贫穷的地区，建立灌溉和交通设施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自



“世界银行很愿意跟中国合作，因为中国的项目资金使用是最严格的，这也是金立群先生从一开始就奠定的基础。”

1993年起至90年代末，中国一直是世行的最大的借款者。

这期间，从1994到2003年，金立群分别担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和分管对外交流的副部长。直到现在，一谈起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中国政府对其贷款资金监管的超常严格。“世界银行很愿意跟中国合作，因为中国的项目资金使用是最严格的，这也是金立群先生从一开始就奠定的基础。”

2003年，担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金立群竞选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成功，而且是排名最靠前的常务副行长。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担任亚开行的副行长，金立群要协调域内几十个国家的贷款项目，这段一线的工作经历为其日后执掌亚投行积累了宝贵经验。在王军的印象里，金立群为人直爽、真诚，理论功底深厚，还善于讲故事，常常是能够举一个轻松的例子就能把大道理讲清楚。金立群曾讲起他亲自飞到柬埔寨跟首相洪森协商解决贷款问题的经历。他说，当初洪森首相并不打算见他，但会谈中，他并没有一上来就指责，而是本着坦率、真诚的态度去分析问题，从而赢得了洪森的尊重，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

杜大伟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在担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的时候，对时

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金立群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世界银行的研究成果特别感兴趣”。当时中方和世行有意将世行一些关于中国的研究集结出版，也包括杜大伟自己的研究在内，该书的合著者就是金立群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金立群是一个喜欢读书和钻研问题的人。”

国际金融机构一线工作给金立群带来的，除了经验，还有深切的体会和观察。世界银行僵化的体制被人诟病已久，按照规则设计，重大事项需要超过85%的投票赞成才能通过，但美国一个国家就拥有16%的投票权，也就是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因此，喊了多年的世行改革，到现在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因就是改革方案在美国国会迟迟得不到通过。而在亚开行做副行长期间，金立群也对其运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深有体会。“他有时候也向我们感慨，一个项目从申请到批准通常将近两年，效率太低了。”王军回忆，“另外，很多亚洲国家腐败严重，项目监督跟不上，造成亚开行的运行效率降低，实际支援效果有限。”

自从肩负起筹备亚投行的任务开始，金立群就在每一个公开场合表达中国的开放心态。若严格按照GDP比例来计算，中国将拥有更大的投票权，但中国并不谋求一票否决权，目前拥有的26%的投票权很有可能随着将来新国家的加入而相应减少。对于66岁的金立群来说，终于在晚年迎来了一次真正执掌一家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机会，如何平衡各个大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如何保证亚投行的高效运行与共赢局面，都是摆在他眼前的挑战。■



8月4日，诺贝尔奖获得者曼斯菲尔德爵士与中国的高考状元们一起讨论学习方法问题

大数据时代，学习之变

大数据与互联网思维将会为传统教育和学习带来什么变化？这个问题，正在破解之中。

主笔 / 魏一平

状元笔记

今年6月高考的时候，有近百位各地全国特级教师、教研员来到北京，他们要跟900多万考生一起参加高考，不仅仅要答题，还要为答案制定出评分标准。这是百度文库和觅题团队策划的一个活动，目的只有一个，让刚刚走出考场的考生们能够快速估分。

估分，看上去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实用处的功能，可是在高考三天期间内，这个估分系统的在线使用人数一直保持在百万以上，最高的时候竟然达到了800万流量的峰值。怕考生知道自己没考好，影响下一科成绩的发挥，很多老师会反对考生去估分，但即便如此，在北京仍然有接近一半的同学上百度估分。来自山东的理科

状元贾晶考了726分，她告诉记者，当初考完之后的估分与这个只相差了不到10分。

其实，除了对一部分考生需要在考试结束之后、分数公布之前填报志愿外，估分的意义更大程度上是在于满足人的一种好奇心。这只是一次小小的体验式营销，这背后的真正野心在于用大数据的方式来打通教育资源

的不平衡。

去年高考结束后，百度文库与各省的状元商定，把他们的笔记放到文库上，免费分享给师弟师妹们。最初，大家对状元笔记并没有抱太高期待，一直到拿到笔记那一刻，心里不免暗自惊叹起来。“每一个人的笔记都至少有四五本，很多人用五颜六色的笔分类标注，状元们的笔记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记录了他们各自的一套学习方法。”百度文库负责人李小婉回忆。状元笔记成为学生们备考期间最抢手的学习资料，总下载量已经超过百万次。

也是这一次笔记分享，让李小婉他们更加深刻意识到了传统教育的门槛。“很多高水平的老师，能意识到今年要考的重点、怎么考，但他并不能清晰地表达出来，也说不出为什么。这就是经验问题，传统应试教育中，老师的经验成为一种无形的实力，从而出现了很多超级中学。”李小婉解释说。但是，这种隐性的知识可以用显性的数据来表达。全国有1500万教师，其中800余万是百度文库用户，有2万余所学校的近8万老师已经取得了文库的实名资格认证。此外，文库上每天有5000万用户，产生1亿的浏览量，每天有20万用户上传文档，现在文库已经储备了1.3亿个文档。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种显性的数据关系。依照在海量数据基础上的计算，文库能够清晰地掌握，一个知识点在哪些地区更受关注，以及它再次出现在高考中的概率有多高。

大数据是一切的基础，反过来，每一个用户又成为大数据的贡献者之一。觅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一款针对高考必考点的APP，既然文库集合了海量的练习题和考试题，那为什么不干脆开发一个可供学生们主动学习的试题平台呢。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如何辨析易错考点以及寻找更有效的学习方法，成为他们的第一需求。“虽然考试这种方式有很多弊端，但只

有用更高效的方式确保理想考分之余，中学生才能解放出时间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李小婉解释道。为此，觅题从全国聘请了一支庞大的教研团队，解决了线下辅导价格较高及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等问题。今年4月上线后，觅题以考点推荐和热点预测为方向，迅速成为考生备考的“利器”。



状元笔记看上去五花八门，但若透过表面看实质，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方式。

与此同时，代表着高中学习巅峰水平的高考状元笔记，成为大数据链条上的一个亮点。去年，仅仅是将状元笔记扫描上传，就影响了上百万高中生，今年，文库的工作人员想再进一步，在原版笔记基础上，将各个知识点加以再整理，期望能够呈现出状元们的学习方法和思考路径。来自吉林的文科状元张哲向记者感慨，状元笔记看上去五花八门，但若透过表面看实质，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方式，“找对了适合自己的方法，就会事半功倍”。

而如何通过分析海量的数据来寻找一套更为高效的学习道路，则是互联网时期传统应试教育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学习的革命

十几年前，一本《学习的革命》曾经风靡中国，一时间兴起了五花八门的速成班和脑图训练班，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任何知识的学习都有其规律，没有捷径可言。去年的陕西省理科状元李强已经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读了一年书，他向本刊记者感慨，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学习方式跟之前最大的不同是减少了对知识的重复性学习。“知识需要不断重复，再重复，不

一定所有学习都是为了马上创新，但把知识融会贯通，将来才有后劲。”

8月初，百度文库组织今年的10名高考状元去英国访学，状元们先后拜访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聆听了不同领域的讲座，从飞机发动机到人工智能，从计算机视觉到宗教改革。但最有收获的一次碰面，要算在

诺丁汉大学拜访诺贝尔奖获得者曼斯菲尔德，他们面对面讨论了学习的方法问题。

花白头发，粉色衬衫，灰色开衫毛衣，搭配上一条印有诺丁汉大学校徽的深色领带，已经82岁的皮特·曼斯菲尔德爵士(Sir Peter Mansfield)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很容易让人忘了他的年龄。他是2003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他是诺丁汉大学的镇校之宝，他是临床医学核磁共振成像(MRI)技术的发明者。

能够见到曼斯菲尔德爵士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个月前，组织方就此向诺丁汉大学提出建议，在当地孔子学院的协调下，由诺丁汉大学校长亲自出面邀请曼斯菲尔德爵士，才终于促成此次状元与大师的会面。就连在诺丁汉大学就读的医学博士后邢悦都激动地告诉记者，她来诺丁汉几年时间都只是从照片上见过爵士，今天才终于一睹真容。

如何能够更精准地探知人体组织内部的结构，一直以来都是医学界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此之前，从X射线到B超，再到后来的CT技术，这一目标在不断接近，但各有局限，距离临床医学的追求仍有很远的距离。其实，磁共振现象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被证明了。1952年，两位美国科学家还因

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候，曼斯菲尔德刚刚结束了在一家打印店的工作，重返校园。他1933年出生在伦敦，15岁那年就辍学工作了。此后，他考上了伦敦玛丽女王学院攻读物理学。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磁共振现象都被用于石油探测领域，据曼斯菲尔德回忆，那时候他的志趣是研究火箭的抛光技术。

转折点出现在1973年，长期对观察固体剖面影像有兴趣的曼斯菲尔德，将观察对象转向了动物。他们在很多小动物身上做实验，以至于后来领取诺贝尔奖之后，曼斯菲尔德开玩笑说：“要是放到现在，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我们。”他花了很长时间去说服医疗器械厂商制造设备，但绝大多数都是拒绝。直到上世纪80年代，第一台临床应用的磁共振成像仪才正式诞生。

状元们听得津津有味，颇具专业性的技术疑间接踵而至。“磁场对金属过敏，那体内有金属移植的病人怎么办？”“理论上说是不是只要提高磁场强度和扫描时间，就会提高影像的清晰度？”……每次问题提出，曼斯菲尔德爵士都要吃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回答。

直到今天，在隔壁实验室的黑板



“大家可能感觉要获得诺贝尔奖，必须要天天创新，但是创新不是凭空而生的，是日复一日的实验和思考得来的。”

上，贴着两张A4纸打印的黑白老照片。那是上世纪70年代，曼斯菲尔德爵士带领他的研究团队试验第一台磁共振成像仪时拍摄的。由于当时谁也不知道这种成像技术对身体的伤害性，曼斯菲尔德成为第一个躺进仪器做实验的人。照片上，年轻的博士生们留着长发，戴着方框眼镜，像是披头士乐队的唱片封面。“为什么您能在这一领域保持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呢？”曼



今年高考期间，百度文库组织特级教师进行同步答题

斯菲尔德爵士的回答简单有力：“那是我的工作，思考一件事情可以带给我乐趣和动力。”

快结束时，我向曼斯菲尔德爵士提了一个我最关心的问题：“英国的教育更重个性培养，没有冠亚军，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呢？”爵士停住脚步，很认真地说：“我喜欢聪明的，当然更得努力。”走了两步，他又转过头强调了几遍：“Harder！Harder！”

Harder！”边说边用手做出狠狠抽鞭子的动作，嘴角露出了一丝调皮的笑。他的助手在一旁帮忙解释道：“大家可能感觉要获得诺贝尔奖，必须要天天创新，但是创新不是凭空而生的，是日复一日的实验和思考得来的。”

在拜访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中心的时候，我们与去年刚刚接任中心主任的梅建军教授也讨论了这个问题。1937年，已经37岁的李约瑟开始学习

中文，他对中国的科技演变史产生了浓厚兴趣。1948年，他计划写一本有关中国科技史的书，后来这部书不断增加篇幅，直到他95岁去世那年也没有完成。现在，按照李约瑟当初所列出的提纲，还有三卷尚待编纂。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聚集到剑桥大学这座木质结构的小楼里做研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当年李约瑟的心愿。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无用的研究，但历史研究的价值往往不是即时显现的。”梅建军教授经常面临质疑，但他强调，学习与学术并不是一回事。“高考状元是这些年轻人在基础知识学习阶段所取得的成绩，现在要读大学了，除了继续学习基础知识，还要开始接触最前沿的知识，将来读博士做研究，想的是怎么在既有知识基础上去做知识的创新和生产。”梅建军教授解释道，“从这个意义上讲，状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翻转课堂

在英国访学期间，正值“中国老师与英国学生课堂冲突”事件持续发

醉，BBC请了五位中国老师去英国给学生们上课，结果因为教育方式和理念的差异，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刨除电视媒体在选取素材方面对冲突的有意放大，这背后的中西教育理念分歧，却是不可否认的。在诺丁汉大学交流的时候，英国学生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有“状元”这个群体，翻译只好解释成是“考试中的冠军”。但是，在欧美教育体系里，学习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并无第一第二之别。申请剑桥、牛津这样的顶级大学，也只是需要在优异的基础知识考核之上，再通过面试进行一系列综合筛选。

但是，随着互联网在教育中的深度应用，这种传统的“大锅饭式”的应试教育正在发生改变。上海第十中学的计算机老师王文辉对此感受颇深，他向本刊记者解释，传统的教育方式，对教材中很多内容没法展示，借助互联网手段，老师在课堂上开始大量使用微视频、微试验等手段，让学生更立体地接受知识。但这还只是互联网应用在教育上的第一阶段，只是工具性应用的层面。

第二阶段，也即大数据时代，新的教育发展方向是个性化学习。王文辉解释说，互联网将学生和老师放到了一个起跑线上，之前的信息鸿沟被大大拉近，通过网络分享式学习平台，学生可以接触到的教育资源与老师是对等的。教育中一直倡导的“因材施教”也终于具备了实现的可能，学生可以通过网上学习，基于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在网络上留下自己的学习痕迹，在抓取这些大数据并作进一步计算之后，网络就可以自动判断出学生的学习偏好，从而有针对性地分配相应内容和学习方式。

最新的流行趋势是一种被称作“翻转课堂”的学习方法。以往，老师上课的时候主要是传授知识，为了保证效率，通常把全体学生都默认为是“沉思型学习者”，等老师讲完之后，再交

给学生讨论和练习。但在教学中，王文辉逐渐发现，尤其对那些男生比较集中的实验班来说，更受欢迎的是一开始就抛出一个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因为他们大多属于“活跃型学习者”。现在，有了“翻转课堂”，实际上就是让学生把学习过程转移到课下，通过网络平台去完成，然后网络会把大数据分析后的每个学生的特点反馈给老师，老师在课堂上则进行针对性的分组练习和作业。将学习放在家里，将做作业放到课堂上，学习过程实现了一种“翻转”，但个性化、自适应的学习却得以展开。

互联网一方面缩小了教育资源的不平衡，通过教育资料的分享，让偏远地区的学生也有机会接触更丰富的学习资料，但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的教育，地区之间的差异反而在进一步拉大。王文辉去年跟随华东师大的一个项目组去宁夏推广互联网教学，结果发现很多地区硬件设施落后，有电脑，但是因为宽带速度太慢，几乎没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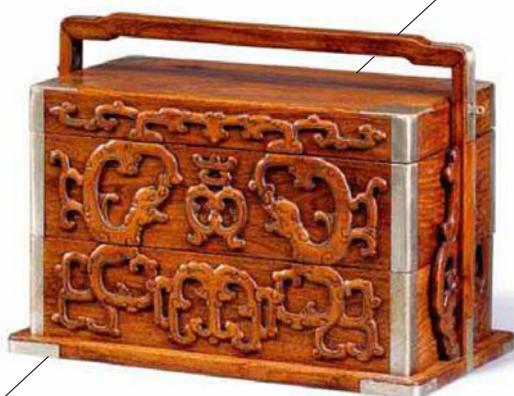
一项针对去年高考状元做的调查

显示，只有极少的状元是农村的孩子，其余全部是城市户籍，“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已经成为常态。从这次同去英国交流的10位状元也能管窥一二，他们有一大部分来自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不仅学习优异，也各有所长，钢琴、绘画、书法都玩得有模有样。他们大都出生于1997年左右，是标准的互联网原住民，从上小学开始就接触网络，到现在已经明确培养出各自的兴趣与方向。比如，来自新疆的理科状元多力岗就是个疯狂的汽车迷，他报考了清华大学的汽车工程系，希望将来能去德国深造。在剑桥大学听一位工程系博士后讲解飞机发动机时，他们进行了相当精深的专业对话，多力岗笑言，自己的汽车知识都是从网络上自学的。

在王文辉老师看来，互联网就像一面镜子，最大的功能就是照耀出每个学生的个性与模样，不仅让老师可以“因材施教”，还可以让学生发现自我，大胆去追求自己的所爱。依托日益发达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未来的学习，才有可能成为真正属于自我的学习。✎



长沙长郡双语中学初一翻转课堂试点班的学生通过平板电脑观看老师授课视频并答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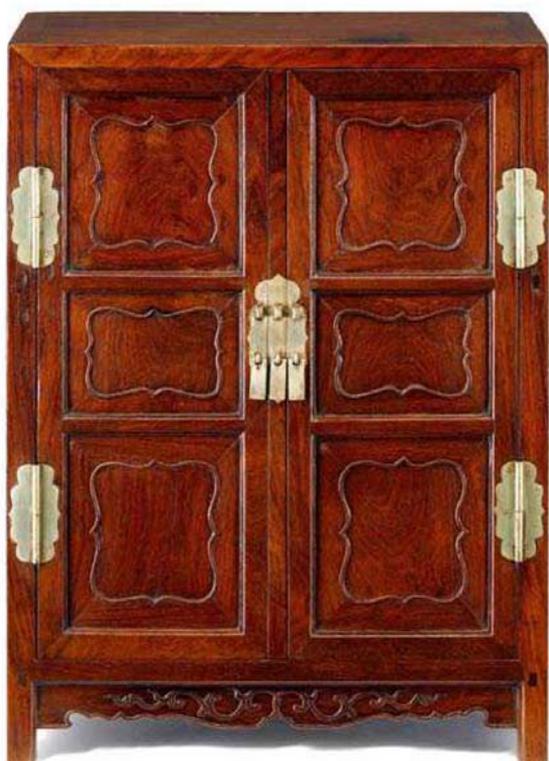
晚明或清早期 黄花梨镶嵌黄杨木龙纹提盒



晚明 黄花梨折叠式炕案



晚明 黄花梨镶大理石案屏



晚明 黄花梨四足瘦木面带托泥长方香几

晚明 黄花梨方角炕柜（成对）

叶承耀与黄花梨家具

“科学和艺术在理论上是不同，但是在更高的思想境界中它们是相互包容的。科学对艺术有影响，同样艺术对科学也有影响，这一点可以在我日常的出诊中体现。”

记者 / 李晶晶

家具百年

家具的收藏和买卖跟其他古董截然不同，家具具有陈设使用的功能，因此一直以来流通缓慢，一些经典的家具更是递传有序。近百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其收藏家与古董商的脉络也是清晰可知。上世纪初，不少来华的外籍官员、商人、学者在接触明式家具后，被其简洁、练达的线条，温润的色泽，天然成纹的图案所吸引，开始大量购买，成为家居生活的一部分。有关家具的研究也是始于这个时期西方学者的家庭购买。

1934年，格蕾丝·斯滕（Grace Steen）女士与洛杉矶博物馆装饰艺术品部主任格雷戈尔·诺曼-威尔考克斯（Gregor Norrnan-Wilcox）结成连理，斯滕女士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并赴中国购买古董文物。她对明式家具的钟情影响了丈夫，致使诺曼-威尔考克斯1942年在馆内举办了突破性的明式家具展览。这是有史以来明式家具首次以艺术品的角色出现于博物馆。

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Gustov Ecke, 1896 ~ 1971）与中国的渊源颇深，先后在福建厦门大学、北京辅仁大学任教26年。艾克研究中国艺术、哲学、历史以及建筑，尤其专注硬木家具。1944年出版了《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这是第一部关于明式家具的专著，将家具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介绍给全世界。艾克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家具艺术在国际上的地位。书中含

多幅精确测量数据的剖面图，以及榫卯结构图，虽然尚未形成系统与定名，但其严谨的科学式勘察方法，指导了后来者研究工作的方向。

美国人乔治·凯茨（1895 ~ 1990, George N. Kates）则将明式家具推介给更多人认识与欣赏。凯茨是语言学家，年少已通英、法、德、西班牙语，不仅中文流利，还可书写汉字。在他居住北京的7年里（1933 ~ 1941），建立了十分可观的明式家具收藏。1937年冬，凯茨的姐妹比阿特丽斯·凯茨（Beatrice Kates）女士与她的英籍朋友卡罗琳·比伯（Caroline F. Bieber）女士从众多居住于北京的外籍朋友家中挑选了她们喜欢的112件明式家具，进行测量并拍照。初衷只是想留为纪念，后来萌生了出版一本手册的想法。10年后，当凯茨回美国出任布鲁克林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时，促成了《中国家居家具》的出版。1946年，凯茨在博物馆举办了一场规模可观的明式家具展览，共展出家具35件，之后部分展品分别入藏费城艺术博物馆及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此时在北京协和医院任建筑师的杨耀（1902 ~ 1978），当上艾克的助手，并跟随其研究明式家具。1947年，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青铜器鉴赏家陈梦家先生（1911 ~ 1966）从美国回清华大学授课，开始到城里的古旧家具店寻觅称心的家具，他在1948年写给远在国外他乡的妻子赵萝蕤的家书中，记录了购买明代小方桌、黄花梨

八仙桌、黄花梨橱柜等家具的情形。

着唐装、住四合院、讲中国话的罗伯特·德拉蒙德与威廉·德拉蒙德兄弟（Robert & William Drummond）从美国伊利诺伊州来到北京，经商是目标之一。他们四处搜罗明式家具，活跃于明式家具的买卖中。艾克有不少家具就购自德拉蒙德兄弟。其《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更说明：“书中家具以及不少京城（外籍人）家居所藏的家具，都得力于德拉蒙德兄弟。”1946年，威廉借了30多件家具给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做“中国17至18世纪家具”专题展览。德拉蒙德兄弟也把家具销往国外。他们的商业活动，让明式家具得以在富商巨贾、博物馆界以及居住北京的外籍人士之间流通。1949年，威廉回到美国继续经营明式家具，当上美国极负盛名的艺术品收藏家阿瑟·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的收藏顾问。赛克勒购入多批黄花梨家具，部分现存放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院·赛克勒美术馆，部分为赛克勒后人拥有。

1949年，艾克博士携夫人曾佑和（又名幼荷，1925 ~ ）赴夏威夷出任檀香山艺术学院中国美术馆馆长，带动了当地收藏中国艺术品，特别是明式家具的风潮，让檀香山馆藏加上当地私人收藏在1952年时已足够在馆中举办展览。室内设计师罗伯特·安斯泰斯（Robert Ansteth）自1950至1970年间经香港购入硬木家具，不仅供应当地收藏团体，更迎来了美国多

家博物馆馆员以及业界行家来檀香山选购明式家具。中国明式家具艺术就这样循着檀香山向美国本土传播。

明式家具不单只出现在美国。英国外交官约翰·阿迪斯爵士(Sir John Addis, 1914 ~ 1983)也把他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包括黄花梨家具借展或捐赠给英国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1949年中国政治巨变,外国使节及旅居中国之外籍人士纷纷撤离北京。伴随他们出国的明式家具,之后也有不少出现于欧洲各国博物馆中,例如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斯图加特林登博物馆,以及哥本哈根丹麦艺术及设计博物馆等。全球不少博物馆展示明式家具,更有学者与收藏家的专著相继问世,这就引导、启发了更多的人将中国明式家具视为艺术收藏品。

纽约著名亚洲文物古董商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 1929 ~ 2014)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营明式家具,1971年的著作《中国

家具:明至清前期硬木例子》在当时被认为是突破性的出版。同时期,相对于西方对中国明式家具艺术的肯定,中国人本身还未意识到其重要性,导致研究、收藏明式家具的人数寥寥可数。香港地区的家具古董商黑洪禄与陈胜记是为行业的前辈。

至80年代中期,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与《明式家具研究》面世,开启了中国的家具收藏热潮并延续至今。香港亦在这股浪潮中,成为中国家具的全球集散地,叶承耀医生的明式家具收藏得益于这个时期。

叶医生

1996年9月19日,纽约佳士得拍卖了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的107件中国明清家具,全部拍品悉数成交。其中一件17世纪的黄花梨镶大理石插屏式座屏风,以110.25万美元成交,中国家具首次冲破百万美元大关,创造了当时国际拍卖市场上少有的奇迹,这次拍卖让中国家具成为

关注的焦点。

7年后,2003年9月,纽约佳士得再次举行了一场明式家具专场拍卖,68件拍品成交40件,全部藏品均来自香港收藏家叶承耀的珍藏。拍卖成交总额约为2262万港元,其中成交额最高的三件家具分别以200多万港元拍出,包括明黄花梨三屏风独板龙纹围子罗汉床、明黄花梨灵芝纹衣架和明黄花梨两卷角牙琴桌。这一场拍卖让业内知名的叶承耀一时成为公众人物。

叶承耀祖籍福建,他的名字按辈分来自祖先叶光大所写的一副对联中的一句:“光明正大承家法。”爷爷是上世纪初最早来香港的一批移民,后来成为一个殷实商人,曾经拥有九龙弥敦道几乎整条街的房子,但家道逐渐中落,叶承耀记得到50年代末他第一个儿子出生时,正赶上家族分家产,每人只分得几万港元。叶承耀后来通过优良的教育和后天努力在社会地位上晋阶,在香港大学念到三年级时,考入伦敦大学医学院,在伦敦和美国行医几年后,又去哈佛念到医学



晚明至清前期 黄花梨独板围子罗汉床、黄花梨玫瑰椅和黄花梨升降式灯台(各一对)

博士。

1965年，32岁的叶承耀回到香港开了私人诊所。几年后，手中有闲钱，他就跟着两个叔父玩收藏。他的五叔父收藏古玉，七叔父收藏瓷器。1971年五叔父过世时，把收藏的古玉和书斋号“攻玉山房”一并传给了他，这个斋号是由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尹秉绶题写的，叶承耀最为钟爱。不久后，叶承耀凭借古玉收藏成为“敏求精舍”的会员。

早年的瓷器与玉器收藏经历也让叶承耀对于收藏家的标准有了更深的认识，只收藏真品和精品、不要残品的标准始终贯穿在他的家具收藏中。“我收藏的一个出发点，是尽量全。整个明朝系列桌椅床凳都收藏齐了，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收藏家。不过我觉得我收藏书画、瓷器不够精，故转而收藏明式家具。”

1985年，叶承耀看到香港三联书店发行的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立刻对这类收藏感兴趣，并且迅速地从无到有。叶承耀说：“20世纪50年代，我在伦敦学医时，那些古董店中的老家具才真正唤起了我对古旧家具的兴趣；到了60年代，我成了美国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一名实习医生，在曼城附近查尔街著名的古旧家具店我又能打交道了。”回忆起在英美留学的日子时，叶承耀说自己当时就已经开始对家具产生了兴趣。

上世纪80年代是家具收藏的黄金年代，这个时间大约维持了10年。到90年代价格上去了，家具的数量在下降，收藏家越来越多。当时香港就是一个集散地，内地的东西到了这里，收拾、加工、整理好了被老外买走，传到美国，后来很多好的家具都是美国拍卖出来的。现在所能看到的有规模的收藏，像香港特区的两依藏、美国收藏家约翰森（Johansen），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刚刚改革开放时，很多东西从内地过来，香港那会儿买的

人少、货多，是收藏家的天堂。那时候内地有专门的人找好家具运到香港。货到的时候都是散的，比如一个椅子全部拆开，每个部件用草包着，拉过来给行家们看。80年一个圈椅只要几千块钱，相对现在来说，很便宜。一开放的时候，市场承受的能力不是很强，所以能有大量的家具让藏家挑。

叶承耀的藏品有九成购自香港嘉木堂的伍嘉恩，伍嘉恩也帮助叶承



谈入藏要诀，叶医生娓娓道来：“挑选藏品80%源于家具是经典款式加品相好，20%则要有个别特色。”

耀从1991年起先后三次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明式家具专题展览，在新加坡、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等地的艺术博物馆举办20多场叶氏展览，对传播明式家具收藏风气影响至深。1987年，伍嘉恩买进了一件黄花梨衣架，三年后出让给叶承耀。2003年，叶承耀调整藏品，将部分明式家具在纽约佳士得上拍，黄花梨衣架又被伍嘉恩成功竞得。但叶承耀对此念念不忘，于是又从嘉木堂购回。一买一卖，一卖一买，再卖再买，竟然是同样两个人的来回交易。

叶承耀的另外一个收藏途径，则得益于他在世界各地的游历。叶承耀很喜欢的一件紫檀雕花炕桌是从美国新墨西哥州购得的。他说：“原来的主人上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中国居住，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带回来的几件家具拿出来，在当地拍卖，价格不高，我看上是觉得小桌子制作得十分精良，后来才知道这个炕桌是一对，另一只在故宫。”

还有一次，叶承耀在美国联系展览事宜，去了西雅图，西雅图博物馆的女馆长刚从耶鲁大学过来上任。“我去之前，刚有一位先生去联系做一个小的文物展，是关于文房书斋用品的，

收藏家许诺，如果展览做成了，就一张明式琴凳送给博物馆做收藏。后来博物馆还是决定不做那个展览，做瓷器，把凳子还给了他。那个收藏家就很生气，我从他手里买下了那张琴凳，扛回香港。”

作为香港知名皮肤专科医生，医学训练让叶承耀看事物比别人更重视细节。他有一套独特的审美观：“不单经典，还要有特点，最重要是品相完

美。”谈入藏要诀，叶医生娓娓道来：“挑选藏品80%源于家具是经典款式加品相好，20%则要有个别特色。像这典型的平头案腿足内缩安装带侧脚，设计源自古代中国建筑大木梁的造型与结构，但例带凤纹牙头，有别于一般设计。”

今年秋季，香港苏富比获得叶承耀医生的委托，拍卖其38件藏品，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表示：“此38件套藏品，结合了人与物的升华，是世界最高级别的明式家具范例，其中更不乏孤品。唯其最珍贵之处，乃是它们见证了叶医生过去近30年收藏明式家具的独到眼光、文人修养和热情，使每件藏品更添意义。苏富比必须感谢叶医生割爱，让全球更多知音人有机会分享所藏，让中国家具艺术精粹得以传承。”

在叶承耀看来，由于对艺术的理解和研究，自己能把握尺度和分寸。艺术之美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使人更好地理解人生哲学，甚至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由于在海外度过了12年时间，到香港后我渴望了解古老中国的历史和文明，这也是我从事艺术收藏的动机之一，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我天生的占有欲吧。”叶承耀说。■

航空市场向“低成本”转向？

在8月25日最新发布的中国市场展望中，波音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6330架新飞机，其中，单通道客机的需求会持续攀升，至2034年将需要4630架。尽管目前中国境内的低成本航空公司(LCC)只占机队总数的5%到8%，但波音仍然认为，低成本航空公司将会是这个部分主要的推动力量。

主笔 / 李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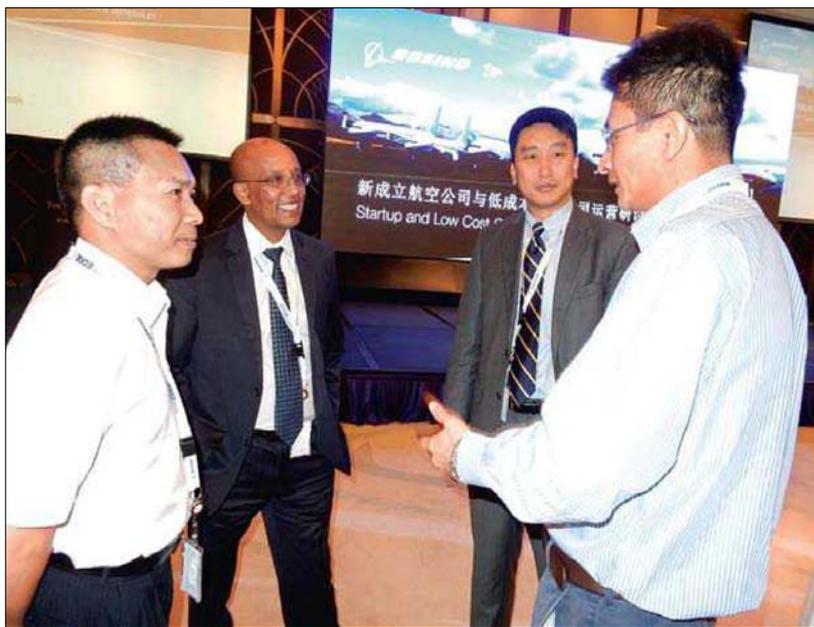
波音民用航空服务东北亚地区销售总经理安博西·伊特巴雷克(Anbessie Yitbarek)表示：“以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相关地区的经验，低成本航空公司将会带来巨大的中产阶级移动性的增长，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对当地的经济也会带来滚雪球的效应。”

波音最近正在将注意力集中在区域性的航空公司上。与其说波音公司的市场转向带有某种战略性，不如说是市场的反馈在先：一些区域型航空公司的扩张计划比以往更为激进大胆，基地位于广州的九元航空有限公司与波音一次就签下50架737系列飞机订单；而去年刚刚运营的云南瑞丽航空也在6月的巴黎航展上签订了30架737MAX的承诺订单。

伊特巴雷克告诉记者，他曾经接触的一些中国低成本航空公司，听到的业绩令人难以置信：“在投入运营一年之内，他们的飞机利用率高达每天11个小时，上客率甚至是95%以上，这是极高的，甚至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是其他国家的低成本航空公司无法比拟的。”伊特巴雷克说他之前在非洲管理一个航空公司时，第一季的利用率只有30%，对于已经正式投入运行的航班，哪怕只有1%的利用率，也得飞，因为那就是计划的航班。“一年运营就达到95%，这种利用率是前所未有的，这显示出中国的市场之巨大，发展的潜力之巨大。”

三联生活周刊：波音为什么对中国低成本航空市场情有独钟？

伊特巴雷克：在全球其他地区，



伊特巴雷克总经理(左二)与同行在交谈中

低成本航空公司已经有差不多2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相对来说市场也比较成熟，低成本航空公司占有的市场份额高达30%到35%。中国在未来，我们预期在20年之内也将会发展到同等水平。所以我们认为，20年之后，中国机队的总规模将达到7000架，如果按30%算，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机队就会有2000多架飞机，也就意味着这部分市场会在接下来的20年里翻10倍。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在成立之初规模都很小，无法获得规模效益，这在民航市场是不是一个独特现象？

伊特巴雷克：中国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和世界其他地区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发展特点非常近似，比如说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只有3

架飞机，而且只在德州境内运行，现在他们的机队规模已经有600架了。我们认为在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最开始可能只有三五架飞机，但他们的发展潜力巨大，而且也会发展得非常迅速。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你的预测，中国低价航空公司会不会出现新一轮业务的整合？

伊特巴雷克：我觉得中国市场的低成本航空公司面临整合为时尚早，因为大部分都刚刚开始，这个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现在这些低成本航空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先要确定自己独特的市场定位，之后才是寻找发展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把低成本航空公司当成未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波音公司如何吸引客户？

伊特巴雷克：我们为低成本航空

公司提供专门的“服务包”，这些服务包在中国推出两年多来非常成功，包括为区域航空公司制定特定的服务内容和规划方案，帮助航空公司实现目标。比如为一个新启动的航空公司进行早期的规划，包括机队构建、航线规划，租赁及购买飞机，甚至包括机队构成的融资内容等，我们都会提供特定服务。

说到机型，我觉得波音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运营的成本对低成本航空公司来讲是非常重要的，737的机型就是一个集合了这些优点的典型机型。比如737 MAX和737 MAX 200，我们为这两个机型还有并行的融资运行支持，这个安排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飞机运营的经济性优势也非常明显，航程、载客数量、燃油成本以及航线长短，这个产品会给这些低成本航空公司带来极佳的经济效益。

三联生活周刊：在与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接触中，你了解到他们在运营中遇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有哪些？

伊特巴雷克：低成本航空公司和任何新成立的航空公司都会面临非常近似的挑战，尤其是在最初的两三年，他们必须要集中所有的资源才能够确保正常的运行，不管他们最初的机队是100架还是5架，他们的要求可能也不一样，但大体的情况都是非常类似的。有的时候可能没有足够的飞行员，波音就会先派自己的飞行员帮助解决相关问题。有的在航材上遇到挑战，我们就会通过当地公司和他们一起制定解决方案。有的航空公司可能需要一些额外培训，我们都提供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低成本航空的核心就是要降低成本，波音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伊特巴雷克：成本问题，是所有的航空公司都会面临的挑战。比如空域，资源紧缺会影响所有的航空公司。我们注意到，尤其是空域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非常主动的态度来解决，我们也与中国的有关部门进行紧密合作，寻求更好的应对方案。我们看到，

政府也致力于空域优化，提高能源效率，增加运行的安全性和能力，我们也在非常积极地帮助他们解决所有的相关问题。当然，低成本航空公司特别关注控制运营成本，但其中有些成本是他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服务外包也许是一个办法。25年前，如果航空服务外包市场只是几家独大，可能会出现成本过高的现象，但现在，中国的航空服务市场已经非常成熟，而且竞争也非常激烈，所以在低成本航空公司选择服务外包时，他们的选择是非常丰富的。这种情况下，服务外包并不一定增加额外的成本。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对低成本航空有哪些具体的支持举措？

道格·考德威尔（波音北亚机队管理总监）：充分考虑到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可能需要，波音在积极推进一些有针对性的项目。波音会为这些低成本航空公司建立一个备件库，可能几个低成本航空公司共享备件库。一个公司可能只有20架飞机，10家加一起可能就是200架飞机，如果可以共享备件库，就可以帮助他们大幅降低成本。

机库建设，既耗费时间，投资又非常大。在这方面，波音上海就已经利用他们的能力和范围设立了机库，可以帮助这些低成本航空公司解决机库问题。

模拟器培训，也是波音负责的另一个费用比较高的项目，我们最近将会在上海引入一个新的737模拟器，今年将会到位，明年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三联生活周刊：以服务带动销售，你预计会对销售有多大的帮助？有没有具体的目标？

伊特巴雷克：在我们的市场预期当中，特别是在中国市场预期中，单通道机型的销售将会达到70%，而主要的驱动力都是来自低成本航空公司。现在我们25%的单通道机型的交付都是给中国的航空公司，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对低价航空而言，高利用率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可以通过优化航

线来实现单天多点停降，飞机利用率甚至可能高达11到12个小时，载客率非常好。早期在单通道机型的机位方面我们有过一定的瓶颈，但波音迅速地扩大了产能，交付没有问题，在市场份额上，我们爬升得很快。

三联生活周刊：欧美廉价航空运行方式短期内在中国复制并非易事，波音对这个市场容量的预期是否过于乐观？

伊特巴雷克：纵观航空业在全球过往的发展，比如北美低成本航空公司七八十年代刚开始时，他们的路径和现在在中国所看到的非常近似。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国家，很短时间就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消费经济的转型，没有任何国家做到过这一点。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国和欧洲的低成本航空公司，比如说美国西南航空，他们着力于二级市场，来回运送，这样就有效避免了枢纽城市的空中交通拥堵问题。而正是因为二级市场之间的空中交通，减轻了枢纽城市的拥堵。比如现在“北上广”，拥堵很严重。我相信低成本航空公司也注意到了，他们也正在按照这样的理念来运营。

中国每年都在新建许多新机场，机场越来越大，即使是中国二级市场，人口也要大于世界许多地区大都市的总人口，所以，低成本航空公司根本不需要担心市场有无问题。

中国和北美市场相比有一个不同点，就是在中国市场如何部署新机型，因为现在新机型的航程非常长。之前北美的航空公司可能只能用737-200或航程更短的机型，而新的737可以把航线拉到中国的任何城市，所以中国航空公司不再需要担心机型限制。

积极的因素很多，将会促进整个航空业问题的解决。在这种背景下考虑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未来，我觉得应该不是难事，尤其是中国政府现在关注到了问题所在。当然，我知道在整个20年的预测中，会有许多其他因素起作用，但我认为中国的低成本航空发展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BMW X1 xDrive20i 升级版在鲁朗林海



不期而遇的美景与美食 与 BMW X1 探寻西藏

2015 BMW X1 西藏探寻试驾之旅完美收官

去西藏可以有各种原因，为了欣赏那里独特的美景，为了感受那里浓郁的文化，为了品尝那里的美食佳肴，抑或是涤荡心灵、感悟人生。8月是最适合去西藏旅行的日子，8月3日至8日，我们跟随 BMW X1 的脚步开始了海拔5000米高原上的西藏探寻之旅。

爱玩爱吃的我们来到西藏，首先就被入目的景色震撼不已，而后沉迷于藏式美食不能自拔。真真是唯美景与美食不可辜负。

印象西藏 一次感动心灵的旅程

为期6天的旅程，西藏探寻之旅的队伍走过了近千公里的旅途，从“日光城”拉萨到被称为“太阳宝座”的林芝地区，越过海拔5013米的米拉山口，穿过工布人的“母亲河”尼洋河，不仅亲身体会了1000多米的海拔落差，经历了从山地到平原、从高原到森林的路况变化，也鲜明地感受了拉萨地区的干燥与林芝

地区的湿润之间仅一山之隔的独特景致。

在拉萨迎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的时候，真的有如临仙境的感觉。阳光笼罩下的布达拉宫，不可言喻的神圣之感充斥心间。不论是站在布达拉宫广场还是身在其中，不管是听千年历史还是看今人膜拜，这都是一座需要从眼中、从心里仰望崇敬的宏伟建筑。

在西藏辽阔雄壮的美丽背景下，BMW X1 极其动感和优雅的轮廓之美也锋芒毕露。BMW X1 独特的造型风格，短前悬、长轴距、长发动机舱、宽大的车轮罩和半高式坐姿具有典型的 BMW X 车型基因，而精心设计的高宽比例赋予 X1 极其动感和优雅的轮廓，使车辆具有清晰的识别度和时尚风采。穿梭在拉萨城中，BMW X1 也被赋予了一层神秘之感。

距离拉萨西南方向220公里处，坐落着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措，藏语意为“碧玉湖”、“天鹅池”。羊卓雍措

湖光山色，景色如画，仿若仙境般摄人心魄。第二天我们即驱车前往，路上天微雨，空气中浸润着青稞熟了的淡淡清香，云和雾环抱着山，越往高处走能见度越低，车内也很少能感觉到风噪和胎噪，打开音响，迷人的音乐如水般流淌。

如果不是轮胎与地面接触传来的震动感，简直会陶醉在动人的歌声里。BMW X1 xDrive20i 升级版搭载的是国际顶尖的 Harman/Kardon 环绕音响系统，高频清晰亮丽，层次分明，低频厚实有力，声音还原真实，这使得歌声更加厚实有力，总有一种他就在身旁喁喁而唱的感觉。

从拉萨自驾到林芝，海拔先是上升而后下降，落差的变化所带来的极致景色变化弥补了身体的不适。3650、4200、4780、5013米……伴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有同行的小伙伴开始吸氧了。我们一度担心 BMW X1 的表现，毕竟这里空气稀薄，汽油燃烧不充分。但是，每一次踏下油门，它都没有让人失



BMW X1 xDrive20i 升级版在拉萨寺庙

望。通过油门施压，BMW X1 xDrive20i 升级版的动力超乎想象的给力。凭借双涡管单涡轮增压、高精度燃油直喷和Valvetronic电子气门三大尖端技术，发动机输出的动力具有强劲、线性顺畅、稳定性高的特点。与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搭档，别说海拔4000+不会出现高原反应，山顶超车也一样轻轻松松。

下山时，天微雨，尽管BMW X1的抓地力非常好，可以轻松应对低温雨天湿滑的路面，在入弯时，xDrive全轮驱动系统会自动向后轮分配更多的动力，可以稳准快地通过弯道，但领队仍旧在对讲机里提醒道：“不要急。”不要急就是要让自己经历一些时光的洗礼，对车对人都一样。BMW X1自上市后迅速获得消费者认可，两个升级改款紧扣市场脉搏，到今年推出BMW X1 xDrive20i升级版，每一步都是一种成长和沉淀。

品味西藏 碰撞与融合的魅力

来到西藏，必然要品尝地道的藏式美食。藏餐是西藏的传统饮食，有着悠久的历史，品种繁多。独特的气候使藏族人民的饮食中重油，他们十分喜欢酸酸辣辣的味道，香料也是少不了的，藏餐中常用的烹饪方法有烤、炸、煎、煮等。一天的奔波后，美味的藏餐不仅满足的是口腹之

欲，更是从心灵上带来深深的满足感。

在BMW X1的陪伴下走了近千公里的路程，我们也抵达了位于林芝地区由灌木丛和茂密的云杉、松树组成“鲁朗林海”。在这里，美食家黑麦为我们推荐起当地美食：“石锅鸡的石锅用的是一种叫作‘皂石’的云母石砍凿而成，这种石头仅产于墨脱，要靠背夫从墨脱把原始石材背出来后，再由门巴族人用整块石材手工细心凿制，加工时要求下手力道匀称，一旦心急，皂石立即被凿穿，所以这种石锅的售价也比较昂贵。墨绿色的云母石锅，保温性特别好……”雨天冷，见到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我们听到一半就完全听从自己肚子的指挥了，满口鸡肉鲜香，心情也变得异常晴好。

天空渐晴，挑战泥地涉水驾驶和山路越野驾驶正当时。自然的山地越野路面，加上涉水、泥泞、坑洼、乱石等路面，BMW X1 xDrive20i 升级版全面发挥了其卓越的越野性能。相比于传统四驱系统在至少一个车轮打滑时才做出响应，xDrive全轮驱动系统甚至能够主动预判，并在0.1秒内将动力传递至附着力最好的车轮。自动差速制动系统ADB-X、HDC陡坡缓降功能、动态牵引力控制系统DTC等配置，都为X1探索各种非公路环境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这6天来近千公里的路程中，BMW X1 xDrive20i 升级版以新增的许多越级豪华装备，比如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腰部支撑等，即使是在西藏这样极端复杂多变的路况下，X1依然为我们带来最佳的驾乘舒适性。

青藏高原的沙石路和平原上的沙石路大有不同，石块棱角分明，车子只能在根基不稳的石块上颠簸跃行。领先的xDrive全轮驱动系统可根据路况灵活地分配各轮之间的动力，实现前后轮0~100%动力无级分配，为BMW X1带来全天候和全路况的适应力，轻松应对多种复杂路况。BMW X1与西藏的碰撞，迸发出新的动人篇章，BMW X1以卓越的表现完成此次探寻西藏的旅程，不期而遇的美景与美食成为难忘的记忆。

回顾这几天的行程，时晴时雨，不期然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又一道彩虹，随着色彩渐渐浓烈起来，笑容也爬上大家的脸颊。而我们也终于明白：经风雨见彩虹，那些不期而遇的人、事、物都是生命的馈赠，能否抵达自由之地，全在人心。

2015 BMW X1 西藏探寻之旅以“不期而遇 寻找自由之地”为主题，不仅让我们全面深入地体验了BMW X1的操控和越野性能，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一场极致的感观之旅。视觉、味觉、触觉等充分融合和调动了全方位的感官感受，让我们一路上探寻、体验和领悟了西藏的人文环境、自由心境和大自然。

选址西藏，是对X1所代表的SAV所倡导的自由精神的进一步探索。自BMW开创X家族始，X就被赋予了一种探索精神。在自由、率性、行动等元素的倡导下，BMW X1从未停止挑战，登上雪域高原，征服极端复杂路况，正是对于BMW X家族探索精神的再一次印证。



2015 BMW X1 西藏探寻之旅试驾队伍行进中



30年同窗再会， 让一部分人先跑起来！

——TNF 跑族 TGR 100 公里超马登陆中国大陆

撰稿人：跑族上海（根据嘉鸿 Cat同名文章改编）

4 个多月前，跑族（上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嘉鸿 Cat 被远在美国的初中班主任范老师曲折“搜索”到踪迹后，召唤到大多 30 年未见的初三（1）班同学微信群中，一堆人谈论着“十一”的毕业 30 周年团聚如何大吃大喝，并邀请 Cat 回来。她说不好确定，因为那时有柏林马拉松还有其它马拉松赛事。这时，当年的物理课代表 Jerry 在群里说了一句，国庆节在靖江组织一场超马比赛，她不就回来了？没想到，一句玩笑话，Cat 当了真，超马真的落地中国大陆，而初三（1）班的 30 周年聚会的主题，也从单纯吃喝变成了 100 公里接力！

3 月底的那个晚上，同学们出谋划策，如果初三（1）班 30 年后重聚可以举办一场马拉松赛事，也是一件未来 30 年值得说道的事情。女同学云华立刻帮助联系当地体育局，一拍即合，政府早有此意。随后 Cat 返乡，开始了长达 4 个月的比赛筹备。

这期间 Cat 在全世界四大洲跑马，将在新加坡和香港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已成功举办的 TNF 跑族 TGR100 公里超级马拉松接力赛首次引进中国，毫无疑问，中国大陆首站设在了 30 年同学聚会的母亲河边—靖江。



Cat 特意邀请超级马拉松冠军、The North Face 签约运动员、澳洲天空跑国家队队员 Vladixel (弗莱德·毅科梭) 担任赛事总监，并联系全球知名户外品牌 The North Face 邀请合作。三方惺惺相惜，对把超马赛事介绍到中国，一拍即合，TNF 承诺冠名赞助。

江苏靖江是个鱼米之乡，历史上苏东坡小住过3个月，看望初恋情人、远嫁这里的堂妹；岳飞抗击金兵都经过此地，立有圣祠；当地民风淳朴，人民热情好客。初中时记忆中的美食蟹黄汤包、肉脯和菜肉馄饨如今与Cat已分道扬镳，因为她两年前开始跑超马茹素，但外地人金秋十月来靖江可以尝尝蟹黄汤包。



当地跑步水平还处于摇篮状态，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跑了起来。把 TNF 跑族 TGR100 这样一个国际赛事首站落地一个马拉松运动还未展开的县级市，各方一开始是有顾虑的。但 Cat 坚持，马拉松的推广就是要从民间从基层做起，一旦跑起来的人们体会到跑步的快乐，马拉松这件事就能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经过严格论证认真准备，Cat 获得各合作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8 月 Cat 回到靖江，开了班会，并成立赛事筹备委员会，全班同学要组成一支 20 人的超越队，挑战 100 公里，每人 5 公里。对于这些已过不惑之年，身体发福，不太运动的同学，6 周之内实现 5 公里超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12 小时关门之内跑完 100 公里，每人 5 公里的平均速度要达到 36 分钟，不是走走就能应付的。

这期间靖江的一位 9 岁的二年级小女孩被诊断为白血病，在苏州治疗。远在澳洲的 Cecily 提议初三(1)班为小女孩慈善筹款，为了帮助这个孩子，一向体育不及格的她也开始跑步。马拉松与慈善是最搭的事情，Cat 让团队策划，与地方媒体合作，动员所有参赛选手、公司团队和赞助商以跑步的形式为这个孩子尽一份力，我跑步，你出钱，国际上最为流行的马拉松筹款方式。



6月，Cat以12小时55分完成秘鲁的印加古道马拉松 (Inca Trail Marathon)，并成为该赛事在中国的唯一合作伙伴，每年选派35位选手参赛。为了让中国跑手能够体验世界上最难的马拉松，赛事组委会将为100公里个人组别的第一名跑手提供印加古道马拉松参赛资格及全程费用。

国庆节100公里接力赛似乎已经超越了跑步，少年时代的珍贵记忆大家彼此珍藏，国庆节又共同做一件4个月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庆祝毕业30周年，这中间有挑战自我，有帮助他人，有团结合作。谁说一场马拉松赛事不会改变一些人，一座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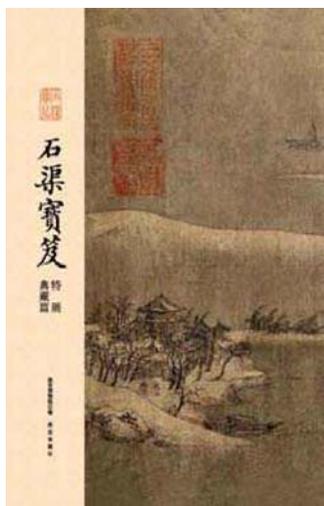
马拉松，超马在国内，靖江只是一个起点，几个月来，Cat已在国内搭建起了一个在马拉松及超马赛事运动领域的专业运营团队，一起致力于让跑步走向民间，让更多的人跑起来。希望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跑族上海”**)，让我们一起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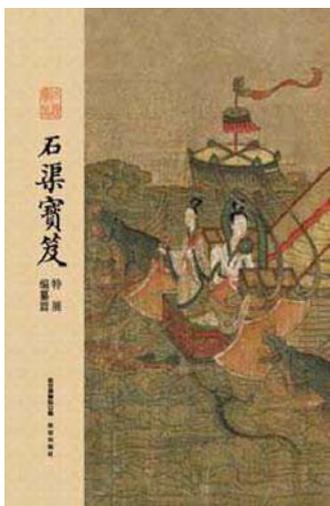
清 郎世宁 王致诚 艾启蒙《安德义画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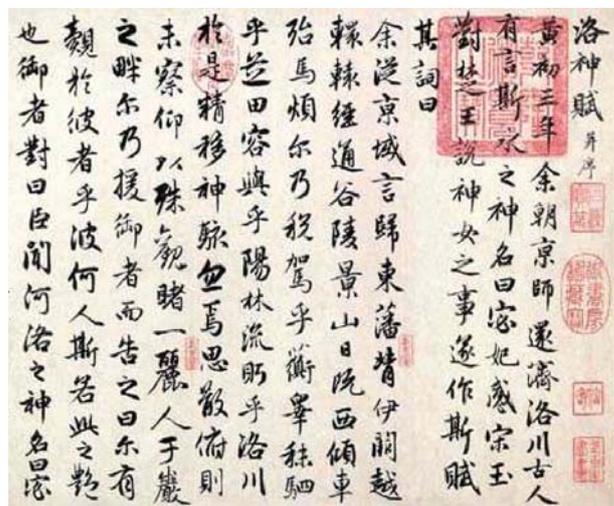
清 张若霭《临明朱竹书画》卷(局部)



《石渠宝笈特展·典藏篇》



《石渠宝笈特展·编篆篇》



元 赵孟頫行书《洛神赋》卷(局部)

故宫“石渠宝笈特展”：《清明上河图》全卷打开

201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大庆，为此将推出一系列涵盖各个文物品类的展览。于9月8日开幕的“石渠宝笈特展”是尤为令人瞩目的书画类大展，近200件珍品将悉数亮相故宫武英殿和延禧宫，其中包括《游春图》、《清明上河图》、《伯远帖》、冯承素摹《兰亭序帖》等重量级书画国宝。近6米长的《清明上河图》在本次展览中是近10年以来首次全卷打开，堪称盛事。

文 / 朱蓝

“石渠宝笈”是什么？这个收藏专业领域的词汇伴随着今年的故宫大展，逐渐热了起来。“石渠”一词出自《汉书》，西汉时，皇家图书的典藏与编校机构设有“石渠阁”、“天禄阁”，在后世流传中，将“石渠”、“天禄”指代为皇家收藏图书典籍。《石渠宝笈》就是清代乾嘉年间由皇帝亲自主持编纂的一部大型书画著录文献，详细记载了清宫内府书画收藏的状况。继北宋《宣和画谱》以来，历代皇家没有像清代这样重视历代书画的收藏、鉴定与著录，清代发展至乾嘉时期，经济富足，加之乾隆皇帝本人对书画热衷，成就了这样一部典籍。此外，乾隆皇帝对历代古籍善本也广为搜罗与度藏，他专门辟乾清宫昭仁殿为“天禄琳琅”，广纳天下珍本，详考其刊印、流传、年代、鉴藏等问题，又成就另一部著录典籍《天禄琳琅书目》。至此，清代宫廷对中国书画艺术、善本古籍的保护与传承就以两部皇皇巨著，向汉代的“石渠”、“天禄”二阁致敬。

世人多诟病乾隆皇帝附庸风雅，题诗无数，尤其在其收藏的书画珍品上题字，几乎每件都题，密如佛头着粪，这从本次展览的大部分展品上都可窥见。但反过来看，也说明他对书画的痴迷喜好。有评乾隆的书法俗气，实在是因为题字太多，其实他学赵孟頫非常用功，后又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字体偏长，中正平和，有帝王贵气。本次“石渠宝笈特展”上展出赵孟頫书《洛神赋》及乾隆行书《随安室诗》，

观者可以自行比对。

“石渠宝笈特展”以《石渠宝笈》这部著录典籍为主线，在故宫的展览中尚属首次，对观众来说，欣赏书画的难度也被提高了。与那些单一线索的专题展不同，《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作品量非常大，内府鉴定收藏有专门制度，编纂有复杂的体例，这些作品的皮藏更替、流散沉浮也有着曲折经历，所以，要想更加深入地欣赏这个展览，必须要对《石渠宝笈》有所了解。

《石渠宝笈》分为“初编”、“续编”和“三编”，共著录历代书画作品8000余件（注：这其中含有《秘殿珠林》所著录的宗教题材书画作品）。在乾隆皇帝（后期是嘉庆皇帝）的主持下，参与该书编纂的编纂官、词臣达31人，他们多为有书画特长者，直接参与内府收藏书画的遴选、鉴定、定级，并为之著录。而《石渠宝笈》就像是为此8000余幅作品建立的专属档案。

《石渠宝笈》“初编”，所有作品按编纂体例分为上等和次等，于作品标题下写明，上等作品钤“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五印，称为“五玺全”。如果该件作品贮藏于乾清宫，还要加盖“乾清宫鉴藏宝”殿座章，以此类推其他贮藏地的殿座章。次等作品则仅钤“石渠宝笈”和“乾隆御览之宝”二印。文字描述上，上等详尽而次等约略，但都记述作品尺寸、质地、书体、画法、内容、题跋、印章等，并考订作者、流传、鉴藏过程，

以按语标出，所以是书画研究至为宝贵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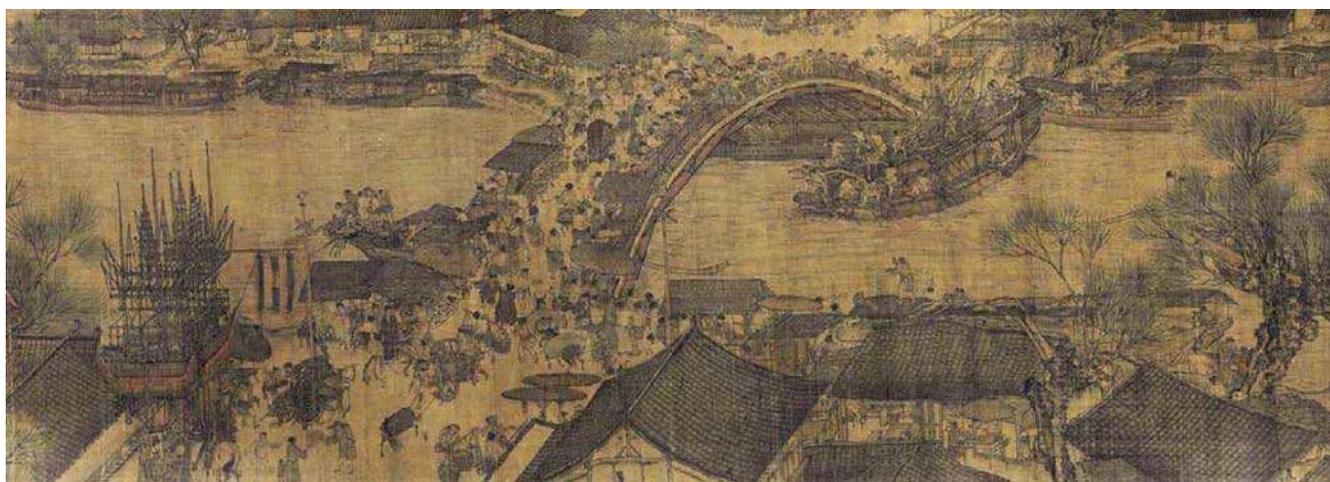
“续编”和“三编”基本沿承“初编”，但文字上不再分为上等、次等，更加详尽。据记载，“三编”在文献征引方面，引用书籍达160余种。入“续编”作品除沿用钤盖“初编”之“五玺全”外，还要加钤“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二印，以示区分，称为“七玺全”。此外，再加钤贮藏地殿座章，称为“八玺全”。入“三编”作品，将“五玺全”中的“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改为“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依然为“五玺全”，并加钤“宝笈三编”，以示区别于前两编。

除鉴藏体制完备的钤印制度，经内府收藏、《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还具有其他明显的皇家收藏特点：重新装潢，并大多有乾隆皇帝及词臣们的题识。在内容上，《石渠宝笈》不仅著录晋唐以来的法书绘画名迹，也将本朝皇帝、宗室、臣工的书画作品罗列于内。“续编”较“初编”，增加了历代法帖丛刻，涉及典章制度的诸大事件的宝贵实录绘画，如“南巡”、“交战”等图，以及部分西洋画都在其中。“三编”搜罗更广，包括书画、碑帖、缂丝、图像等品类。

本次“特展”的近200件作品，都是精选之作，分为两个部分：“典藏篇”放于武英殿，以三个单元介绍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书画珍宝的鉴藏、流传及辨伪情况；“编纂篇”放于延禧宫，从五个单元展示《石渠宝笈》编



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局部）



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局部）



宋 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局部）



“五玺全”之“嘉庆鉴赏”印



“五玺全”之“宣子孙”印

纂成书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展览结构，围绕著录典籍的特点，将书画作品、文献佐证结合呈现，希望让普通观众和专业人士都能找到令他们激动的视点。

特展典藏部分的“皇室秘赏”，都是晋唐至明清法书绘画名迹，件件绝世珍品。东晋王珣《伯远帖》，入《石渠宝笈》“初编”，为已知确认为晋人书迹的唯一作品，在书法史上的价值非常高。此帖是王珣想念友人的一封信，文辞简练，意境怅惘，书迹古淡天然，晋人风度。乾隆皇帝非常喜爱这件作品，将它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并称“三希”，置于养心殿温室，称为“三希堂”。经后人研究，“三希”中，二王父子作品皆为后代书家临仿，唯有这件《伯远帖》真迹无疑，它的价值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标志中国山水画趋于成熟的开山肇始，入“续编”。画作绘春日光景，佳客游山玩水，山石有钩无皴，青绿填色，泥金晕染，整体布局已经克服了早期表现山水时“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毛病，画境非常自然生动，颜色古艳明媚，为“金碧山水”。此图没有名款，但在画前有宋徽宗瘦金书：“展子虔游春图”，因而得名。

唐冯承素摹《兰亭序》，为“兰亭八柱”之三，被认为是最接近王羲之原作的双钩摹拓本，入“续编”。目前已知王羲之并无真迹存留，赏“冯摹兰亭”，可神会“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王书之妙。有了王羲之这一篇优美的文辞，又有这一篇在书法史上无法逾越的绝世之作，中国人的精神领域里就有了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块专属之地，围绕它的创作、研究、雅集、唱和层出不穷并绵延历代，那就是“兰亭”文化。

宋代，花鸟画因为“格致”的思想，呈现出一批穷极物理、精致非常的作品，它们对自然物象的掌握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北宋画家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入“初编”，在精准之外，还增

添了“写生”的灵动性，正如沈括论及“写生”所说：“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赵昌也颇以之自诩，自号“写生赵昌”。此幅花鸟画描绘三蝶起舞，蚱蜢静待，野草闲花，一派秋原野色。构图与用色，是这幅画作最别具匠心的地方。



经后人研究，“三希”中，二王父子作品皆为后代书家临仿，唯有这件《伯远帖》真迹无疑，它的价值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国宝《清明上河图》在休眠10年之后，终于全卷展开让世人一睹它的风华。这件长卷入“三编”，也是北宋张择端的唯一传世之作。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文学、艺术作品知名度非常高，但创作者平生也就仅有此一二件作品流传，如此幅《清明上河图》，如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诗。这些作品有如神助，意境、技巧之高，难以揣测。欣赏近6米长的《清明上河图》，之前若能读一读《东京梦华录》，可以有更好的文献参照。全卷楼阁屋宇、贩夫走卒、车马舟船，一丝不苟。

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书画国宝，在清末及民国初年由于政权更迭、战乱频繁而流散出宫，历经劫难。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及至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购买、捐赠、调拨等方式，这些散于各处的国宝又纷纷回到了故宫。如宋李公麟的《临韦偃牧放图》，入“续编”，长为429.8厘米，全卷绘1200多匹马，140余人，细看可谓毫发毕现，蔚为壮观。

参与《石渠宝笈》编纂的31位词臣，都是饱读诗书之辈，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书画专长，也有过相关研究专著。举例二人做一管窥：张若霭，安徽桐城人，是大学士张廷玉之子。他本人擅长书法绘画，以内阁学士参与纂修《石渠宝笈初编》，后累官至礼部尚书。他有《临明朱竹书画》卷12段，

分别临仿明代画家孙克弘、张忠、宋旭、莫是龙、丁云鹏、周之冕、侯懋功、璩之璞笔意，绘画的朱竹意态多姿。朱竹的典故，来源于大文豪苏轼的文人意气，世间本无红色竹子，也无墨色竹子，如此表现，自然之态不失，更能表现文人画的放逸，妙在似

与不似之间。另一位张照，华亭（上海）人，长于书法与戏曲。他是康熙年间进士，乾隆时期历任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内阁学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等职。他的书法学董（其昌）、颜（真卿）及米（芾），成为“馆阁体”代表人物。他也是《石渠宝笈初编》的主要编纂官之一，深得乾隆皇帝信任，被誉为“五词臣”之一。他的《行书弘历读昌黎集诗》轴录乾隆御制读昌黎集诗一首，朴茂厚重，堂皇雅正。

《石渠宝笈》有如宝山，此次“石渠宝笈特展”更加难得，是将经典书画著录进行深入挖掘并发展的重要尝试。特展的起因之一，其实源于故宫编纂的《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经过6年细心整理和搜集图片，故宫首次为这套典籍尽可能地配上了彩图，这对传统书画著录为一大进步。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故宫博物院相关专家渐渐萌生为此做一个展览的想法，经过不断论证与遴选，“石渠宝笈特展”终于成型，从手工誊录的皇家秘藏典籍到电子印刷图文并茂的现代出版，再到可以供全社会人士都可以近距离参观的大型展览。配合这个展览，故宫还出版了《石渠宝笈·典藏篇》、《石渠宝笈·编纂篇》两部大型图录，忠实记录展览结构、作品，又从展览回归书籍，这可能就是《石渠宝笈》这部皇皇著作亘古存在的意义。■

（故宫出版社供图）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景象

在斯德哥尔摩遇到地球上 50% 的麻烦

一顿饭，麻烦未必能够解决，可是，麻烦中的人，却可能因为沟通，而缓解焦虑，平复情绪。

主笔 / 陈赛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瑞典。同行的还有 5 个记者，分别来自伊朗、阿富汗、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我们是应瑞典研究院的邀请，一起参加斯德哥尔摩文化节。今年文化节的主题是移民和融合问题。

在严重的时差恍惚中，我们一行人先是跟一位卖婴儿椅起家的亿万富翁在他漂亮的艺术画廊里共进了一顿午餐，然后风尘仆仆从斯德哥尔摩的

最西边穿越到最东边，参观了一场怪异的同性恋艺术展，在一个语言学校兼布艺店里喝了一顿下午茶，晚上还要跟一群文艺界人士在湖畔餐厅共进晚餐。

客人陆续到来，一位纪录片导演、一位广告导演、一位历史博物馆馆长，还有一位语言教师。除了纪录片导演是男的以外，另外三位都是女性。我心下暗想，瑞典果然是一个女人非常

强势的国家。

一路上，我已经打了 1000 个哈欠，但此时难得偷得半刻闲暇，半杯红酒下肚，反而清醒过来。时钟已过 20 点，太阳仍高高挂在天上，丝毫没有西下的意思。但空气中暑气已去，白云朵朵，凉风徐徐，只觉得满目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正是瑞典夏日最美好的时刻。

对瑞典人来说，夏天里一切都是最好的，阳光、空气、湖水、食物……

尤其是当他们想到，3个月后就进入漫长的冬季与长夜。斯德哥尔摩离北极圈很近，北极寒风一起，冬天倏忽就至。一入10月，湖面吹来的风就变得冷入骨髓。

来瑞典之前，不少朋友建议我写一篇《瑞典移民指南》或者《如何嫁给瑞典男人》。在这个纷乱不安的世界上，瑞典是一个难得富足、安定而健康的国家。200年没有战争，但富足、安定的生活既没有让他们张狂好战，也没有让他们颓废消沉。这么多年来，这个位于世界最北端的小国始终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对外部世界保持着审慎的兴趣。他们仍然坚持关于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理想，希望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没有人因为性别、种族、政治、宗教、性取向，或者身体、精神、智力上的残障而受到歧视。这样一个国家，对于那些陷于战火、恐怖、暴力、贫困或绝望之中的人们而言，大概是接近于天堂的一个地方。

瑞典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我们看到的一份统计数据上说，他们有五分之一的国民出生于国外，或者父母是国外移民。瑞典研究院的莉维亚女士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从90年代初以来瑞典大量接收政治难民的缘故。在欧洲，瑞典是对避难者最为慷慨的国家之一，仅去年一年就有约8.13万人在瑞典申请庇护，其中3.06万份申请获得认可，以该国总人口960万来计算，已经是欧盟中接收难民的比例最高的国家。我们下午参观了一个叫fijia的小镇，就是一个著名的移民区，只有9万人，却混杂着152个国家的语言。阿富汗、索马里、叙利亚……每当有战争发生，就有人逃到这里，哪怕千辛万苦，九死一生。

3年前，我一个人在斯德哥尔摩城里转悠，只见到处都是金发长腿蓝眼睛，但这一次，我们走到斯德哥尔摩的郊区，金发长腿逐渐变成了黑皮肤、黑面纱、奇怪的语言、陌生的面

孔，路边玩耍的孩子们朝我们投来警惕的眼神。城中漂亮的别墅变成了一排排千篇一律的高层楼房住宅区。这些楼房大都建于1965到1974年，当时瑞典政府计划在10年内建造100万套新房子，以解决中产阶级的住房问题，因此又叫“百万房屋”项目，但最终住到这些房子里的，既不是中产阶级，也不是瑞典居民，而是成了少数族裔和国际难民的聚居之所。

为了帮助这些移民尽快融入当地的劳动市场，解决就业和经济问题，瑞典每个城市都设有瑞典语学校，每个移民都可以在这里免费学习语言、文化，以及职业培训等。我们下午拜访的那家小小布艺店原本就是一个专门为女性移民开设的语言班，创始人Brigitta Notlof女士有一个愿景，希望天下女性都能自立，每个孩子都能受教育。除了教她们语言之外，她还倾听她们的故事，教她们针织、刺绣以及印染的手艺，以帮助她们融入瑞典社会。

她以一个设计师独特的敏锐感，在这些女人的故事中发现了迷人的图案，并将这些图案转化为漂亮的工艺品。最让我震动的一个画满了五花八门的包包的图案，各种异国风情的挎包、手提包、双肩包、行李箱……每一个包都是她的学生自己画的，是她们逃离家园时随身携带的那个包——逃离战争往往从一个包开始，你必须决定人生的哪些部分可以放进去，哪些必须留下来……所以，这个图案的名字就叫“一个包里的一生”。

其实，人类的故事大部分可以叙述为一种迁徙活动。我们通过短距离迁徙，寻找更好的狩猎场所、更富饶的土地，或者更好的文化。多年来，人类已经习惯这样迂回的迁徙。但长途迁徙不同，它是单向性的，而且是永久性的，所以，当人们怀着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而迁徙远方，其中的艰辛往往超出他们的想象，很多时候

结果也并非如他们所愿。

对于绝大部分难民来说，来到瑞典并非意味着一脚跨入天堂。他们大多居住在郊区的贫民区里，靠政府救济生活，失业率、犯罪率高，子女教育不良，与瑞典本地人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并不是所有瑞典人都欢迎他们的到来。事实上，最近几年，瑞典排他主义日益蔓延，因种族主义引发的暴力冲突和过激反应屡屡发生，尤其以2013年5月的斯德哥尔摩骚乱最为严重。当时，斯德哥尔摩移民区连续4天晚上爆发骚乱，数以百计的移民青年焚烧汽车、袭击警察，并逐渐蔓延到多个城市。

“这些人虽然千辛万苦来到瑞典，却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社会。”坐在我身边的Ebba Akerman女士一边跟我聊着瑞典移民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一边难过地感慨。

Ebba是一个瑞典语老师，今年32岁，短发，微胖身材，穿一身鲜艳的红色波点裙子，温柔可亲。她在斯德哥尔摩郊区一个小镇教移民瑞典语，有一次，她问一个学生是不是喜欢住在瑞典。那个学生耸了耸肩，说这里的生活与阿富汗也没什么区别。

这个回答让她非常震惊，同时也意识到瑞典社会与这些移民之间的隔离之深。Ebba决定为此做点什么。她通过Facebook和Instagram撮合瑞典人和新移民在一张餐桌上共进晚餐，就像媒婆撮合相亲对象一样，至于吃什么，在哪里吃都由他们自己决定，也可以各自带朋友，扩大饭局。有时候，她也会被邀请参加。到目前为止，她已经撮合了800多顿饭局，并得到了“晚餐大使”的美名。“当大家坐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彼此之间很多的经济与社会差异就会走远。”她说。

虽然有点天真，但想想我们一行6个人，分别来自完全不同的国家和背景，才一起吃了两顿饭，已经彼此

觉得很亲切了。除了食物之外，迅速拉近我们之间心理距离的还有美国电视剧——伊朗的穆罕默德喜欢美剧《新闻编辑室》，阿富汗的马苏德则认为《国土安全》更好，他觉得其中对巴基斯坦情报局的描写实在太真实了。

马苏德在阿富汗主持一档十分具有影响力的时事热线栏目。他的英文极好（他说美国人给阿富汗带来的唯一的好事是英语），又擅长讲故事，所以整个餐桌都围着听他讲阿富汗的事情。他给我们看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的照片，他们在喀布尔的家，漂亮的庭院，花花草草，正常的、安宁的生活，与我想象中的阿富汗不同。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过去30多年来，阿富汗约600万人逃离家园，前往他国，难民数量在全世界居于首位，直到去年才被叙利亚超过。90%阿富汗难民逃往东西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不少人在当地做保安、园丁、家政服务员，大多数情况下是打黑工，所以始终处于担心被发现并遣返恐惧中。只有很小一部分阿富汗难民有足够经济实力和人脉，得以逃到欧美国家。这些难民多是阿富汗国内精英阶层，有些是国际组织工作人员，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媒体人士等，比如当年饰演《追风筝的人》的小演员艾哈迈德·汗·马赫米扎达就因为这部电影中部分情节激怒塔利班，一家人面临死亡威胁，不得不逃亡海外。过去8年来，马赫米扎达东躲西藏，四处流浪，几经周折才在蛇头“帮助下偷渡到瑞典。如今，20岁的马赫米扎达住在瑞典博伦厄的一个寄养家庭，为当地一支足球队效力，但仍梦想有一天能够去读电影学院。

“我从小就是那样长大的。我见过子弹穿过我姐姐的茶杯，她幸而保留一条小命。我见过炮弹落到我家后院，我跑过去捡碎弹片玩，结果把手烫伤了。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给我哥哥庆祝生日，一群恐怖分子突然闯进来，



斯德哥尔摩郊区一处居民楼旁是欧盟为移民搭建的临时住所

二话不说就开枪杀人，没有任何理由。那件事情以后，我的脑子有5天没法正常运转，我儿子两年不能说话。”

尽管已经将两个儿子安顿在土耳其，但马苏德说自己大概永远不会离开喀布尔。那个炎热、干燥、贫穷的城市对他来说仿佛有着某种神奇的魔力，每次远行，哪怕只是短短几天，哪怕目的地是富庶自由的西方国家，他都会无比怀念家乡。

俄罗斯姑娘叶琳娜听腻了打打杀杀的故事，偷偷拉着穆罕默德一起去湖边拍照。叶琳娜在莫斯科一家反对派报纸工作，一个美丽奔放的姑娘，就是自拍瘾太重，走到哪里都要拍个不休。大概因为瑞典是她心爱的童话王国吧。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对瑞典如此疯狂的姑娘。仿佛瑞典的一切她都喜欢。瑞典的云、瑞典的树、瑞典的湖水、瑞典的街道，瑞典的街道上走着的每一个瑞典男人在她眼中都丰神俊朗、玉树临风，随便抓一个都会是如意郎君。

她大老远从莫斯科跑到瑞典，头等大事竟是去采访一个银行抢劫犯。30多年前，这个叫 Janne Olsson 的男

人闯入斯德哥尔摩 Norrmalmstorg 广场最大的一家信贷银行，劫持了4个人质，与警方对峙了6天，没想到在最后关头，4人质竟站在抢劫犯一方，抗拒政府的营救，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质还自称爱上了劫持者。这就是心理学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由来。

在她的 Facebook 上看着她 and 老劫匪的照片——他们一起坐渡轮重回劫案现场，他给她示范怎么给人质上绑，还给她买冰激凌和啤酒——我觉得整件事情太诡异了。问她为什么大老远跑来采访一个抢劫犯，她莫测高深地笑了笑说：“因为我们都很疯狂啊！”

餐桌上的人都默默地点了点头。是的，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逾越这条底线，心理就会出现惊人的错位。而我们多多少少都曾以各自的方式体验过疯狂的历史与当下。事实上，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差不多代表了地球上半以上的麻烦。但是，现在我们这样坐在一起，手中握着酒杯，在美丽的斯德哥尔摩，静静地聆听水声，还有岸边传来的钢琴声，好像一切麻烦又离我们那么遥远。☑

real watches **for** real people



谢霆锋 - 与豪利时艺术家新款多功能月相表

点击www.oris.ch注册成为MyOris会员，
将可获赠额外一年保修。

ORIS
Swiss Made Watches
Since  1904

上海 021-6486 3680
沈阳 024-3131 5119

北京 010-5746 0401
重庆 023-8816 0580

广州 020-3881 2338
西安 029-8740 3686



那只叫米奇的 92 岁老鼠能领导一家娱乐帝国吗？

“所谓迪士尼，中间是电影制作，之后向下游分别有我们的主题公园、电视、出版、音乐和周边玩具、游戏，这样的—个构成图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皮克斯、卢卡斯，他们与我们的结构图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些公司的核心是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比如星战就是一个在迪士尼框架内的任何层面上都能得以延展的好故事，也就是非常迪士尼的。”——鲍勃·艾格

记者 / 李东然

D23 是以为迪士尼“粉丝”创造魔力瞬间为主旨的官方“粉丝”活动，始于 2009 年，每两年—届，由华特·迪士尼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

—手创建，这个乍看抽象的字母数字组合，稍加推敲，才觉全是对 1923 年华特·迪士尼先生创建华特迪士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的致

敬之意。

8 月的南加州从清晨时分就已是艳阳当空，不到 7 点，阿纳海姆会议中心就人满为患到成为感受美式排队



电影《玩具总动员3》剧照

文化的圣地。相对于英国人那永恒的一列长队，美国人对待队伍的态度显得随性自在许多，队伍过长而空间有限的时候，美国人自觉将长队排成Z字形顺次迂回，于是在比如阿纳海姆会议中心这样入口有5个之多的复杂建筑前，各个门口的队伍渐渐纵横联合成片，幸好那些用严肃脸说着冷笑话的保安大叔们总会不失时机地就把你塞进人群里合适的位置，反则单找到进场队伍的队尾也会是颇有难度的挑战。

并且相比英国人对排队这件事的

严肃态度，美国人的欢乐奔放也能在这样的长队中体现充分。有母女一起装扮成冰雪女王，于是苗条的妈妈妖冶美艳，女儿的嘟嘟圆脸和角色相应却是一派童真谐趣；那边有扮装白雪公主的爸爸急急地牵着扮成小矮人的女儿穿梭在人群之间，小女孩脸上一脸瞌睡和迷茫，无意之间把反串的幽默感发挥到极致。还有认真扮作钢铁侠和黑寡妇的年轻情侣，把银幕上的暧昧英雄直白演绎成了甜蜜情侣。人群上空是一只长67.7英尺、宽39.9英尺、高34.3英尺的巨型巴斯光年（Buzz Lightyear）造型热气球，造型还原细致入微的巴斯光年太空人正做着举臂飞翔的动作，映着明亮的加州晨光，营造出使人炫目的幻境之感。

20年《玩具总动员》，10年新迪士尼帝国

事实上这只巨大的气球刚刚结束了它在美国西海岸的《玩具总动员》20周年纪念活动才返回加州，今年是《玩具总动员》的大日子。D23当然也准备了令“粉丝”们激动人心的周年庆祝活动。在很多人眼里，《玩具总动员》标志着皮克斯的崛起。1986年，史蒂夫·乔布斯以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皮克斯，在软硬件开发应用上下足功夫，皮克斯曾制作出高端的计算机图像和动画软件，并凭动画短片《小锡兵》获得了1988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技术也为其在广告制作领域打开了市场。但直到5年后，公司仍旧连年亏损，仅1990年一年，皮克斯的经营业亏损额就超过了830万美元。当时有人评价说，皮克斯的部分问题在于，它的软件技术已经超越了目前可使用的硬件能力。筋疲力尽的乔布斯失去了耐心，但不甘心就此失败，1991年，他低价收回了员工手中的股权，裁掉了72名员工中的30名。

此时的皮克斯已着手《玩具总动员》的项目，只是当时这些皮克斯动画师自己都不确定从此可以做出一部改写人类动画历史并且风靡世界的大银幕电影。他们一只眼睛瞄准商业广告，一只眼睛盯住30分钟的圣诞特别电视节目，寻找突破。《玩具总动员》的故事基础就是拉塞特的《小锡兵》（*Tin Toy*）。“从一开始《小锡兵》就不仅是技术试验，那个故事本身也是为今后做长篇动画打下极好的基础，所以当华特迪士尼和我们说，让我们一起做一个长篇动画片的时候，我们就很顺利回到最初的情感基础：每个人都有一个遗失的玩具，我们都记得当初寻找这个玩具时候的焦急，我们甚至在心里默默希望这个玩具也在找我们。最初我们构想的角色模型是一个从父亲童年传承下来的安迪，小锡兵就是一个新的玩具。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非常明显的就是蒂尼实在是太陈旧了。我们讨论了一遍又一遍，如今究竟一个什么玩具能让一个小男孩痴迷到不再和其他任何玩具玩耍？我们想到了把《星球大战》和《特种部队》战士形象结合试一试，之后随着这个主意的不断向前，我们就找到了巴斯光年这样有趣的宇宙英雄，因为我们要写一部兄弟电影，所以我们希望再有个和他决然对立的形象，所以就有了牛仔安迪。”约翰·拉塞特讲起玩具总动员的角色，就像是谈论那些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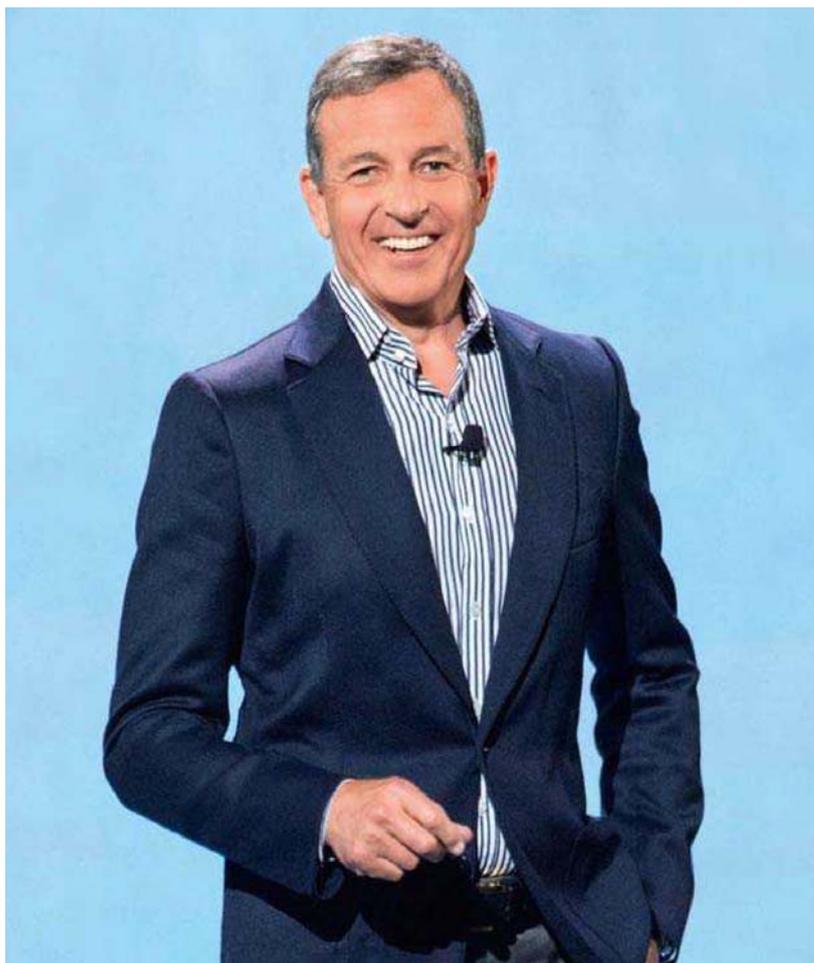
事实上当迪士尼开始对电脑动画感兴趣时，皮克斯已经成了电脑动画的领跑者。1986年《小锡兵》获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至今是奥斯卡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动画短片之一，其实就从那时开始，整个好莱坞都已明了，皮克斯是未来的方向。1990年，迪士尼方面希望与皮克斯达成此次合作，双方的合作经过相当坎坷，但成果惊人，至1995年《玩具总动员》在全美2400多家影院上映，周末三天进

账 2000 万美元，转眼间，整个美国一切可以进行广告合作的产品都印上了《玩具总动员》的人物角色，迪士尼赶制的影片周边玩具也被洗劫一空。迪士尼强大的宣传和发行优势发挥了威力。

然而素来作风强硬的乔布斯始终坚持皮克斯与迪士尼的关系是平等合作，因而迪士尼也不停尝试制作自己的电脑动画电影，但经营手绘动画近一个世纪的迪士尼并不容易轻易就折返方向，反而眼见大获全胜的电影比如 2003 年的《海底总动员》、2004 年的《超人总动员》无不是与皮克斯电影合作而来。迪士尼对于皮克斯的依赖正在变得越来越深。不过皮克斯后《玩具总动员》10 年，成功之外也有忧患。1994 年曾任迪士尼电影部门主管的卡岑伯格从迪士尼出走后，便联合如日中天的斯皮尔伯格、资本大亨保罗·艾伦，建立了启动资金高达 26 亿美元的梦工厂，正是直指皮克斯而来。随后相当长的日子里，无论皮克斯做足保密工作，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制作出相近题材与皮克斯同擂台竞争，一直是卡岑伯格和他的梦工厂乐此不疲的目标所在——皮克斯做《海底总动员》，梦工厂做《鲨鱼传说》；皮克斯做《料理鼠王》，梦工厂做《鼠国流浪记》；皮克斯做《机器人总动员》，梦工厂做《怪物大战外星人》。

毫无疑问，梦工厂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无疑又维系了迪士尼和皮克斯之间的合作。2005 年 10 月，新任 CEO 鲍勃·艾格用一个刺激的提议打破了沉闷的董事例会：“如果我们把皮克斯动画买下来将会如何？”不等公司董事会成员们惊魂稍安，鲍勃就拨通了乔布斯的电话，他惴惴不安地请乔布斯听一个“最最疯狂主意”。沉默半晌，乔布斯答说，这也算不上世界上最疯狂的主意啊。

很多人将鲍勃·艾格看作破冰华特迪士尼和皮克斯紧张纠缠关系的核



华特·迪士尼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

心。那通电话之后，艾格两次登门拜访乔布斯，3 个月之后，迪士尼宣布以 74 亿美元并购皮克斯。这仅是艾格主导的三项并购的开端，2009 年迪士尼收购美国娱乐印钞机漫威娱乐，2012 年收购乔治·卢卡斯的卢卡斯电影，短短 10 年，迪士尼斥资 150 亿美元建立起庞大娱乐帝国。华特迪士尼从较低幼的公主城堡女童路线，拓展到拥有全年龄段青少年儿童流行热点，甚至囊括其父母们热衷的怀旧内容的动漫娱乐霸主。同时迪士尼也巩固了 ABC 广播电视台、ESPN、迪士尼频道等主流娱乐频道和节目的所有、经营权，并在完成公司收购的同时，迪士尼也完成了对巴斯光年到天行者，以及钢铁侠等上千个角色的购买。

10 年之间，迪士尼公司增长至原

来的 4 倍，收入从 319 亿美元增长到 488 亿美元，艾格出任 CEO 之初《纽约时报》曾经声称，他不仅无法像创始人沃尔特·迪士尼一样创造出一个神奇的魔法世界，甚至哪怕是延续魔法，他也不值得信任。如今稳坐迪士尼历史上最成功一任 CEO 荣誉的他在 D23 的全球媒体见面会上，手握着星巴克咖啡，自在轻松地跟大家打着招呼，不过也继续着他招牌的谦逊姿态。比如问及任期内工作中的骄傲之处，艾格满脸诚挚地回答，自己拥有全世界最幸福的职业，最骄傲之处也莫过于跟那么多艺术家工作在一起，甚至如此光鲜的业绩增长也不来源于所谓的公司运营，更不相关股票市场的外力，最重要的是如今的迪士尼拥有这么多美妙的故事，拥有最优秀的讲故事能力。

刺激的转折

甚至鲍勃·艾格在 D23 创立了“迪士尼传奇表彰大会”(Disney Legends Awards) 环节, 作为 D23 最重头的开场活动, 新老迪士尼艺术家众星云集, 不次于奥斯卡颁奖典礼。今年的 D23 传奇表彰环节, 就有乔治·卢卡斯、斯坦·李等大师级艺术家、电影人亮相, 并领走了本年度的“迪士尼传奇”荣誉。颁奖典礼上的鲍勃·艾格谦恭严谨, 走下典礼舞台的艾格津津乐道的却是他如何在典礼上那部混剪的历年迪士尼经典作品的短片里看明公司未来的方向。“今天早上我发现观众们是从《加勒比海盗》开始尖叫的, 强尼·戴普就是迪士尼的魔法之一, 这是永恒的, 但真正的高潮来自《星球大战》, 当哈里森·福特对楚巴卡说我们回家时, 全场的掌声尖叫让我放下心来, 这会是一个期待中的转折, 会是迪士尼历史上最刺激的转折之一。”

事实上从 2015 年冬天的《星球大战》、《动物乌托邦》到 2017 年夏天的《玩具总动员 4》、《加勒比海盗》, 未来 18 个月, 将有近 20 部新片顺序排布在华特·迪士尼的未来时间轴上。当然最不负“万众期待”来形容的仍旧是《星球大战 7》, 几个月前它在网络上发布的新预告 24 小时内就得到 8800 万的点击。艾格不乏幽默地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我是超级‘星战粉’, 我的两个男孩, 13 岁和 16 岁, 对星战的感情和我一样狂热, 所以有一天我忍不住给他们放了一小段片段, 就一小段, 他们的反应实在是太剧烈了, 我立刻意识到, 虽然我们都是‘星粉’, 但也不能信任他们啊(笑)。”

艾格直言不讳《星战》将会是不容失败的 40 亿美元电影, 不过又很快把话说回到对于星战故事的膜拜之情, 甚至需自我警告着过分膜拜的危险所在。“事实上我常觉得收购卢卡斯电影本身远比承担下延续星战神话这

个责任要来得容易得多。包括我每一次和卢卡斯见面, 我都感到那种在自己、我们肩膀上的责任, 星战不只是一部电影, 它是一段我们精神世界中都无比珍视的传奇, 我们必须把这段传奇延续, 我们要取悦那些固有的“粉丝”, 我们也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最困难的部分是事实上世界每一分一秒都在改变, 不仅是那些曾经的星战‘粉丝’他们经历了十几年甚至 30 年的成长, 更不用说年轻新一代他们有自己的更新速度, 所以事实上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你永远不能用以前的路数来对付今天的时代。这正像是我经常告诫那些慕名而来迪士尼工作的伙伴们, 我们要尊重我们的过去, 我们以此为荣, 但不要过分膜拜, 否则这会令我们的创新脚步举步维艰, 所以我们也并不是用一种要把星战放进博物馆里看它变旧的心情去拍电影, 我们要拍最当下的星球大战。”

《星球大战 7: 原力觉醒》距离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电影已经有 30 年的时间, 所以韩索罗船长比上一次他的星际旅程老去了 30 年, 这样的写实, 鲍勃·艾格形容为“尊重时间的流逝”。事实上目前已有 5 部星战电影在迪士尼的工业流水线上, 包括随每一部电影而来的玩具周边, 以及游戏互动装备, 还有即将分别动工在加州和奥兰多迪士尼乐园内, 占地 14 英亩的星战主题公园。评论界视星战为迪士尼吸金全球的利器, 鲍勃·艾格也毫不讳言自己的迫不及待心情。2015 年 12 月新的星球大战电影登陆全球, 2016 年春天上海的迪士尼主题乐园又将呈现在世人面前。“难以置信这样令人惊叹的刺激转折即将一个接着一个到来。”

华特·迪士尼公司, 不一定讲英文

“几个月我亲率一批重要的中国商界精英游览了一遍迪士尼乐园, 他们

惊讶万分地看着我们的建筑, ‘你们怎么做到的呢, 怎么可能建造起整座城市!’ 当然, 我实话实说, 这背后是大量的耐心, 近 10 年的磋商、合作、配合以及进取。如今这一切就要呈现在世界面前, 我简直忍不住想要马上向全世界展示这一切。”鲍勃·艾格说。

预计明年春季开园的上海迪士尼乐园是华特·迪士尼公司在中国内地创办的第一座主题公园, 园内共有六大主题园区, 此外乐园还设有现场演出场地、百老汇风格的剧院、两家酒店和“所有迪士尼乐园中最高、最大、互动性最强的城堡”。鲍勃·艾格谈起上海迪士尼乐园里的中国特色、园区特色的中国餐饮、由中国艺术家们完成彩排和设计的园区表演, 甚至那座全世界最大的城堡设计中也有百分百原创, 这当然让人高兴。“在我看来最有趣也最重要的是, 上海迪士尼园区内所有的项目名称、标识、文字介绍也都是直接由普通话完成, 之后再翻译成英文, 通常美国公司的做法是将一切用英语写好, 再翻译成为中文, 这个区别可能听上去是有那么点奇怪, 但是其实对我们而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语言是一切的基础, 在上海迪士尼, 一切从中文开始, 我们自知须尽全力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力量的市场里不断前行, 我们要融入整个文化和环境。”

华特·迪士尼国际部主席安迪·博德则就语言话题, 更加仔细地为本刊解释了 10 年来迪士尼的国际战略。“10 年前我们就做了决定, 彻底本土化, 我们和《美女与野兽》放在印度公演, 那么可以全部百分百由印度的导演、剧团独立完成。比如如果要开在中国、日本或者印度的迪士尼公司, 我们希望的是更彻底的本土化。我们希望的负责人和雇员需要当地人, 必须务实, 并且善于沟通, 更重要的是善于和本土环境沟通, 甚至我们不强求每个为我们工作的人都必须说英文。”



(急冲人鱼摄)

何川在挪威攀登冰崖时留影



(Rocker 摄)

2015年，何川独攀华山南峰，成为第一位独攀大岩壁的中国人

何川：自由地攀岩

攀岩是一种非常慢的运动，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去注意细节。

记者 / 张星云

平时的何川过着两种生活。我第一次在北京理工大学见到他时，他穿着大裤衩和短袖T恤，从学校教师宿舍塔楼走过来，钻进了一家校内的咖啡馆，要了壶水果茶。当他用比常人粗壮得多的手捏起玻璃小茶杯时，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小臂上微微凸起的青筋。他从老家重庆农村考到北理工，本科、研究生、博士一路念下来，2000年毕业后就留校当了老师，一晃15年，没怎么参与评职称，依然是教光学的讲师。

第二次见他是在京郊白河他的农家院里。农家院在密云白河峡谷的尽

头，三面环山的小村子里一共几户人家。入秋的京郊正赶上丰收，后院的大婶给他拿了一袋新打的鲜核桃，几个新掰的玉米，还在他的厨房桌子上放了一碗新磨的韭菜花。何川身材不高，穿着冲锋裤和拖鞋，坐在小院里轰着身边的飞虫。他的小院随意种着葫芦藤、金银花藤，一棵梨树、两棵银杏树、一排大葱和几排玉米，没什么规律。白河峡谷的花岗岩岩壁非常适合攀岩，这里也成了京郊乃至全国最有名的攀岩地点之一。何川是白河攀岩基金的负责人，管理着这里的20多处攀岩线路。

他在北京市里没有房，平时住的是学校内的教师宿舍。2008年他花几万块钱买下了白河这处农家院，几乎每周末都过来住。何川说白河是他的第二故乡，而他的第一故乡是大山。

王苗与四姑娘山

攀岩分两种，在人造岩壁上的竞技攀岩和在天然岩壁上的探索性攀岩。何川2002年第一次接触的是竞技攀岩，一个喜欢户外的朋友带着他去了首都体育馆。在室内的人造岩壁上，何川没有找到乐趣。“现在回头看，开



2013年，何川和队友首次试攀四川布达拉峰，出发前在岩底大本营做晚饭。遗憾最终未能登顶

岩馆的人会在人造线路上故意设置一些难点，这是人工岩场的特点，但对初学者来说太难了。”那一年冬天，何川通过“绿野”户外网站参加了在河北涞源的攀冰活动，在冬天自然形成的冰崖上，他头一次感觉到了自由的畅快，“没有手点、脚点的限制，随便你去发挥，想爬哪儿就爬哪儿”。那次经历不仅让何川开始对室外攀岩感兴趣，也因此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攀登者，其中一位就是王茁，网名

“Kristian”，大家叫他“老K”，是中国最早一批开始研究攀岩的人，也是何川攀岩的启蒙老师。

2000年前后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攀岩爱好者。“那时物价不高，整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不太大，很多做IT的人收入挺高，就开始了攀岩，一直坚持至今。这个圈子里现在很多主力还是那时候参加的人。”那时大家没有什么攀岩的专业知识，“盗版岩与酒论坛”网站成了人们交流信息的地方。

岩友们在上面分析、翻译、讨论技术和攀登方面的相关知识，除了有国内的爱好者经常在里面发文，还有在国外的中国人，将他们在外面的攀登经验直观地分享给大家。“这个论坛一点都不浮躁，大家一点点积累直到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学习的宝库。”何川回忆道。王茁就是这个论坛的版主之一。

“盗版岩与酒论坛”成了岩友们的理论基础，而白河岩场则成了他们主要的实践地点。王茁那时是白河攀



(Alex Zhao 摄)



何川（左）和队友“裂缝”（中）、伍鹏一同攀岩时的旧照

岩基金的负责人。基金并不是一个实体组织，而是大家自愿地通过基金将捐款和物资聚集起来，购买专业设备，用于白河附近岩场的开线和维护。

从此何川便每周末跟着王茁去白河攀岩，从王茁那里学到了很多攀岩技术的知识，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天然岩壁。在天然岩壁上分为传统攀岩和运动攀岩两种。通常天然岩壁会有岩缝，攀岩者将机械塞或岩塞插进这些岩缝中形成安全保护来攀登，放一

个爬一段，再放一个再爬一段，下降时再将机械塞全部撤走，对天然岩壁不造成任何破坏，即所谓的传统攀岩。后来人们又发现在没有岩缝的地方也可以攀岩，攀岩者用电钻在岩壁上钻眼，再用膨胀螺栓设置固定挂片，根据岩壁的情况和预想攀岩线路的难度设置每个挂片位置，就是所谓“开线”。这种使用快挂设备配合固定挂片的攀岩，就是运动攀岩。

何川入门攀岩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他觉得这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小众运动，在岩壁上，永远只能靠自己。“我身材矮，也不够瘦，对于攀岩来说身体条件不算好。但我的性格适合攀岩，这是一种非常慢的运动，比走路、跑步、滑雪慢得多，不追求速度。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去注意细节，这些细节非常重要，搞错了就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何川将攀岩总结成四个等级，最低级别是攀岩装备，装备越现代越专业越好。第二级是攀爬者的身体力量、体能和攀爬技术。第三级是攀登实地经验，如何将装备与技术运用结合的能力。最后一个级别便是心

态和意志，攀爬者在关键时刻出现问题应该怎样判断，是选择抗住压力继续坚持还是撤退。那两年何川和王茁在白河开发新攀岩路线，何川自己的攀岩技术也越来越好。

2004年底，王茁在攀登四姑娘山骆驼峰时遇到雪崩，他和向导一起被雪崩冲下山，遇难了。这对何川的打击很大。2005一年，何川没有再攀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很迷茫、很难过。他对于我来说，算是攀登的导师，也是精神的支柱。他一离开，我就感觉失去了支柱，失去了灵魂。”王茁走之前，把白河攀岩基金的管理权交给了何川。于是在放空了一年后，何川决定开始专门负责白河新攀岩线路的开发，正是在那时，他积累起了探索未知天然路线的经验。相比成熟路线，在攀爬未知路线时，需要认真面对每一块岩石，浮石和松动的岩石都可能在攀登时产生危险，一路爬上去，攀爬者也是在清理岩壁。“成熟路线没有什么未知的，你的难度和长度都知道，并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你知道有人爬过，你知道有人能做到这些事情，你再去

做心里是有底的。而未知路线最大的挑战就是它的未知性，你在攀爬的过程中不停地在怀疑，不停地反问自己，这么爬到底可不可靠，行不行？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就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你不知道它可不可以通过。”

在经历了进阶训练后，何川不再满足于白河峡谷每段20~30米的单段或多段短途攀岩，他将目标瞄向了长度在500~800米大岩壁攀岩。“我想去爬更多、更高、更长的路线，我到处去找，那会儿就把目光留在了四姑娘山，也就是王茁去世的地方。”四川四姑娘山有很多大岩壁，纯岩石的山峰很多。利用寒暑假时间，何川考察了周边的很多岩壁，于是从2010年起，他和一两位岩友一起开始了在这些大岩壁上的训练，每年去两次，每次要在山里待上一两个月。每次和他一起去的人中就有伍鹏。

伍鹏与婆缪峰

伍鹏是“盗版岩与酒论坛”的创始人，网名“自由的风”，本职工作是游戏软件开发。他也是白河攀岩基金的创办者，王茁走后，伍鹏和何川一起在白河开了很多条攀岩线路，白河岩场中至今最有名的“老怪”线路就是经他手亲自开设的。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大岩壁攀岩记录，在网上也只能看到翻译的外国攀登者报告，何川和伍鹏2010、2011年一起在四姑娘山的各个大岩壁上训练，以积攒经验。他们并将目标瞄准了四姑娘山的婆缪峰。

“婆缪峰很美，第一次在网上的帖子里看到照片特别震撼，山顶特别尖，像金字塔一样。”何川回忆道。婆缪峰山峰高度5413米，岩壁长度1400米。他们训练准备工作完成了，但就在攀登婆缪峰前两个月，伍鹏的孩子出生了，伍鹏放弃了这次攀登。最终何川与岩友“五香芋岩”、“裂缝”组成三人小队在2012年8月开始了攀登。

何川说那是他至今印象最深的一次攀登。攀岩对天气的要求严格，下

雨会导致岩壁湿滑，机械塞松动，无法攀登。就在他们达到4100米大本营的那一天，雨还没有停，他们觉得第二天肯定没法爬了。没想到第二天何川一觉醒来，发现天晴了，三人赶紧收拾东西出发，从岩壁根部开始一直爬到了第二天凌晨3点，雨又开始下了起来。三人摸黑找了一个带仰角的崖壁岩石躲雨，直到6点多天晴了，他们再出发，顺利登顶。

第一段下撤就出事了。爬的时候何川领爬，通过绳索下降的时候也在最前面。他第一段下降结束后等着另外两人下降，其中一名队友的保护绳碰到岩壁使一块岩石脱落了，盘子那么大的落石正好砸到何川膝盖上方。他的腿瞬间肿得像面包一样，整个左腿弯不了，膝盖周围皮肤里全部充满了组织液和积血。“当时我以为完蛋了，因为我不知道骨头与膝盖有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腿受伤行动不了，就是灭顶之灾。太高了，另外两个人没法带我下去。”在等待另外两个同伴下降的时候，何川腿上的疼痛缓解了一些，这时他尝试用脚尖去蹬面前的石头，发现能发上力，说明他的骨头结构是完整的，很有可能只是肌肉受伤。“我觉得太幸运了，没有砸到膝盖。”换了一名队员开路后，他们继续下撤。下降的时候，三名队员利用一根绳子下降，绳子的顶端套在岩壁上的固定保护钩，三人全降完这段之后，再将绳子抽下来用于下一阶段的下降。然而婆缪峰的岩壁有很多裂缝，绳子抽下来的时候经常会卡在岩缝里，这时还需要一名队员重新再爬上去把绳子从岩缝里整理出来，下降后再抽出来。外加何川受伤，他们的速度大大降低。

三人都累坏了，原本打算轻装快速上下的他们随身携带的食物和饮水也开始紧缺。下撤的第一天晚上，三人只能坐在稍微平缓的岩壁坡上休息。“睡也睡不着，就坐着看一晚上星星，等第二天天亮气温暖和了再继续下山，非常艰苦，但我很开心，因为我捡回

条命。”就这样，他们花了两天时间才顺利降到岩壁底端。

婆缪峰的经历让何川真正感受到什么是风险。“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你知道这件事有风险，但好像觉得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只有我面临那一刻的时候，才开始知道风险与自己有关。无论如何安全是第一位的，要让自己安全回去。”那块落石只在何川的大腿上留下了像肉疙瘩一样的伤疤，但却没有影响到他的心理。他觉得风险分为两种，像落石或雪崩属于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只要攀登就无法排除，不如去接受它。另一种人为的内部风险，则可以通过提高技术、经验和心志来排除风险。“能不能成是上天注定的，我能做的是自己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把这件事做好。人这一辈子，总归得面对死亡。不抽烟、不喝酒、多运动，只能延长寿命的一点点，但不能改变本质的东西。所以生死由命，无所谓。我没想做什么事业，没想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想把握上帝给我这一次活的机会，好好利用好这个机会，过得快乐。攀岩就让我快乐。”

一般来说，攀岩者完成一座山峰或岩壁的攀登后，就不会再次去爬，继而转向其他的山峰。但何川两年后又去爬了婆缪峰，不过只爬到5000米高度。2014年8月，何川和队友孙滨一起攀爬布达拉峰，在岩壁上第一天爬了200米的两人挂好吊帐正打算睡觉，准备接下来几天冲击这座海拔5428米的高峰。夜里何川带的电话响了，电话另一头告诉他伍鹏在婆缪峰攀岩时出事了。原来出事后，伍鹏的队友从山顶撤下来，向外打的求救电话，而何川那时在山上正好有信号，就接到了这个电话。何川带着队友迅速从布达拉峰下撤，前往婆缪峰。当地景区管理局找了很多人去搜寻遗体，但他们不会攀岩。何川最后和队友从4800米的岩壁底部向上爬，在5000多米的地方找到了伍鹏的遗体。

伍鹏登顶那天夜里下着大雪，他

们登顶后决定迅速从5400米处下撤到5200米的一个沟槽处。当时攀登队伍食物和饮水都已经开始短缺，大雪带来了低温，夜晚大家在沟槽处坐着休息时把安全绳解开了。何川只听说第二天清晨伍鹏的神志不是很清醒，出发时从沟槽上坠下山。

何川回忆道，伍鹏和王茁2004年也曾打算去爬婆缪峰，但当时天气不好，等待几天之后他们就将装备藏在岩壁根部，约好了再来爬。同年年底，王茁就去世了。“婆缪峰一直是伍鹏的一个心结。”

这一次，何川没有迷茫。“伍鹏走了，我知道我要去做什么，我要做的是去攀登、去白河开线、去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像他在的时候一样，我觉得这也是他希望看到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希望看到的。”在“盗版岩与酒论坛”上，大家为伍鹏的家人捐款。现在登上论坛，“Kristian”和“自由的风”依然是部分板块的版主，“自由的风”发表的很多攀岩技术文章依然被顶在最前面。

何川与华山南峰

何川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2015年7月，他在华山南峰完成了全中国第一次独攀大岩壁。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何川采用了传统攀爬中“Big wall”的方式。由于下方没有队友保护，何川要先自己先爬上去一段，向上爬的过程中在岩壁上塞好机械塞保护自己。爬到一段后在顶端做好牢固的保护固定，再通过与安全绳连接的安全绳降下去把沿途的机械塞回收以待下一段继续使用。他降下去后再把装有吊帐和所有物资的吊包通过绳索拽到顶端的保护固定处，最后自己再爬上去卸下保护固定进行下一段的攀爬。“我要上一趟，下一趟，再上一趟，每一段都要这么爬。华山南峰岩壁虽然只有580米，但是我爬的总路程超过2000米。”

“就是难，每一步都很难。”开始攀爬的第二天，何川6个半小时里只向

上爬了40米。当时他就觉得总用时肯定会超出自己之前预计的4天，最终580米长的岩壁，何川爬了8天8夜登顶。“这么多年来攀岩给我的就是心态上的平和，遇到任何困难我知道怎么去解决。我不着急，慢慢来，没有别的办法，一点一点地解决，总能克服的。”

独自一人，何川面对的是无限的恐惧感。“有人在旁边和没人差的差距是巨大的。一个人的时候，要独自去面对所有的一切，出了危险，没人帮助我。但几个人一起攀岩的话，操作上有什么失误，旁边的人可以提醒。如果将锁扣取下来、再放上去算作两次操作。那么华山这580米的路线上，我估计做了2000次操作，每一次操作上的错误都有可能都是致命的。”正是这种恐惧感，使得何川高度集中。“当我面对生存问题时，这种警惕感使我完全专注在攀岩上，心里没有任何杂念，想的都是这条路线要怎么爬、后面会遇到什么问题，我会把我所有本事全部使出来。而当我完全投入进去，我就觉得特别快乐。”

何川最大的恐惧是怕保护安全的机械塞失效，从岩缝中脱落。华山上，何川每晚会将吊包中的帐篷展开，架在固定保护上睡觉。“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它会不会脱落出来。”何川只能每晚多放几个固定保护在帐篷下面，来缓解心理的压力，好在爬了一天他通常非常累，展开帐篷吃完饭就困得不行，没法多想什么就睡着了。何川一直坚持在大岩壁上使用干净的传统攀岩方式，只用机械塞安插在岩缝里，不用电钻和膨胀螺栓。膨胀螺栓结实可靠，放上它之后攀岩者就不用担心脱落的问题，会减少很多心理压力，但安上去之后永远取不走，会对岩壁带来永久的伤害，也不符合对环境低冲击的原则。“不使用膨胀螺栓，也是勇于承受压力的方式。”

何川说这种恐惧是心底一种隐隐的担心。“尤其自己一个人，心里的无助感和恐惧感无法通过与别人的语言交流来化解，这种无形的压力存在心

底，越积越多。但绝对不能释放出来，一旦压不住了，就会导致崩溃，就没办法再攀登了。”何川见到过别人崩溃的状况。2014年他曾经和搭档阿飞攀登过华山大岩壁的另外一条线路。何川领爬，阿飞跟爬。爬的时候绳子钩住了岩缝里一块松动的石头，岩石掉落，正好砸在阿飞脸上，他眼睛、鼻子、嘴唇都被砸破了，满脸是血。“然后他心里面的恐惧和担忧全部被释放了出来，整个人就崩溃了。”后来何川独自搭好了两个人睡觉用的吊帐，做好饭，阿飞始终没有干任何事。所幸第二天早上，阿飞的伤口结痂了，他也恢复了正常理智，两人最后安全登顶。

独攀华山大岩壁给何川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人独攀大岩壁，但在中国却是第一次。这对我自己来说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没有人专门传授我这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全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世界权威攀登媒体《Rock and Ice》也曾第一时间在头条报道了何川独攀华山的新闻。

“生死我都经历过了，现在面对很多事情我都看得很淡，宠辱不惊，谁也不怵。”如今的何川过着游离于常规的生活。在北理工要教的课程很少，他自己也不想评职称或者研究领域再做过多次尝试。平时炒股票，周末开车去白河攀岩，每年利用学校放寒暑假的大块时间去各地攀登大岩壁或者攀冰。白河的农家院和白河攀岩基金是他现在日常生活的重心。“现在去白河的人很多，除了攀岩的，还有很多去钓鱼的、烧烤的，有些人可能不太注意，人一走，周围都是垃圾。”如今白河攀岩基金不仅负责维护岩场攀岩线路和开新线，也负责保护当地自然环境。何川还在筹备新项目，通过白河攀岩基金的资深攀岩者，让更多的初学爱好者来白河参与室外探索性攀岩。

对于未来，何川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只想攀登更多的山峰。“我希望到70岁的时候还能攀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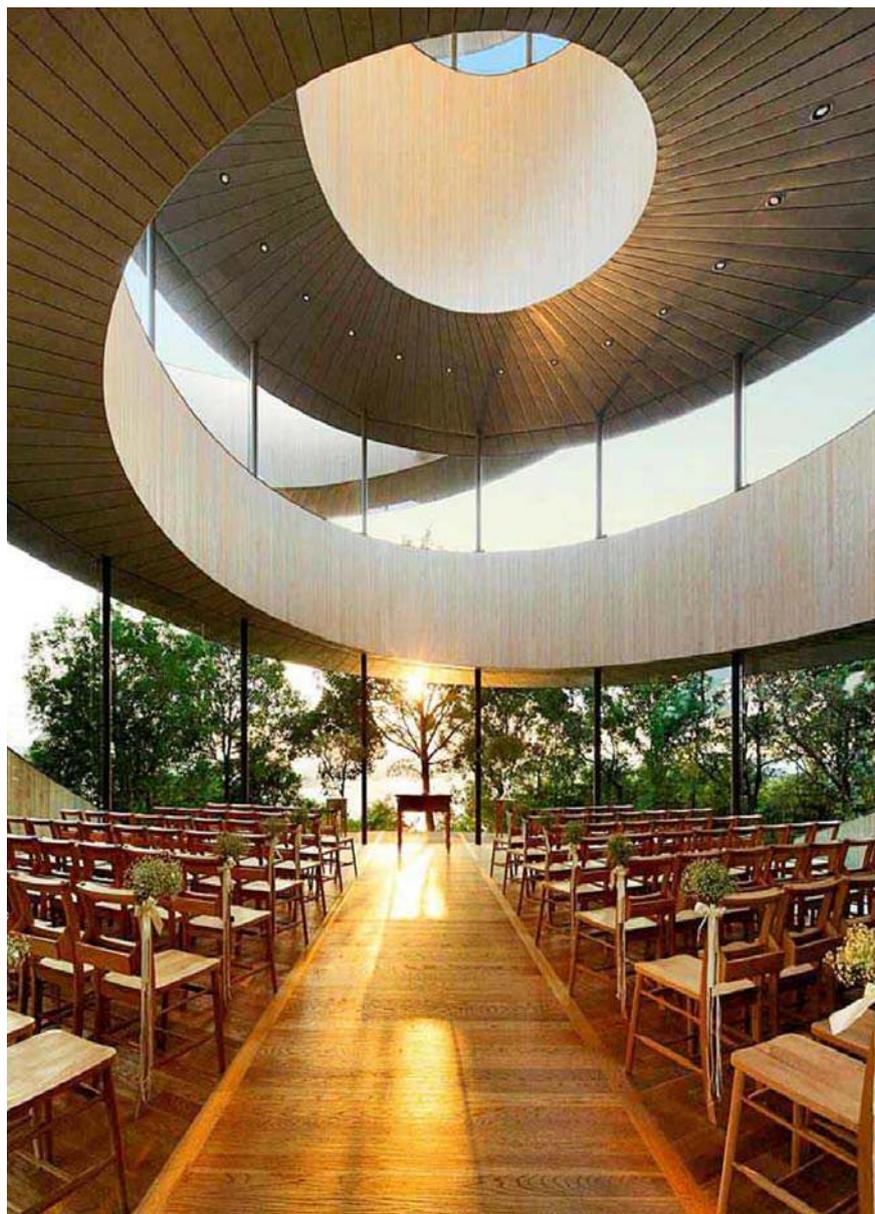
位于广岛的“丝带教堂”。用一个纯粹的建筑形式象征婚姻的结合



东京爱马仕专卖店 L'Ecrin。玻璃外墙带有独特的人字图案



广岛的“光学玻璃房”。阳光穿透玻璃砖不规则的表面在内部形成波光粼粼的背景



“丝带教堂”的楼梯同时承担了屋顶、屋檐、墙壁等功能

恋爱中的建筑

“我的目标是让建筑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让人对建筑产生一种亲近感，让这种亲密关系变成一种双向的交流。”

主笔 / 钟和晏 图片提供 / NAP Co.

一个纯粹的建筑形式如何象征婚姻的行为？日本建筑师中村拓志最近完成的“丝带教堂”，让两条螺旋形楼梯从两个不同的点出发，相互缠绕着

缓慢地上升，在 15.4 米的高度无缝对接。如同两个人经历生活的曲折之后，最终结合在一起。就这样，一座由路径组成的建筑物，做出了它对一场难

忘婚礼的贡献。

这座婚礼教堂位于广岛尾道一家度假酒店花园的半山腰，远处就是美丽的日本内海。但是，花园四周被 10



集合住宅“跳舞的树木，唱歌的鸟儿”让所有的住户都拥有一间树林边的小屋

米高的大树包围，无法眺望到海景。中村拓志说：“所以，我们把教堂的形式延伸到高于树木的高度，同时获得了一个观景平台。”

通常建筑物由屋顶、墙壁、地板等不同部分组成，在这里，两条缠绕在一起的楼梯同样承担了屋顶、屋檐、墙壁等功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结构，由此产生的内空间就是80个座位的小教堂。中央走廊的尽头，正对着一棵蕴含象征意义的绿树，祭坛设在这棵树前面的位置。

这是由单一材料实现的纯粹设计，“丝带”的外表皮采用漆成白色的竖条木板以及钛锌合金，合金有足够的柔韧性达到需要的曲率，还能抵御海风的侵蚀。单个螺旋楼梯在水平方向上是不稳定的，容易从垂直方向产生振动。加入两个相互支持的螺旋形楼梯，通过连接四个方向的四个点，两条楼

梯越来越互相接近，产生了一个三维箍环的效果，用于限制向外膨胀以及抵抗水平力。

但是，“丝带”的宽度不尽相同。楼梯根据不同位置和功能被适当加宽，比如顶部的观景台或者为室内遮挡阳光的屋檐处。

婚礼教堂这一类建筑需要遵循特定的路线设置，这座结构独特的建筑物让婚礼仪式变得更具象征意义了。新郎和新娘从两条“丝带”的不同出发点，各自登上楼梯，沿途海洋、高山、天空以及远处的岛屿等美景先后出现和消失。两人在顶部相遇，获得上天的祝福结为夫妇后，再携手一起走下楼梯。参加婚礼的宾客坐在下方的大厅，目睹整场动人的仪式。

丝带教堂的占地面积有2500平方米，但楼面面积只有80平方米。“虽然只是一个小建筑，我们考虑到新郎新娘

的情感以及监礼人的想法，把楼梯延伸到160米的总长度。”中村拓志说。

今年40岁的中村拓志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曾经在隈研吾建筑事务所工作过三年。2003年，他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如今拥有一个21名员工的团队。

一直以来，他对“好建筑”的定义是如何在人与建筑物之间创造关系，如何用建筑空间丰富及加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连接。如果说他的作品特征在于对光线的偏爱、空间的敏感性以及与自然的关系，其中，大自然而不是都市的影响更为重要。

“我的典型工作方式就是站在基地现场，从各个可能的角度仔细分析，这是建筑过程的开始。”他说，“具体到建筑设计态度，我认为应该乐观与悲观共存，这两者的平衡至关重要。作为建筑师，以乐观的态度为人们的



Roku 私人艺术馆形成一种人、建筑物和树木紧密偎依在一起的效果



Roku 私人艺术馆内部空间

生活想象和设计更好的空间，同时以一定程度的悲观自我节制，尤其在监督过程中，确保每个细节经过严格测试，来应对无数潜在的问题。”

29岁那年，他以法国时装品牌朗万（Lanvin）在东京银座中央大街商店的室内设计获得最初的知名度。他赋予了商店一面独特的透明丙烯酸外墙，将大约3000个小的亚克力圆筒埋入其中，如同朗万把钻石缝缀在黑色晚礼服上。

要制造出这样的效果，普通的窗户是无法到达的，只有无框窗户才能更纯粹地表现光线的质感变化。作为合作伙伴，中村拓志找到宫城县一家造船集团“高桥工业”，利用亚克力管热胀冷缩的性能，用“冷镶嵌”技术来制作他想要的外墙。

这是颇为复杂的过程，首先，把以纳米为单位切割的圆筒焊接在铁板

壁上，然后，对直径6厘米的亚克力无尘圆柱进行低温冷冻。亚克力收缩后，迅速插入切割好的铁板壁圆筒中。恢复常温的过程中，亚克力逐渐膨胀回到原来的大小，与外圈的铁筒牢牢地嵌合在一起。

因为有了这堵透明的圆筒外墙，白天，商店室内受阳光变化及过往行人衣服色彩的影响，光线如钻石的光芒洒落一地，店里的人们被变幻的光线温柔地包围着。到了夜晚，店内光线从里往外流出，外墙如满天星一般璀璨。

同样是利用物质的温度差进行镶嵌的工艺，后来又被中村拓志用于东京爱马仕专门店L'Ecrin的设计。客户要求临街的商店视线开阔，同时又要保护消费者的隐私，因此，他构想了一面带有复杂图案的玻璃幕墙，应该像玻璃首饰盒一样晶莹剔透。普通

压花玻璃缺乏透明度，切割玻璃又有成本问题，他从爱马仕手袋名为Chevron的内衬获得启发，发展出一种特有的人字形图案玻璃。

这一次的制作是先将12毫米厚的隔音玻璃安放在人字形的不锈钢框架上，一起放入窑中加热到675摄氏度，达到玻璃软化的临界点。玻璃的软化过程中，出于重力它在框架之间下沉10毫米到13毫米，自然地形成了与不锈钢框架相同的人字形图案。

广岛的私人住宅“光学玻璃房”的设计中，他又一次借助了玻璃材料美妙的视觉效果。房子位于繁华街道旁，为了挡住城市的喧嚣和车流的声音，他用总共6000块5厘米宽的光学玻璃砖，砌起一道13吨重的玻璃砖墙，玻璃墙后面就是青翠的庭院花园。光学玻璃的高透明度来自材料中的硼硅酸盐成分，不仅隔绝外界的噪音，阳

光穿透玻璃砖不规则的表面，又在内部空间形成波光粼粼的背景。

还是2004年初，刚创办事务所不久的中村拓志接到一项委托，为东京都港区一个四口之家建造住宅。房子位于青山的密集街区，马路是朝北的，对面是公寓楼的阳台，即使开了朝向马路的窗户也得整日拉着窗帘。所以，他的方案是临街用全封闭的白墙，然后打通三层到地下一层的空间，在房顶开设天窗，让阳光从屋顶直射下来。

人口密集的都市环境里，这座小房子占地面积仅仅40平方米，完成后的总建筑面积只有87平方米。保证地面停车空间之后，每层只有4米×5米的空间。为了改变客厅里墙壁的压迫感，他试着将客厅的墙壁朝外推出去，用三维模板浇筑混凝土制作弯曲



“当我看到小女孩与凹墙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何不将人与建筑的恋爱作为目标呢？”

的墙面，改变了墙壁平直的形状。

住宅交付时，业主的女儿最先奔向那个凹陷的墙壁，她快乐地坐在贴合身体的凹陷处，或者把墙壁当作滑梯玩耍。后来，中村拓志在《恋爱中的建筑》一书中写道：“当我看到小女孩与凹墙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何不将人与建筑的恋爱作为目标呢？让建筑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让人对建筑产生一种亲近感，让这种亲密关系变成一种双向的交流。在人们与建筑接触得到的感性体验和语言中，蕴含着连接社会的力量。”

不仅仅是人与建筑的关系，还有它们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这从东京市中心惠比寿的集合住宅项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住宅基地位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1700平方米的建筑用地南侧被高度超过15米的树木包围，以大概40米的宽度延展成一片树林。“当

时的感觉是，地价再高，出于经济因素及效率而砍伐掉这些树木，实在叫人于心不忍。”设计原则被确定为极力保存现有的树木，每间公寓设法嵌入树干和树枝之间，同时确保容积，提供最大限度的可用空间。

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先用三次元模板制作弯曲的混凝土墙面，然后对树枝逐一进行激光扫描测量，用电脑三维模拟台风期间树枝摇摆的幅度。房间设置将避开树木会移动的区域，用悬臂固定在树枝振幅之外。为了不损伤树根，还请树木专家查看和推算树根的分布位置，地基以及构造墙有意做了退避。

“建筑术语中，为了建造地基而挖地叫作‘斩根’，与此相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生根’。我着眼修建的不仅

是为人的居住而存在，也是为了树木以及鸟儿们而存在的房子，这样的体贴为建筑物带来独特的善意。”中村拓志说。

出于这样的体贴与尊重，房屋为了给树木让路而发生了形变，屋顶高低不一，但是所有的住户都拥有了一间树林边的小屋。这片住宅被命名为“跳舞的树木，唱歌的鸟儿”，风吹来的时候树木摇曳起舞，树林里有鸟儿的歌声传来，阳光滤过繁茂的树枝，给人美好生活的感觉。

后来的Roku艺术馆也是延续了与此相似的脉络，不同的只是新种植的树木。在栃木县小山市的商业街上，业主要在那里建一个小型私人美术馆用于展示已故父亲收藏的画，以及一个沙龙氛围的咖啡厅。不过，地块在马路旁边，来往车辆很多，绿化却少。所以，建筑师决定先在地块内种植树

木，形成一个适合鉴赏绘画的清静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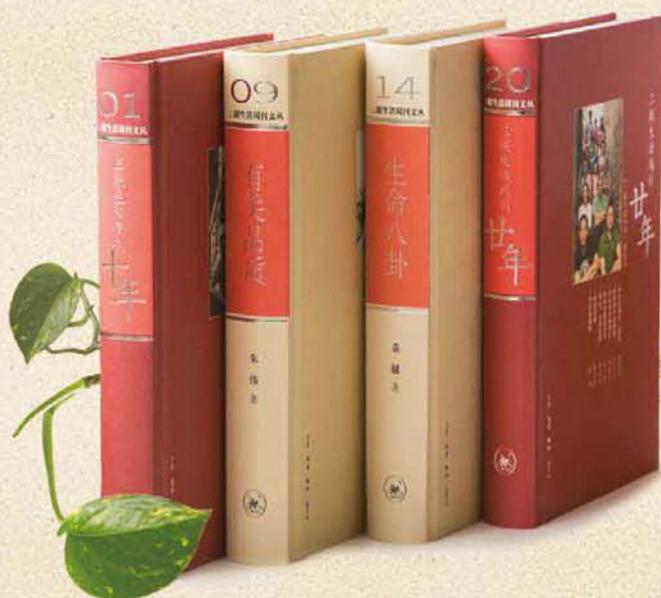
一般来说，建筑师会在建筑主体完成之后，再着手园林景观的设计，Roku的设计却是先选择适合移植的树种。常绿乔木种在北侧，冬季的时候挡住寒冷的北风，落叶乔木种在南侧，以便夏季遮挡阳光，花园小径两侧则种植带有芳香的花草树木。基地上总共种了三排树，每排6棵，接近网格图案。每棵树的枝干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整个场地未来完全可以被绿树覆盖。

艺术馆用地面积7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与“跳舞的树木，唱歌的鸟儿”相似，事务所用三维测量和电脑建模的方法计算树枝的布局生长以及强风下的摇晃程度，利用这些数据，在树木的缝隙之间展开建筑。房子必须适应树木的布局，与它们相互混合在一起。画廊展室被插入场地后方的两排树之间，咖啡馆的地面略微抬高，突出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

某种意义上，树木形成一个厚厚的隔膜，轻柔地包围着建筑物，不同季节里控制阳光、风、湿度等自然因素，释放氧气吸取二氧化碳和污染气体。为了让观众在艺术馆里也能感受到树木的存在，天花板和墙壁采用柔和的曲线，形成一种人、建筑物和树木紧密偎依在一起的效果。

因为入口处刚好在低树枝的下方，天花板的高度不得不降低到1.7米，穿过树枝后的内空间，再不受制约地一气拔高到6.2米。就像日本传统茶室的爬行通道，人们不自觉地低头弯腰穿过入口。咖啡馆部分的天花板同样很低，沿墙放置长条板凳，给人躲在树荫下的感觉。

在中村拓志看来，虽然Roku艺术馆的建造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周折，由此衍生出的情感会渗透到人、动物、树木之中。也许，这样的情感共享，唯有建筑能实现。■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盛夏特惠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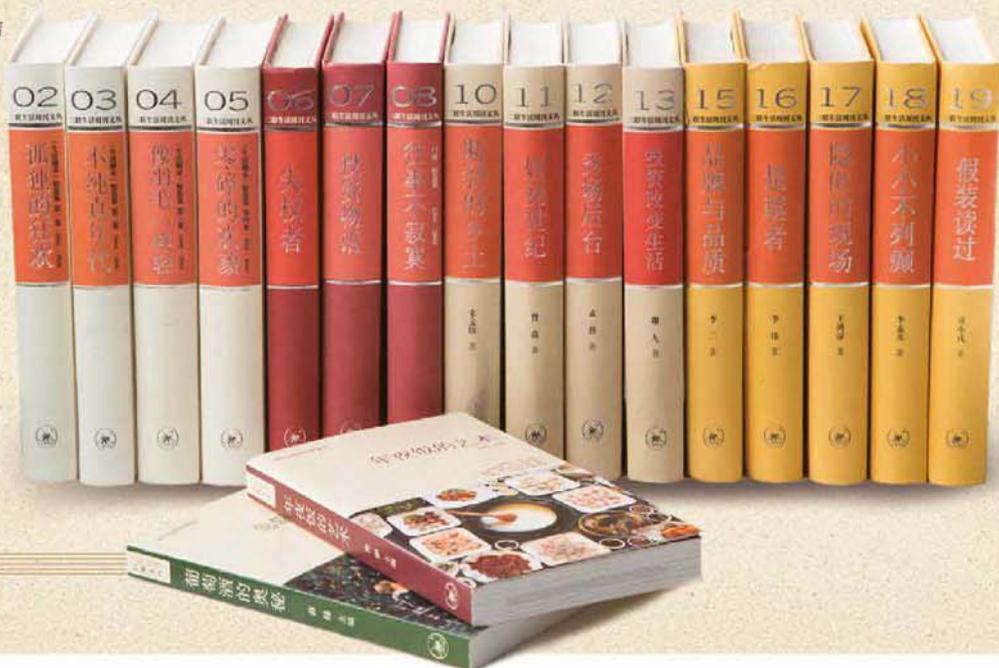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丛，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丛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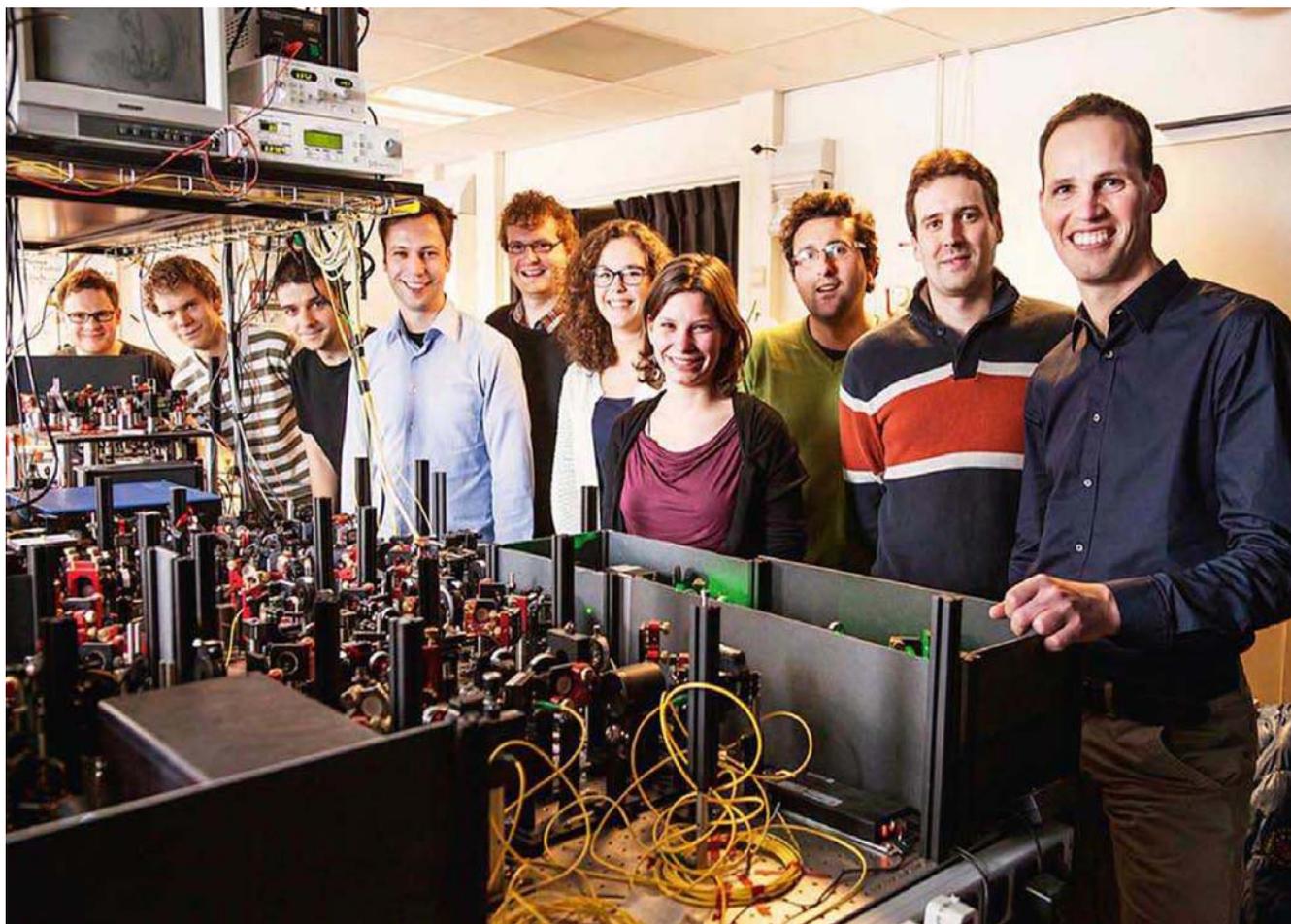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十年	孤独的狂欢	不纯真年代	像羽毛一样轻	零碎的欢颜	失权者 / 李鸿谷	投资物语 / 邢海洋	往事不寂寞 / 李青	有关品质 / 朱伟	断裂的乡土 / 朱文颖	妖娆世纪 / 曹霖	秀场后台 / 孟静	投资改变生活 / 谢九	生命八卦 / 袁越	品牌与品质 / 李二	超越者 / 李伟	隐匿的现场 / 王鸿禧	小小不列颠 / 李孟苏	假装读过 / 贝小戎	十年「精装版」	廿年「平装版」	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丛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荷兰代尔夫特科技大学的物理学家罗纳德·汉森（右一）和他的研究小组成员

爱因斯坦错了吗？

在爱因斯坦的头脑里，制定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上帝一定是一个有花白头发的老人，他经常称之为“老头子”。

文 / 苗千

这当然不是某种真实存在的人格化的神明，在爱因斯坦的心目中，上帝指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是自然规律的化身。多次明确表示过自己无神论者身份的爱因斯坦和当时大多数的欧洲人一样，习惯把“上帝”挂在嘴边，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或许就是：“上帝不是在掷骰子。”——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爱因斯坦对于量子力学的态度。

最近，一篇尚未通过同行评审正式发表的论文使爱因斯坦又一次上了许多科学媒体的头条，这有关量子力学的本质，也有关爱因斯坦对于量子力学的态度。长久以来，这位相对论的发现者一直是以反对量子力学的形象出现的，他坚持认为量子力学有其自身的不完备性。而这篇论文利用一个漂亮的实验证明了量子力学中或许

是最令人迷惑的现象——量子纠缠现象——恰恰存在着最令爱因斯坦感到困惑的“鬼魅般的超距作用”，这是量子力学的又一次胜利。

但是，爱因斯坦真的错了吗？

2015年8月24日，荷兰代尔夫特科技大学的物理学家罗纳德·汉森（Ronald Hanson）与合作者们共同在网上提交了一篇论文《利用相隔

1.3 公里的电子自旋纠缠无漏洞实验对贝尔不等式的破坏》(*Experimental loophole-free violation of a Bell inequality using entangled electron spins separated by 1.3km*)。这篇论文迅速吸引了物理学界，进而是世界媒体的关注，《自然》(*Nature*) 杂志更是针对这篇论文专门撰写了一篇介绍性的文章。

量子纠缠现象是量子力学中最核心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不同物体的某种性质之间一旦形成某种“纠缠态”，那么它们之间无论相隔多远都会产生瞬时的相互影响，这种瞬时作用显然违反了相对论（相对论描述宇宙中最快的速度是光速），因为如此，爱因斯坦认为量子纠缠现象证明了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

20 世纪 60 年代，爱尔兰物理学家约翰·贝尔 (John Bell) 提出了著名的“贝尔不等式”，这个不等式成为判定爱因斯坦所主张的“定域隐变量理论”与量子力学非定域性孰是孰非的关键。从 1981 年开始，不断有物理学家通过实验验证贝尔不等式，每一次都是量子力学的非定域性取得胜利，看来，量子纠缠确实是一种超距作用。尽管如此，因为量子纠缠实验对于精度要求很高，每次实验总会存在一些漏洞，为定域隐变量理论留有一丝余地。

罗纳德·汉森与合作者们最近在荷兰进行实验，他们利用微波脉冲分别冲击两个相隔 1.3 公里远的钻石晶体中的电子以形成纠缠态，然后再使这两束微波脉冲的光子在中点相遇，让光子之间形成量子纠缠，这样相隔 1.3 公里的两个钻石中的电子也就形成了相互纠缠。之后，实验者再对相隔 1.3 公里远的两处的电子进行测量。如果这两地之间存在着某种通讯，即使是以光速传播，也需要 4.27 微秒的时间，而测量只需要 3.7 微秒，从而

杜绝了两地之间进行通讯的可能，实现了世界上首次无漏洞的量子纠缠实验，而这次实验，又一次实现了贝尔不等式的破坏，证明了量子力学非定域性的胜利。

尽管大多数物理学家在此前都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人们仍对这个实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维也纳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安东·蔡林格 (Anton Zeilinger)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实验，他说：“定域性的观念植入在人们的日常思维中，甚至连物理学家也是如此，因此进行一个无漏洞的（量子力学非定域性）实验非常重要。”滑铁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马修·莱费尔 (Matthew Leifer) 甚至认为这是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实验。

实验毫无疑问地证明，处于纠缠态的粒子之间，确实存在着非定域性的瞬时作用。那么，爱因斯坦错了吗？可以说，爱因斯坦对于量子纠缠的判



目前从现象上来说，量子纠缠确实违反了相对论，并不存在爱因斯坦所假设的“隐变量”。

断确实错了，目前从现象上来说，量子纠缠确实违反了相对论，并不存在爱因斯坦所假设的“隐变量”，但是爱因斯坦对于量子力学完备性的质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恐怕仍然无法解决，并且会一直激励着物理学家们进行探索。

作为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爱因斯坦并不反对量子力学。实际上，爱因斯坦从未坚持物理学的决定性，他对于量子力学非决定性的理解远比一般人更加激进。问题在于，爱因斯坦始终坚持认为，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在量子力学之下，还隐藏着更加深刻的物理学原理，才使量子世界呈现出概率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量子现象是概率性的，但量子理论却是决定性的，薛定谔方程正是精确的以决定性的方式描述波函数的演化。而一个量子领域的粒子在测量中呈现出何种状态，则取决于波函数的“塌缩”(collapse)，这正是尼尔斯·波尔 (Niels Bohr) 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所阐述的量子力学的重点，也正是爱因斯坦最不能同意，并与波尔争论了半生的焦点问题，“上帝不是在掷骰子”这句话，正是出自这样的语境中。爱因斯坦并不反对量子力学，但是他完全反对哥本哈根学派对于量子力学的解读。

无论是提出了波函数概念的埃尔温·薛定谔 (Erwin Schrodinger) 还是奠定了量子力学数学基础的维尔纳·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都始终没有承认波函数在量子力学中的核心地位，但波函数以及波函数塌缩的概念因为与实验现象相吻合，随

着哥本哈根学派的兴盛，逐渐成为物理学界的主流观点，而问题从未消失：波函数究竟是什么？是一种纯粹用于计算的数学概念还是一种切实的存在？它以怎样的形式存在，而当人类对一个量子系统进行测量时，波函数又是如何发生了瞬时塌缩，它为什么可以违反相对论对于速度极限的束缚？测量的本质又是什么？量子力学是否只是对于量子现象的描述性的理论，是否存在更深刻的理论可以解释量子力学？可以说，在这些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问题被解答之前，爱因斯坦与波尔的争论就仍然没有结束。■

(本文写作参考了《自然》杂志和《科学美国人》杂志的报道)

沙拉真的有益健康吗？

文 / 袁越

人类爱吃的很多种食物都有健康问题，白米饭缺乏营养，红烧肉脂肪含量太高，方便面盐太多，巧克力热量太高……唯独沙拉名声一直特别好，想减肥的人觉得沙拉热量低，想健康的人觉得沙拉营养价值高，沙拉仿佛是一位冰清玉洁的仙女，人人都想亲近她。

沙拉真的有那么好吗？

先说热量。沙拉的热量

不见得比普通食物低，原因在于很多厨师为了让沙拉更好吃，往里添加了很多高脂肪高热量的肉块或者沙拉酱。这里面的道理很容易理解，但问题却不那么容易解决，因为光吃生蔬菜很难让人产生饱腹感，吃完跟没吃一样，没几个人能吃得惯。

再说营养。很多人之所以喜欢吃沙拉，就是因为生蔬菜比煮熟的蔬菜含有更多营养。这个想法从理论上讲是没错的，但大多数蔬菜并不适合生吃，尤其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于是饭馆里卖的沙拉往往只含有少数几种比较适合生吃的蔬菜，可惜这些蔬菜的营养价值往往是最底的。

曾经有人统计了常见食品当中含有的 27 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的含量，排名最低的 5 种蔬菜当中有 4 种都是制作沙拉的常见原料，包括黄瓜、小萝卜、生菜和芹菜（另外一种为茄子）。这 4 种蔬菜当中，生菜（Iceberg Lettuce）的营养价值最低，但沙拉里却用得最多，因为生菜不但便宜，而且很占地方，视觉效果也更好。

这 4 种蔬菜之所以营养价值低，最大的原因就是含水量太高了。就拿生菜来说，其含水量高达 96%，和瓶装水相当。瓶装水当中的 4% 是塑料瓶的重



量，生菜当中的 4% 则是营养物质的唯一来源。当然，大部分蔬菜的含水量都很高，96% 并不奇怪，可问题在于生菜这 4% 里面含有的营养物质也太少了。据统计，超市或者饭馆里提供的一份正常大小的以生菜为主的沙拉只含有大约 1 克的食物纤维，只相当于一只中等大小苹果的四分之一。生菜中含有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也很少，一份生菜沙拉只能提供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量的十分之一，难怪一位《华盛顿邮报》记者把生菜定义为“一种把冷冻的水从农田运到你家餐桌的运输工具”。在她看来，种植生菜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运输生菜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化石燃料，其结果却只相当于运水，实在是得不偿失。

生菜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味道中庸，没有明显的苦味或者异味，对于不同口味消费者的适应性非常广。饭馆和食品厂家最喜欢这样的品种，农作物育种家自然也会朝这个方向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蔬菜越来越没有“味道”的主要原因。蔬菜中的这些苦味大都来自植物特有的小分子化合物，吃多了有可能中毒，植物之所以进化出这些小分子就是为了自卫，而人类之所以觉得它们苦，也是一种进化出来的自我防御机制。

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微量的苦味物质反而有利于健康，原因在于它们往往具有抗氧化的特性。抗氧化物质的健康功效近年来遭到了一些质疑，但主流科学家还是相信它们能够消除炎症，杀死癌细胞，以及防止血管硬化，因此它们被统称为“植物营养素”（Phytonutrients），这是蔬菜之所以有利健康的主要原因。

换句话说，当沙拉中的蔬菜变得越来越好吃时，其营养价值也就越来越低了。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植物营养素有益健康，人类为什么反而进化出讨厌苦味的偏好呢？这是因为植物营养素的好处往往需要等到年纪大时才能体现出来，此时人类早已完成了生育任务，而苦味物质一旦有毒的话就会杀死任何人，尤其是体重较轻的小孩子，这就影响到了人类的繁殖，而繁殖才是决定进化方向的唯一要素，一种优良性状如果不能影响繁殖，那就很难被进化出来。

这个思路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人类为什么喜欢吃煮熟的蔬菜，经过高温处理的蔬菜不但更易于消化，而且其中含有的病菌也会在高温中被杀死，吃起来更加安全。虽然这么做破坏了蔬菜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但这个缺点对于原始人来说没那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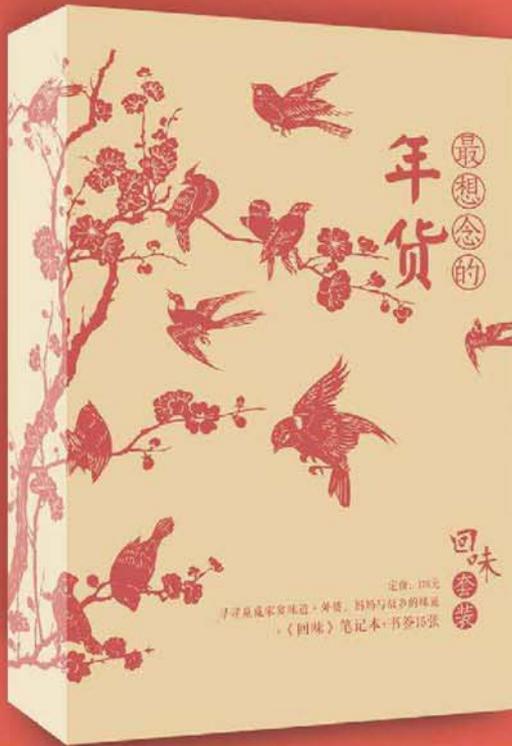
事实上，这就是沙拉的另一个问题所在。据统计，美国在 1998 ~ 2008 年发生的食物中毒案例中有 22% 源自不干净的沙拉。

总之，沙拉从理论上说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吃到的沙拉真不一定有益健康，各位“吃货”就不要盲目崇拜沙拉了。☑

回味 套装

内含

- 寻寻觅觅家宴味道 + 外婆、妈妈与故乡的味道
- 《回味》笔记本
- 书签15张



定价 176元

售价 149元

8.5折
优惠 + 包邮

多种购买渠道，只需扫一扫



微店



淘宝

拨打电话购买：010-84050425 / 84050451

官方商城地址：<http://shop.lifeweek.com.cn>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 寻寻觅觅家宴味道+外婆、妈妈与故乡的味道

- 2013 / 2014两年踏察，持久专注，总计超过600页的寻味记录。
- 绝版杂志，最后的收藏机会。

▼ 《回味》书签



- 一套15张
- 属于所有中国人的年味心情

▶ 《回味》笔记本

- 硬面抄
- 248总页码
- 58幅印刷精美图文
- 大量空白页，方便书写涂鸦



游子联队

文 / 张斌



8月27日，德国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邀请难民在西格纳伊度纳公园球场观看球赛

3岁孩童溺亡在海滩上的照片迅速传遍世界，刺痛人心，不敢更多直视那姿态活脱脱像个洋娃娃一般的小生命。难民潮平地风雷，星夜赶路，冲破阻拦，投奔生的希望，欧洲的怀抱试图承载世界之痛。教皇呼吁每一位信徒都可以收留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家庭，芬兰总理让出自己在北方的一间居所给渴望落地生根的游子。

德国，如今欧盟之中坚，面临难民潮担当自然更多些，预计会有80万来自中亚和北非的难民涌入这个国家。难民潮汹涌，初到异境，颠沛流离之人最渴望的是笑脸、食物以及安放疲惫身躯的一张床。在街边，他们会瞥见三两市民举在胸前白纸上的“欢迎难民！”这一小小举动足以让奔波千里的难民们坚信，这里就是幸福的终点了。

如果220名难民被邀请去观看多特蒙德欧联杯的主场比赛，那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小小的白纸换成了巨大

的横幅，个人的态度凝聚为城市的温暖，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的义举实际上是“抵达多特蒙德”城市行动的一部分，20年前在威斯特法伦球场上还曾出现过纳粹举手礼，如今的温暖行动算是对种族歧视的最好反击。20年间，多特蒙德俱乐部曾资助两个民间组织一项名为“联合运动”的行动，努力融和种族和文化日益多样的球迷群体，甚至还曾组织球迷去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过去一周内，德国足球赛场上处处可见“欢迎难民！”的标语，一个名叫“希望并拒绝仇恨”的民间组织将各赛场感人场景的照片拼合在一起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引得万人点赞。其实，早在一年前，在汉堡队的赛场里就曾飘扬起“欢迎难民！”的旗帜。在足球圈中一向乐于扶危济困的拜仁也有行动，他们将专门为难民募集善款100万欧元，并在城中建设专门接待新入境难民的足球训练营，提供德

语培训、免费餐食和训练装备。德国国家队也迅速行动，请出施魏因斯泰格、厄齐尔和博阿滕等五位国脚拍摄了“欢迎难民！”的宣传片，德国足球人坚信，足球俱乐部具备多样性、宽容性和世界性，游子们凭借着足球这种世界共通的语言可以走进每一个陌生的世界。英国足球界也行动起来，9月12日，92支联赛球队有可能在赛场采取统一行动，竖起“欢迎难民！”的横幅。波尔图队也发出倡议，32支欧冠球队从每张售出球票的票款中捐出1欧元给难民救助组织。

3年前，《游子联队：一支难民球队可以改变一座城镇》的小书在美出版，详尽描述了在亚特兰大附近小城中发生的真实故事，女教练卢玛主动招募来自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新移民，组成一支足球队，移民渐多的小城一度因为文化冲突而发生撕裂的社区关系得以弥合，落地生根以及他乡变故乡都成为可能，足球成为彼此认同的最好方式。

“游子联队”也有德国版，慕尼黑郊外有家业余球队——ESV Neuauibling俱乐部，如今已接纳了34名新移民球员。起初，因为俱乐部紧邻阿富汗移民社区，进入俱乐部的多为阿富汗裔球员，随后有了伊朗人、突尼斯人、波兰人、厄立特里亚人、尼日利亚人。俱乐部中的德国教练巴特博德要求所有移民球员不要再自称“难民”，他们已经被德国接纳了，说着流利的德语，有正式的工作，新生活早已开始。今年6月，巴特博德向德国足协注册成功，第一支完全由昔日难民身份球员组成的球队将正式加入联赛体系之内，所谓落地生根就是如此吧。☑

“高、大、上”的猜想如何兑现？

文 / 宋晓军

我在“9·3大阅兵”前一天面市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写了篇专栏文章——《对大阅兵‘高、大、上’的猜想》。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文章中的猜想第二天就被中国领导人一句“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给部分兑现了。事后，有看过文章的媒体朋友问我：你的猜想如何才能全部兑现呢？我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天使在想象中，魔鬼在细节里。

说到全部兑现“高、大、上”的猜想，本质上是猜想军队以裁军为起点在规模和结构上的现代化改革是否能够成功。通常而言，改革方案的设计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并不取决于改革波及到的群体和集团对改革方案的设计全部满意。恰恰相反的是，改革所波及到的群体和集团中所谓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一开始对改革方案的设计一定会感到不满意。套用—个政治化的比喻就是，“保守派”只希望改良，而“激进派”则更希望革命。但是从此次军队改革的可操作性上看，两者显然都不符合军方之前确定的现代化阶段性目标——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有重大进展。换句话说，前者只是希望在军队的规模和结构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让军队接纳一些新型装备；但后者则更希望颠覆性地改变军队的规模和结构，并最大范围地将新技术应用于装备和融入编制体制及作战原则。而这次军队改革，很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操作。

至于如何实现此次介于两者之间的操作，9月3日当天在国防部发言人回答有关裁军30万的问题时，用了一句“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

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似乎已经透露了一些方向性的“细节”。可是鉴于我的专栏文章中举了1985年以裁军100万为起点启动军队改革的例子，那么就不妨将相隔30年的两次以裁军为起点的军队改革做一个对比，去发现一些标志性的“细节”。简单说，30年前开启的那次军队改革，由于国家经济刚好处在转型的不稳定周期，在那次军队改革开启后的几年里，基本是一种“减量改革”，即在国防开支连年下降和经济接连通胀的情况下，试图完成军队的规模和结构调整。最终对在“减量改革”中出现的缺失，不得不一度以“军队经商”加以弥补。而“军队经商”给军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已历历在目。那么30年后以裁军为起点的军队改革会不会重蹈覆辙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可以借鉴一下9月2日《亚洲时报》引用英国简氏集团首席防务预算分析师卡弗里（Craig Caffrey）的一个分析。

卡弗里分析的大意是：按保守的估计，中国国防开支在未来5年将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会达到2600亿美元左右（卡弗里的计算依据是2010年中国国防开支为1340亿美元，2015年为1900亿美元）。如果卡弗里的分析与未来5年的现实基本接近，那么此次以裁军30万和亮了武器装备“家底儿”为起点的军队改革，就应该是一次“增量改革”。按常识推断，“增量改革”不仅出现缺失的可能性会小，而且也更容易让所谓“保守派”和“激进派”都最终接受唯此一途才具有可操作性。

最后我想说的是，裁军也好，不缺钱也好，甚至手里有了部分新装备也好，并不能保证军队改革就一定完美无缺。事实上，军队改革是将新技术及与之相关的战术和作战理论融入军队新的规模和结构中的一个渐进过程，它的成功关键，可能更取决于政治家的决心、耐心、对循序渐进的把握和国家财力可承受的成本控制。■



参加“9·3”大阅兵的济南军区轮式装甲突击车方队

（潘旭摄/新华社供图）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和他的著作《牵线木偶的灵魂》

哈耶克理论的得失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在新著《牵线木偶的灵魂》中分析了哈耶克理论的得失：哈耶克最具创造力的看法是，指出市场是发现和传递信息的一种手段，但他的理论还有科学主义和幻想色彩。

主笔 / 薛巍

哈耶克的科学主义

BBC制作的三集纪录片《货币大师》分别介绍了凯恩斯、哈耶克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关于哈耶克的一集中说：“哈耶克对完全自由市场优势的信任，源于他童年在奥地利的经历。他1899年出生于维也纳，当时维也纳聚集了很多天才，如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哈耶克认识其中许多人。他成长的过程伴随着现代世界的形成，对于这个世界，哈耶克充满了学习的

渴望。哈耶克成长于一个科学家家庭，像当时维也纳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乐于认为自己正在承担揭开宇宙奥秘的伟大使命。年轻的哈耶克尤其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是一位医生和狂热的植物学家。一开始哈耶克像父亲一样，狂热地收集植物和昆虫样本，并对它们按照物种的发展加以分类。16岁时他的兴趣转向了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不再是植物，但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深入他的脑海。”

而在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看来，

科学对哈耶克产生的是负面影响。另外，奥地利赋予他的也不只是一种爱好学术的氛围，其后来崩溃的政治体制也一直令哈耶克非常怀念。格雷在他的新书《牵线木偶的灵魂：人类自由探寻》中说：“哈耶克出生于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享受到了茨威格所说的太平年代的最后几十年，这一漫长的时期是奥地利倒数第二位皇帝弗兰茨·约瑟夫68年安稳的统治。这个帝国政权比取代它的大部分民族国家更文明、更自由，哈耶克见证了它的

解体。哈耶克在哈布斯堡王朝临近谢幕时的经历决定了他对自由和政府的思考。”

20世纪初，维也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都市之一。它的人口不像后来的欧洲那样分裂为敌对的群体。古老的哈布斯堡的政府结构支撑了一个非常现代的社会，它不仅欢迎技术（铁路和有轨电车，电灯和公共卫生），还使得不同的文化能够共存、非常高效的协作。这一秩序被民族主义力量破坏后，形成了一种困境，哈耶克的余生都在思考如何解决这种困境。“如何在政治部落主义的时代复兴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哈耶克无法解答这一问题。他就提出了一种进化论者的伪科学，再把它跟自由主义统治的理性设计混合起来。在教条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家米塞斯的影响下，哈耶克放弃了他年轻时信奉的社会主义，开始认为社会的演进过程会推动人类走向他们喜欢的方向。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遗产是科学主义的一种类型：在研究人类社会时，错误地试图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结果，因为他激烈地批评经济学上的科学主义。”1974年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他说经济学家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制造出的是虚假的知识。

自发秩序的幻想

当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稳定之后，他却在40年代中期不再把经济学作为他的核心知识活动。他转向了社会哲学，这主要是因为在有关大衰退成因的辩论上输给了凯恩斯。这两个人的心智非常不同，凯恩斯敏捷、活跃，对他人的想法明察秋毫，而哈耶克是缓慢地探索，内向、自我封闭。但他们待对方都很亲切。“二战”期间，哈耶克从伦敦经济学院搬到了凯恩斯所在的剑桥大学，有一段时间二人一起负责在楼顶放哨，因为那时

担心剑桥会遭到轰炸。1944年，凯恩斯很大方地表扬了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

格雷说，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差异，既是经济理论上的差异，也是更根本的哲学观上的差异。他们都敏锐地意识到了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但哈耶克由此认为不应该干预经济，凯恩斯则认识到，有时只有政府大胆的行动才能使经济走出衰退。哈耶克最具创造力的看法是，市场是发现和传递分散于全社会的信息的一种手段。正是这种对市场创造知识的功能的洞见，使他形成了反对计划经济的论证。中央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经济学知识无法被集中起来。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不是由于腐败，而是由于人类知识是有限的。问题在于这也适用于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市场确实是像哈耶克说的那样传递信息，但有什么理由相信市场资本主义天然能够纠正其错误？历史不支持这种假定。非理性的繁荣和恐慌也会使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疲于应对。凯恩斯就质疑市场自我管制的力量。他的概率利率揭示了我们关于将来的知识的缺口，一切投资都是赌博，不能依赖市场来分配资本。在现代中央银行出现之前就有繁荣和破产。如果不加干预，自由市场很容易就会像30年代那样陷入绝境。

凯恩斯自己的经历也对哈耶克的理论不利。凯恩斯是20世纪最成功的投机性投资人之一，他每天起床前就用床头的电话代表他的学院买卖股票。他明白经济生活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哈耶克虽然目睹了哈布斯堡王朝如何被战争、经济破产和民族主义毁掉，但他的反应是寻找一个永久的法律框架，作为经济和社会自由的保证。他甚至提出了一些非常稀奇古怪的建议。在《法律、立法和自由》的第三部《自由人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他勾画了一个两院制立法的框架，其

中上议院完全由45岁时当选的人组成，他们的任期是15年，到60岁时退休。哈耶克喜欢取笑可以在抽象模型的基础上设计制度的想法，认为那体现了建构主义者的理性主义。但他的自由宪政框架正是他批评的那种哲学的原型。也许是对理性主义哲学的限度的半意识状态，推动他提出了进化论的猜想。支撑他为自由市场辩护的是相信所谓社会的自发秩序，认为只要人类不受制于政府的压迫，就会演化出使他们能够和平、自由地共同生活的秩序。哈耶克的朋友和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卡尔·波普尔很文雅地推翻了这一观点，他的另一位同事、保守主义哲学家欧克肖特说这是胡说八道，社会也许会出现未经计划的秩序，但它没有理由要尊重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格雷说：“哈耶克这种乐观的精神并不是右翼自由主义特有的。反政治的自由主义是他们这一代进步主义思想家中占支配地位的幻想。罗尔斯和德沃金金的正义观跟哈耶克的正义观非常不同。哈耶克反对最低需求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收入再分配，罗尔斯和德沃金金则奉行各种形式的平等主义。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认为理性的人会集中于一个共同的正义所要求的想法。在他们眼中，政治不是对立的利益和理想不停地相互斗争的混战，而是一个集体思考、走向共同价值观的过程。”

“哈耶克也许仍能教我们一些教训。他在大萧条期间提出的政策建议有着严重的缺陷，但是他说不能通过无止境地扩大债务来恢复繁荣，这一洞见现在是有价值的，因为凯恩斯主义者的量化宽松限度已经很清楚了。凯恩斯应该不会支持扭转崩溃局面之后，仍然实施货币宽松。凯恩斯主义是不动脑筋的学生调制出的概念，它不能表明头脑灵活的凯恩斯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困境。”

垃圾堆中萌芽的植物，自己也变成了某种垃圾。植物垃圾。”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杂草”的背后，都有一双人类的“凝视之眼”。这就像美国学者温迪·达比在《风景与认同》中所说的，所有的景观背后都是人，必然涉及到谁有权来定义、再现和控制这些风景。也就是说，这种审美原则本身是一种权力。在那种英国乡村风景画中，其呈现的不是某种“事实风景”，而是“象征风景”——仿佛是井然有序的理性主义的缩影，表现着英国式的田园诗生活，而能带来审美愉悦的风光往往意味着要把那些令人不快的干扰性事物（例如农业劳动者或杂乱的树木）从画面中删除掉，以使人能够观赏纯粹的画面。

对杂草的态度也是如此：人们本能地会把那种符合我们观念中有序和美感意识的风景才看作是“美”的，如果什么植物扰乱了这种干净有序的世界，或不按人类的行为准则生存，我们就将它们冠之以“杂草”之名。这其实是一个农夫的视角：他希望看到的田野里都是有用的、整齐的、因而也是美观的农作物，而其他的植物通常只有在它们造成危害时才值得特别予以关注。

因此，一如书中所言：“我们如何、为何将何处的植物定性为不受欢迎的杂草，正是我们不断探寻如何界定自然与文化、野生与驯养的过程的一部分。”这也不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那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而从自然和植物本身去理解它们。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认识的改变本身，正是因为人类的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我们对自然的主宰性优势已经确立，这才使得人们开始觉得，那些不驯服的“野性之美”不失为过度文明的一副解毒剂。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赞美杂草之美：“不加雕饰的、无处不在的、光合作用下的勃勃生机”；它们那种无与伦比的旺盛生命力（有时是太旺盛

了），以及在战乱年代，象征着在逆境中强大的恢复力。现在人们不再以宗教和道德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不会斥责它们是“魔鬼之肠”或“寄生的”，而认为凡符合自然之美的都是好的，相反那种人工雕琢的才是令人厌烦的。鲁迅的《野草》则借此歌颂反抗和不驯顺：“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然而问题在于：这意味着人



更可取的方式，恐怕既不是消灭杂草，也不是人类自愿灭绝，而是彼此学会如何共存下去。其实，一直就是这样。

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吗？我想答案是：没有。因为这仍然意味着从人的视角出发来界定植物的审美价值，只不过现在审美判断发生了颠倒，人们欣赏的不是驯服的、规则的、对称的、繁复的美，而赞赏野性的、残缺的、不对称的、简洁的美，甚至“美”本身都被放弃，进而去欣赏丑、怪、拙、朴的事物。

不仅如此，人们渐渐意识到：就像农作物一样，很多杂草本身也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杂草就是我们培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作物”。这无疑源于一个现代观念，那就是——人创造出了不受自己控制的造物。最早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就是这样一个隐喻：人用技术创造出的工具，最后却反对人本身。很多杂草的产生，并非因为它生而为杂草，而是因为人们将它带到远方，使之在一个没有天敌的环境下疯长；又或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导致原本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不仅农作物需要人类（据说假如人类灭绝，麦子最多活三年），杂草也是和人共同进化的，用美国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的话说：“没有人类来创造农田、草地和空地，大部分杂草都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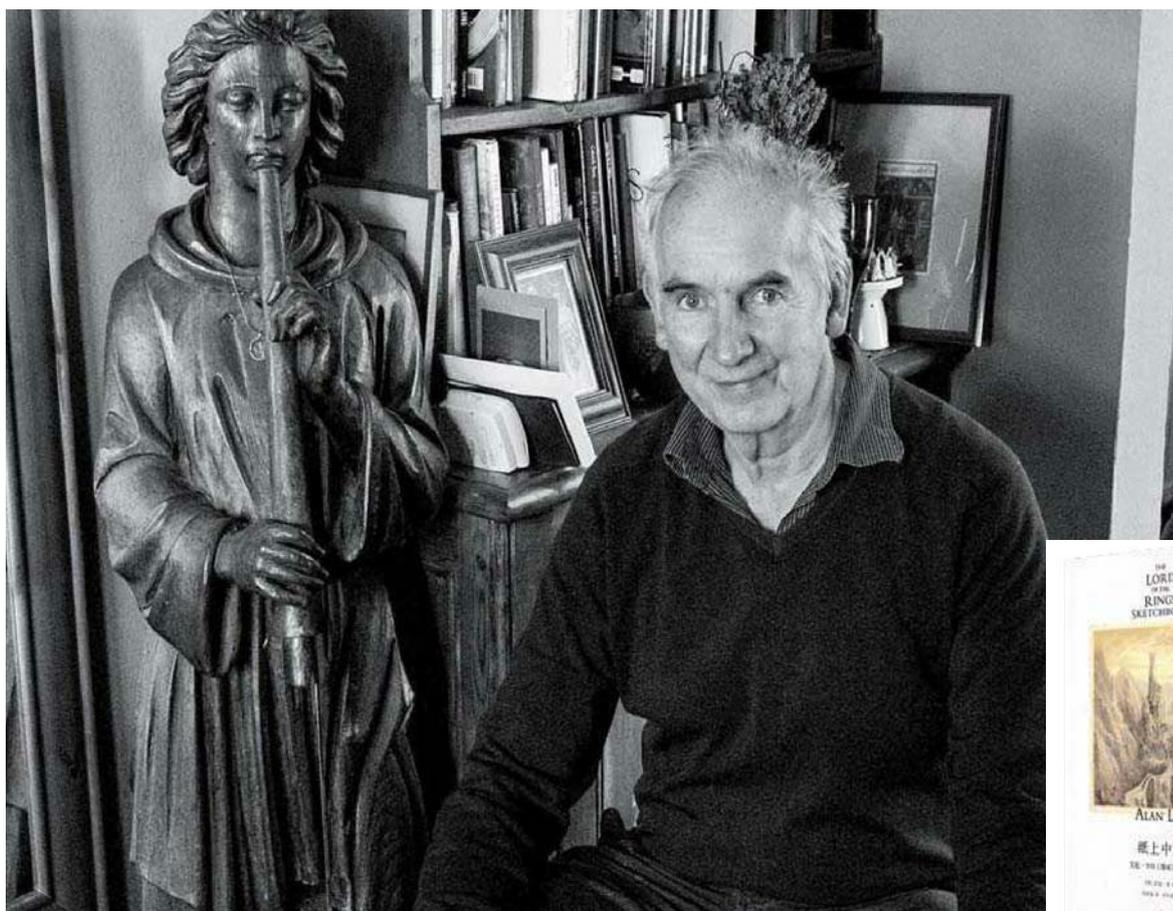
很快消亡。”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东方的观念中，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常归于某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局面，即让人融入自然；但在西方的主客二元对立意识中，则往往以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告终。既然现在完全主宰自然被看作是某种不可挽回的破坏，因而在欧美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即

把人的存在本身视为原罪，假想一个人类灭绝后的世界。在《没有我们的世界》一书中，详尽设想了人类消失后自然界逐步恢复的情景。根据这种观念，自然界是一个外在于人类、自行运作的客体，鸟类学家史蒂夫·希提（Steve Hitti）曾说：“如果人类消失了，地球上至少三分之一的鸟类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件事。”这是“‘文’化为‘野’”（rebarbarization）的终极版本：文明完全消失，而代表着野性的自然重新占领这个星球。看似颇为奇怪的是，在这景象的背后，仍有一双对此感到欣慰的人类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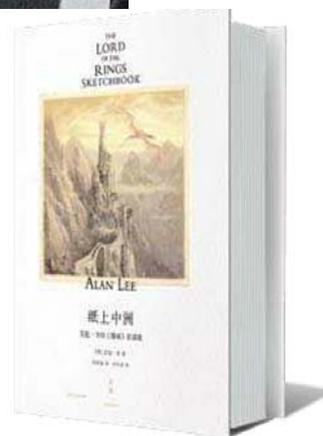
既然我们现在认定所有的植物都是平等的，也意识到试图完全驯化和控制自然界只会遭致反抗，生活景象的整洁有序有时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那么更可取的方式，恐怕既不是消灭杂草，也不是人类自愿灭绝，而是彼此学会如何共存下去。其实，一直就是这样。人类固然在利用杂草，杂草其实也一直在利用人类，就像所有的作物、花卉和果树，都成功地发展出一套让人类协助它们成功繁衍的策略。☑

（《杂草的故事》，译林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克里斯·查普曼 摄)

英国插画大师艾伦·李和他的著作《纸上中洲：艾伦·李的〈魔戒〉素描集》



他把托尔金的世界变成了你的视野

“我会专注安静的氛围，而不是剧情进入最高潮的部分。”英国插画大师艾伦·李说，插画是用来支持、润饰读者对作品的阐释，但绝非提供一种全新的观点。

记者 孙若茜

“我很喜欢自己那幅比尔博在袋底洞门口驻足的画，那是在甘道夫到来之前，他的世界还没有被搞得天翻地覆。但此时我已经清楚地知道，霍比特人悄无声息又躲躲闪闪，是在避开插画师窥视的眼睛。”艾伦·李所说的这幅画，在他为《魔戒》和《霍比特人》所画的插画中，实在不能算是夺人眼球的一幅。

它所展示的并不是整个故事中的关键情节，甚至都算不上情节，也似

乎没有暗含太多的玄机，只是霍比特人一切如常的生活，是中洲世界所发生的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中难得的宁静一瞬。画面中手拿着烟斗的比尔博站在袋底洞口，面露浅笑，眼睛正看向别处。远处是成片叠落的田野、森林、山峦和层云，一条小路蜿蜒其间不停地向前延展。水彩让画的色调并不艳丽，但层次和细节极其繁复、清晰，因此，观看许久也不会觉得烦腻，反而会完全沉浸在一种细腻、安静的气氛里。

所以，虽然不抢眼，但这幅画足以展示出艾伦·李是多么地擅长水彩，以及他在诠释托尔金作品时是运用怎样的一种独特表达。他告诉我：“我不想干扰读者阅读过后心中浮现出的画面，因此不去寻找故事中发生动作打斗之类的节点，重复作者描述过的东西。而是在他的陈述中找寻自己施展的空间，寻求如何能渲染出一种氛围，构想出一个场景，描绘出环境地形，为读者创造出更大的世界，而不是亦

步亦趋地对文字进行再现。”

他希望自己绘制的插画可以支持、润饰读者对作品的阐释，但又绝非提供一种全新的观点。因此，这种创作既要紧密地依靠住文本，又要谨慎地避免对文本的依赖。展现他这观念的典型符号，就是画中的小路。“通常会画出一条通道穿过画面，延伸到远处。如果你去注视图画边角，就能在心中看到这幅画延伸出去的部分。就像是如果你正处在画面当中就会看到一条路。”艾伦·李的很多作品中都有这样的路，或者说是通道。他希望读者能依照他给出的画面构想出自己的视角，在惊呼着“这和我想象的一样”并认出那个世界时，还能收获一些惊喜。因为在他看来，关键之处并不是你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而在画面周边或者远方，你能想象出来的东西。

“这并不是简单地将作者的描述转化为画面，文字的力量并不在它们唤起的画面中，而在它们于我心中激起的情感。”艾伦·李拿托尔金笔下的洛丝罗瑞恩举例，说他自己所见过的绘画，包括自己的作品，与托老用文字所描绘出的动人心魄的力量都弗如甚远。他读到那文字中流露出的一种很原始的情感：“它来自于人类发展早期便遭破坏的森林与我们的联系——我们内心的一部分仍然渴望着那片失去的乐土。”他读出这样的情感流露于托尔金所有描写自然的文字中，而在那些描写树木和森林的段落里，其感染力就更强，尤其是洛丝罗瑞恩。

艾伦·李像托尔金一样热爱自然。他出生在英国伦敦的米德尔塞克斯，一个濒临泰晤士河的地方。小时候，家的附近就是成片的森林。17岁第一次读到《魔戒》时，他正在一处墓园做园丁。白天，在常青藤掩映的墓穴和幽暗的树荫中忙碌，晚上沉浸在托尔金缔造的中洲世界里。大概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开始意识到，比起在墓园修剪花草，他更喜欢为书籍绘制插

画。于是，他花了3年时间学习绘图和插画，又给平装书画了6年封面。

后来，他从伦敦搬到了德文郡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扭曲的树木覆满苔藓，藤蔓交错的小路指向远处起伏的荒原，他把自己的工作室就安置在灰色的德文郡石砌起的、覆满玫瑰的谷仓中。他说：“我将尽可能多的时间都用于写生自然。”他实在很爱画树木和森林。对他来说，那就像是画人物一样，树木的阅历就记录在每一处瘢痕与参差当中，并且它们还拥有延展与弯曲的无限可能。“长时间地描绘真实的森林之后，总有机会尝试虚构的林地，大可自由、精细地作画、设计。”

当托尔金在构建中洲世界时，他不断回想起自己置身森林中、高山上的时刻，并尽力表达出他自己的体验。艾伦·李同样根据自己在自然环境中的体验进行创造，他不断地在森林和山野中画素描、拍照，相信自己积累的素材越多，创造、还原那样一种世界时就更加容易。因为，他与托尔金共赴的幻想世界是基于真实世界存在的，并不完全是个虚幻的环境，而他自己自己在自然中产生的感受，和阅读托尔金作品后产生的想象是并行的。“我们做的是两件相同的事，虽然我们的结果不一定会完全相同，但如果我对此足够敏感，就可以用我自己和自然接触的体验来创造托尔金和自然接触后所产生的世界，重现他的视野。”

“你去画一棵树，对这棵树的方方面面倾尽关注，这行为不仅是在向这棵树致敬，向大地本身致敬，也是向我们人类与它的关联致敬。”艾伦·李认为，绘画是在向我们呈现人类发现这种关联的瞬间，而这同样也是神话常常带给我们的。

他对神话和传说的钟爱由来已久，小时候第一次和神话故事相遇后，他就迅速读遍了附近两座图书馆中的所有传奇故事。因此，他擅长为神话绘制插图，仙境传说、凯尔特神话和亚

瑟王故事，他都画过。早年时，他还和朋友一起创作了《仙灵》——这本书探索了仙灵传说在英伦的丰厚传统，从古老的口头传说中寻找仙灵的形象。1978年出版时它非常畅销，并在此后成为影响一代艺术家、作者和电影人的重要文本。它的成功，让艾伦·李获得了更多机会为自己热爱的神话绘画。

1988年，J.R.R.托尔金百年诞辰，英国出版社HarperCollins邀请艾伦·李为《魔戒》绘制50幅新插图，历时两年作品出版。1997年，《霍比特人》出版60周年纪念，艾伦·李出版了包括26幅水彩和38幅素描在内的《霍比特人》插图本。次年，在世界奇幻大会上，他获得年度最佳艺术家奖。1992年，他为《伊利亚特》所作的插画还曾使其获得了英国童书最高荣誉格林纳威奖。

众所周知的是，托尔金构建中洲时，通过北欧神话、凯尔特民族传说等汲取了很多灵感，艾伦·李可以对此清晰地把握。“当托尔金描绘矮人的时候，我脑海中出现的形象和他心中的想象不会有多大差别。因为那并非凭空创造，而是来自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他说，神话当中常见火龙、魔戒和对金子的贪婪，托尔金写下的是他自己版本的故事，在细节上，对以往的神话有许多借鉴，真正由其创造的是霍比特人、精灵的文化和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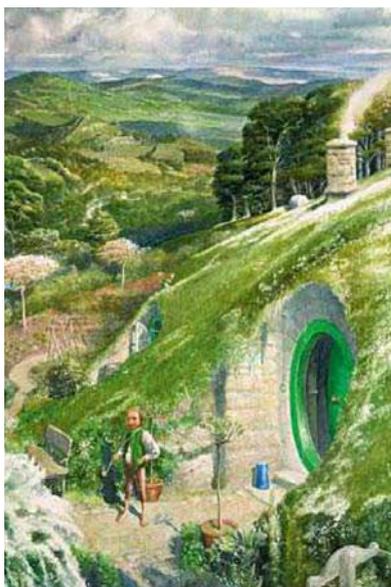
这样的理解能让他在创作时准确地寻求到文化元素上的对应。比如，霍比特人带着明显的英国气息；刚铎的白城米那斯提力斯适用拜占庭帝国的元素——古老、丰饶但正在衰落；而洛汗，按照托尔金的描述，它主要类似盎格鲁-撒克逊的风格，他们居住在木质房屋里，建造宴会大堂，热爱马匹。至于巴拉督尔和欧尔桑克以及其他邪恶之处，他认为，那并不与这个世界任何文明的外貌相同。它们既被赋予哥特风格中的华丽外观，又显得更加畏手畏脚，几乎全是尖锐突

出的棱角、锯齿般的外表，让人觉得坚硬且残忍。

在为《魔戒》创作插画的过程中，艾伦·李让风景居于率先统领的地位。如他所说，他希望尽可能地避免让那些更着重于人物及人物内在关系的图像干扰到读者脑海中已经建立起的形象。因此，在某些场景之中，人物被画得小到难以辨清。这也正符合他自己的习惯倾向——绘制不可思议的、奇特的景观首先是他个人的偏好。刚好在这个史诗般的故事中，他所渴望的就是宏大。“我感觉自己的任务应该是去跟随那些史诗中的英雄，有时要保持一段距离，当其感情饱满之时走近特写，但要努力杜绝对于文本中的戏剧性高潮点进行二度创作。”这样的风格让托尔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托尔金评价说：“艾伦·李让中洲世界变得更加辽阔了。”

但是，在为《霍比特人》所作的插画中，艾伦·李放弃了用远景制造距离感，反而让插画聚焦故事中的英雄本人。他给我的解释是，这毕竟与《魔戒》不同，是一本托尔金写给孩子的书，年轻的读者更加偏好人物，而地点次之。他希望自己的插画让读者觉得它更像一本儿童小说，而并非充满着地形地貌。他认为这本书理想的人物形象会略带一点点夸张的幽默感，但又不会太卡通，他强调说：“只是一点点。”

于是，在尝试构思一个寻常的霍比特人的形象时，他要求自己既要符合作者的描述，又要避开显得过于孩子气、滑稽或者荒诞的误区。这听起来就非常难。“我从没见过任何一幅能让我感到信服的描绘霍比特人的画作，我也说不好自己笔下描绘的比尔博是否离这一目标更近。”在他笔下，佛罗多是难定年龄的年轻人，甘道夫是岁数模糊的老者。毕竟，谁也不知道霍比特人成熟的速率，而作为迈雅，长生不老的甘道夫的肉身大概已经使用了2000年。



比尔博在袋底洞。选自《霍比特人》(精装插图本)



号角堡之战。选自《魔戒》(插图本)



黑骑手来袭。选自《纸上中洲：艾伦·李的《魔戒》素描集》

有趣的是，艾伦·李在对这两个关键人物的具象化过程中找到了“原型”。霍比特人是他的朋友基兰·沙阿，他身高1.27米，后来在电影“指环王”三部曲中担任了佛罗多的比例替身。而甘道夫，却不是身边什么酷似巫师的朋友，竟是他创作时支起的两面与画板形成斜角的镜子，使他能摹画出自己啃着铅笔头儿的模样。他告诉我，这是他经常采用的方式：独自工作到深夜时，忽然需要了解某个动作或姿态，旁边没有人可以帮忙摆出姿势，他就依靠镜子里自己的侧影，比

如，抓起一把剑。当要画一些面部表情，他自己的表情也会变得相同。“当我要画霍比特人时，我就让自己成为霍比特人，如果画精灵，就会自然而然地采用精灵的思维方式。如果画难看的人物，会做些鬼脸。进入一种思维方式、登上一个舞台，我想这有那么一点儿类似于表演，而这些都是无意识的。我相信大多数人也是这样。”

艾伦·李擅长以素描、水彩作画。素描是以朴素的形式制造出一幅插画的气氛或者内在动力，水彩吸引他的地方则是那种不确定性。他喜欢看到画

笔上较重的颗粒沁入直面的起伏之中，尽量被湿度和重力所影响。“在用其他手段和媒材时，你可以有更多的控制，同时也就必须对页面上的每处印记负责。但用水彩时，你是在和颜料对话，它向你反映，你也反过来向它反映。”

可能也说不上是排斥，但除了参与电影后期制作时，艾伦·李几乎很少用 Photoshop 作画。他调侃说，很多人使用 PS 的水平都比他高很多，如果不是用铅笔和水彩作画，自己恐怕会淹没在一大堆 PS 画家的作品之中。而真正的原因，是他觉得 PS 会损失掉原创性。“对我来说，线条的质量和水彩的质感，很难在软件当中复制出来。PS 很伟大的一点就是可以迅速修改、迅速完成，但是每当我审视自己的 PS 画作，我都不愿把它们挂上墙，也不愿意向别人展示。”

艾伦·李开始为彼得·杰克逊的电影“指环王”三部曲做概念设计是在 1998 年。当时，同样应邀前来的还有插画家约翰·豪。和画插画时直接回应作者不同，虽然同样是打造中洲世界，艾伦·李在电影团队中回应的对象变成了导演——即便他坦承自己当时并不是被电影的魅力吸引而来，而是因为深爱着要讲述的故事。

他主要参与的是城市、建筑、环境方面的设计，导演说约翰·豪非常善于描绘动态的、戏剧性比较强的场面，比如邪恶一方和恶龙之类，因此要求他专注在巴拉督尔和其他邪恶地域的场景上，而要求艾伦·李专注一些优美的环境。但他们在创作过程中还是有些交互，比如艾伦·李设计了欧尔桑克、约翰·豪设计了袋底洞，而艾伦·李又设计了霍比屯的其他地方。有时他们会创作同一个场景，让导演有更多选择并观察他会怎样选。“我们都希望能画出彼得希望看到的东西。所以或许约翰和我对某个场景的看法不同，但我们都需要不去管自己是想怎么做，而是依照彼得的想。”

在他们的中洲里，每一样事物都要去建造、雕刻、手制、描画。“我们永远没有把握，摄影机的镜头掠过美工部门和维塔工作室制作的布景表面和道具时，会不会不小心近到可能露馅的程度。”于是，他们在工作中必须精益求精——家具、手推车、工具、马鞍以及演员们携带或手持的道具，每一件都要当作工艺品来设计，而这种工艺品必须堪为中洲大地上某种文化的造物。而后，这些设计由极富才华的工匠实现——美工部门就大约有 400 名木工、施工人员、道具制作人员、雕刻师、草木师、油漆工、一个“石头与泡沫材料小组”，以及鞍具工、纺织艺人、书法家和制作玻璃制品、陶器等各种手工艺者。拍摄过程中，他们制造了 350 套布景，另外又为三部影片的补拍镜头制作了大约 50 处布景。

不遗巨细，有时候连艾伦·李自己甚至都觉得对细节打磨得有些过了，比如拍摄在风云顶打斗的场面时，他从街上的砖墙里抠来一团团苔藓塞在铺地的假石板缝里，还一棵一棵地把干草种在他认为摄影机会近距离掠过的地方。重要的是，这个场景是为全天候而建的布景之一，也就是说必须随时准备就绪，但也可能需要等待拍摄而原封不动地保持几星期。于是，他和他的同事们每天都要检查和完善，往往是亲力亲为。

“我们在片中各处努力添加细节和对故事各个方面的视觉参考，它们不会推动情节主线发展，却能加深我们对情节的理解——同时加深我们对中洲的范围与历史的理解。”艾伦·李对于他在电影幕后所做工作的理解与他对插画之于读者的作用所进行的解读非常近似。但是，相比为一本书画插画，他为电影所做的工作堪称海量。

6 年的时间，艾伦·李彻底沉浸在电影设计之中，除了设计、绘制的工作之外，还包括跋山涉水对那些偏僻外景地所进行的探索。最终，他绘制

了探索中洲方方面面的超过 2500 幅的速写，以及为特效镜头画了数百幅数码绘制的效果设计图，和其工作人员一共搭建了 400 处布景和 80 座微缩模型，且全部都是精工细作。凭借这些贡献，艾伦·李因《指环王》荣膺 2004 年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此后，他为电影《霍比特人》投入了又一个 6 年。

“一旦你在某件事情上如此投入、耗费如此长的时间，那些在你日常关注之外的事物便如白驹过隙、疏离而陌生，仿佛一部告别放映的电影。战争发生、政府倒台，人们相遇、结婚又生了两个孩子，这期间我们却在思索、探讨如何制作逼真的岩浆，魔戒毁灭那一刻又该是什么模样。”艾伦·李的这段话写在《纸上中洲：艾伦·李的〈魔戒〉素描集》的最后，我觉得这段话再好不过地描述了他沉浸在《魔戒》中，有如在其他时空中度过的时间与之现实生活的关联。

因为该书的中文版出版，前不久，艾伦·李受邀在中国参与了多场读书活动，我得以在北京和他见面聊天，并成此文。在这本书中，他配合手稿，非常细致地讲述了自己在参与电影制作时与维塔工作室重现中洲世界的历程。其中包含了 150 幅素描及设定图，以及从未面世的《指环王》电影概念原稿等等。

演员伊恩·麦凯伦为其作序时说，自己最初就是因为看到导演手中那 40 多幅艾伦·李所作的令人震惊的中洲画作，才点头同意在《指环王》中扮演甘道夫一角。序中写道：“当读者们在电影中辨认出托尔金笔下的人物与景致，并发现其‘和我想象的完全一致’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把顺序想反了。事实上，他们对小说的印象，已经被原有的插图过滤或渗透过。这并不仅仅在于，艾伦·李的布景和设定有那么栩栩如生。”如此人们常说，托尔金创造的世界，艾伦·李让我们看见。■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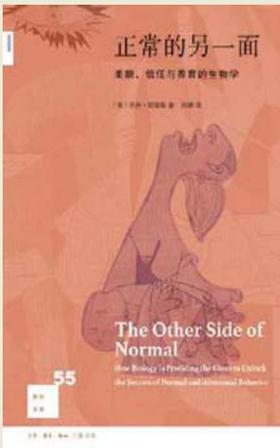
[美] 程为坤 著 杨可 译 定价：39.00元

女手艺人、佣人、乞丐、小贩、三姑六婆、戏子、普通妓女……清末民初的北京，这些劳作的女人，努力适应着急速变革的社会，在市井之间为生计而奔忙。作者以精细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她们的各种潜力与可能，以及她们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中的危险与焦灼。

合肥四姊妹

金安平 著 凌云岚 杨早 译 定价：35.00元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金安平女士，借由信件、日记、家谱、诗歌、杂志和访谈，讲述了张家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四姐妹的传奇故事和集体记忆，为这个家族撰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编年史。对于古老中国及其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进程，作者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洞察力。



正常的另一面：美貌、信任与养育的生物学

[美] 乔丹·斯莫勒 著 郑熾 译 定价：39.00元

信任和爱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对外貌和性吸引力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兴趣？感情给我们的记忆涂上了哪些本来不存在的色彩？这些问题，只有掌握了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的工具后，科学家才找到解答的门户——隐藏在心灵背后有关“正常”的生物学。

艺术概论

蒋勋 著 定价：48.00元

深入浅出介绍各项艺术的源流、特性，艺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使人可以坦然看待艺术，从中获得乐趣。这本书适于每个人在案头、枕边赏读，更是课堂上的最佳教科书。



粉黛罗绮——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

陈芳 等著 定价68.00元

先秦的清纯、质朴，汉代的繁复华美，六朝的灵动飘逸、飒爽戎装，隋唐的胡风汉韵、葳蕤华彩，宋朝内敛的奢华富贵，辽金元的佛妆和高丽风，明清之际的低调奢华……对各个时代女子妆容服饰的个案研究，从直观且微观的角度彰显时代文化。

筑人间：汉宝德回忆录

汉宝德 著 定价：42.00元

汉宝德兼具建筑学教授、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建筑师等多重跨界身份，但都以建筑文化与人文思考为依归。本书由汉宝德亲自执笔，将其一生由幼及长，从求学到做事，从建筑理想到文化志业，点滴记录。



老头

文 / 舒曼同学(湖北) 图 / 陈曦



在从医院回去的路上，阿彩码了2000字的日记，题为《青春需要奋斗，可命是自己的》，她讲述了自己患上颈椎病的前前后后，夹杂着对大学4年生活的反思。一时间，点赞评论瞬时在个人空间炸开了锅。嘘寒问暖的人不少，可是只有老头私信，还发来语音，连忙问她的近况，鼓励她要坚强。阿彩想起了2011年的夏天。

她刚来的时候位列全班23名，老头不怎么赏识她。只不过原来的老师对她好评如潮，这才叫他在100号人中刻意关注起这个女生。第一次按照成绩排名选座位，她靠窗坐着，因为留给她的最好的位置也只有靠窗，窗外的风景并不怎么美丽。对面的教学楼空空如也，只有几只顽强的“蜘蛛人”顶着烈日吊着绳子在装修，她这才记起原来这还是暑假，2001年7月12日。因为一纸成绩单和一口怒气便与大好的世界隔绝。就连父母第一次来看她的时候，也会口无遮拦地说起谁谁的孩子考上了哪个大学，你要是明年能跟她一样就好了。阿彩一脸的鄙夷，大口吃着鸭肉堆里的辣椒。

没有人主动关心她，或者说，没有人敢关心她。

老头几乎每天每时每刻都围着教室打转，那时他还兼任着理科班的班主任。所以语数外政史地理化生他都懂，任课老师看不完的试卷他来改。4年以后，大概也没有人会相信4年前的他也只不过是四十出头，黝黑的皮肤，消瘦的身体，为学生操碎了玻璃心才显得苍老异常。两年前，老头在省城名校的儿子高考只达二本线，阿彩特地打了电话过去，那头除了叹息还是叹息。他说师母一直在责怪他心里只有别人家的孩子。不过他也有不少发脾气瞪眼珠子青筋凸起的时候。通常一顿臭骂以后他就背着手走了，教室里就会安静一会儿。但到冲刺的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有段子讲，不正宗的普通话夹杂着家乡话别有一番味道。

几次考试下来，阿彩稳居前三，老头便经常

找她谈话，她也挺能说，通常谈完正经事就无厘头地要这要那。寝室的女同学晚上鼾声阵阵，晚上没睡好第二天学习就没有状态，她吵着要换寝室，两三个回合以后她总算搬进了英语老师不用的公寓。从此陪伴她的就是塑料桶里的那只比她年纪还要大的乌龟。

文科综合开始模拟的时候，阿彩成绩马上下滑，这连她自己都不相信。父亲赶到学校的时候，一巴掌莫名其妙地扇过去。老头马上怒了，把阿彩入学以来的成绩和排名写在纸上递过去，再也没有说话。后来老头再问起阿彩情况的时候，打趣地说：“这么多年你能这么坚强地活下来真是不容易。”从那以后，他们的话题里也不再有关父亲这个话题，他生怕触碰到痛点。可是他不知道的是，阿彩这只打不死的小强根本不会因此停止进步。

他们的关系很好，很多次老头都想认阿彩做干女儿，不过都被阿彩拒绝了。高考前的晚上她又案件重演地失眠了，校车出发前，鞭炮声震耳欲聋，阿彩双手合十竟也阿弥陀佛念念有词。那天晚上，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回到教室自习，她一个人波澜不惊地练毛笔字，老头敲了敲她的桌子，示意她别写了。第二天果然出了意外，文综考试因为计时员睡觉提前五分钟下考，看到操场上的哭泣的同学她才恍然大悟。所幸的是，这一回，她做完了，她欣喜若狂地告诉老头。

告别的时候，阿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她说，最深厚的感情用不着表达，就像那年父亲那没有只言片语的一巴掌。18天后的晚上，成绩出炉，排名班级第二。数学却出乎意料地比第一名少了30分。老头说，这辈子也就它跟你过不去了，今后的路要绕开它走。

相比大学里遇到的老师，感动更加深刻，不说谁更好，因为缘分不是说有就有的。如果当年没有遇到操心的老头，兴许阿彩就是另一番模样吧。✍